

[美] 安德鲁·利维森 著

55682  
248

# 工人阶级多数



商务印书馆

# 工人阶级多数

〔美〕安德鲁·利维森著

本馆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务印书馆

1976年·北京

---

*Andrew Levison*  
**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Inc.  
New York 1974

**内部发行**

**工人阶级多数**  
〔美〕安德鲁·利维森著  
本馆翻译组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9<sup>1</sup>/<sub>2</sub> 印张 195千字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4017·150 定价：0.74元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美国人安德鲁·利维森曾在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当过工人，现为佐治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争取社会改革中心的研究人员。

近年来，美国流传着一些粉饰工人阶级状况的神话，如说美国“工人阶级已成为少数，白领工人（脑力劳动者等）的人数已超过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不断提高的收入已消除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别，蓝领工人现在已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等等，作者用具体统计资料指出，美国工人阶级仍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个比数还在逐年增长，美国在业工人的大多数是贫困的，远远够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事实证明，工人的劳动条件很差，工伤事故、职业病很多，课税繁重，又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毫无根据的神话。

虽然作者看到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可能彻底解决美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问题，但是由于作者的根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他也就根本不敢和不愿触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反而竭力美化资产阶级国家、政党的职能，鼓吹阶级合作，宣称：“本世纪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不发达国家中发生的”，“不适合美国工人的需要”。呼吁民主党的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组成政治联盟，进行所谓社会改革。实际上这是



在散布幻想,麻痹工人阶级,而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出谋划策。

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阶级结构、美国工人的贫困化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目 录

前言：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 .....	1
第一章 美国工人阶级 .....	6
第二章 对工作的不满 .....	41
第三章 对社会生活的不满 .....	85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政见 .....	120
第五章 工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	160
第六章 当前的局势 .....	200
第七章 将来 .....	236
注释和资料来源 .....	279

# 前 言

## 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

水门事件和能源危机久已成为首要的新闻，以致今天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以及所有希望进步的美国人所面临的更加根本和迫切得多的政治问题，即蓝领工人选举谁的问题，倒显得黯然失色了。揭露尼克松政府长期存在的欺骗、腐败和非法活动的混乱情况，也许可以断然地削弱保守派所吹捧的“正在露头的共和党多数”的活动能力。但是问题仍然存在。1972年，蓝领选民投向尼克松。1976年他们又将如何呢？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中心问题。

其原因很简单。如果象中间派所说的那样，1972年的选举表明美国工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目标业已丧失信心，并选择了右翼作为他们的政治根据地，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进步的方面就没有什么希望能够争取到美国人民的大多数。根据这一论点，水门丑闻从其结果来说，只不过是长期保守倾向的一个暂时挫折，并且1976年仍将选出这样一个总统，他即使在目无法纪方面比不上尼克松，在政治保守方面却将与尼克松不相上下。

尽管那种前景很阴暗和令人沮丧，许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却已开始予以承认。他们断定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理想，或者不顾工人，而谋求与妇女、青年和社会上

被疏远的人们结成联盟。他们回避蓝领问题，在别处寻找赞助者。

这些是广泛持有的看法。本书的中心论题是，所有这些看法根本是极端错误的。不应当忘记在美国有争取进步多数的希望，完全不必抛弃基本的进步原则和理想，也不应该把那些缺乏共同兴趣的、彼此大不相同的集团提出来作为解决目前政治困境的办法。

所有这类办法是从绝望中产生的策略，而不是认真了解美国工人的实际问题、合理的不满，以及——十分重要的——很不错的民主本能。它们是根据一种关于工人和工人阶级生活的普通看法而得出的结论，而那种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想一想蓝领工人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吧。虽然五十年代“富裕工人”的愉快形象，近年来已变为不那么欢欣鼓舞的“中等美国人”，可是一一般都承认，蓝领生活的传统不满已经成为陈迹，工人现在是“较低的中产阶级”，是富裕的美国社会中非正式的低级伙伴。没有价值一千美元的立体电视机，或许没有到阿鲁巴岛去作圣诞节旅行，可是据一般的看法，他们越来越同美国郊区他们的中产阶级邻居一样了。

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人们谈论技工工资过高，收入差距很小，实际的情况却远非如此。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的生活不仅远远不够富裕，而且低于政府给一个充分舒适的“中等美国人”的生活所规定的一般标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基本上用双手劳动的人和用脑力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并且象那种关于类似的生活方式的想想法一样，与实际

情况不符,实际的情况是,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地理上的间隔,这种间隔已接近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了。在工作上,在社会中,工人往往不仅面临着最严峻、最迫切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虽然多年来有真正的改进是无可否认的,可是牢固地存在着真正和根本的不平等,也是无可否认的。只要考查一下,甚至那种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白领社会的由来已久的陈词滥调,也变成一种歪曲事实的完全骗人的鬼话。在本世纪的其余年代里,美国人的大多数仍将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者,而不是专业的或从事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

对于工人的政治态度的一些流行看法,同样是不对头的。尽管有人常常把他们讽刺为远比中产阶级糟糕的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可是认真的考核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在美国工人阶级中,确实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强烈思潮,但是,如果现在把所有的工人都看作是殴打学生的充满仇恨的保守派工人,那就与三十年代亨利·方达主演《愤怒的葡萄》影片时把汤姆·乔德的形象无耻地加以浪漫化的情况一样是不正确的。选举的结果和其他实际生活态度事实上都表明,在某些主要方面,蓝领工人在美国政治中仍然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一股保守力量。

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些说法和他们所读到和听到的一切事情截然相反,所以他们会马上加以驳回。但是,虽然每一种说法都同二十多年来已被接受的一种普通看法相抵触,它们却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必须指出的是,根据传统观点作出的关于工人的每一种预言,尽管被人广泛接受,实际上都是错误

的。它说什么蓝领和白领已经变得几乎不可区分了。然而在1968年，先在华莱士竞选运动中，后在工人和学生的冲突中，工人十分突出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根据这些事件，人们认为工人突然成了这种“社会问题”的俘虏，并且成为受阿格纽或任何其他乞灵于种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反动政客欺骗的傻瓜。

民主党在1970年选举中的胜利，再次证明关于这一普通看法的预言是错误的。然而，在1972年7月，民主党虽然孜孜不倦地要确保代表大会中有适当数目的妇女、青年和黑人的代表，却没有认真讨论应当如何同样关心工人代表人数的问题。标新立异的报刊可以在大会上拥有发言权，但一些工会职员——他们都是支持麦戈文的——却连旁听证也拿不到。这对于那些从电视上注视着这次大会的蓝领工人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一个技工是南部一个地方工会的车间代表，他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归纳了这种情况：“我在那里看到的仅有的工人是戴着华莱士式的礼帽的。”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但这已足够说明，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阶级的这种混淆不清是多么有害了。

关于蓝领工人人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富裕以及政治见解趋于极端主义的神话，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它每次被接受，就引起工人的反感，使自由主义者陷于孤立。它所酿成的漠不关心和彻头彻尾的恩赐态度，已经成为六十年代几乎每一个社会运动，特别是和平和生态学的绊脚石。它在尼克松再度当选总统方面起了作用；如果我们死抱住这种态度不放，那就会在1976年选出一个象华莱士那样的人物或比他



更糟的人。每当所订定的政策以这些概念为基础时，这些概念就曾导致失败。如果象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它们是根本错误的，那么，这该是一劳永逸地抛掉它们的时候了。

简单地说，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

\* 需要作一点最后的说明。由于本书的主题不仅是专家们感到兴趣的，而且也是每个关心美国前途的人都感到兴趣的，所以作者尽最大努力要把本书写得简单易懂。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一个一个的结论都和广泛持有的看法相抵触，所以那种避免图表和脚注的潦草而过分简单的文体（这是许多关于一些专题的“通俗”论述的特点），也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其结果我希望是一种恰当的折衷办法。所有事实都作了脚注，应该有详尽资料的地方就使用图表。

另一方面，不使用比百分数更为复杂的任何统计标志法，把一些互相有关的数据等等尽可能改写成普通英语。同样，虽然一段中有许多脚注和各页都有脚注，对于专家们十分方便，可是对许多读者来说，它们就象中世纪欧洲的拉丁文祈祷在一个上教堂的农民看来非常陌生和望之生畏一样。因此，在许多场合，在有一系列有关的轶事或事实的地方，就在这一段或有关的几段的结尾处用一个脚注，向有兴趣的读者指出所使用的资料出处。



## 第一章 美国工人阶级

### —

这是秋季里寒凉而阴郁的一天，中西部就是以这种天气而闻名的。我坐在一所大学的教室里，厌倦而心不在焉地记着笔记，记录那“十大”学院中把人们从一年级拉扯到四年级的大批不知其姓名的教授之一的讲课。

我跟一个朋友坐在后排，他也同样厌倦和精神涣散。他是一个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出生在密尔沃基郊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里。讲题是“工人阶级”；如果这个教授的讲述稍有一点趣味，无论如何也会使我的这位蓝领朋友从那种意气消沉的状态里振作起来。

可是，这个教授只是复述对战后美国社会的普通看法，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新奇的东西。他说，“由于若干原因，工人阶级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中心力量了。

“第一，他们已经成了少数。白领工人的人数现在超过蓝领工人。

“第二，越来越高的收入水平已经消除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严格区别——有些蓝领工人，象铅管工和技工，所挣的钱多于职员和教员之类的白领工人。

“第三，各郊区已经实现了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化，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与众不同的工人阶级地区或文化成为历史

陈述了。”

这个教授继续讲这种变化的政治含义，在他看来，这就是任何与众不同的“工人阶级”政治态度的结束。

这节课是在 1967 年秋季讲的——不到六个月，乔治·华莱士就不再抱有这样的想法：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从政治上说和他在美国郊区的大学教授同伴一模一样。

关于美国工人的百分数、生活和种种条件的其他论点，不是那么容易销声匿迹的。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到今天，有很多人仍然相信它们。

那时我没有怀疑我的教授。可是，如果我有所怀疑，我就可能会请教我的朋友，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关于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事情，而这些决不是我从听教师讲课时所能得到的。但是大多数大学学生和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真正和工人接触过，因而那个教授所列举的三个论点似乎是完全合乎逻辑和无疑地正确的。但是，这些结论的每一个都是错误的，并且对于使美国在七十年代争取进步的任何合理的战略来说，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些必须丢开的神话。

## 二

头一个结论说美国人的大多数是白领，这似乎难以否认。例如，即使那间教室里的一个学生没有被他的教授的说法所说服，他也找不到什么根据来支持他的怀疑。他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有一张满页的图表，使各种白领职业显得遍布美国，就象一支挺进的大军横跨欧洲的地图一样。教科书中有关的一

段开头是这样一句反问：“为什么发生从蓝领到白领、从体力到脑力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呢？”<sup>1</sup> 这一页的其余部分都用来提供解答。

一般地说，这就可以打消任何怀疑了。但是，如果这个学生怀疑他那“标准”教科书和教授，并去请教最有名望的自由派甚至激进派的社会理论家，他本来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确实没有对这神话提出异议。在《新工业国》一书中，他写道：

1965年，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差不多多出八百万人，前者四千四百五十万人，后者三千六百七十万人。在这些年里，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即技术结构上最有代表性的类别的人数大约增加了一倍。<sup>2</sup>

赫伯特·马库塞在《一个范围的人》一书中也赞成这一普遍的想法：

在职业分层上有一种同化的趋势。在关键性的工业机构中，“蓝领”劳动力相对于“白领”成分来说减少了。非生产人员的人数增加了。<sup>3</sup>

最后，甚至在那“通俗的”畅销书《未来的震动》里，阿尔文·托夫勒特别感情奔放地说出这同一想法：

大约在1956年，美国变成了头一个大国，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非农业劳动力不再穿工厂或体力劳动的蓝领衣服……就在这一一生中，一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不仅扔掉了农业的羁绊，而且设法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扔掉了体力劳动的羁绊。<sup>4</sup>

面对着这样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异口同声的意见，那间教室里的学生就难怪马上不再考虑蓝领工人，转而去研究有关

青年和意识的理论,以探索前进的道路了。

但是,虽然在那间教室里记笔记的人会废然断念是可以理解的,这却是件可耻的事。如果他决心再前进一步,他就会发现,白领和蓝领这两个名词是被用在一种特定的和专门的意义,而不是我们在日常谈话时所使用的意义。

因此,在采取那个学生所没有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以前,让我们先弄清蓝领或白领、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毫不含混的”定义。\*

根据职业,这一区分根本上是体力的,主要是肉体的或卑贱的劳动与管理的或智力的工作之间的区分。蓝领工人指的是那些用他们的双手而不是用他们的脑力工作的人。其典型的代表就是工厂工人或垃圾搬运工、建筑工人或在飞机场给你拿行李的人。人们马上认识到,总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把所有“按时上下班”或“整天累得要死”的人,同其工作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有创造力的重要部分并对他们有些意义的医生、律师和行政人员区分开来。工人阶级的工作在报酬和声望方面几乎必然是比较低的。他们日复一日,同医生或律师相比,确实没有什么独立性或控制权。

另一方面,“白领工作”使人想起办公桌后面的人的形象:

---

\* 有些人会反对离开收入、生活方式等等来谈论职业。然而,在过去二十年,由于人们认为美国社会按职业划分阶层的“旧”想法决不可能是正确的,这三者已经混在一起了。在关于社会阶级的许多讨论中,甚至根本不提职业,只是用收入来说明社会地位。但是,很值得把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问题区分开来,首先看看职业结构、蓝领对白领,然后看看这些职业所提供的收入,最后看看人们用那种收入所能获得的生活方式。在这样做以前,是很难妥当地得出什么关于整个美国工人阶级的总括性的结论来的。

威廉·L. 怀特的《听话的职员》一书中追求副经理职位的人。要不然也会想起医生或律师这类“专业的”人来。

这些工作的地位和报酬是比较高的，比起那只需呆板机械劳动的工作来，能提供更多的独立性、控制权和愉快。

有些工作处在这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一般地说，这些就是最低级职员的位置。但是，脑力对体力这一根本的二分法是我们关于美国阶级的真正想法。1970年，当建筑工人在纽约闹市痛打学生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震惊的反应显然表明了对阶级的真正看法。自由主义者说，“那些恶棍在毒打我们的孩子。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一定都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才好！”

所有那些说建筑工人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并享有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陈词滥调，都被忘掉了。所说的是我们和他们，而他们就是指工人阶级。因此，如果我们要根据实际政治意义来考虑美国工人的问题，这一简单明了的区分法是我们必须用来作为指南的。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无须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既然大多数人都用蓝领和白领作为体力和脑力、体力劳动对专业及管理工作的同义语，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可以期望，当引用统计数字时，这些数字是十分具体地以这种二分法为根据的。

然而，问题在于它们并非如此。如果那个怀疑的大学生去看一看人口调查局的出版物，他就会发现，美国的两万多种具体工作并不直接按体力和脑力分类，而是分为十个不同的类别，然后把其中一些类别称为白领或蓝领。它们是：



白领	蓝领	其他
专业、技术人员等	技工和工头	服务人员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机械操作工	农业工人
办事员	杂工(非农业的)	农场主
销售人员		

这种分类法表面上看来挺好。那些类别不是一清二楚，但它们似乎是合适的。虽然二十年来这些类别使评论者们似乎很有理由可以宣告体力劳动的结束，然而，如果这些评论者或那间教室里的一个学生超出这十个类别的范围去看一看它们所包含的各种具体工作，他们就会发现那个白领多数非常象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你越是仔细注视，它就越是可望而不可即。“蓝领”这一范畴的明确定义把它限于从事生产和分配的工人，这些人只是所有那些仍然基本上忙于呆板的体力劳动的美国人的一部分。<sup>5</sup>

首先，“服务人员”被排除在蓝领分类之外。但这一类里有这样一些职业：照管房屋的工人、侍者、行李搬运工、传达、电梯司机、看门人，甚至擦皮鞋的孩子。列举的这些工作乃是美国最低贱、报酬最差的职业的一本“人名录”。然而，当作家们引用“蓝领”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这一百分比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人——包括服务人员——都列入中产阶级之内了。服务人员这一类别中的其他人员同样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警卫、守夜人、厨师、管家、医院和其他场所的服务员、理发师、警察和救火员。只有一小撮干联邦调查局特务和侦探这类工作的人还可以被认为是中产阶级。

此外，被认为是白领集团一部分的男性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别实际上隐藏着许多工人阶级的工作。邮递员是一个办

事员。在自动售货商店给罐头标价的青年人也是如此。行李收发员、信差、收帐员、报童、拍卖人、小贩、办公用机械操作者、公共汽车和火车调度员、报务员等等，都包括在白领范围之内，因而都叫做中产阶级。

只要看看男子的各种具体职业，这一切就十分明显。但是，当翻到妇女的明细分类的篇幅时，我们突然认识到，我们完全受骗了。

当人们阅读关于体力劳动的结束以及新的白领多数的那些引证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医生、律师和“公司”职员是这种“新阶级”。但是他们所阅读的统计数字，不仅是关于男子的，而且也是关于所有妇女的，甚至包括那些每星期只工作几小时的妇女。

这些妇女构成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的百分之七十，是“中产阶级多数”的主要部分。她们担任电话接线员、出纳员、售货员、打字员，以及其他报酬差、地位低的工作。一个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的社会的美好形象无可挽回地消失了。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不是体力工人，就是从事体力工作的大多数办事员。

有些社会学家力图挽救这种“中产阶级多数”，他们说这些女办事员和销售人员是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是一个较低中产阶级的“薪水阶层”。这倒是一个吸引人的解决办法，因为人们总不大愿意把这些妇女叫作“工人阶级”。

许多作家为这种概念所蛊惑，因为它似乎适用于人们碰到的许多“职业姑娘”，她们似乎更象中产阶级，而不象工人阶级。这些作家心目中的女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的形象是纽约的



单身姑娘，也许是一个瓦塞学院毕业生，她做秘书工作，可是梦想“出出风头”。她和另外两个姑娘一起住在一间高价的东岸公寓里，看看电影剧本，在新学校里选读象存在主义陶器这类的新奇课程，偶尔抽抽大麻，每逢周末去滑雪。然而，这样一个人决不是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别中的典型。大多数女办事员和销售人员都是已婚的，其中约有半数是嫁给工人阶级的。<sup>6</sup>

突然间，那个职业女秘书和一个不那么浪漫的人物结合在一起了，她是一个焊接工人的妻子，作为散工在大西洋及太平洋茶叶公司当出纳员。你可以想象，她看的不是电影剧本，而是《读者文摘》；没有滑雪的斜坡，而是星期三晚间的滚木球戏。最后，没有大麻，而是她丈夫的一瓶啤酒。如果社会学家在街上碰到她，她将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要澄清这种混淆，最好的办法是看一看只是男子的职业结构。大多数妇女是已婚的，因而生活在她们丈夫的阶级和文化里。她们在政治上以丈夫为榜样，她们的全部社会生活是同丈夫的阶级在一起的。因此，男子的职业能够非常清楚地说明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相对大小。

下表十分清楚地说明这种比例：（表见 14 页）

当我们记起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别中藏有邮差之类许多工人阶级的工作时，真正的体力劳动的数字是在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二之间。因此在美国，五分之三即百分之六十是工人阶级。关于中产阶级多数的好听的概念、体力劳动的结束、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等等，其根据都是把钢铁工人的充

1969年男性主要职业类别\*7

专业和技术人员	14.6%	}.....29.2	}.....42.4中产阶级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14.6		
办事员	7.4	}.....13.2	
销售人员	5.8		
技工和工头	21.4	}.....57.5工人阶级	
机械操作工	21.4		
杂工	7.6		
服务人员	7.1		

当出纳员和售货员的妻子列为中产阶级。

然而，这张表包括美国黑人和白人。由于黑人很不相称地大都从事体力工人的工作，人们可能就会觉得大多数白人都是白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的白人属于四种体力劳动的类别，再加上错误分类的办事员，人们可以估计，大约百分之五十八、或许更多一些的人是我们要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因此，差别大约为百分之二，即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对百分之五十五点三。<sup>8</sup>

上表还不包括学生，因此似乎低估了中产阶级的大小。但是，即使加上学生和就业劳动力以外的一些其他类别，这个结论也不会改变。如果说学生会成为中产阶级，那么其他几个未列入的类别则会成为较低的阶级(无论如何也不是中产阶级)：例如，失业的蓝领工人、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以及

---

\* 使用 1969 年数字的原因，仅在于尼克松时期的衰退把许多蓝领工人都投入失业者的行列，因而使得 1970—1972 年就业男性的统计数字很有欺骗性。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把失业的人叫做中产阶级；但是如果使用 1970 年或 1971 年数字，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收罗了大批工人阶级青年人的军队。<sup>9</sup>

在美国，所有这些类别加在一起，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学生。美国不是一个白领的或中产阶级的社会。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仍然从事主要是呆板的体力工作。

为了一切实际的目的，这是关键之点。下星期一，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又将开始新的一周，从九点到五点做基本上用双手劳动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关系到组织社团、赢得选举或通过立法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是，仍然有这样的可能性，即蓝领工作可能很快就消失，或许在几年之内我们终将见到我们心爱的中产阶级多数。社会分析家宣告体力劳动的结束，确实言之过早；可是他们说战后时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长期的趋势是走向体力劳动的结束，他们或许是正确的。

如果有人硬要专家举出有关工人队伍“巨大”变化的事实，他通常得到一套十分复杂的关于增加和减少的“相对比率”的统计数字，所有这些数字似乎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表明工人阶级正在逐渐消失。

不幸的是，虽然这些统计数字宜于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它们却无补于实际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掩盖了某些最重要的资料。

如果我们看一看从事不同职业的实际人数，就会看到一件绝对使人吃惊的事实。美国工人阶级的人数根本没有减少——实际上，从1950年起，它增加了大约四百万人！今天和1950年相比，美国增加了四百万工人。分析家们所指出的下降趋势完全是相对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人阶级也增

加了,但是作为中产阶级的少数美国人增加得更快。

下面是以我们的常识定义为根据并只计其大致的数字:

	1950年	1969年	1950—1969年的变化 <sup>10</sup>
中产阶级	13,000,000	19,000,000	+6,000,000
工人阶级	22,000,000	26,000,000	+4,000,000

白领的这种增加十分显著,但是让我们联系各方面的情況来加以观察。工人的相对百分比下降了,从百分之六十二点四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七点五,二十年中下降了百分之五(不算错误分类的办事员和销售人员)。

但是首先,我们仍然还有二千六百万工人阶级的美国人和一千九百万中产阶级。这纯粹是不可否认的社会和政治现实。

其次,中产阶级原来需要增加三百万人才能与工人阶级扯平,并保持百分之六十二的工人阶级多数。因此,稍稍不到三百万中产阶级这一现状,表明1950年以来职业结构中新的变化。

而且,这原始的数字是很惊人的。整个“巨大变化”、战后“革命”、体力劳动的结束,都落在四千五百万男劳动力中不到三百万人的身上。这可能是重要的,但它很难构成社会本质的根本变化。按照这种比率,在下一世纪开始以前,仍将有一个工人阶级多数。至少下一代美国人仍将主要是工人阶级。七个总统和成千的国会议员还将由一个工人阶级多数选举出来。

劳工部对于1980年的估计证实了这一点。任何体力类别的绝对数字不会下降,相对的下降是很小的。在七十年代,技工和工头的数字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机械操作工减少

百分之二；杂工减少百分之一；而服务人员实际上将有所增加。<sup>11</sup>

仔细看一看 1950 年以后各职业类别中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另外一些有趣的问题：

**1950 年和 1969 年按职业划分的  
就业人数(单位: 千人)<sup>12</sup>**

	1950 年	1969 年
中产阶级		
专业和技术人员	2,700	6,800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5,400	6,700
办事员	3,000	3,400
销售人员	2,400	2,700
工人阶级		
技工和工头	7,500	9,900
机械操作工	8,800	9,900
杂工	3,400	3,500
服务人员	2,700	3,300

在白领类别中，显著的事实是，这三百万“新”工人显然都在专业和技术人员类别里，这一类别的增长主要可以追溯到战后时期两个具体事件。一件是随着战后婴儿兴旺和人造卫星而来的教育系统的突然发达。另一件是把资源大量分派给科学研究和发展，而这大部分是直接和军事工程项目相联系的。

很明显，这种“巨大变化”的大部分是一些十分具体的政治决定的结果，即决定怎样花费纳税人的钱而不致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上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这不象“工业化之后国家”或“人类历史新纪元”那样振奋人心，但它很可能是更接近实际。



表的下半部也打破了人们心中所抱有的其他一些幻想。首先，熟练工人显然一直在迅速地增加着，而最不熟练的蓝领类别则几乎没有变动。但是在1969年，美国工人的多数——实际是百分之六十一——是非熟练的或半熟练的。我们将会看到熟练工人曾是多少神话的受害者，可是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丢掉这种想法：他们是典型的蓝领工人。是一个很可观的少数，但不是多数。

由于得出这些结论，我们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不得不走了一条弯路来剖析二十年的神话。但是那些事实在现在显得十分清楚。美国人的多数是工人阶级——百分之六十的美国男子及其妻子儿女。他们不是逐渐消失，就是到下一世纪开始，中产阶级在人数上或许还赶不上他们。

### 三

然而，如果体力工人的生活完全和白领工人相似，他们在工厂工作而不在办公室工作这一事实或许就没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了。

当然，这就是大多数评论家告诉我们的话。他们再三重复蓝领工人现在是“中产阶级”或“中等美国人”这种说法，以致没有人想到提出疑问。虽然不再有人说他们富裕，可是没有人说他们穷。

作为一个适当的典型例子，赫尔曼·P. 米勒在其《蓝领美国的侧面——透过人口调查资料看到的一种情况》一文中说，“到1969年，以蓝领工人为户主的白人家庭的中等年收入是一万零七百美元……”<sup>13</sup>但是，人口调查局的说法应当使我

们存有一些戒心。他说的是什么人呢？答案是——只有技工、工头和机械操作工——没有别人。服务人员除外，杂工除外，调查时失业的人除外。更不用说更有一些理由作为特殊情况而除外的黑人了。

如果我们往回查看几页，我们就会发现，米勒先生排除了工人阶级就业白人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如果我们把长期失业者和黑人也计算在内，那就更多了。好得多的办法是，把所有四类体力工人都包括在内（技工和工头、机械操作工、服务人员和杂工；不幸，从事体力劳动的办事员和销售员不能同他们类别中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以便了解到不只是平均数，而是收入的分配情况——有多少工人是我们认为是穷困的，却属于中等美国人或富裕阶层。

如果必须单是依靠猜测或直觉来进行划分，这些数字就很难求得，即使求得也是很武断的。幸运的是，劳工统计局计算了“标准预算”，这些预算告诉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每个预算都以四口之家为准。

虽然它们使用一些不太鲜明的用语如上等、中等、下等来描述三种生活水平，这些预算却自然而然地划分了美国三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的文明程度：贫穷的文明程度，工人阶级的文明程度，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方式。例如，大多数富裕的人购买一定种类的衣服，租赁或购置一定种类的房屋或套房，采购一定种类和数量的食品，等等。

劳工统计局每年都把它的职员派到商店、停车场和房地产代办所去查明购买这些有代表性的东西要花费多少钱。

结果是得出了三种预算，它们反映出三种水平中每一种



获取基本商品和劳务的平均费用。例如，在 1970 年，下等生活水平的预算是六千九百六十美元。这就是说，一个贫穷的家庭需要用六千九百六十美元来获取大多数“低收入”美国人的典型的衣、住等等。

中等的预算马上可以看出是蓝领工人的世界，是西尔斯·罗伯克公司的家具、四美元的威士忌酒、每六年换一次的用过两年的旧汽车的世界。这不是富裕的水准，同美国人梦想的东西没有任何类似之处。有些工会把它构成的生活费用称之为“拮据但体面的生活”。

在 1970 年，这种中等预算需要一万零六百七十美元，而富裕的预算需要一万五千九百五十美元。<sup>14</sup>

下表说明 1970 年工人阶级收入的分配情况。

1970 年工人阶级家庭收入<sup>15</sup>

收入 (单位: 千美元)	百分比	在此水平以下全部 工人阶级家庭的百分比
1-7	29.5	29.5—30% 贫穷
7-8	8.1	37.6
8-9	8.6	46.2
9-10	8.2	54.5—60% “低于中等”
10-12	14.8	69.4
12-15	15.2	84.4—85% “低于富裕”
15+	15.5	100.0

结论很明显。大多数美国工人所挣的钱甚至不够“中等美国人”的“中等”预算。

大多数人并不是徘徊在富裕和贫穷这二者的中间。大多数人的生活低于“拮据但体面的”舒适和安稳的水准。

百分之三十一——美国就业工人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生活

在真正贫穷之中。他们每年挣的钱不到七千美元，而“下等”预算需要六千九百六十美元。这意味着全部家庭收入在纳税以前是每星期一百三十五美元。另有百分之三十高于贫穷的预算，但低于那种“拮据的”中等水平。因此，工人阶级的百分之六十不是贫穷，就是徘徊在贫穷和中等预算所包含的很朴实的水平之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一份研究表明那种预算是多么“朴实”。

劳工统计局的预算是十分“朴实的”，而不是“够用的”。例如，它假定一个家庭要有：

- ……一个烤面包电炉，可使用三十三年；
- ……一只电冰箱和一个炉灶，各可使用十七年；
- ……一个真空吸尘器，可使用十四年；
- ……一台电视机，可使用十年。

预算假定，一个家庭将购置一辆用过两年的旧汽车，再使用四年。在四年中，每年将花钱小检修一次，每三年修一次车闸，每四年来一次大检修。

预算假定，丈夫每四年购买一套四季都可穿的外衣……每八一年半买一件轻便大衣。

它假定，丈夫每三个月和妻子一起去看一次电影，二人之一每年独自去看一次。两个孩子每人每四个星期可看一次电影。每年每人各有二点五四美元的总数可用来作为所有其他场合的入场费，从足球、棒球比赛到剧场或音乐会。

最后，预算没有留出任何储蓄的余地。<sup>16</sup>

百分之六十的美国工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许更差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典型的富裕工人，构成工人阶级——白人和黑人——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八十五不

是“典型的”1970年，普通的工人收入九千五百美元，更接近贫穷，而不是接近富裕。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许多评论家大谈富裕工人有两部汽车放在车房里和一台彩色电视机，但甚至在今天，大多数蓝领工人两者都没有。

这些统计数字确也包括黑人工人。但是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出，即使除去他们也只不过把白人工人的“福利”增加大约百分之二点五<sup>17</sup>——这还不足以抵消这一简单事实：这些数字都是纳税以前的收入。它们也是包括有工作的妻子子女在内的全家的收入。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长期失业者、病人和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这些数字所说明的是有工作的穷人，而不是全部贫民。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许多年来，人们对于工人的经济情况只是耸一耸肩，很轻松地提到极少数铅管工人和电气工人，他们每小时挣八至十元。但是，就在同时，其他工人却只挣四至四点五〇美元，有些人甚至挣得更少。

事实上，尤其重要的是，即使是工人们所享有的这种朴实的生活水平，也还是靠有工作的妻子们才成为可能的。即使是全日工作，丈夫的收入也很清楚地说明一个工人的工资单是个什么样子：

#### 1970年按职业划分的中等工人阶级收入<sup>18</sup>

技工和工头	9,253 美元
机械操作工	7,644
杂 工	6,462
服务人员	6,964

1970年5月，一个要供养三口人的典型的制造业生产工

人每星期的收入是一百三十二点九三美元，可花费的收入（即缴纳税款等以后的收入）是一百一十五点二七美元。根据劳工部的数字，建筑工人的平均收入是一百九十四点三一美元，可花费的是一百六十五点一三美元。<sup>19</sup> 当人们想象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每年有一万美元收入——丈夫只挣得七千或八千美元，其余由他的妻子挣得——时，是值得把上述的一点记在心里的。或者以一个有一万二千美元收入的熟练工人家庭为例，他往往挣得九千美元，她挣得其余的部分。

所有那些认为工人们实际上不应对经济地位有何怨言的分析，突然都显得很可怀疑了。

我们将会看到，一场疾病、一段时期的失业或者是妻子因怀孕而没有收入，都会把一生的积蓄一扫而光，使许多工人阶级家庭陷入一种无尽无休的负债和经济恐慌的循环之中。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千百万人的生活仍然远远低于一种充足的、相当好的生活所需要的水平。

但是，如果说大多数工人的客观情况使人感到意外，那么，当我们把它和中产阶级相比较时，其结论非常惊人，与我们所听说的情况大相径庭，以致有些人可能不顾事实而认为它是难于接受的。

为了使这种对比清楚一些，让我们先看一看我们都知道的事情——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

黑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是白人的百分之六十，相差大约四 thousand 美元。<sup>20</sup> 这就意味着，要使黑人处在和白人一样的经济水平上，我们就得每年给每个黑人家庭一张平均为四千美元的支票。这个百分之六十或四千美元，乃是了解美国黑人和白

人之间不平等程度的简便方法。很明显，要达到白人的平均收入，有些家庭需要弥补多一些，有些家庭需要弥补少一些，但四千美元是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之间的平均差额。

然而，当我们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时，那些关于生活方式相同和收入差距很小的陈词烂调却引导我们去指望得到一些大不相同的结果。把典型的工人形容为一个工资过高、其生活方式优于很多白领工人的技工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陈词烂调。

可是，白领的平均收入约为一万二千五百美元，而如我们所知道的，蓝领是九千五百美元。差额大约为三千美元，或者换句话说，蓝领的收入大约是白领的百分之七十七。<sup>21</sup>

但是，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白领总数中包括很多实际上是体力工人的办事员和销售人员。如果我们看一看专业和技术人员以及经理和业主这两个主要类别（占全部白领人员的百分之七十五），我们发现他们的平均收入约为一万四千五百美元。体力工人所挣的钱只是上层中产阶级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其间差额是五千美元。要在专业和管理人员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造成经济上的真正平等，我们就得给每一个美国工人五千美元。用百分比来说，体力工人和大多数白领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差不多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一样大；用把他们区别开来的美元绝对数来说，体力工人和专业与管理之间的距离实际上要更大些。

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和黑人一样穷，或同样受剥削。并非如此。这意味的是，一个工厂工人所看到的在他自己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即距离，同普通黑人所看到的在他自己



和美国白人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一样大。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在社会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如果说黑色的皮肤意味着经济不平等，蓝色的领子也是如此。在美国，两种颜色都含有经济不平等和不公正。

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将认为这一结论是难于接受的。他们很奇怪地在感情上沉溺于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说有人挣得少，那是他们，而不是蓝领工人。一个教授在批评这一命题的一种早期说法时，先就一般统计数字说了一些毁谤的话，然后说，“纽约市卫生局有一些工人，他们的收入同纽约市大学的一些教授一样多，并且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教授多。”

有人认为教授和知识分子正在经受着和大多数工人相同的或甚至更加严重的经济苦难，这种信口开河的说法十分普遍。实际上，这或许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最流行的关于工人的神话。

但是，尽管它十分流行，它是一种神话，是一种颇有破坏性和非常有害的神话。或许，主要就是这种想法使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不顾蓝领工人的理所当然的不满，表现出稍稍加以掩饰的恩赐感，而这种恩赐感却已成为乔治·华莱士的最大的政治资本。因此，必须详细地说明和十分清楚地指出这一想法是荒谬的。

1970年，教授的平均薪金是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美元。<sup>22</sup>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机械操作工平均挣七千六百四十四美元，技工和工头挣九千二百五十三美元。即使是低级助理教授所得的收入也比熟练工人多，即一万零六百九十八美元对九千

二百五十三美元。这还不能说明那种谬误有多大。这笔一般为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美元的收入，或助理教授的一万零六百九十八美元的收入，还包括三个月的假期。这是九个月的工作年，是教授职位最受欢迎的特点之一。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周薪来修正这种差别，我们发现教授平均每星期二百九十三美元。正教授挣得极多，平均每星期四百一十九美元。低级助理教授每星期二百六十七美元。

工资最高的建筑工人和熟练工人，在1970年每小时平均挣六点五四美元，即每星期二百六十二美元。<sup>23</sup>

事情就是如此。一个助理教授认为自己处在大学图腾柱的底端，但有机会升为副教授并最后升为正教授，他平均每星期挣的钱也多于已经达到工人阶级等级顶端的工人。这是一件难堪的事情，但是，那种关于工人是工资过高、拥有快速汽艇的技工的流行说法，却和那种关于黑人都是拥有卡迪莱克牌汽车的福利金骗取者的想法，差不多如出一辙。尽管有这些陈词烂调和神话，工人和中产阶级还是被一种真正的很大的不平等给划分开来了。

如果一个人不熟悉蓝领工人，没有亲自同他们谈过话，他很可能认为这种不平等对于一般工人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然而事实是，蓝领工人实际上是深切了解这种不平等的。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当知识分子大谈其阶级消失的时候，工人们却看到在他们自己和那些写文章谈论他们的理论家之间的极大差别。拥有一辆作为旧货买来的用过五年的旧雪佛兰牌汽车的汽车装配工，每天花八、九甚至十小时来制造他决不会买的卡迪莱克牌或托里诺牌汽车，而他知道买这



类汽车的是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的人们飞往阿卡普尔科或圣胡安去度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是在机械工人、维修工和出租汽车司机的注视下离去的，后面这些人每年有两星期假期，通常是在家中度过，或者顶多带着家属开车到“奇妙的幻境”这种娱乐场或一处国立公园去玩几天。对这些人来说，社会上的不平等并不是抽象的。它是每天都看得见的现实。

#### 四

还有一种神话是“郊区工人”。根据权威的说法，就是在这里，关于社会和经济平等的美国梦想变成了一种实际的现实。蓝领工人不再是穿着工作服回到他的阴郁的住所，同他的伙伴们挤在一起。现在，他在工厂里换好衣服，驱车回到他郊区的家，看来就和跟他一起到来的中产阶级邻居完全一样。他们说，这种共同的郊区生活方式，以及每天的私人接触，很快地在消灭着蓝领美国的所有那些特殊的“工人阶级”性质。美国是一个郊区的国家，社会上的大问题是爱发牢骚。

最近几年，这一美好的形象由于白人反对在住房方面取消种族隔离而已暗淡无光，郊区现在同日趋衰退的内城的形象不相上下了。但是，关于郊区是一个单一的、无差别的中等美国人集体这一虚幻的想象仍然存在。郊区的白人和黑人区的黑人很清楚地说明了大多数人对美国社会的看法。

照例，这一想法受到一些统计数字的支持，并且为很多作家和社会理论家所肯定。在那间大学教室里的一个学生，当他骑自行车回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他或许甚至不大考虑这一想法。他太年轻，不记得多年以前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工人阶

级人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铁路轨道那一边”的情况。他也许甚至没有想到要在他骑车走路的时候去看一看周围，把它和他的教授所说的话作一番比较。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学生确曾决定要进行这种比较，他本来就会突然认识到一件一直是显然存在的事实。如果他呆在中西部一所最大的州立大学，从市中心开始他的巡视，他本来就会发现，往西去他碰到一种“郊区”，而转向东则使他走到一个十分不同的“郊区”社会。

离开大学往西，他会找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种郊区。在两侧有住宅的街道上，房屋都修建在远远离开绿荫成行的街道的后面，一排房屋最多只有三所。许多都是新建的，有汽车房、书房和客房，以及美国人渴望得到的一切装饰品。如果他目光敏锐，这个学生甚至可以看出他的教授的房屋——不那么新，但却是一所经过仔细改建的旧式“良好”社会中的建筑物——和企业行政人员新房屋之间的细微差别。最后，离城若干英里，他会碰到一些奢华的房屋，看来就象从《美化的住宅和庭院》的书页上剪下来的那种房屋式样；它们离开街道很远，隐藏在绿篱和树木的屏障后面，在路上看不到它们。

这个社会的其他一切也符合于郊区的形象。汽车都是新的，半数以上的住宅似乎都有两部汽车。空气是新鲜的。这是典型的郊区。

但是，当我们这个学生回到城市中心，开始朝另一方向前进时，情况就显然不同了。顺着大街走去，不到一英里，他经过一家占地四、五个方形街区的大工厂。再往前又是一家，是一家肉类罐头厂，散放出一种在半英里内可以闻到的和几乎

可以当作实物那样消化的浓郁气味。低飞的飞机说明飞机场就在附近。离开大街到住宅区的街道,这个学生发现一些三、四十年的旧房屋,每一街区有八、九所。如果他试一试,他会发现这些房屋有时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致他不得不斜过身子,才能在它们之间安然走过去。这里没有宽敞的房前草坪,没有汽车房,很少有一所新造的建筑物。在后院,他可以看见晒衣绳上挂着一些洗过的衣服。每所房子前面有一部汽车,汽车是旧的。

沿着街道,我们这个学生还能看到城市那一边所不存在的许多别的东西。酒吧间。汽车零件和车身修理所,一些小货栈,招牌上写着“零件和供应品”。

我们这个学生走开时,可能会由于这个地方的气氛而有些沮丧。这里有一种几乎是陌生的东西。住在这里的人并没有享有他父母所享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也不是生活在他父母的那种文化之中。他所看到的不是绝对的贫困,但是和城市较好的那一边比起来,这显然是次等的。

当我们这个大学生回到城市中心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终于观察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就在城市中心的若干街区之内,他要越过一连串的铁轨,这些铁轨把这个城市截然分成两半。如果他使用这些铁轨作为分界线,他会发现,在铁轨以东的人口调查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蓝领。在西面的人口调查区,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白领。在1970年,这些铁轨仍然是划分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社会和文化的分界线。

当然,任何城市都不是“典型的”,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或巨

大黑人区的存在能使情况更为复杂。有时是分为南北，而不是分为东西。有时一条河或其他地理因素使情况复杂化，而常常没有真正的铁路轨道。但是，在美国的每一个城市，你驾车朝一个方向行驶，可以看到富裕的郊区，而朝另一方向行驶，则会看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例如，在密尔沃基，一位社会学家理查德·汉密尔顿写道：

没有很多的中产阶级郊区足以同化任何较大比例的蓝领工人……这个城市的大多数蓝领工人显然和其他蓝领工人比邻而居。有代表性的是，每五家邻居中有三至四家是蓝领家庭。在这些地区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和其他工人阶级的孩子一起上学。他们的朋友和以后的工作伙伴绝大部分将来自其他蓝领家庭。就个人接触和影响来说，这个城市的结构就是如此，它几乎保证了排外性的交往型式。<sup>24</sup>

另外，关于布法罗：

布法罗这个城市，显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在1960年包含七十五个人口调查区。其中仅十四个区有一个非体力的多数。在十七个这种区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从事体力职业。另外十个区包含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的体力工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即最大的一部分，大约四英里宽六英里长，就没有一个区拥有中产阶级多数；只有两个区（三十八个区中的两个）中从事体力职业的人口少于百分之六十。<sup>25</sup>

这些工人阶级郊区也不表现出和富裕郊区相同的生活方式。在后面一章中，我们将较为详细地讨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在这里只说以下两点就够了。第一，1964年，一所工人房屋的平均价值是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七美元，而上层中产阶级的房屋的平均价值是二万零三百七十五美元。此外，拥



有房屋的工人也比上层中产阶级少（百分之六十一对百分之八十三）。<sup>26</sup>

关于密尔沃基，汉密尔顿还写道：

还有许多别的细节，说明“看来一样”这种说法显然有些夸大。在郊外工人阶级地区，我们看到下面的情况：第九十四号州际公路穿过这个地区；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和太平洋铁路也穿过它；霍华德大街净化水厂坐落在这块地区的一角；邻接另一角的是米切尔广场，即这个城市的飞机场。一条主要跑道直接指向工人阶级郊区的这块地方。虽然个别房屋可能看来同别处的房屋一样，可是这块地方的总“情调”显然和中产阶级郊区大不相同。<sup>27</sup>

一般说来，工人阶级郊区有着快车道、飞机场或公共房屋，这些都降低这个地区的价值。

你可以集合一批工作人员，花费一年的时间，详细研究美国的每个城市，来证实这一实际情况。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中产阶级不去美国工人阶级的酒吧间和滚球场，工人们也不去看“艺术”影片或走进收费高昂的餐厅。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我们上班时路过的郊区不同于我们自己的郊区。

实际的情况是，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来说，工人阶级人们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所发生的接触只限于匆匆瞥视一下坐在人行道上吃午饭的一群建筑工人。要不然，就是和邮差、看门的仆役或按装电话的工人简单说几句话。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接触。

工人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间这种严重隔离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后者会如此长久地相信那些神话。如果你住在中



产阶级郊区，在办公室工作，你就永远见不到蓝领工人，自然也就永远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根据这种歪曲的参考框框，那就很容易相信工人们在逐渐消失，或认为他们在生活上同中产阶级一样。如果说许多收入统计数字似乎使一些读者吃惊，那只是因为他们在其一生中从来没见过工人的工资单或银行存摺。很可能有许多研究者手里拿着一本奥斯卡·刘易斯的著作走遍墨西哥的贫民窟，而很少有人印第安纳州哈蒙德或密执安州弗林特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这样做过。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供中产阶级的人们阅读的可资比较的书籍。

但是，那三个惊人的论点、即我们的出发点，现在是十分清楚了，其政治上的含义在于，凡是承认“中产阶级”多数的社会计划和关于未来的蓝图，都是根本错误的。

蓝领工人的不满被认为是微不足道而不加理睬，他们的经济要求被称作是贪得无厌的；他们的具体利益几乎是故意被忽视了。提出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和带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关于工人阶级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其结果就必然认为工人们没有抱怨的正当理由。

这种神话的主要受益人是乔治·华莱士和理查德·尼克松；由于这是十分危险的错误，现在该是根据事实来制定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策略的时候了。自身的利益和正义都要求这样做。\*

---

\* 必须指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这种隔离状况在两个地方更糟，这两个地方可能是大多数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居住的地方——纽约和华盛顿。在这两个城市里简直没有工厂——华盛顿有百分之四的人口从事制造业。纽约整个来说只有百分之二十，而曼哈顿岛或许不比华盛顿多。<sup>28</sup> 住在切维蔡斯郊区或曼哈顿东部的人从未见过一个工厂工人。蓝领工人，除了建筑业技工和

## 五

在讨论工人们对其工作和社会中的情况所表示的实际不满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十分特殊的两类人,他们的境遇我们在前面只是顺便提到过,那就是黑人和妇女。

含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黑人的情况要比白人工人的情况容易讨论。虽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于有关蓝领工人的最基本的事实一无所知,很多人却记得某些统计数字,例如,美国有将近二千五百万或更多的黑人,他们的失业率通常是白人的一倍,等等。

然而,失业和福利事业的不可否认的不公正现象往往使人产生一种明显的感觉,认为黑人社会完全是由黑人区的失业青年和靠福利救济的母亲构成的。这种感觉,再加上恶劣的住房和医疗设备、麻醉品以及犯罪等社会危机,终于造成一种自由主义的看法,认为黑人社会是某种独特的“下等阶级”或“贫穷的文化”。

这种“下等阶级”看法的问题在于,虽然它突出了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它却模糊了某些关键事实。大多数黑人并不是福利救济金的受益者,也不是“街头流浪者”。他们是蓝领工人,在美国从事一些最脏的、工资最低的、常常是最危险的工作。这意味着,黑人的问题虽然比白人工人的问题糟得多,从经济

---

象出租汽车司机之类的私人服务人员以及管理员(实际上他们甚至不是工人)以外,就象中国农民一样,不属于他们接触的范围。另一方面,住在象密执安州弗林特和萨吉诺这类城市之中的全国舆论制造者的人数却可能是屈指可数的。阿格纽对报纸、电视和广播记者的攻击充满了蛊惑人心的话语,但其中含有人口统计方面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个十分危险的事实。

上说却是美国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状态一般型式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平等的社会中某种偶然的、特殊的情况。例如，大多数黑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工资低，而不是因为福利救济金支付不够或失业。虽然关心失业青年和靠福利救济金生活的母亲的贫困是正当的和重要的，可是这不应该使我们不顾黑人看门人、洗盘子的工人、女仆和洗衣工人的贫困。从经济上说，黑人贫困的最重要的根源是黑人工人由于从事低工资的工作而受到剥削。黑人青年的失业状况在某些地方达到十分危险的水平，但就全国来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仍然是有职业的。

一味强调关于贫穷文化的浪漫化的想象，往往导致在实质上同意右翼的那种关于所有黑人都靠福利救济金生活的神话。

然而，就在这时，大多数黑人长时间地干着艰苦的工作，所挣的薪水甚至不能提供贫穷预算的生活水平。

一个南方黑人青年参加了一项职业训练计划，这种职业训练计划给予参加学习的人一定的薪水。他提供了一个含有讽刺意味的恰当的例子。他解释说，除了给予某种不大可靠的技术的训练外，白人教师怎样花费很多时间来谈论文化因素，以及他如何真正了解受训者所感到的关于寻找工作的困难和失望。

含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黑人青年和他的几个朋友在参加这一训练计划以前本来是有工作的。他们开始参加这一计划是因为它所给的报酬确实多于他们原来的工作。他们原先是在一家临时职业介绍所，扣去税款等以后净得的薪水每天

约为九点五〇美元——去掉到介绍所去的来回公共汽车费剩八点七五美元。为了不致丧失工作，他们必须在早晨四点三十分起床，五点十五分至五点三十分到介绍所，虽然他们要到八、九点钟实际开始工作时才有工资可拿。

由此可见，这里就有一些曾经每天花掉十二小时以上的时间去挣八点七五美元的人，他们现在在参加一项训练计划，其中心命题是：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而不在于八点七五美元。

一般说来，黑人工人的糟糕情况和真正不满是美国黑人状况最受忽视的一个方面。然而，这是当前危机中的中心因素。

这方面的人口调查数字特别不可靠。有充分证据说明，对黑人往往计算得过低。因此，虽然我们将使用人口调查统计数字，但必须随时注意它们不象有关白人的数字那样可靠。

在美国人口调查所计算的两千二百万至两千三百万黑人当中，大约六百万是在学校、监狱和军队这类机构以外的成年人。其中：

就业的	4,770,000
失业的	410,000
失去劳动力的	889,000 <sup>29</sup>

失业数字包括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二十六万六千人，以及据美国劳联-产联估计属于失业但不积极寻找工作、因而不列入人口调查计算之内的十四万四千人。甚至这一数字也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因为它把这次调查前两星期内那怕只工作一天的人都列入“就业”之内。由于这次人口调查少算了黑人人数，

它也是以多报少的。上述失业人数大约等于黑人劳动力的百分之九，完整的数字或许应该是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如果把只工作几小时的人也计算在内的话。一项关于一些中心城市中黑人和白人失业情况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项研究说，大约百分之十三是失业的或半就业的。<sup>30</sup>对黑人青年来说，情况要糟得多；在一些城市中，失业数字是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或更多些。

**1969年按职业分类的黑人和其他男性职工  
百分比分配情况和平均收入<sup>31</sup>**

职业类别	百分比	1970年全年全时工人的平均收入
专业和技术人员	7.4	8,675美元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4.5	8,752
办事员	8.1	7,668
销售人员	1.9	不 详
技工和工头	15.1	7,353
机械操作工	29.9	6,273
服务人员	14.3	5,670
杂 工	18.9	5,410

当我们把这些收入（这只是那些有运气能够找到全年工作的人的收入）和全国平均数相比较时，黑人工人阶级的贫困程度就变得很明显，正如他们在工人阶级职业范围内集中于较不熟练工人这一端的事实也变得很明显一样。特别是服务人员和杂工这两个类别，同全部美国人的职业分配情况相比是很大的。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机械操作工是最大的一个类别，几乎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虽然这一点往往掩盖了把黑人纳入



最坏的“黑人”工作之中的职业隔离的一贯型式，可是在六十年代，象汽车和钢铁这类工业中的黑人工厂工人的人数确实也有令人瞩目的增长。黑人工会会员也有相应的增加。今天，除了黑人教会以外，工会中的黑人(三百万人)比任何其他组织都多。在后面的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这含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其中有些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基本的问题是很清楚的。美国黑人的大多数是工人，对于接近五百万的这些黑人来说，他们的不满和贫困来源于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受压迫的部分。如果增加最低工资和认真执行最低工资法律，那就会比一批社会工作者更有效地结束黑人的贫困。问题不在于社会准则或文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的问题——工资大小的问题。

## 六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美国阶级结构的认识混乱，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妇女所起的作用。当我们把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类别来加以考察时，其原因就很清楚了。

美国基本上有两套平行的但不同的职业体系，一种是男子的，另一种是妇女的。两者合在一起看，可以看到白领工人所挣的钱少于蓝领的一些奇特的事例。但如果你把他们分开来看，无论是男性体系或女性体系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白领始终优于蓝领和服务人员。服务和销售方面非熟练或熟练程度低的工作，如女仆、售货员、女侍者，是报酬最低的。半熟练的工厂女工情况好一些；巨大的办事员类别，其人员分别属于熟练和半熟练两种（例如秘书、速记员和接待员），情况又好一

些。处在这一体系顶端的是一小群经理和业主，以及更大的一群专业人员，如小学和中学教员、医务技术员、护士等等。\*

因此，我们对于男性所使用的脑力对体力的区分，对于女性体系同样有效，尽管她们所做的具体工作并不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工作分成非熟练的、半熟练的、熟练的和受过高等学校训练的专业和技术人员，我们就会发现，女劳动力就其大多数来说，是从事呆板重复性工作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实际上，男女之间的主要不同之点在于女性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专业和管理人员。妇女所从事的许多“专业”工作，如医疗实验室助手，在训练和技术水平上确实是可以同最高级男熟练工人的工作相比拟的。

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男女的薪金大不相同。在每一类别中，就技术水平大体相同的工作来说，妇女的收入要比男子少几千美元。

给予这些女工人的低工资产生两个重要的后果。首先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和蓝领工人结婚的百分之五十八的已婚妇女来说，这种低工资影响到她们是过几乎完全贫困的生活，

\* 1969年按职业分类的就业妇女32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1970年全时 平均收入	1970年 全时百分比
专业和技术人员	4,018,000	14.1%	7,850美元	62.5%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1,261,000	4.4	6,369	74.3
办事员	9,975,000	35.0	5,539	60.3
销售人员	2,017,000	7.1	4,174	32.8
技工和工头	339,000	1.2	4,955	58.7
机械操作工	4,489,000	15.7	4,465	54.2
杂工	146,000	.5	4,375	46.7
服务人员	6,271,000	22.0	3,875	38.7

还是过一种虽不够用但还过得去的生活。有些抱有不可动摇的乐观看法的评论家认为，女工的惊人增长是由于“放宽了眼界”，是由于希望寻求自我表现，可是，仔细的研究表明，经济上的需要是更有可能的原因。<sup>33</sup>

其次，付给这些妇女的低工资是许多工业部门的利润所在，例如服装工业和电子工业，这些工业受到廉价外国进口货的压迫。在这些工业中，女工厂工人往往只挣二点一五美元或二点二五美元的起码薪金，这对男工来说是在贫困水平以下的。象女售货员之类的职业也是如此，她们每星期的收入往往少于九十至一百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虽然迄今为止，妇女解放运动著名于世是由于它的个人的和对社会的不满，而不是由于经济上的不满，可是这里包含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尽管和黑人大大不相同，黑人和妇女却都已被推入各自的工资最低的职业和工业之中；因此，比较明显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不公正现象掩盖着阶级不平等这个总问题。然而，妇女的经济地位象黑人一样，显然是美国工作和不平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只是因为有这么许多蓝领工人的妻子现在已参加工作，女工的状况也是和美国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分不开的。

我们已经看到，本章开头那位教授所讲的三个论点中的每一个都是极其错误的。大多数的美国人不是白领，也并不宽裕。百分之三十的蓝领工人是贫穷的，另有百分之三十所挣的钱也不足以达到政府所规定的中等美国人的十分朴素的生活水平。同中产阶级相比，把他们区分开来的不平等的差别比得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在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存

在着生活方式和舒适方面大相径庭的经济和社会差距。

美国工人是有其真正的、真实的问题和不满的一个阶级。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彼此大不相同的各集团之间纸面上的抽象联合不同,他们是由于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并构成美国人民的多数。

## 第二章 对工作的不满

### 一

几个月以前，我早晨五点钟起床，开车到一家小工厂去申请当一名冲床操作工。雇工办公室很小，既是候雇室，又是雇工负责人的办公室。因此，我在等待的时候，能够听到他跟在我前面的人谈话的内容。这个人是个大学毕业生，曾在某市政部门干过文职工作。雇工负责人在他的申请书上看到这一点时，就对他说，对不起，对于这一工作来说，他是“资格过高”了。

可是这个大学生没有离开，而是突然大声反驳，“你知道，这很不公道。我是说，你对上过大学的人有偏见。”雇工负责人对这一发作显得很惊奇，过了一阵，他回答说，“瞧——我们一直让象你这样的人进来，可是你知道他们呆多久吗？——两三个星期。我是说，我们已经发现，进过大学或整天在办公桌后边坐过的人不愿意做这种工作。我的档案架上装满了证明这种情况的例子。工资不算低。但是一般说来，你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干不了这种工作。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他所忍受不了的。”

虽然上面说的这个雇工负责人不是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他却触及了根本的问题。尽管理论家和作家们过去花了二十



年的时间来争论工人究竟是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疏远，还是真正感到满意，可是对于实际在美国工厂或建筑工地工作的人来说，结论总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大多数工人必须忍受一系列有关繁忙、健康和安安全、就业保障等十分具体的条件，以及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甚至不能想象的，当然不必去忍受的其他许多条件。如果说在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这二者的工作条件之间的差距就甚至更大些。

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流行的想法，认为一个被迫去撰写庸俗的无关紧要的论文的大学教授同工厂工人一样，也是那种疏远感的受害者。这种想法表明，他们对于一个蓝领工人十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了解是多么肤浅。

我有一个朋友是根据军人权利法案进行学习的青年工人，他曾碰到过这种议论，他说，如果这个教授每天必须从九点到五点用打字机打那同一段落的文章，他就会开始懂得一个工厂工人有什么感受了。速度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这个教授的打字机的活动架在上午九点就得开始活动，要按照始终不变的速度一直继续到下午五点。如果他打字跟不上这个速度，他的职位就危险了。

为了得到上厕所或打电话的许可，这个教授必须请示一个监督人。他的薪金——正教授是一万六千美元——要减掉八千美元；他的假期减为一年两个星期。公司也可能随便下命令要他加班加点，要不然他就会丢掉职业。如果运气不好，他可能还得上夜班。最后，如果他面对着他的工作毫无出路这一冷酷的结论，那他的处境就会同现代汽车工厂中一个不

熟练的青年工人的处境差不多。

总的说来，我们要看看工厂工人，其次要看看建筑工人。这是两种主要的工人阶级的环境，其情况和令人不满之处，除了在里面工作的人以外，大部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 二

在罐头制造工厂里学习做工花了我大约十五分钟。我被安置在两台机器之间。我背后的那台机器把长长的铝片切成一块块纸皮小说书大小的长方形，并把成堆的长方形放进八个盘里。前面的那台机器自动地把它们卷成圆筒，再送进一座炉子，把这一边和那一边焊接在一起。我的工作是从我后面长方形铝片落入其中的盘子里取出每一堆的长方形铝片，把它们理得象一副纸牌那样齐整，再放到我前面的盘子里，这个盘子自动地把它们送入机器。

当然，这里有一些需要学习的窍门。首先，铝片堆很滑。头一次，我抓了一把，大约一百片，它们溜出我的手，掉到地上。而且，每堆八英寸厚，有十或十五磅重；你往进料器放它们的时候，还得让它们整整齐齐，这就意味着要把它们压紧。看来有点象力图拿起一块上面涂了凡士林的重砖头。

在我前面的机器不断地运转；如果进料器里没有铝片，一盏灯就会自动地“告发”你。

我还得做另外一件事即照管我背后的切片机，当铝片堆得很高时把它关掉；到我用完八堆时再把它打开。除

此以外，就是拿起铝片堆，把它们弄整齐，再放进盘子里。

做这样的工作头几天最糟。你还没学会窍门，肌肉在你平常不用而这种工作迫使你使用它的地方，又酸又疼。

然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赶得上节拍。起先，你努力奋斗，力图赶上机器。你打算一次拿两堆，或者想要找出一种办法，比工头教给你的更好。但是最后，你不再想赶上机器，而是跟着机器走。当你有了这种感觉时，你就比较随便了；你可以不必那么全神贯注，也不再象以前那样感到吃力。

很多小伙子喜欢说，他们在做这类工作时整天想男女关系的事情。他们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小伙子们常常只是想着头脑里偶然出现的美妙念头。我所想的一件事情是，竭力想象一台可以替我做这件工作的机器。这是一种带有两个夹子的装在轮子上面的自动机。它会夹住铝片堆，转一个完整的半圈，把长方块正好放进盘子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想想它的形状就觉得挺高兴。

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作这样的幻想，因为噪音特大，而且离最近的小伙子也有十英尺远。事实上，罐头工厂的噪音是最糟糕的，因为在头顶上运转着的六条传送带上有好几千个罐头在一起撞击。这种撞击声不象其他某种工厂的噪音那样会低落下去。即使有人大声喊叫，我也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很多工人带上耳塞，来杜绝一切声响。

这个工厂分三班工作，头一班早晨七点开始。如果你晚上十点睡觉，你可以在早上六点起床，白天精神还能不错。但是对大多数青年小伙子来说，很难不偶尔跑到外面去喝口酒，一直喝到午夜十二点或一点。

睡眠不足或宿醉未消的影响在第二天是可怕的。这和中学或大学不一样，在学校里你能坐在那里假装听课。可是现在你必须整天站着，和往常一样保持同一的速度。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光景，缺乏睡眠最为难受。你不能不听噪音，不能不管工作；你不能让那有节拍的动作继续进行而不去想它。你开始每隔三分钟看一看钟，心里盘算，如果你一直干到吃午饭的时候，你的命就算拣到了。

不过，你最感恼火的是，在你觉得稍为舒服一些以前，你不能放慢速度，也不能使工作有任何改变。我猜想，多半就是当一个小伙子少睡了两小时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十分恼火，以致走了出去，或是揍他的工头。你感到整个这一套东西都是由于你想要稍稍打破一些常规而在惩罚你。

一天，在和工厂里一个小伙子一起喝完夜酒以后，我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碰到他一个人在小食堂里休息。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瓶半品脱的廉价威士忌酒，还给我一些解除宿醉的“药物”——这在那时似乎总是一种好主意，但实际上决非如此。我要了一瓶可口可乐，坐在他的旁边。我们坐了一会儿，一面谈，一面喝。我告诉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弄一台机器来代替我。他说他们可能找不到愿意做这种工作的人。我们两人都觉得这种想

象很可笑，当我们还在笑着的时候，突然工头来找我们。他看到了酒瓶子，开始把我们训得狗血喷头。然而，他却沒有扬言要开除我们。他四十多岁，已经花掉很多时间来和抽大麻叶烟卷的或更糟的小伙子们打交道，因此在看到两个青年小伙子喝着一瓶酒的时候，他可能油然而产生怀念以往好日子的幽情。

至少这是我的猜想。实际上我沒有怎么听清他说的话。食堂的隔音不好，罐头的撞击声淹沒了他每一句话的后面几个字。

当人们谈到蓝领工人对工作的不满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工作本身的性质。显然，所有工人阶级工作的明摆着的共同之点是用手操作的、往往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它不允许有很多创造性或个人表现。

通常，范围广阔的蓝领工作的条件和问题被压缩成为这样一个短句：“艰苦、单调、重复、肮脏和使人厌烦的工作。”要不然，就选择汽车工人作为典型，并举出这样一个工人作例子，他的工作就是当汽车在他面前传送过去的时候把四个螺栓拴在每一部车子上。但是，虽然蓝领工作中存在着深远的不满根源，我们却要当心，不可以拿典型的工人作为论据。有着分布很广的各种问题和各种条件，可是沒有典型的工人，也沒有典型的工作。

例如，有许多工作只是单调或重复，而不是很费体力的。一些非产业工人如看门人、加油站服务员、警卫、守夜人、停车场服务员等等的日常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在工业环境里，在



发电厂、石油化工厂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工厂里,也有许多类似的控制操作过程的工作,其中有些工资是高的。

另有一些工作主要是“笨重、肮脏的工作”,但不象装配线上的工作那样使人厌烦。码头工人、建筑业的杂工、搬运砖头和木料的人,垃圾清洁工、成千成万在货栈卸车和堆放货箱的工人所处的环境,是和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大不相同的,即使只是因为他们不被束缚在有节拍的装配线上。

然而,在工业部门最低的技术水平上,象汽车工人所从事的那种工作十分普遍。在罐头工业和食品与奶制品工业中,象在汽车工业一样,也往往有典型的装配线。在其他工业中,象传送带这样的装备或者只是很高的生产定额,也造成同样的压力和腻人的工作常规。在纺织工业中,纺纱工和织布工照管着很多台机器,总是不断地忙着从这台机器跑到那台机器,匆匆地替换或调整纱锭。在电子工业中,装备工人可能从箱子里取出一些小零件,进行一系列如把一些电线或一个电阻器焊接起来的简单操作,以完成一天的定额。在许多技术水平最低的工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比这些工人的技术水平稍高一些的是,例如机器车间的工人,他们的监督人分派给他们特定的工作,他们使用各种机器和技术来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归根到底,他们所面临的也是使人厌烦的事情或工作常规,但和那种不需要技术的装配线上的工人不同。卡车和公共汽车司机也属于这一类,成千上万工作不同的熟练的或半熟练的机器操作工也是如此。

最后,还有熟练的技工、木工、电工、汽车修理工等等,他们都有相当的知识,他们的工作需要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

力。<sup>1</sup>

因此，对于工人阶级各种工作的任何简单想法都会不幸地趋于过分简单化。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工作确有某些共同之处，和中产阶级的职业大不相同。虽然许多学者使用异化或疏远之类的词汇，工人们自己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把人当作一架机器，而不是当人看待。如果有一句话能够概括地说明工人阶级工作和中产阶级工作之间的区别，那就是这一句话。

首先，存在着尽力控制一个工人进行工作时的速度和节拍的情况。在装配线或传送带上的工作方面，要使人仿效机器的做法是异常明显的。研究时间的精明的管理员挑出一个十分能干的工人，计算他完成一项操作或一系列操作所用的时间，然后让工头强使所有将来的雇工都遵照这个速度。从此以后，不问一个工人轻微地扭伤了手指，还是起晚了，还是他的妻子生病，都毫不相干。装配线按同样的速度移动着，他非跟上不可。定额也是根据那个管理员的设计规定的，工人所有的自由只是，比如说，早晨工作努力一些，以便在下午可以稍稍慢一些。但是，如果他的定额是一千单位，他总得到下午五点就完成。一份研究报告说明，在办公室人员中，只有百分之五有工作定额，而在生产工人中则有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八十五。<sup>2</sup>

一个工会职员描述他在工作中所碰到的一种情况：

三个二十岁和二十一岁的年轻工人受雇在第二班打扫办公室。一天晚上，工头看到这三个照管房屋的年轻工人之一在作家庭作业（他白天上学），另一个在看报，第三个把脚搁在办公桌上睡觉。工头发火了，给了他们书面警告。工人们提出一份申诉书，抗

议这一警告。“我们确实尽力在五小时内打扫了所有的办公室；干吗因为我们做自己的事情就发脾气？……他们还要什么？”工会的车间代表回答说，公司花了八小时的工资，就有权要求八小时的工作。“他们现在把时间匀配得很好；每个人都挺高兴，”他说，由于在不言而喻的规章的范围内处理好这一申诉而感到满意。然而，这几个年轻工人并不那么高兴。他们想要得到和专业人员一样的自由，在相同的八小时内去干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3

就是这种时钟制度以及计时工资工人同挣薪水人员之间的区别，加强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异。它假定工作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机械的节拍：蓝领工人挣钱不是凭质量，也不是凭所做工作的本身，而是凭每小时一定的劳动产量。这是对一台机器规定的标准，而不是对一个人规定的标准。

蓝领工作的另一方面是寂寞。很多工人阶级的工作被有意识地安排好使人们分离开来。在许多工厂里，仅噪音之大就使人除了大喊一两声之外无法进行谈话。在另一些工厂里，工作台相隔很远，或是工作十分难做，根本不容许进行认真的交谈。禁止谈话的规章也很通行，或是明文写在纸上，或是由监督人口述。说法是，如果你在交谈，你就可能不在工作。只有在必须成班成组地干活的情况下，例如建筑业的工作，才能有真正接触的机会；而对于很多象卡车司机这样的工人或警卫之类的非产业工人来说，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总是完全单独地做。

往往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大多数男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完全和妇女隔离开来。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公司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当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工厂申请一个位置时——这

家工厂大都由妇女担任装配工作——雇主负责人很诚实地说，他们不愿意雇用男工，因为男工容易“闹出乱子”。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没有袭击妇女的习惯，除非她们要求我这样做。但是他很认真地回答说，“问题不在这里。”他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单凭来了异性这一点，就容易使人们把工作岗位当做社交的场所，而不是工作的地方。”

这种态度和中产阶级的世界截然不同。在大学校园里，在办公室里，或者在专业人员中间，一个男子常常有机会不仅和一个妇女谈话，而且和她一起工作，同她搞得很熟。

许多心理学家指出，在象监狱和军队这样纯粹是男性的环境里，两性完全隔离产生有害的影响；可是没有人把这一点引伸到工厂，尽管工人们每星期有五天处在同样的环境里。且不说象监狱生活这种完全隔离所造成的明显的压力，工人们的部分隔离也产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影响。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造成心理学家所说的“缺乏社交技能”，即仅仅由于缺乏实践而不善于和妇女交往。但更一般的是，这使得男工人和妇女的关系十分肤浅。从来没有同妇女一起工作的男子很少有机会和她们来往，或许只是认识她们罢了。如果陈旧题材里的大学生的形象是一个男学生和一个女学生一面喝咖啡，一面热烈讨论人生和哲学，而两性关系的形象是在一起生活，那么，对于工人来说，这就是一群小伙子坐在一辆运货卡车里从这个酒吧间跑到那个酒吧间，希望很快能碰上好运气。

中产阶级优越感的更使人憎厌的事例之一就在这一方面。中产阶级的人藐视工人，说他们对待妇女举止粗暴，说建筑工人对走过的姑娘们吹口哨，或者说他们想以粗野的方式



求得“艳遇”。著名的心理学家们撰写论文，认为他们的行为的根基在于各种神经官能症和由来已久的对于两性关系的不安全感。

可是，如果你整个星期在工厂里工作，你能碰到妇女的仅有的时间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而决定工人们在白天永远碰不到一个妇女的，并不是蓝领工人，恰恰就是那些实业家、社会科学家和研究时间的管理人员。然而，没有人议论说，公司经理和人事科长们是潜在的同性恋爱者或男性沙文主义者；这种攻击是留给工人们自己来进行的。

在许多方面，这种缺乏和别人——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接触的情况，要比工作本身更使人厌烦。这意味着，工作时间好象是被偷掉的时间，是从一个人可以过真正生活的非工作时间里拿走的时间。这意味着，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所有的日子都是从事工作和工作准备的漫长而刻板的时间。工人们早晨六点或六点半起床，吃早点，穿衣服，上班。他们等待时间过去，直到吃午饭，而吃午饭往往只给二、三十分钟。到下午五点，他们下班，也许去喝口酒。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工作很累，因此他们回家，吃晚饭，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大多数晚上，他们最迟到十点或十点半就上床睡觉。

对许多工厂工人来说，所有这些压力更加严重，因为他们为了使收支相抵，不得不加班工作，或在晚上另操副业。196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揭露，全体美国工人中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一，即将近四分之一，每星期工作四十九小时或更多一些。机器操作工是百分之十九。这就是说，每五个工厂工人中有一个人每天不是工作八小时，而是十小时；有的人还更长一



些。<sup>4</sup> 1973年夏季,在汽车工业中,许多工人每天工作九小时以上,每星期工作六天或七天。用通情达理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不是在下午五点而是在下午七点离开工厂,或者是下班后在晚间去开小汽车;这意味着,晚上八点到家,吃过晚饭,在睡觉以前至多只有一个小时的“空闲”,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对这几百万工人来说,所有关于“空闲”和怎样处理它的问题的谈话,听起来仿佛象是一种残酷的玩笑。任何熟悉这种情况的人都听到过妻子们的许多怨言,她们说她们的丈夫回家刚吃过饭,不到几分钟就在电视机前面睡着了。

还值得记住的是,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家庭收入数字,包括加班加点和晚间兼操副业。包括那些每天工作十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在內的机器操作工的平均薪给为七千六百三十六美元。

对另一些人来说,寂寞和隔离的问题也非常严重,这就是那些上第二班(从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或上“坟地”班(从夜里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工厂工人。这些工人的人数往往被低估了。但是在东北部,这占全部工厂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sup>5</sup>

这两班的工资多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但这也包括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收入总额之内。轮班工作意味着扰乱家庭生活,工作的循环使他们除了一起工作的人以外和任何人分离开来。四点到十二点那班工人常常发出的怨言是,他们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学龄儿女。孩子们起来离开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还没有睡醒;大人回家的时候,孩子们早已睡熟了。

因此,在那关于“令人厌烦的工作”的简单的老生常谈后

面，有着一系列改变蓝领工人整个生活的色彩的具体情况。虽然有些中产阶级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可是，任何中产阶级的职业环境都并不有系统地把这些情况强加在人们身上，象各行各业的蓝领工人所遭遇的那样。

这还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工作安全、工作保障和附加福利的问题，以及施加于在职工人的权力主义和琐碎的控制的问题。最后提到的这个因素本来可以在这里谈一下，但是它十分重要，需要另用一节来加以论述。

### 三

我曾在其中工作了一段时期的发动机工厂，是紧挨在一起的长达半英里多的一系列较小工厂之一。这些工厂面对着宽宽的一段铁路轨道，轨道那边是一座大钢铁工厂，它的长度一定多于一英里的四分之一。

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曾试图向一些大工厂找工作，但是它们都不雇人。那时到处都很难寻找工作，因此，当我发现这家工厂时，我就接受了这个职业。起点工资每星期一百零六美元，这还不是最差的，特别在南部是如此。

这家工厂接受用过的旧发动机，拆卸开，然后用多半是新的零件重新装好。我分在拆卸旧发动机的第一组。这里大约有八个人，照管这个工作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发动机由一连串滚轴组成的一条传送带向我这边送来。做头一部分工作的那个人把发动机推到半路，我再把它拉过我面前的其余的距离，直到它停在一张特殊的

工作台上。

发动机来到我这里的时候，盖子已经揭掉，车子翻了个身。因此，我在面前所看到的，是发动机内部的曲轴，样子看来就象某种史前动物的脊骨；在它下面，是六个活塞，由一连串小夹子固定在曲轴上。它们装在发动机底部六个圆柱形的洞里。我的工作拆掉曲轴和活塞，只留下金属空壳。我得从那钳住曲轴的各个夹子上取下大约二十五个螺钉，然后把曲轴拿出来，把它送到作业线上。然后，我得用力使那些已经露在外面的六个活塞脱出窟窿，把它们传递给另一个工人。

这个工段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被称为油坑。旧发动机送来的时候，上面凝聚着厚厚一层粘油和润滑油。没有办法避免很快就弄上一身油腻。

取下夹子这头一部分的工作通常很容易。头顶上吊着一个自动扳钳，叫做气枪，它很快地取下螺帽。我所要做的只是把它放在适当的插座上，在它转的时候按住它。但是，如果活塞生了锈——这是常有的事——我就必须使用一个小单手锤，有时是一个大锤把它们敲出来。有时候，用锤子和楔子狠打几下就行了。可是，有时候我得打碎活塞的陶瓷和金属部分，才能使它松动，掉到地上。有一个大个子，人们给他一些最坏的发动机让他拆卸。他有些蠢，常常乱舞大锤，把他所使用的楔子打飞到屋子的那一头。有一次，他特别乱挥起锤子来，没有打中楔子，弄断了锤柄，锤头飞到空中，差点没打中另一个人的小肚子，在此以后，他们终于把他调到另一组去了。

这项工作不象把四个螺钉安装在传送过来的汽车上那样使人厌烦。节拍是不同的。我努力摆弄发动机，不是机械地往上面装螺钉。这是刻板的、使人灰心丧气的工作，不过并不十分叫人厌烦。但是，有关这一工作的一切情况，实际上都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我们每天得处理五十四个电动机，大约每十分钟一个。

早晨七点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精神挺好，如果发动机不特别生锈，我在十分钟内能弄好一个发动机。但是，一天弄好五十四个发动机就意味着整天都要保持这个速度。这意味着，如果我停下来离开机器去厕所，或是去喝一杯可口可乐，那么，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必须更加紧地干。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套需要花更多时间来拆卸的锈得特别厉害的活塞使我落到后面，我就不得不急忙赶上去。这种定额的存在根本改变了这一工作的性质。它不再只是繁重的工作，它变成紧张的工作了。只有在吃午饭的二十五分钟里，我才觉得没有人在监视我。

那个监督人似乎不象是个坏人。有一天，我的手指让一个发动机的锐利的金属边缘割伤了，去请求急救医疗。他给包扎伤口的时候，就我们两人在一起，我感到有些轻松愉快，因此忘掉了工厂生活的头条规定，打算跟他谈一谈，好象他是一个普通人似的。他问我一些关于工作做得怎样的事情，我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回答说我的秘书不够漂亮。

我刚说出这句话，我就知道我应该闭口不谈了。他们付给工头的工资同工厂里工资最高的技工一样多，或

许更多一些，并不是为了让工头对于某个雇工讥笑他的工作的俏皮话一笑置之的。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说当你找到一个相当好的工作时应该加以珍惜；他在心里记下我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家伙。

然而，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最坏的一个。这个油坑里的人员经常有所变动。很多人都呆不到一星期以上。

有一个年龄较大的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大个子，一天来到我们那里，开始工作。就在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当每一个人开始感到心烦意乱，盼望吃午饭的时候，这个大个子突然扔掉他的锤子，用一种若有所思的但很高的声音说：“你知道——他妈的这种倒楣活儿。”说完以后，他转身走了出去。

工头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要去找这个人。但是在去追赶他以前，他停下来，吩咐我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想法补上去，免得每个人都闲着。这个年轻人翻眼望了一会儿，笑着说，“你知道——他妈的那种倒楣活儿。”

这时我们其余的人都犯歇斯底里，监督人看着我们，好象整个世界都发了狂。然而，他终于找到另一个人补了进去，作业线可决不能停下来。

第二天，我从餐车上买了一份牛肉饼，坐在一个汽油桶上吃午饭。在象这样的一些小工厂里，它们常常缺少的一件东西就是食堂，甚至也没有桌椅。我看着外面的日光，心想这是多么好的天气。

哨子响了，每个人都开始回去做工。我看着旁边的



那个小伙子；我看得出，我们两人有同样的想法。我们跑到我们的汽车那里，开车走了，仿佛我们刚从福尔索姆脱逃出来似的。这是一种疯狂的感情，就象从学校里逃学一样，只是好一些。那样子一定很好笑，因为我从头到脚仍然是一身油腻；但那时我太高兴了，不去理会它。

在六十年代，当学生们开始反抗统治着他们大学的权力主义和家长式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根据如何赢得其他成年人所有的那种独立性和责任感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工厂和车间中，蓝领工人却受一些规章制度和政策的支配，使各大学相形之下象是颓废派的群居村。很难描述这种情况，这只是因为在中产阶级的工作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同存在于工人阶级美国的权力主义和缺乏自由的情况相对应。

首先是各种工作规章制度本身。《幸福》杂志的一篇文章很恰当地用以下的话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在一些工厂里，存在着繁琐得达到苛刻程度的工作规章，如果在海军里，会使新兵营里负责教练的军士长高兴得眉花眼笑。规章规定，不许发出嘘声，不许打闹，不许在吹哨以前准备下班，不许乱扔东西，不许浪费时间，不许在厕所里磨蹭。”<sup>6</sup>

清单决不止于这些：骂人，分散其他雇工的注意力，以及（几年以前）只是留了长头发，就都是公司实行惩戒处分的根据。当人们想到范围广泛的各种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反抗命令、粗心大意、工作马虎、磨洋工这类词条之内时，很明显，差不多任何事情都可以解释为值得暂时停止工作（叫做“惩戒性

暂时解雇”),或甚至永远解雇。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一条通则是:如果老板想要撵掉你,他总会找到办法。

这些规章的锐利锋刃是工头,这是在中产阶级社会中绝对没有与之相应的人物。拿薪水的专业人员确也常常有他们的上级,但是不可能想象,教授或行政人员请一天假还得拿医生的病假条,也不可能想象,他们还得对他们上厕所的次数说明理由。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只要工作做完,什么事也没有了。

在有工会的工厂里,工头所握有的权力的大小,以及他所能执行的纪律的种类,是有很复杂的规定。可是对于几百万未入工会的工人来说,那就极其简单:你照工头的命令办理,否则就会丢掉工作。有一件事很清楚地说明工头在沒有工会的厂矿里的权力和权威是多么巨大,这就是,甚至在六十年代,在南部的一些城市和工业部门,工头自动地成了特别代理人,他们可以佩带手枪,并且大概也可以使用手枪。

我所认识的一个黑人工会组织者告诉我,他所组织的一批工人提出的首要的和最痛切的要求之一,就是不许工头带枪。如他所说,“工人们不能不感到害怕。工头不仅可以开除你,而且可以逮捕你,甚至开枪打你,并且几乎肯定可以不受处罚。”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事实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即使在有工会的工厂里,情况也仍然基本上是不民主的。工会合同具体规定工作时间、安全条例以及厂内的其他事项,工人有权通过工会提出申诉,抗议停止工作或解雇的处分,如果他认为那是不公道的话。这些申诉或由工会和公司处理,或提交联邦仲裁与调解局的一个“中立的仲裁人”。但

5 是，在这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暗中勾结舞弊，非常不利于工人的。

首先，从根本上说，这种申诉程序是单方面的。实际上，工人在证明无罪以前总是有罪的。正如一个作家所说，“如果公司惩戒一个工人，处罚马上付诸实行，工人就因此受屈。例如，一个工人因‘工作不好’被停止工作三天，他就三天拿不到工资。他通过申诉程序提出抗议。如果这个案件要通过仲裁，那就会拖延一年多的时间才作出最后裁决，即使是在仲裁之前作出的那些决定通常也要花费六个多月的时间才有眉目。”<sup>7</sup>

在工会报刊上，人们偶然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被工厂不公正地解雇的工人终于在大约六个月以后得以恢复工作。在极罕见的场合，他们补拿到全部未付的工资，但在通常的情况下那笔工资是到不了手的。在这中间的时期里，他们的收入和整个生活都遭到破坏。

关于工作本身，工人必须听从监督人的一切命令，哪怕这些命令违反工会合同，或者更奇怪的是违反安全条例。工人的唯一办法是实际做完让他做的事情以后，再提出申诉。有一次，两个工人由于拒绝加班而被停工两天，虽然工会合同明确规定加班是自愿的。他们提出申诉，抗议停工处分。这一案件提交了仲裁人，仲裁人承认他们是对的，但仍然说停工处分有理，因为“正确的办法是先做完所抗议的加班工作，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提交申诉程序”。

在另一事例中，问题远远不那么平凡。监督人命令一个工人用手去倾倒几桶一种很危险的化学药品，虽然为了安全

起见，这种活通常是由机器来做的。他拒绝去做，被停工十天。他提出申诉，抗议停止工作；但当问题提请仲裁时，仍维持停工处分，只不过把日期减为三天。换句话说，这个工人损失了三天的工资，比如是九十美元，只是因为拒绝服从一项既错误又危险的命令。<sup>8</sup>很明显，申诉程序限制了工头的绝对权威，但并没有接近于提供一种公平的境遇。

零零碎碎的滥用职权和不公正的事件非常之多。洛兹城雪佛莱公司工厂里一个工人叙述了以下的事件。

上星期，有个作业线上的人把一个臭气炸弹放在一辆车子里。我是管后部坐垫的。工头说，“到那辆车子里去。”我说，“如果你能把脑袋伸进那辆车子，我就去。”于是工头说，“我是在给你下直截了当的命令。”因此，我屏住呼吸做了这件事。我的工作是在管间隔的一辆车子，因此我把下一辆车子放过去。他又要我干，我说，“这不是我的车。对不起，我已经做了你的肮脏工作，另一辆不该归我管。”但是他坚持不放，我终于被停工一星期。这时我找到了一个热心的工会委员，他认真地替我辩护。你晓得怎么样——他们把他也打发回家了。给了这个工会委员惩戒性的暂时解雇处分。这简直象是军队——不，比军队更糟，因为你被焊接在作业线上。连撒尿都得经过批准。<sup>9</sup>

关于公司根本比工人占优势的另一例子，可以在另一家工厂的一件事情上看起来。在一个工人和他的监督人关于要他做的工作量的争论过程中，他用通常称为“行话”的语句来表述他的意见，因而受到公司的警告。（警告不象暂时解雇那样严重，但也记入工人的工作记录，能够严重地影响他的前途。）



公司用以下的话来回答他的抗议，“违抗命令和骂人是不能容忍的。只要发生这类事情，就要加以惩戒。”但是，当这同一工厂的工人提出申诉，抗议某监督人咒骂一个雇工时，公司只是答复说，“管理人员用咒骂的话来对待以钟点计算的雇工，这不是公司的意图。”对于那个监督人，没有停止工作，没有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然，问题不在于语言，而在于存在着双重标准。<sup>10</sup>

实际上，近年来情况变得更糟。申诉制度充其量也是缓慢而麻烦的，有时堆积起好几千份申诉，数目多得使好些申诉或许永远得不到认真处理。由于没有迅速而有效的工业裁判制度，申诉往往成为集体合同争议中的工具，使工会面对着这样一种不愉快的选择，即要想获得一份较好的工资协议，就只有把申诉的问题撇开不谈。

许多自由主义的和左翼的批评家，批评工会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工资这一面包和黄油的问题上。这一批评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有道理的。但仅是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糟。一个作者在一份劳资关系杂志中提供了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

在典型的公司里，在整个1945—1955年这一时期，工会和管理部门之间发展了整整一系列非正式的关系。他们往往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处理各种申诉，而不管合同的明确条文。工头和工会车间代表、监督人和工会委员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达成私下的口头谅解或“协议”，这些谅解或“协议”实际上修改了合同。

毫无疑问，工会学会了利用这种灵活性来为自己求得好处。当正式谈判陷于僵局时，它们有很多武器可以用来加强它们的地位



——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怠工、过分从字面上遵从规章的做法，甚至还有破坏。工头也有武器——不让加班；实施严格的纪律来把工人困在工作上面和阻挠工会职员的活动。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一种类型的游击战，其中工会占有各种地形上的优势。最近，在申诉程序的每一步骤上，都作出努力来加强管理部门的地位。两个人事管理人员宣布说，他们拒绝考虑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申诉，除非工头有充分机会来研究这种申诉。例如，一个新人事科长在就职时坚决表示，仲裁程序中的所有证人都要宣誓，这和以前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在有些事例中，人事科长能够获得一些使申诉程序更为严格的合同。<sup>11</sup>

除了一些有关安全条例的事例外，这些问题可能显得无关紧要和十分琐碎，然而并非如此。这样一些问题往往代表以下两种情况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别：在一个人的工作上，是有一种基本的安全和尊严感呢，还是完全听凭雇主摆布。当然，从本世纪初或三十年代以来，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本世纪初，公司常常贴出布告说，“如果你星期日不上班，星期一也就不要来。”在三十年代，监督人会紧跟着工人们走进厕所，查看他们是不是在里面磨时间。但是，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在工作场所缺乏公正和民主，现在仍然是不满情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源。

#### 四

在我住处附近，有一个酒吧间。年轻小伙子下班后在五点到六点的快乐时间里，常常在这价钱便宜的时候到那里去喝一两杯啤酒。有一天，我们团团坐着，听一个

小伙子讲话；他刚在一家小货栈里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已经和监督人发生了麻烦。这是初春的一天，每个人都精神挺好。当这小伙子一个劲地谈起他的监督人是怎样一个王八蛋，以及他如何不再听他的任何废话时，别人开始插嘴，讲他们曾经做过的最糟糕的工作。所有这些人都是年轻工人，唯一的熟练工人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木工师傅，因此他们竞相发言，非常热烈。我的一个朋友在这场竞赛中取得很大优势，他讲了在一个养鸡场铲鸡粪的事情，然后讲他在一家牛奶装瓶厂做的临时工。奶瓶在传送带上很快地运转着，他的全部工作是在瓶子移过来的时候往每个瓶子上面贴带胶的标签。他说的详细情况使这件工作听起来更加糟糕。由于他干这工作每小时仅挣得一点六五美元，我们都准备举起酒杯，告诉他他已经竞赛获胜。

但是，一个通常不大讲话的已婚的年轻人突然开了口。他讲他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工资很低的小造纸厂里发生的事情。他的这个朋友在切纸组加班加点，一只手卷进了一台把纸切成八英寸半宽十一英寸长的切纸机。机器把他的手齐腕切掉。更糟糕的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刚刚结婚，妻子已经怀了孕。这个已婚的人说，他的朋友正在想法请求赔偿，但这是一家没有工会的小工厂，事情很棘手，他可能什么都弄不到。

在围桌而坐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打算用一句讽刺的俏皮话把这件事轻轻放过，但是我们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震惊，因为在座的每个

人都不知道某人在工厂里碰到的倒楣事。但是我们无法恢复我们刚才的心情了。那天我们很早就分手回家，并且忘掉了这件事。在此以后，没有人想问问事情的结局是否圆满，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那多半是没有好结果的。对于这样的事，如果你无能为力，你就只有把它忘掉。说你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是比较容易的。我当时没有十分考虑这件事，但是以后我认识到，象五点半钟在一个酒吧间的漫谈或一阵突然的沉默，确实能告诉你一些你在关于当代美国工作和工人状况的民意测验或调查研究方面所找不到的东西。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民意测验，能够衡量代表那种沉默的东西或其背后所隐藏的恐惧心理。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所了解。

1911年，杰克·伦敦《铁蹄》一书中的主人公欧内斯特·埃弗哈德带领一个中产阶级妇女去看望一个在工厂里丢掉手臂的工人，以此作为颇富戏剧性的办法，来打破她对当时工人状况的带有优越感的自满情绪。如果伦敦今天还在写作，他是会采用同样的策略的。在六十多年以后，现实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很多工人阶级的工作使人死亡和变成残废，其程度之深甚至是中产阶级所不能想象的。

例如，在1970年，福特汽车公司玻璃工厂的一个机工的左手被切断，血肉模糊地轧在机器里。他的呼救声没有人听到，因为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带着耳套，以防止那超过九十分贝的非法噪音的骚扰。只是在一次罢工的威胁下，公司才把噪音降低到七十分贝。

在宾夕法尼亚州黑兹尔顿市，铍精炼厂的一个雇工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每天要吸四次氧气来争取他的生存。据医生预测，他可能已临近一种越来越普通的肺病——慢性铍中毒——的末期；此外，医生还说，他的剧烈的阵咳可能引起癌症。

丹尼尔·马西博尔斯基是一个从事石棉工作的杂工，他患了间皮瘤。人家告诉他，在一种恶性肿瘤硬化并包围他的胃，使他不能吃东西以后，他就会死去。在过去八年里，他的同伙工人至少有六十个已经死于这种疾病，还有一个妻子因为只是经常洗她丈夫带有石棉的衣服，也这样死了。

一个女电子工在九个月的时间胸口剧疼发作四十次，烧到一百零四度，出汗，发抖，喉疼，呼吸困难。其原因是，工厂空气中的聚四氟乙烯微粒污染了她在午饭时间打开的每一包烟卷。<sup>12</sup>

这一清单可以一直开下去，有着一件又一件断肢、失明、断头和其他工伤的事例，使得一张清单十分凄惨，有些读者不忍卒读。可是这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每天由于这类情况有五十五人死亡，两万七千人受伤。在1970年，一万四千二百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一两千万人受了伤，至少有十万人死于职业病。这使得工厂比公路加倍危险，并且成为美国的头号杀人凶手。<sup>13</sup>

阅读一张职业病的清单，人们开始感觉到，实际上就好像一位将军在查看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伤亡清单。

**黑肺病**：煤矿工人的一种肺癌，是由于吸入煤尘而得的。三十万人受到威胁，十五万人已得此病。

**褐肺病**：纺织工人由于不得不吸入碎棉毛而得的一种类似的

疾病。一年中有八十一万九千人受到威胁——一万七千人已严重残废，也许还有十万人已多少患有此病。

**石棉沉着病和间皮瘤：**在有这种原料(石棉)的工厂、造船厂和任何场所的工人所患的癌症。其症候能潜伏二十年才显露出来。每年有三十五万人受到威胁——患者人数不详。

**铍中毒病：**它也能在二十年以后发作，并且突然置人于死地。五十万工人受到威胁。因此而死的人数无法估计。

**煤气和其他气体中毒：**在汽车工厂中，这是一氧化碳——在其他工厂中，是三氟溶剂，一种普通的工业溶剂。在航空空间工业中，这是工人们吸入的“高能燃料”。易受某种形式的这类毒害的人数可能以百万计。已受害者的总数很难估计。

**破坏性的噪音：**这能造成耳聋，听觉减退。在某些情况下，它也能造成高血压、心脏病、神经失常(包括性机能失调)。据估计，有一千七百万工人多少受到过大的噪音的影响。

**意外事故：**建筑工人、机工、码头工人和屠宰业工人特别易于遭受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包括爆炸、触电、从高处坠落以及其他许多种危险。由于有关什么是“使人丧失劳动力的”意外事故的定义含糊不清，意外事故的件数往往被少算，例如说1970年是二百五十万起。然而，劳工部的调查研究表明，每年意外事故可能高达两千五百万起。<sup>14</sup>

关于旧的阶级区分和不公平现象如何已经消失的一切陈词滥调和一厢情愿的说法，被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揭穿为虚伪的空话：美国工人必须承认严重伤残甚至死亡是他们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而中产阶级却不是这样。

设想一下，如果每年有几家公司的总管理处照例象矿场一样坍塌下来，砸坏六、七十个行政人员，那会发生多么普遍



的大喊大叫。或者，如果所有的银行都充满着看不见的毒尘，使一些经理、办事员和出纳员经常发生癌症，那又将如何。最后，再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的工作中每年震聋了耳朵，或者丧失了手指、双手，有时搞瞎了眼睛，那么，全国的每一家报纸将怎样描述那种恐怖的情景。职业保健和安全这类简单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美国仍然有着阶级之间深刻的不公平。

对美国工人的这种冷酷无情地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出现在“工人赔偿金”方面。正如弗兰克·沃利克在其所著《美国工人：一个受危害的种属》中说的：

现在，从商业观点看，拚着付给一个残废的或死亡的工人一千美元的赔偿金，也比投资去改善设备、改善工作场所的通风装置或改良工作场所的环境来得便宜。不幸的是，这是大约三十年前一笔政治交易的可悲的遗物，那时工人们放弃了控告雇主忽视工人安全的权利，得到了一张支付工人赔偿金的正式明细表作为报偿。<sup>15</sup>

这类赔偿金在各州之间大不相同。一个工会律师告诉一个在泽西城听取意见的参院劳工小组委员会说，“在密西西比，一个手指的价值比在宾夕法尼亚小；而在宾夕法尼亚，一个手指的价值又比在加利福尼亚小。就什么是平等的劳动保护法来说，并没有划一的标准。今天在这间屋子里，有谁愿意丢掉一只眼睛而换取不到一万美元的款项呢？在宾夕法尼亚，你每星期领取六十美元，共一百五十个星期，这笔款项总额为九千美元，或同损失一只手的赔偿费相等。”<sup>16</sup>

1972年年底，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赔偿金的研究报告。《新共和》周刊的一篇社论用一段简洁的文字概述它的研究结果如下：

尽管许多州有所改进，可是委员会报告说，现今在超过半数的州里，暂时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每星期最高补助金不到国家规定的四口之家非农业户的贫穷收入水平。在大多数州里，永远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每星期最高补助金都不充足。在十九个州里，还没有等到残废工人死亡，这种补助金就会停止支付。劳动队伍中的百分之十五还没有包括在工人赔款金的支付办法之内；有九个州还没有对所有职业病提供充分的补助金；有十五个州还没有对残废工人提供充分的医疗补助。<sup>17</sup>

因此，保健和安全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加引人注目地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并揭露出存在于美国蓝领工人方面的深刻的不公平现象。

当我们谈到那些被认为有助于消除前几年不满情绪的工作安全设施和小额福利问题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二者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结论：美国工人阶级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遭受苛刻的对待，并且同那些撰写文章来描述他们的人相比，是次等的公民。

## 五

即使在最近几年，当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的时候，在所有论述“蓝领工人的烦闷”的文章中，或在关于美国工人问题的讨论中，人们都不大注意失业问题。当然也提到一些，但很快就把它丢开，不当作一个主要问题。即使在1971年最糟糕的时

候,失业问题毕竟也只影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因此,不用很多的算术知识就可以知道,有百分之九十四没有被解雇。在1973—1974年,当能源危机成为失业的一种重要根源而出现的时候,估计它最后仅影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或至多是百分之十。同三十年代相比,它看来确实不象是一场大的危机。

自由主义者批评了这些数字,其理由是,它们把某几类人不计入失业者的行列,如已经停止寻找工作的“心灰意懒的”工人,以及要求全时工作但只能找到每星期几小时工作的人们。保守主义者答复说,那百分之六包括妇女、寻找暑期工作的学生、辞去工作的工人,以及其他一些所受失业影响不象突然被公司解雇的、“养家糊口的”男性工人那样大的人们。他们说,在1972年2月,已婚男子的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八。<sup>18</sup>由于黑人在没有工作的人们中间也构成一个不相称的数目,多数作者断定,对于“典型的”工人来说,失业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们觉得,这听起来很合乎逻辑。他们没有看到领救济食物的穷人队伍,又和工人没有私人接触,就很容易想象百分之九十四的工人有工作保障,并不比白领工人更担心失业。

问题是这样:每个人所密切注视着失业“率”,象我们在上一章讲到的“增加率”一样,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尺度。反之,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去年有多少人失了业?”——“有多少工人失掉了工作,并且花了许多星期或好几个月去寻找另一种工作?”——那么,答案就很惊人。在1969

年,即在失业还没有成为一个大问题以前,机械操作工的百分之十八,即每五人中几乎有一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失业。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即每四人中几乎有一人失业。在这一年里,他们的失业期间平均在三个月以上。<sup>19\*</sup>

下表说明这种情况(失业人数在1970年激增,所以也列出1969年的数字):<sup>20</sup>

### 1969 和 1970 年的失业总数

(百分比)

中产阶级	1969年	1970年
专业和技术人员	5.7	6.5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4.3	5.2
办事员	10.2	11.5
销售人员	9.7	10.8
工人阶级		
技工	12.7	17.5
机械操作工	18.1	23.2
服务人员	12.1	13.6
杂工	22.6	25.7
建筑工人	24.4	30.7

结论很简单。失业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是极其普遍的。每年有几百万工人丢掉了工作,而其余的人也普遍担心他们会遭到失业。毫无疑问,大多数美国工人,即使他们现在保有他

---

\* 失业“率”所表明的情況如此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它只计算进行调查的当天的失业人数。数字统计人员抽问一些人是不是有工作,然后计算其结果。这种调查结果所表明的是在某一天没有工作的人的百分比,而不是所有那些在以前失过业或在以后将会失业的人。这种“年度失业率”只是每年十二次调查的平均数,而不是所有那些在这一年中某个时候的失业人数的总和。这些总计数字叫做年度工作经验资料。虽然这些统计数字远比失业率更有意义,人们几乎从来没有用以判断失业的严重性。

们的工作,也不能感到有真正的就业安全。

必须指出,工人中有很大的一个少数每年不止一次失去工作,因此这一年失业的工人总数要比这些数字所表明的少一些。但是,这些数字既没有包括暂时失业的工人(例如在改换型式时的汽车工人),也没有计入由于天气不好而闲下来的工人,尽管在这种时候他们拿不到工资。特别是,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每年都要由于这一原因而失去几个星期或更长一些时间的工作。

工人阶级失业和中产阶级失业之间悬殊的差别,也是同样明显的。机械操作工失去工作的比例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们的四倍。即使是熟练工人失去工作的比例也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们的两倍。

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是失业期间的长短。1969年,在失业的蓝领工人当中约有百分之二十三失业的期间是四个月或更长一些。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sup>21</sup>四个月没有工作的情况,不仅破坏一个家庭当年的生活水平,而且造成有高度破坏性的个人和家庭的紧张局面。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他们坐在工会办事处的周围,或者匆匆忙忙地赶做一些打杂的短工,如果可以找到的话。

对这些失业的工人来说,缺乏工作保障当然是一种深刻的不满根源。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工人都不能不面临着失业的恐惧。很少有几家工厂非常稳定,或其具体工作充分受到保护,以致不存在这种恐惧。如果说失业本身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那么,缺乏就业安全就更加普遍得多。

这个问题对于一些人特别重要,这就是建筑业的技工。



人们能够再三听到这种自以为是的议论：“那些人每小时挣七、八美元或更多些……就是说，让我算算……五十个星期或二千小时乘八，那岂不是每年一万五千多美元。”

但是，在1970年，实际上挣一万五千美元或超过这个数目的，还不到全部建筑工人的百分之十。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在整个美国，大多数建筑业技工一年甚至挣不到一万美元。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字，建筑工人的平均收入是九千零五十五美元。

这一部分是由于未入工会的技工的工资率较低，在除去东北部以外的全国其他各地尤其如此。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建筑业在美国各经济部门中是失业率最高的。1969年，这一行业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十四点四都失业一段时期。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那一年的有代表性的一天，每十个建筑工人中就有一人以上没有工作。他们失业的期间也很惊人。在1970年，三分之一以上的失业者有四个月没有工作。<sup>22</sup>

因此，熟练建筑工人所挣的“使人反感的”工资，毕竟不是那么荒谬的。如果建筑工人所挣的工资同工厂工人一样多，他们的收入就会降到“低等贫穷预算”以下。其实，九千零五十五美元就低于那年的“中等预算”。有些挣到工会规定的最高工资并且全年工作的人，能够获得富裕的收入。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失业把它降低到和其他部门的熟练工人一样——每年九千至一万美元。

在肯尼思·拉森所著《工人》一书中，一个来自波士顿的未入工会的砌砖工人描述他的情况如下：

去年夏季，从6月到10月，我能拿回家平均每星期二百二十五美元，可是在春季和秋季，那就是每星期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而在冬季，则差不多有一个半月没有工作。今年夏季，如果每星期我能挣到二百美元，那我就是很幸运的了。至于秋季和冬季，我甚至不愿加以考虑。

以后他又说：

许多人有这样的印象，认为蓝领工人挣很多的钱，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的确，有些作为工会会员的建筑工人每小时挣六美元或七美元。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每年由于天气不好是十足有五个星期没有工作的。使他们发生误解的另一件事，是在他们的房屋周围有一些零碎工作。例如，你找一个“砌砖工”修理你的台阶，他干四小时的活，要你付一整天的工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必须另外找个帮手，或许还要弄一辆卡车来；对他来说，他失去了一天的工资。付这笔钱的那个家伙以为我们总是每小时挣十美元，并且生活得很阔气，其实并非如此。看一看一些白领工人吧。以一个按时间收费的会计员为例，你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花费了一小时；他们折腾你，收拾你——他们就是靠着收拾你来过他们的优裕生活的。<sup>23</sup>

失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情况确是有所帮助，但它只包括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失业总是不相称地落到那些没有包括在内的人的头上。1968年，百分之六十四即将近三分之二的失业者拿不到任何救济金。有些州的法律规定要有一定的就业时期和一段等待时期。此外，很多雇主都雇用顾问来对付他们的工人的失业保险金要求，因为低的解雇记录使公司能够对这一方案支付较低的税款。

最后,在许多州里,这种救济金同帮助受抚养儿童的福利金一样,或许更糟些。只有少数工业部门,例如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提供私人补贴,如果工人有一年工龄,给与三个星期的正常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对于有七年工龄的雇工给与一年。<sup>24</sup>

这一方面的政治含义十分重大;虽然我们在下面有一章中将对它们作较为详尽的讨论,可是,这种认为工人们在就业和工作保障方面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的想法,一直是很多自由主义的错误判断的依据,所以必须谈一谈。

例如,环境运动在过去对于关闭一些污染环境的工厂问题,总是采取“嗯,到处还有其他许多工作要做”这种心安理得的态度。然而,并不是到处都有其他很多工作要做。否则,在1970年就不会有百分之二十二机械操作工失业了。

能够夺走一个工人积蓄起来作为子女教育费的钱,或者甚至使他丢掉房屋的,正就是那些失业的时期,所以很明显,他必须努力进行反击,即使他也希望有清洁的河流和空气。自由主义人类生态学的提倡者往往很漂亮地谈到蓝领工人有继续从事原来的职业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选择自由,可是当接触到实际生活时,态度就变成“现在先关闭工厂,以后我们会给工人另想办法的”了。通常,所说的办法结果总是成为泡影;这不仅不公正,而且在政治上是愚蠢的。

同样,许多自由主义者对于建筑业不要黑人的态度,也是往往以这种想法为依据的:大家都有足够的工作可做,“硬帽工人”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只是纯粹的种族主义。在很多很多事例中,确实存在着种族主义。但也有失业的幽灵,这是千真

万确的。

旅馆和餐馆雇工工会国际副会长迈拉·沃尔夫冈认为：“当你的工会会员象底特律地区的木工那样，有百分之二十二失业时，这就不是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和黑人分享就业机会的最适当的时候。如果政府能满足我国对住房的需要，建筑业的黑人和白人工人就都会有工作可做。”<sup>25</sup>

全国闻名的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赞成这种看法。他说，“我并不责备白人不想让黑人得到他的工作。我也并不责备黑人想要得到那个工作。我想看到政府实行一种使白人和黑人都能得到工作的政策。”<sup>26</sup>

不幸的是，象这样的一些意见大都被自由主义者以百分之六的失业率这种神话为依据而加以忽视了。这种神话“证明”工人阶级关心工作只是掩盖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的“烟幕”。但是，工人阶级失业问题是十分现实而带有破坏性的，只有在承认这一点之后，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才能有任何真正的进步。

## 六

史蒂夫是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做过许多建筑工作。我们谈了话，我只是如实地把他说的话写下来。

我曾工作过一阵的一个地方，是在华盛顿以外的弗吉尼亚地区，一片正在建筑着的房子，非常讲究。我们一定有五十个人在盖其中的十五所到二十所。最便宜的房子的造价大概是八万五千美元，最好的要花三十万美元。

它们什么都有：风景优美的大窗户，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壁炉，红木酒吧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室内游泳池。正如我所说的，非常讲究。

至于工作本身——我是跟一个木工头儿干轻巧的构架的活。我想你会认为那只是一天到晚钉钉子，但其实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还的确需要懂得一些技术。你必须能够看蓝图，搞计算，工作的时候你心里还要想到整个那所房子。如果你不把楼面布置图设计得很妥当，你就会让一个烟囱从浴室穿出去。我认识这样一个木工，他能够十分熟练地在心里进行运算，所以他常和别人打五块钱的赌，说他能够作一些十分复杂的心算，比别人用纸和铅笔算得快，结果他总是获胜。这就是因为，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进行这种计算。

构架木工的工作基本上是镶地板，安装所有的墙构架以及支持墙壁的主梁，然后是墙壁本身；最后，如果是平房，还有屋顶。关于墙壁，你把一面墙壁的构架在地板上拼好。然后，当整个骨架准备好了以后，你一下子把它立起来，并且一定要让它正好垂直。然后，你放上一些稳定支架把它撑住。如果是大房子，那就会有二十个墙构架，你都得象这样把它放好。再使用一些不同种类的支架把四面墙壁互相联结在一起，让整个结构能够自己立牢。这时，你去掉角撑架。

关于屋顶，那就更复杂一些（除非房子设计得象一个平顶的碉堡），因为你要修盖的屋顶有各种大小和形状。有时你还必须是一个走钢丝的演员。真能在上面走来走



去，一面保持平衡一面工作的人，都得到象“猴子”或“蜘蛛”之类的外号，因为你必须象它们那样灵活。

这里也有压力，但它决不象一个工厂。承包人知道这一工作应该花多少时间；如果他看到你应该弄好四面的墙构架而只弄好一面，他就知道出了毛病。实际上，我所认识的这个承包人就有那么一大本书，里面确切地说明这一或那一种操作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在他计算成本时，他就使用这本书籍。

但是这整个问题很少发生，因为一个木工或另外一个熟练工人对于他的工作抱有很不相同的态度。他们花费多年时间才成为真正的技工，觉得自己挣较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活干得好，并且他们也愿意做好工作。如果在他们完工以后房屋倒塌，那就好象是他们的过错，而对于一个汽车工人，你就根本不能这样说。当然，对于许多为一些小承包商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愿意做好工作，只是因为这样办承包人会再雇用他们。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态度是，他们挣得优厚的工资，他们愿意做好工作。

工作是危险的，这点毫无问题。有一次，在我搬运木材的时候，一块跳板砸到我身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们这一伙里另一个人丢掉了左手大拇指上的一大块肉，因为在他使用圆锯时有一块板子掉到他背上。当然，还有摔伤的。我可以在房顶上工作或做类似的事情，但是跟你说老实话，我肯定不能去半空二十层楼的横梁上走来走去。我是说，那真危险！我不知道是否真假，但是我

听说，他们常常使用美国印第安人来进行那些高空作业，因为印第安人似乎更懂得保持身体平衡之类的事情。你真需要有这种本领，这是实话。

然而，最使人担心的是你到底能有多少工作可做。这真是一会儿吃酒席一会儿挨饿的工种。你会整年有活干，挣很多钱，可是突然你会长期揽不到什么活。我曾跟这个建筑师交谈过，他告诉我，当他们宣布改变利率或“贴现”率时，就在那天早上，他的电话铃就响起来。在一小时之内，他开始接受定单或接受撤销定单的通知。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对我来说，这还不太糟糕，因为我还年轻，又是单身汉。但是我认识一个结了婚的小伙子，他碰上一段时间的好运气，就开始认为他有成功的把握。于是他生活阔气起来，把挣得的钱都花掉。接着时运不利，他真是弄得浑身是债，没有积蓄，又要养第二个孩子。正是这种事情确实使人痛心，并且把一个人弄得很颓唐。好象是你差不多已经把运气抓在手里，可是你总是担心它要溜掉。

另外，工人们还感到懊丧和苦恼的是担心年老时生活贫困。行政人员和许多专业人员在年轻的时候往往能够作些投资，或者一直工作到七十岁多，蓝领工人却和他们不同，在年老而不能工作时就遇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彻底变化。由于他们的工作往往是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们不再能胜任的日子就来得早些，他们就变得完全要依靠社会保险或在某些情况下依靠额外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即使这两项来源的收入合在一起，其总额也大大低于工人退休以前的收入。但是，仅仅这一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工人阶级老年贫困的真正程度。即使拨出大笔款项供抚养他们身后的子女之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老年仍然是一段确实贫困的时期。\*

主要的事实是，全部蓝领工人的半数左右都受雇于根本没有任何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行业或工业部门。这些人往往是在没有组织工会的小工厂里，或从事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工资最低的工作。因此，工人阶级的这一半也最不可能有什么储蓄。（一项估计是，这种储蓄只能提供工人一年生活所需的百分之十五。）<sup>27</sup> 这样，他们就完全依靠每月的社会保险金支票来维持生活。

下面是工作过的工人在 1971 年领取的每星期基本社会保险金：

	1971年每星期社会保险金**28				
	全部私人 工 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零售业
六十五岁退休的 单身工人	56.60美元	51.85	54.02	44.77	39.05
六十五岁退休的 夫妇二人	78.90美元	77.77	81.03	67.16	58.57

\* 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可能很复杂。幸而劳工统计局一位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到他所说的“私人经济中普通工人”的社会保险和私人养老金问题上面。这份统计数字不包括高薪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的退休计划，也不包括公共部门——如军队、政府等等——的养老金。

\*\* 1972年年底，经过投票进行改革以后，社会保险福利有所增进，但是得不到系统的资料。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这里的数字资料只有比实际情况稍低一些。

一个工厂工人和他的妻子每星期得到七十七美元，没有工会养老金计划的已婚建筑工人每星期得到八十一美元；对于很多人来说，靠这种收入水平来维持生活，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很多工人靠这种收入简直不能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继续工作，或者成为他们子女的负担。有些人依靠福利金来增加他们的社会保险金收入。如果房价还没有偿清，房子就没有了。他们的晚年往往消磨在租赁的带家具的房间和“住宅旅馆”里。这是一种使人沮丧的凄凉前景。

然而，过半数的就业男性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工作场所是有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他们能够想象退休时的生活比这好得多。

但可悲的事实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这些工人中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根本不能从他们养老金中拿到一分钱。每年都有几千工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跟他们的救济金完全无关。用拉尔夫·纳德的话来说，私人养老金制度是“很多美国人所曾碰到过的最广泛的对消费者的欺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许多批评家把私人养老金描述为一种“残忍的骗局”。<sup>29</sup>

试举一个在一座冷藏奶油仓库工作了三十二年的工人的事件为例。在他五十二岁即离他领取养老金最低年龄五十五岁还差三年的时候，公司关闭了这座仓库。他什么也没有拿到。阿纳孔达铜矿一个因公司缩减生产而遭殃的工人也有同样的遭遇。他四十八岁，工作了三十年，但他根本没有拿到养老金。

除了年龄和工龄的条件以外,养老金基金(无论是公司的还是工会的)既无保证又不受保护。如果企业破产或合并,基金中没有足够的钱。工人们就会丧失养老金。1963年史蒂倍克汽车公司破产时,四千名四十岁至六十岁的工人只拿到公司欠他们的款项的百分之十五。很多人根本没有拿到养老金。

这个单子无尽无休。一个寡妇在她丈夫死后没有从他的养老金计划里拿到遗族抚恤金,因为他是五十二岁而不是五十五岁。包括在一项工会养老金计划之内的一个工人被调出这个工会的管辖范围,他失去了他的养老金。一家大食品联号商店承认,从1950年以来,它的雇员有三分之二丧失了他们的救济金。一家电话公司估计,它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失掉了他们的养老金,其中包括一些曾在那里工作了十五年的人。<sup>30</sup>

事实上,很可能的是,即使是包括在计划之内的工人多半也只能得到他们在增加工资时所牺牲的数额的一部分。这是在整个战后时期无耻地不顾工人的基本而简单的需要的最恶劣的事例之一。

最后,即使是对于那些在退休时确实既拿到社会保险金又拿到全额养老金的少数人来说,所得的结果充其量也是很平常的。下表列出九种对有三十年工龄的雇工的养老金计划,它代表各种不同的工业。



### 1971年私人养老金计划选<sup>31</sup>

公 司	三十年工龄雇工 每星期养老金收入	每星期总收入—— 个人社会保险金平 均数和六十五岁的 夫妇二人的养老金
阿摩尔公司	45美元	102美元
底特律爱迪生公司	58	115
福特汽车公司	45	103
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	16	73
国际造纸公司	39	96
纽约市木工工会	72	129
南部贝尔电话公司	40	97
美国钢铁公司	49	106
西部卡车司机(卡车和仓 库)联合会	47	104

夫妇二人的总数可能比上面这些合在一起的数字高一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夫妇二人的社会保险金增加了。但与此同时,半数以上的美国工人将拿不到私人养老金。

对于很多年老的工人来说,退休实际上是恢复到他们作出极大牺牲以求避免的那种生活水平。许多美国工人在工作三、四十年以后,在同他们开始工作时的状况极其相似的状况下结束他们的工作。象失业一样,这一生活事实不仅只是影响年老退休的工人,而且也影响他的子女,以及每一个当他在美国的工厂或建筑工地做蓝领工作时考虑他的前途的人。

蓝领工人的其他“小额”优惠在其影响方面远远不那么深远,但也值得加以考察并把它同白领工人的这类福利作一比较。在工资照付的假期方面,办公室职工显然占有优势。

### 1970年适用工资照付的假期规定的人数百分比<sup>32</sup>

福 利	工厂工人	办公室职工
工作两年以上享有两星期或两星期以上的工资照付假期	54%	95%
工作十年以上享有三星期或三星期以上的假期	66%	81%
工作二十年以上享有四星期或四星期以上的假期	50%	62%

总的说来,两个星期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假期,难得有三个星期。他们的工资照付的节假日也比较少。工人平均享有七点一天,办公室职工享有八点四天。

另一方面,保健规定和保险赔偿费也不大相同。大多数在大工厂工作的工人享有由公司支付的住院治疗 and 外科手术保险的待遇。但是,象严重疾病医疗保险和工资照付的病假之类“更好的”福利,在办公室职工中间要比在工厂工人中间普遍得多。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工厂工人由公司支付严重疾病医疗费用。而对于办公室的职工来说,这一比率是百分之四十五。至于病假,能拿到全部工资并且没有等待期的工厂工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一;而办公室的职工则有百分之六十四。<sup>33</sup> 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不平等的固定型式在这里也是很明显的。然而,在象这样把注意力基本集中于研究工人阶级工作上的种种问题和不满情绪的时候,必然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曲解,必须加以纠正。这些情况和问题可能使人认为工厂工人的形象好象是郁抑寡欢的机器人——从来不在工作时发笑或面露笑容的傻瓜。例如,如果有人匆匆地巡视一个工厂,那就很容易认为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和五十年代所说的“快乐工人”是

同样的曲解。尽管存在着噪音和压力所经常造成的障碍，人们还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说笑，并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需要协作的建筑业或其他工作中，友好合作一般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即使最坏的环境也无法制止工人寻找办法去“打破制度”。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同伙一起在装配线上作调整车轮的工作，他们常常一面干活一面下棋，在每辆汽车之间的空隙走一步棋子。只有在一个工厂呆过几年的小说家，才能恰当地描述工人阶级生活的这一部分：友谊是怎样发展的，有些“秘密”活动——如把钱押在数字上的赌博（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是怎样进行的。或者甚至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如一个口信怎样会从一个人发出，经过三个人传过来，传到汽车工厂的另一部分，要求从下一辆雪佛莱牌汽车的发动机上拆下一些零件给他，因为他私人的汽车上需要那些零件。作为报答，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他提供火花塞。

但是，工厂工作这一“未被发现的”方面的最放纵的事例，大概是在一些大工厂的停车场上进行的卖淫活动。我所知道的一种情况是，女人们在午餐时间坐着一辆大众牌的篷车到来，然后在那天下班时间又回到那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事情有点卑鄙肮脏，但同时也是一种疯狂的任性表现。尽管其中没有感情，那也是一种方式，宣告他不是机器人，也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人。

说明这一点，不过是想暗示一下时间仓促的考察所看不到的事情。正如我们在开头指出的那样，有许多情况和问题是共同的，但是要懂得这些问题和不满，唯一的办法是去了解各个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各项具体工作。

### 第三章 对社会生活的不满

#### 一

关于经常被称为蓝领工人或“中等美国人”的社会不满和经济不满，论述的文章浩如瀚海。许多文字出自自由主义者的手笔，他们同情工人的怨言，力图向美国的中产阶级说明他们的不满。

不过，他们多半是失败了。多数人似乎仍然有一种难以消除的怀疑：蓝领工人是不是真正有什么很大的或者正当的问题。他们毕竟处于“中等状态”，既不是很富，也不是很穷，似乎还勉强混得下去。他们往往被形容为“倒楣的”和“灰心丧气的”，但几乎从来没有被说成是真正的、普通的不公正的受害者。事实上，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处于中等状态看来是更公平的呢？

当然，从经济上说，蓝领工人并不是处于“中等状态”。大多数人接近贫困，而不是接近富裕。蓝领工人的中等收入低于中产阶级数千美元，并且大大低于劳工统计局规定的一般的然而却是足够的生活水平。

但是，即使是家庭收入的一些基本事实也不能充分说明有关的真正问题。虽然很少使用不公正这个字眼，但是它是指出这样一种事实的唯一词汇：工人的不满并不是某种心理挫折或者关于黑人的偏执狂的结果，而大部分是对那些值得

正视和注意的实际问题的一种正当抗议。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许过诺言，答应要实行“公平待遇”，结束那种划分为阶级的、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美满和舒适生活的社会。这种诺言并没有说工人能够享受公司经理那样的生活，而是说他们至少能够同样分享“美国的理想”。

就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军人贷款和在郊区（如莱维敦）发展造价较低的住房，使许多工人有可能拥有一所房屋，并且希望对他们和他们子女的“公平待遇”不久就可见到分晓。

但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公平待遇”仍然没有实现。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里，在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领域里，蓝领工人仍然是美国的次等公民。

## 二

我离开大街拐到戴夫居住的街区时，时间大约只有四点半钟，所以我猜想他仍然在上班。几个骑自行车的孩子顺着街心弯弯扭扭地驰行，只是在我鸣喇叭时，他们才分开，让我通过。其中一个孩子扮了一下鬼脸，但是并无真正的恶意，所以我只是笑了一笑。

这个街区是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主要为蓝领工人兴建的新住宅区的一部分，房屋比通常为这类住户建造的要好一些。戴夫的房屋在这个街区的中间，有一间汽车房，房子后面有一块比普通邮票面积大一点的草地，还有一间他预备辟作私人小书房的只完成一半的地下室。设计和建筑也比常见的漂亮。同“饼干盒”式的、不加装



饰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农场住房”的格局不一样，这座房子质量牢固，别有风味，它的正面有许多装饰性的金属制品。

这座房子我以前只来过两次，我为了查对所经过的门口的门牌号码，不得不多次放慢车子的速度。

几年以前，当他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开着卡车跑遍全国的、随心所欲的“吉卜赛”式卡车司机时，我们就结成了朋友。他这样开车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首先他会直接违反安全法，开车十五小时，甚至有时达到二十小时，但是挣的钱多，而且都是十足的现金，因此不必缴纳税款。

后来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小孩，在巴尔的摩地区安定下来担任一家工厂的固定工作。

然而，当我开着车慢慢驶近他的房子时，他的汽车却是在车道上。我把车停在路边，不晓得他是病了，还是那用了七年的野马牌汽车终于坏了。

是戴夫本人来开的门。过了几秒钟他才作出反应。

“哦，嗨，快进来，你这狗娘养的。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我路过这里到纽约去，想顺便看看你。”

“好，非常好。快进来吧。看到你真高兴。”

话说得很恰当，但是他的脸色并不相称。接着，在我进去时，他妻子的神色使我知道，我已经闯进一场争吵的中间去了。她没有哭，可是快掉眼泪了。

“嗨，瞧，”我说，“我认为我早就应当来拜访了。我是否来得不是时候……”

“不，他妈的，”他打断我的话。“我们刚争论了两句，但是过一会儿问题就解决了。”

他的妻子生气地哼了一声，退到厨房里去了。我再次提出要走，可是他硬要留我吃晚饭。

“把你们的话谈完吧，”我说，“我到院子里去坐坐。”

我拿了一张报纸，从后门走出去。我开始看报，但是厨房的窗子是开着的，即使我不想听，我也难免不听到他们的谈话。

“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已经改变了主意，”他的妻子说，音调紧张，越来越高。

“不干这个干什么？在工厂里拿一百二十美元吗？我们靠那收入生活不了。”

“那又不是永远不变的。”

“我这工段里有二十个人，我们都有优先权，”他说，嘲笑地说出优先权这个字眼。“总有人要失败。这就是生活的实际。”

戴夫的妻子沉默了片刻。你几乎可以听到她在考虑，在寻找另一条进攻的路线。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戴夫的工段已经结束，假如她让他去，他就要去干流浪式的开卡车的行业了。工厂表面上要他登记等待工作，但是，由于情况相同的还有十九个人，无法断言什么时候或者他能否得到一种工作，象他干过的那样。

他的妻子打破了沉寂。“那就是不好，我们不能那样生活。”

“我以前干过。”

“你以前没有结婚。我是说，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

“你胡说八道，”他突然厉声说。

忽然停顿了一下，接着她大发脾气。“啊，天哪，你放屁！”不一会儿，就听得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戴夫走了出来。

“我们出去开车兜兜风吧。”

我同意了，我们坐进车子。当戴夫开大油门和我们开始加速时，排档喀嚓一声从二档滑到空档上。戴夫开玩笑地把这个机器上的问题叫做他的“自动”换档。

“我看你还是得到了充分的选择自由，”我说，试图打破沉默。

他当时只是说“是啊”，然后又说，“我想你完全听到了。”

“是的。”

“你觉得怎样？”

“我不知道。别的工作就是找不到吗？”

“是啊，你不知道全部情况。”

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他最后说的话和她的反应，也不难猜想。“她怀孕了，”我说。

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句说明。

最初，他并没有开口，可是后来他轻轻地说了，与其说是对我说的，还不如说他是自言自语，“他妈的，我要去干啥呀？”

他不期望回答，即使他等待回答，我也无言以对。

工人面临的经济问题没有激发许多关心社会的人的想象力，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许多人承认，工人挣的钱并不“富裕”，也并不完全称心如意，可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差距却往往被看作数量问题——房子稍为小一点，汽车不怎么漂亮，或者是黑白电视机而不是彩色电视机。但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差距，不仅使他们的家当在式样上和质量上有所差别。这种差距也使他们在经济安全和生活本身好坏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截然不同。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和改善，蓝领工人的生活仍然充满着深刻的经济不稳，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不断提高，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勉强过得去”的基础之上。战后时期一个工人可能拥有的物品数量，已增加颇多。但是，在这两个中心领域，蓝领工人的传统不满仍然是使人烦恼的现实。这些问题，只有对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说，才真正成了过去的事情。\*

用来划分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最合乎逻辑的数字大约是一万五千美元至一万六千美元（1970年数字，现在会更高一些）。这是该年劳工部“较高的”（富裕的）预算标准；它也把白领这一类人大致划分为相等的两个部分（如果人们在办事员和销售员类别里除去被错误分类的体力工人的话）。<sup>1</sup>

这是给下层和上层中产阶级划分界线的一种不怎么精确

---

\* 在谈到蓝领工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必须把非常富裕的企业经理和独立的专业人员同办事员、中学教师以及另外一些往往不比蓝领工人挣钱多的拿薪金的雇员区别开来。虽然他们的工作条件通常要好一些，他们的收入一般比蓝领工人相应的工作的收入高一点，但是，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不满情绪却同工人们的一样。

7  
的方法,因为它忽视了薪金收入者对毋需为生计操劳的人、知识分子对经理人员的这些重要因素。但是,它至少把一年七万美元的精神病医生和一年一万美元的中学教师区别开来,把通用汽车公司经理同享有“吃鸡”特权<sup>①</sup>的人区别开来了。

最有把握的经济安全措施就是储蓄,而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况却是令人吃惊的。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关于美国人民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资料表明缺乏真正安全保障的严重程度。大多数工人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储蓄。1969年,一个挣得典型工人阶级收入的人在其全部流动资产项下只有八、九百美元。<sup>2</sup>这就是说,他住得起九天医院,买得起不到半辆的大众牌小汽车,或者不用负债能让他儿子上几个星期的大学。而一个有普通中产阶级收入的人就有大约四千美元的资产,仅是储蓄就有一千美元。\*

就全国来说:

1969年,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不借债就付不起他们子女在公立大学的学费和日常用费。百分之八十三付不起这笔总数。

百分之六十七不参加保险就付不起两千美元以上的主要医疗费用。大多数连一千美元都付不起。

---

① 当前在美国,牛肉和猪肉的价格比鸡肉的价格分别高出五、六倍和二、三倍不等,因此,一般收入较低的人吃不起牛肉和猪肉,多吃鸡肉。——译者

\* 流动资产包括储蓄和活期存款、存款单和储蓄券。对于蓝领工人来说,实际储蓄额事实上大大低于八、九百美元,因为工人的活期存款大部分已经预定要花掉或者去支付帐单。(作为一种说明,一年挣九千至一万美元的人中将近半数根本没有储蓄存款。)另一方面,上层中产阶级却有流动资产一词包括不了的一系列的投资。



百分之四十二的美国人不能借债就拿不出两个星期的度假费用(全家一天三十美元)。事实上,美国人的大多数完全不度假,甚至不去迪斯尼或某一个国立公园作短途旅行,更不用说去阿卡普尔科或欧洲了。多数人在起居室里度过他们的假期。<sup>3</sup>

这意味着,对多数工人来说,单是一次经济危机就能毁掉一生的事业。例如,除最富裕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觉得难以负担。照顾上年纪的双亲的费用。但是,对一个工人来说,它确实会把他逼回到贫困的境地。一次工伤事故确实同样也会使他回到折磨人的经济贫困的处境。甚至象给少年孩子装一副牙齿矫正带这样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工人阶级的中下层却往往一拖数年,甚至认为花钱太多而干脆不去装它;这种费用,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却很少认为是一种重大负担。我认识的一位威斯康星州南部工业中心的实习医生,曾经描述过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下嘴唇严重破裂,被送到他医院的急诊室的情况。她的獠牙使她非常苦恼,她想把衣架做成一副牙齿矫正用具,结果把自己的嘴唇弄破了。上层中产阶级也许没有诗人们认为属于老百姓的那种“内心之美”,但是至少他们的牙齿是平整的。

但是,除了长时期的不安全以外,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往往是一种没完没了的经济磨难,在这种磨难当中,人们为了保持现状而必须拼命去干。

一次亲身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我在那家罐头厂开始工作时,我在一个星期二只带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进了

厂。午饭时，我发现了这种情况，打算换成零钱，这时候才知道我那工段的四十个人当中谁也没有二十美元的任何一种票面的零钱；旁边的工段里的人也都沒有。实际上，他们的神态表现出了坦率的怀疑。正如有一个人说，“伙计，自从我在那个星期二有过二十美元以来，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我确实记不起最后一次有钱的时间了。”

可是，无论在哪所办公大楼里、大学校园里或其他中产阶级环境里，大概沒有一个人身上带的钱是不超过二十美元的。事实上，许多中产阶级的人如果身上不带有比这多得多的钱，是会感到很不舒服的。

在工人們的极为拮据的日常经济状况中，一个主要因素是骇人听闻的债务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里，消费者的债务总数从六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六十亿美元。增长率实际上是金融财产增长率的两倍。<sup>4</sup> 就个人而言，它意味着挣得普通工人阶级收入的家庭有三分之二——每三家中有两家——是负债的。每三家中有两家欠下某公司或某信贷机构一千多美元。<sup>5</sup>

结果，工人的日常生活同上层中产阶级（以及许多不靠赊欠购买汽车和房屋的待遇较差的专业人员和脑力劳动者）的生活差别很大。很简单，对许多工人说来，当他们走出工厂大门时，整个一张工资支票就早已有了用项。除了付帐用款以及购买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钱以外，所剩无几。

常常是，为了靠近一家工厂或靠近另外一个待遇好的工作地点，一个工人会被迫在实际财力并不许可的情况下去买一所住房。即使他一年挣得一万二、三千美元，他还得暗中检

查一下自己的钱包，才能提议同家属一起出去看场电影。常常是，上述这种住房的选择，使第二辆汽车成为他妻子的必不可少的东西，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买不起的；蓝领工人的妻子在她丈夫下班回家以前，成为她家里的真正的囚犯。

工人阶级生活中受到的限制，大都来自这种实际的情况。许多工人在其蜜月过后的最初的日子里兴高采烈，可是，当他们除了已经在汽车上花的费用以外又有一笔买房子和家具的开支时，他们就使自己陷入一辈子债务缠身的境地。从此以后，他们的旅行自由、找新工作的自由或在工作以外参加一系列其他活动的自由，统统被紧紧缠身的债务桎梏剥夺掉了。

对一些人说来，房子成了注意的焦点——在经济压力严重的日常生活中，它是富裕的唯一象征。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工人们在其住地或住房遇到威胁时所作出的反应是那样强烈，有时怒火中烧，几乎达到丧失理性的程度。它不单是一宗财产，而且是已经花费他们那么多收入、那么多工时并使他们放弃其他许多打算的东西，一旦丧失，那就等于是使一切牺牲尽付东流。除此之外，实际情况是，与专业人员或知识分子不同，许多工人并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也并不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真正的满足；经济牺牲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一天晚上，我同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在一起谈天，他刚刚偿清他的房子的最后一次付款。他突然被他为买房而辛劳工作了多少天数的这个问题吸引住了。他非常仔细地计算准确的天数，甚至是多少个钟头。当他算出结果时，他颓然地坐着不动，脸色十分难看。他确实看到，他那成年人的精力完全倾注在二十年前他所购买的这所房子上了。

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长期存在的误解，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是有其根源的。举例来说，知识分子开车路过一个熟练工人的住家时，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工人的生活水平比他要高得很多。但工人看到的是留胡子的中产阶级子弟带着旅行背包，乘飞机到欧洲去，或者是有昂贵的立体声唱机或双座轻型汽车的大学生。工人看不起头轮电影，吃不起高级餐厅，参观不起展览会，度不起假期，买不起八条音轨的磁带录音机，购置不起吉布森和贝拉斯克的六弦琴。总之，他买不起中产阶级消费的一切东西。在他看来，连下层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也远远比他富裕。他仅有的一所家庭住房是他富裕的唯一例证。

因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蓝领工人仍然受着经济上的不安全和长期匮乏的束缚。把他们同有钱人隔离开来的鸿沟不是他们的电视机的大小和颜色，而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结构。

然而，还必须指出的是，工人不仅没有中产阶级富裕，而且是当代美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中的一贯不公平的受害者。

税收提供了明明白白的实例。实际上，美国的每项税率都是递减的，强制工人付的钱比中产阶级多得多。1972年，《商业周刊》计算了对美国人征收的全部税款和划款在其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结果表明，在一年挣四千元的人的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同一年挣六千、八千或事实上直到五万美元的人是一样的。<sup>6</sup> 帕特里夏·塞克斯顿和布伦丹·塞克斯顿在其所著《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一书中考虑到富人可以利用



的漏洞和窍门以后,提供了下列数字:

家庭收入	全部稅收占收入的百分比7
3,000美元	34%
5—7,000	33
7—10,000	32
15,000以上	28

由于工人人们的钱往往只能换得次等的公共服务,如在学校方面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因此甚至很难找到适当的言词来形容所包含的不公平的程度。

然而,稅收制度的不公平到底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受人注意,所以只要稍为谈一下就行了。

联邦所得稅:在稅收制度上,以及在同个别納稅人相比公司所享有的明显漏洞方面,存在着五花八门的不平等现象。但是,中心问题是稅收实行的“三重标准”,它对工资的征稅比其他收入来源的征稅要重得多。下面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说明。

“例如,一个一年挣一万美元并养活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工人要付联邦所得稅九百零五美元。他的那位决定这一年不工作的紧邻出售一些股票,售价比买价增加一万美元(资本收益),他只须缴纳九十八美元的联邦稅。另一家邻居从市政公债利息中同样得到一万美元,则根本不付联邦所得稅。”

州和地方稅:同联邦稅相比,虽然有更多的个人免稅使这类稅收对低收入阶层实行累进稅,但是这类稅收还是对富裕的人有利。

社会保险稅:这是所有稅收中最明显的稅率递减稅。对于一年一万零八百美元以上的收入,征稅的比例越来越小。生动的说明如下:



收 入	1973年纳税额
7,433 美元	438.83 美元
10,800	631.80
100,000	631.80
1,000,000以上	631.80

财产税：《商业周刊》引用一位经理人员的话说：“在美国……财产税是税率递减得最厉害的一种税收，因为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住房是一项非常大的开支。”另一位作者也指出：“在蓝领工人离开中心城市要去的那些地方，财产税的增加(六十年代期间)特别明显。”因为房东常常把纳税负担包括在房租里面，连住公寓的工人也受到影响。一套公寓的租金有多至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部分会用于支付房主的税款。<sup>8</sup>

通货膨胀同样不仅是工人的一个问题，而且在许多方面同税收制度一样，表现出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它对一个工厂的生产和维修工人的影响确实是深远的。1965至1971年间，他纳税后的实际所得实质上一点没有增加。在这些年里，工资的增加从来没有超过不断上涨的物价。以1967年的美元为准，情况如下：

一个有三个家属的工人纳税后的实得工资  
(按通货膨胀订正后的数字)<sup>9</sup>

1965	102.41 美元
1966	102.31
1967	101.26
1968	102.45
1969	101.49
1970	99.66
1971	102.42
1972	108.41

只有在1972年，工厂工人才真正增加了实际的工资收入。甚至能够争取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工资的建筑工人，在1965至1971这六年期间，每周获得的实际工资也只增加了二十美元左右。对于一点工资都不增加的几百万工人或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工人来说，通货膨胀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某些必需品和医疗之类的必要服务实际上价钱涨得惊人，使许多工人出不起头等保健费用。

关于通货膨胀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但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通货膨胀基本上是递减性的。通货膨胀在自动售货商店中也起到税率递减的销售税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冲床操作工人的妻子和经理的妻子都必须同样支付一份牛排的涨价，这通常要花一点八五美元。蓝领工人和其他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所受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影响，要比富裕的人痛苦得多。中产阶级的人是经得起涨价的，但工人却不得不改吃碎牛肉。

所有打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都增加了另一种不公平的因素。工资物价的冻结，对工资的控制要比对物价的控制严格得多，而利润却根本不受控制。这个方案的税收条款，例如加速的折旧办法，正如工人所描写的那样，确实是“使大企业发财的泉源”，是“劫贫济富的打手”。<sup>10</sup>

然而，许多作家忽略了通货膨胀的内在不公平现象，不重视工资物价冻结的不公之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忙于向全国宣布，工资增加“过多”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例如，在食品和煤气价格暴涨，表明工人是他们不能控制的力量受害者以前，甚至许多自由主义者还相信通货膨胀主要

是由蓝领工人贪得无厌所引起的。

但是，仅仅要求增加工资并不“起通货膨胀的作用”。要“造成”物价上涨，工资必须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工资使产品更加昂贵，以致公司必须提高它的价格，不然就得接受较低的利润。

然而，从 1960 至 1965 年，劳动单位成本（公司生产一件产品所支付的工资额）下降了。而制造品的批发价格仍然有些上涨。

在那几年里，工人也没有得到这个经济馅饼的不相称的一份。利润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股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而工人的实得工资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sup>11</sup>

即使工人们在这十年的后五年里真正得到好处，那也只是纠正了以往的不平衡状态罢了。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 1965 至 1971 年间，工人们的实际收入没有一年是超过物价的。只有硬说美国的经济历史突然从 1965 年年中开始，提出工人贪得无厌这种论点的人才能使其似乎有点说服力。

工人们所碰到的明显的经济不公平待遇的最后一个领域是赊销制度。通常没有人提到它的根本不公平之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多数工人就永远买不起一所住房，许多人连买一辆汽车的钱也出不起。

但是，它索取的代价很高。赊销的含义非常简单，即工人买同样的商品要比付现款的富户多付很多的钱——二百五十美元的电视机要付三百五十美元，他的汽车要多付五百到六百美元。即使大量的抵押借款并不限于工人，而是同样给予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们，然而，还是值得观察一下。工人赊购

住房的后果。一所价值两万二千美元现金的房子，要花三万八千六百七十八美元，即几乎是为期三十年的一万七千美元抵押借款的两倍。实际上，工人只是为了支付利息，就得工作三年半。<sup>12</sup>

因此，税收、通货膨胀和赊购是一个型式的各部分。在经济领域里，蓝领工人所面临的不仅是不安全和权利的剥夺，而且还有决非偶然的不公平待遇。

### 三

当我第一次仔细打量沿密执安湖南岸几英里长的一些钢铁厂时，天正在开始下雪。我站在一块能使我看到湖岸全部景色的水泥板上。坚硬的冰花开始打在我的脸上，迫使我转过脸来，避开湖岸吹来的寒风。我的黑人朋友是一个刚下班的钢铁工人，他正在来回踟蹰，急于想坐进汽车，赶回家去。

眺望的地点很不错。我们所站的码头是在一个小小的半岛上，我能从我们呆的地方加里钢铁厂起，沿着湖岸经过哈蒙德和东芝加哥，一直看到远处芝加哥市的灯光映射在低悬的云层上的柔和晕圈。

但是沿着湖岸，人们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工厂——傍水延伸着许多钢铁厂、轧钢厂、铸工厂，巨大的厂房紧密相连。几年以前，我曾驱车穿过秘鲁的安第斯山，看到了广阔的高原、海拔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原的月夜景色，虽然它很不相同，但我却同样肃然敬畏，就象凝视着某个巨大的陌生行星的表面一样。在我眼前大约有一英里纵

深、十英里长的地区内，工厂连绵不断，那也只是我的被雪花弄模糊的视力所能看到的東西。视野以外，还有很多很多英里。这些就是排列在密执安湖南岸的卡卢梅特地区的一些钢铁厂。

“过来，我们回家去吧，”我的朋友要求说，为了保持血液流通，他不住地搓着双手。

我勉强离开那里，坐进了他的汽车。

当我们驱车经过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有四五层楼高的铝棚——时，他突然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一扇门开着，我瞥见了巨大的钢卷，象庞大的线轴一样。

他拐了一个弯，我们从旁经过一座两边由两座大楼挡着的小红砖房子。

“那是食堂，”他说。“他们过去有一个供应热饭的自助餐厅，但现在他们装上了只供应夹肉面包和菜汤的自动售货机。有些人要工会去要求重新供应热饭，然而机器却有其优点。”

“什么优点？”我问道。

“呃，如果你知道怎样摆弄机器，你就能把你的钱弄回来。伙食很坏，可是不用花钱。他们也许不去修理机器，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比开设食堂要便宜一些。”

我点了点头，认为事情也许就是那样——并不稀罕。

当我们顺着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大街行驶时，我往回一看，不禁露出笑容。加里基本上是一个公司城，是由美国钢铁公司在本世纪初规划、修建和资助兴造起来的。它的外形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当时大企业还不知道“外



表不显眼”的价值，工业界的头头把他们的高楼大厦分布在纽约第五条街上，而不是小心翼翼地使它们避开公众的注目。

回头看时，我看到了这个城市的中心——主要的银行、商店、政府办公大楼都排列在这条大街上。

但是，这条街的尽头是钢铁厂的主要入口之一，由于那时正是换班的时候，我能看到大街上一行行公共汽车和小汽车络绎不绝地驶入延伸到地平线的工厂。市政厅和市议会在大街的两边，正好就在工厂的门前，很难不使人联想起守卫在埃及法老墓地入口处的那两个装饰性的猫的雕像。

然而，从1968年起，加里已经有了一位黑人市长，外观不再同政治实际相一致了。此后，那两只以前忠实的猫——市长办公处和市议会——实际上已多次同设在那边的公司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这一切都是黑人的，”我的朋友突然说，打断了我的幻想。我们转出大街，沿着加里市中心的一条街行驶。

有点象是观察过去似的。排列在加里市区街道上的房子，一度住满了波兰人、斯拉夫人、希腊人和其他各种种族的人群，有人故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希望年久月深的民族不和会阻碍任何组织工会的尝试。

然而今天，这些区域已经变成以黑人为主了。旧房子里住的是黑人居民，白人工人则住在往南几英里外的地方。我们沿着街道缓慢地行驶，为了避开路面上很深的裂缝和窟窿而弯弯曲曲地走着，这时，我看到路边一排

排被认为不适用而空着的公寓——经过风吹雨打变了色的招贴纸表明这个店铺或那块地方是出租的。这一片凄凉景象不是黑人漠不关心或无人照管的结果，而是单纯的经济现实——穷人的购买力不足以维持讲究的商店和高贵的饭馆。这样，为他们服务就无利可图了。有钱的地方才会有买卖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而在加里，钱并不在黑人聚居区最早的和最贫穷的地方。

但是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了黑人钢铁工人的住地。我们经过一所又一所看来象是同任何地方一样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住家的房子。简单的箱形和长方形建筑物，没有新油漆和停车房，但是清洁整齐。

“我们到了”，我的朋友说，他把车开到一条车道上，猛然刹了车，关掉了发动机，打开了车门。

我知道他家里在等他吃晚饭，所以我就告辞了，朝着几小时前我停放在那里的那辆租来的汽车走去。

我继续南行，离开了黑人地区，跨过了“小卡卢梅特河”；这条河是加里市区和格伦公园的非正式的分界线，也是黑人与白人的非正式的分界线。一些年岁较大的白人工人仍然住在闹市区，人们可以看到，离工厂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黑人小孩和白人小孩在一起玩棒球。但这条河是真正的分界，下游就是加里市白人蓝领工人集中的地方了。

夜幕逐渐降临。归途中我回头看时，能看到工厂烟囱里喷出的火光划破了黑暗的天空，使那里呈现出一种特别类似魔法的景象。威廉·布莱克关于十八世纪英国

“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的旧诗，似乎是描写得很恰当的。不过，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因为钢铁工业支付的工资有可能使许多钢铁工人拥有普通的然而肯定是说得过去的住房。但是，假如这个恶魔把硫磺用光了，不得不用一氧化碳来代替，他很可以到加里来寻找。据说加里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我凝视着林立的烟囱，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我很想知道的另一件事情是，我在街头看到的孩子们，甚至是白人的孩子，其中究竟有多少能进大学，或者至少能摆脱他们父辈的生活——在工厂里干活，一直干到最后身残力竭不能再干时为止。这是一个单是工资标准或收入水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 \* \*

和工人们面临的经济压迫和经济不公平不同，要概括居民区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差别很大——从拥挤不堪的、狭小的活动住房集中地，一直到一些非常称心如意的住宅区。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住处比富裕郊区的住处差得多。城市里的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都有许多相同的社会问题，然而黑人聚居区必然要更严重一些。

例如，彼得·宾曾在其《美国的白人城》一书中对费城附近的一个白人工人地区就作了这样的描写：

肯辛顿的空气受到污染，街道和人行道肮脏不堪，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工业不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新建造的房屋屈指可数。它的学校是这个城市中最破旧的学校。在它为数不多的运动

场上,青年流氓横行霸道。工业外迁。社会工作者和牧师往往绝望地认为无法可治(一位新教牧师记述他在肯辛顿的五年时说:“这里连我在别处不喜欢的东西都没有。”)<sup>13</sup>

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类似的描写适用于整个美国的一切种族社会。实际上,某些问题一再重复出现。

首先,蓝领工人的聚居区一般只能得到社会服务单位和市政府的次等待遇。在市内的工人阶级地区里,不论是白人的或黑人的,往往没有象样的公园或娱乐场所。保健机构不足,甚至常常连垃圾也不经常收集。公共交通不足,不仅是黑人区如此,在附近的白人工人阶级地区也是同样糟糕。

这样一种居住区的一个住户,对问题作过如下的描述,

如果我们用税款维持的市政机关支持我们,这一带地方是可以成为抚养孩子的理想场所的……当我们要求市里栽一些树木来换掉死树时,他们置之不理。<sup>14</sup>

另一个蓝领工人居住区的住户对市政机关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也有同样的意见:

假如对我们的地区给予和其他地区同样的考虑,那么,[这里]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住宅区。我们的游泳池因为有个裂缝,关闭四年了。如果这里是费城的西部、北部或南部,那就会马上修好。我们不得不等待四年。<sup>15</sup>

私人企业在蓝领工人住区的作风恶劣,而不受干预,这在中产阶级地区是不会容忍的。例如,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一个社会行动小组在一次因下水道设计不好引起工人住宅发水而同承包商进行的斗争中,组织了抗议,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几年来，[工人们]每到春季都要忍受家里发水的痛苦，那时附近的河水溢出两岸，灌满了下水道，倒流进他们的地下室。

……问题非常容易解决，而且用钱不多。下水道的盖子抹上水泥，修理好有问题的下水道系统。承包商对人民的利益置之不顾，因为他们预料，工人阶级的房主是不会积极地提出抗议的……16

特别有权势的集团用以伤害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最明显的不正当做法，也许就是：不让高速公路去打扰中产阶级的居住区，而是让它们一条条地穿过工人们终身居住的蓝领工人居住区。

就如宾曾指出的那样：

在白人城，你很少看到新的企业或工业。但是，你往往看到新的高速公路从市中心修过去。在许多城市里，快车道纵横穿过少数民族古老的居住区，通往风光明媚的郊区豪华住宅、高贵的商业中心，以及现代化的工业区。这些快车道不仅破坏了美国白人城的统一性，而且使许多白人业主加速离开，从而破坏了这些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留下来的一点稳定。联邦政府很少花一个镍币去帮助白人城，但为敷设高速公路却投入了几十亿美元。17

特别是在这种地区，蓝领工人清楚地知道其中的阶级偏见。在芝加哥，为了回答被排挤的威胁，出现了一个以居住区为基础的抗议小组。一个记者指出：

迈克·斯托拉齐克[领导人]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好象正在受到威胁，为了让住在郊区的富裕的人能快一点回家



吃晚饭。18

在坎布里奇的布鲁克林埃尔姆区，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团体，用一个青年工人的话说：

“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线——纪念大道和阿尔巴尼大街——但是据估计，他们要踩在小百姓的身上……这简直是对这一带的人当头一棒。”19

没有全国性统计具体说明工人阶级居住区受到这类做法损害的整个情况或确切次数。但是；就拿也许是所有社会机关当中最重要的机关、即学校来说，证据是确凿无疑的。

教育制度应当是社会流动性的主要渠道，但它实际上一贯歧视工人阶级黑人或白人的子女。工人阶级子女进大学的机会比中产阶级的子女少得多，即使他们有同样的学术才能。1966年的一次调查表明，一个工人阶级的中学生，即使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考试分数，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进大学的机会。而一个才能相同的中产阶级子女，却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机会。因此，对中产阶级的学生来说，机会就多一些，而对于占人口半数的经济情况差的人的子女来说，情形就很不利，他们的机会大概是一比二。20

原因不单是经济方面的。在美国，确实存在着一种双重教学制度。不仅是中产阶级地区的大多数中学比工人阶级地区的中学好，而且甚至在个别学校里，还有专为中产阶级设置的“特别进度”班，以及专为许多工人阶级子女设置的“职业教育”班。

把工人阶级子女送进这些死胡同的“客观”测验，实际上不过是英国“校友”制度的翻版。如果说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的英国，能否出人头地要靠一个人的父亲是否同伊顿公学有关系，那么，今天的“客观测验”实际上也会造成同样的情况，不过是用一种转弯抹角的办法罢了。剥掉一切伪装，“客观测验”本质上就是词汇测验（例如，智力商数测验的词汇部分就是考取大学的最重要的测验），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子女在这方面会有更好的准备。这种测验制度和按考试成绩分班的制度，不论其背景如何，根本没有给每个学生以相等的机会，只不过是保证最初占便宜的人继续占便宜，而且有增无已罢了。\*

即使没有测验和按考试成绩分班这类正式手段，教师不知不觉的偏爱也能够并且往往确实产生同样的效果。对市内黑人学校的许多批评，实际上同样适用于白人工人居住区的学校。例如有一位作家指出：“乔纳森·科佐尔在《天亡》一书中认为有害于波士顿罗克斯伯里地区黑人孩子心灵的那种学校，同样存在于白人的查尔斯顿，这种有等级气味并充满着阴郁气氛的学校是不健康的、凄凉的和令人窒息的。”<sup>21</sup> 由各个地区征收和分摊学校税款的办法，事实上主要是看收入水平而不是看种族本身来保证实现提供资金方面的歧视的。<sup>22</sup>

结果，许多工人阶级的中学往往同工厂的训练场地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作者评论说：

这种[工人阶级]学校的社会化，反映了工厂的社会化。学生被当作原料……高度重视服从和严守时刻，很少有独立的、创造性

---

\* 当然，有人认为智力商数测验特别能衡量先天“才能”，并能从其结果得出关于社会阶级和种族的固有才能的结论。对这种论点的批评，肯定同黑人有关，大家都非常熟悉，毋庸赘述

的活动机会，很少有教师的个别关怀……[教师]也许是被迫采取权力主义的手法的，不管她是否愿意如此。<sup>23</sup>

以下事实支持了关于蓝领学校的上述看法：一方面是很多工厂工作现在要求有一张中学文凭，另一方面，工作本身却使得这种文凭成为多余的东西。就象一批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在六十年代，许多雇主把蓝领工作的最低工作资格提高到中学毕业的水平……这种提高并不是因为同非中学毕业生相比；中学毕业生表现了更高的才能……倒不如说资方简单地认为，‘有竞争能力的’人是比较可靠的。”<sup>24</sup>

从学校注册的数字中，能够看到教育制度中这种阶级偏见的影响：

#### 男生在学校注册的百分比<sup>25</sup>

年 龄	蓝 领	白 领
16-17(中学)	80	92
18-19(进大学)	49	73
20-24(继续读大学)	20	43

假如有区分两年制大学、四年制大学和研究院的比较详细的统计数字，它们将会说明一种甚至更为明晰的消长过程。有相当多的工人子女的确是上了“大学”，但是许多人上的是两年制的简易学院，这些学院主要教授熟练工人干的事情，如汽车和空气调节器的修理、印刷和电气技术等。能够有钱念完四年制大学课程的工人数目微乎其微。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学位现在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能保证得到一项好工作了。大学体系在六十年代有了扩展，所接受的学生

不限于高贵人物的子弟,但是劳动力市场并未扩大。1971年,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八点五;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足有半数的就业者说,他们的工作同他们在大学受到的训练毫不相干。压倒一切的原因是,这些不相干的工作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工作。<sup>26</sup>

关于职业变动的一些统计证明了学校的失败。尽管白领工作在五十年代有了迅速的扩展,可是,1962年完成的关于变动情况的十分全面的调查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工人看到他们的子女参加了工人阶级的工作;另外三分之一的许多人看到他们的子女稍有进展,当了办事员或参加了象特许业务之类一些往往是勉强凑合的小企业。他们指出,体力劳动工人的子弟只有百分之十进入了专业和技术“杰出人物”的行列。<sup>27</sup>此后,百分比无疑发生了变化,并且可以确信,在美国职业变动是显然向上的。不过对年轻的蓝领工人来说,在教育方面还根本谈不上公平对待。\*

必须考虑的最后这个社会问题,提出了美国黑人的整个问题。若干年以前,本来是可以根据种族和种族隔离的现实来单独讨论阶级的合法的不公平现象的。但是,犯罪尤其是暴行已经抹掉了工人合法的选择居住地段问题同社会上的种族态度这二者之间的简单界限。担心犯罪是一个正当的中心

---

\* 虽然对职业变动的类型作更精确的说明似乎是有趣的,但如果不对定义作篇幅很长的讨论,并解释一些非常专门的精确统计资料,要讲出很多超出上述内容的意见,那恰恰是不可能的。

单是令人误解的调查类别,就使人很难得出“常识性”的答案,并且因为充分谈到年龄、地区、农业工人移动等复杂因素的唯一统计资料已是十多年前的旧材料,比较精确的资料也不会真正告诉我们上述数字所没有指出的任何重要内容。

问题。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同整个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

乍看起来,似乎犯罪和环境污染一样,是每一个美国人的问题,并非工人阶级特有的不满。

固然在某些地理区域里,如曼哈顿的东部,中产阶级上层就住在黑人区的旁边,但就全国而论,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居住区所受到的损害就特别严重。例如,《总统委员会关于民间骚乱的报告》里的一项调查,就提供了下面两个白人居住区的对比资料:

#### 每十万人的犯罪率<sup>28</sup>

	高等收入	中下等收入
侵犯人身的犯罪指数(杀人、 强奸、殴打、抢劫、盗窃、非法 侵占财产、偷汽车)	80	440

这就是说,白人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严重犯罪率高出富裕地区四倍半。(至于黑人居住区,数字要高得多,一个地区的庞大数字是二千八百二十,另一个地区的庞大数字是一千六百一十五。)象其他许多地区一样,黑人的情况最糟,而白人工人则比富裕中产阶级糟糕得多。\*\*

虽然犯罪和暴行所造成的问题的性质非常明显,但是还有几点需要强调说明。

首先,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犯罪和暴行已经成为头号问题。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大城市里有百分之二十一认为它是主要问题,分别有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一认为麻醉品和

\* 关于工人阶级对待黑人的态度这种比较广泛的问题,以及象汽车接送学龄儿童之类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以后各章也将不断谈及。

\*\* 在1965年这项调查完成以后的一些年里,郊区的犯罪率已有增长,但是最新的调查表明,这种总的关系依然未变。<sup>29</sup>



交通事故列为第二位。<sup>30</sup>

其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犯罪问题是同黑人斗争精神的兴起分不开的,在六十年代黑人区的骚乱或恐怖活动这类极端的方式中,尤其如此。结果,象抢劫住家这样的行为看来比几年以前更加令人感到威胁了。一个多年不肯购买手枪的妇女买了手枪,并且非常认真地说,“他们也许会来杀害我的孩子。”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不断增长的情绪:黑人的犯罪现今本质上是一种象肯尼亚的茅茅分子之类的恐怖主义,而基本上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

第三,犯罪,特别是行凶乃是很少数惯犯的行为。例如,一项调查表明,在费城有六百二十七名青年要对一年当中大约五千一百件罪行负责。<sup>31</sup>

然而,尽管行凶罪犯的数目不多,他们的影响却很大,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少被抓到。非常不幸,多半越是激烈地谴责犯罪,越是难以抓到犯人。是可以作出努力,至少查明被盗的物品或汽车的。但是,最使人害怕的强奸犯或行凶抢劫犯,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几乎是抓不到的。老一套的法律实施办法的这种软弱无力,造成非常危险的局面。正如越共的“神出鬼没”使全体越南农民都象是潜在的敌人一样,行凶罪犯的神出鬼没也使人们对所有黑人青年都感到恐惧和怀疑。

然而,关于犯罪的主要问题是,同工人所面临的其他社会

---

\*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却怀疑在这种恐惧当中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真实成分。固然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仍然是经济上的,但在某些案件中,在行凶抢劫时发生不必要的暴行,甚至是杀人害命的行为,这就不能归因于合理的经济动机了。另一方面,黑人在街头的大多数犯罪行为仍然不是种族方面的,这一点的证据是:犯罪行为是针对其他黑人的。

不满一样，它特别严重地影响到工人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住在郊区的比较富裕的人，很少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 四

每个人在上学的头几年在什么地方都能听说的事情之一是，一个穷孩子只有在美国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而且成为总统。但是，除非一个人特别天真，否则早在他毕业以前，他就会认识到，这种机会比爱尔兰赛马独赢彩票的中彩机会还要差。在美国，不仅是总统的职位，而且实际上每一个有政治权力的职位，都是从社会的上层中提拔出来的人们占据的。例如，在1947至1957年间，只有百分之一的参议员在当选时是蓝领工人，百分之九十九是从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选拔出来的。<sup>32</sup>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情况如此，它却从来不象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正如教科书所解释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这就是说，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办法使它提出的要求得到重视，并变成立法。

虽然人们承认，对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来说，这显然是不真实的，但是对蓝领工人来说，这同样是不真实的。象经济制度一样，政治制度也不能公正地处理美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

这一事实往往遭到忽视，因为作为华盛顿的一个院外活动集团以及作为向政治候选人提供基金和支持的一种来源，工会有着无可否认的影响。事实上，自1960年以来，工会的作用已经大为增长，现在它们在民主党内以及作为国会里一

个老练的院外活动集团，有很大的发言权。1968年，它们在政治上花了大约五百万美元，有四百五十万人进行了选民登记，有将近十万会员参加了选举日的活动。《华盛顿邮报》论劳工政治影响的连载文章相当生动地作出结论说：“劳工[在国会里]不仅有能力有力量。人们对他们表示敬畏。”<sup>33</sup>

尽管有这种评价，但是，即使劳工运动的影响比它今天的影响增加一倍，美国的政治制度仍然会对普通工人抱有明显的偏见。蓝领工人是人口中的多数，但是在华盛顿，他们的利益被认为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税收制度的不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为了某些改革，劳工可能会进行院外活动，也可能会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同他们意见一致的候选人。但是税收体制本身，正如最初规划时和整个战后时期所施行的那样，对工人是存有偏见的。劳工的影响，充其量也不过是作出努力，要减少这个制度的一些最坏的方面。他们肯定永远不会有去决定税收的基本结构，并使税收从一开始就是公平的。

同样，工会进行了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斗争，因为这个法案严格地限制它们的力量达二十年之久。然而到现在，它们至多也不过是进行了一场防御战，以防止受到一些甚至更为苛刻的限制。

事实上，劳工的力量是防御性的。他们能够阻止反劳工的立法得到通过，或者赢得现有方案的某些改善，但是他们不能决定立法的基本型式，也不能保证通过他们单独提出的任何法案。一位作者在《幸福》杂志上指出：“象劳工们知道的那样，他们在国会里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操纵主要立法条款的

程度。他们把自己的力量 and 影响同其他集团的力量和影响联合在一起,才能赢得胜利。”<sup>34</sup>

在只对一小部分工人或只对工会有关的一些局部问题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它是一个为大多数工人和所有美国人着想的基本社会方案,劳工的力量也往往不足以战胜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和亲企业的势力。

这里举一个主要工会——美国交通工人工会——对九十二届国会的一些影响工人的法案上所采取的行动的简要总结为例。

“美国交通工人工会和有组织工人的头号立法重点——国民健康保险——在委员会里夭折了。关于得到政府支持的增加急需的最低工资问题,众议院的反工人势力阻挠采取最后行动。养老金改革和税制改革也列进了九十二届国会的失败事例的单子。”

它接着在“贷方”项目里记上一笔:“在九十二届国会期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使社会保险金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在社会保险福利方面,他们还制定了其他一些必需的改进办法……但是,对于用总收入的款项而不用工人所得税来支付各项福利的一些劳工提案,国会没有作出响应。”<sup>35</sup>

三项失败和一项非常有限的成功,这就是所代表的人数超过我国其他一切院外活动集团人数总和的一个“压力集团”即劳工的收获。

但是,由于把有组织劳工的立法目标同美国工人的基本长远需要等同起来,甚至这种评价也没有充分说明问题的实质。一般地说,劳工对于自己的任务抱有一种豁达的看法,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只对工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可是,他们的立法目标和院外活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是以特定时刻有可能提出什么问题为基础来选定的,而不是关于需要完成什么事项的空泛声明。当人们看一看政治制度怎样对待工人面临的关键问题时,工人们身受的大量冷淡和不公平待遇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

以职业保健和安全问题为例。在整个战后期间,这一方面也许是最迫切需要为美国普通工人制订法律或者最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领域。但是,直到1965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行动。

下面的大事记表明从那时起政治体系是怎样对待这种需要的(矿业安全立法已由国会另行处理,所以这里不谈这个问题):

1965年 公布了第一个调查报告即弗赖伊报告。它描述了比较急迫的职业保健问题和可能的改正措施。该报告为职业保健请求一笔五千万美元的全国开支。

1967年 两年后,为了处理工人“工作现场”保健和安全问题,提出了一项法案。

1968年 这个法案由于雇主们写了大量信件表示反对而遭扼杀。

1969年 《民族》周刊在描述现有劳工保护措施的限制性时指出,“各州雇用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的看管人员同职业保健和安全检查员的数目一样多。”

1970年 劳工部一些持独立见解的人的调查报告透露,造成残废的事故率可能是公开发表的事故率的十倍。劳工部和尼克松打算先扣住这份报告,然后把它束之高阁。杰克·安德森搞到了一份,并且透露了报告的内容。

年终通过一项折衷法案、即1970年职业保健和安全法,授



权劳工部长为劳动场所制订全国的保健和安全标准，对违反这些标准的雇主处以罚金，而请求法院采取行动。在危险毒素集中的地方，工人有权拒绝工作而工资不受任何损失，并且有权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得到关于这些毒素的化学分析。法案还规定要进行秘而不宣的联邦调查，并即时披露调查结果。这项法案的缺点之一是它包含这样一种规定：即使调查人发现一架危险的机器，他也不能当场把它关掉。根据法案设立的州工人赔偿委员会总数十八名委员中只有三名工人代表。

1972年4月 拉尔夫·纳德指责劳工部“乱搞一通，把[执行法律的]职业保健和安全局变成一出滑稽戏”。他指出，“有五百名百依百顺的官员……到1972年6月，每七千二百个企业才有一名检查员。”《纽约时报》指出，劳工部用拒不执行和重新解释的办法也将法律打了折扣，例如从新法案的标准里干脆去掉了四种引起癌症的物质。

1972年6月 国会投票取消对有十五名或不到十五名工人的商号实施法律的基金，把六分之五的商号置于检查范围之外。

1972年8月 尼克松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的拨款。职业保健和安全局的预算削减了三百万美元。

1973年1月 这项法律的一部分要求各州到1972年底提出至少和联邦标准同样坚定的计划。只有四个州照办，因此劳工部把截止期限延长六个月，说国会只给各州两年时间去提出计划，是犯了错误。劳联—产联得到了法院不准延期的禁令，但是劳工部提出上诉。

1965—73年 从第一个调查报告到现在这七年间，在美国足有五十多万工人在工作时丧命。法律一如既往，仍然不够坚强有力，也没有充分执行。<sup>36</sup>

养老金改革是另一个例子。1961年，一个委员会指出，需要有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养老金。一年后，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该委员会的报告于1965年发表，但正如我们在上章所指出的那样，在1972年仍然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工人的退休金不受损失。在那一次的国会会议期间，因为政府施加压力，要把紧急反罢工立法置于优先地位，参院劳工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就把养老金立法搁置一旁。这是对国会优先考虑事项的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明。在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帮助三千万工人的一项法律，却由于支持一项反劳工措施而被放在一边。\*

问题的根源多半就是黑人领袖们多年以前就有关他们的利益所了解到的事情。由那些对你的利益表示“同情”的人作代表和有人愿意为你的利益进行斗争之间有很大区别。国会的“黑人核心小组”有十三个成员，比应该有的数目差得很多。然而根本就没有蓝领工人的核心小组。劳工能够进行院外活动并试图影响立法，但在国会里却没有人对一项法案首先问一问，“它对美国工人有什么意义？”当你巡视国会两院或州和地方政府时，你很少看到美国工人能够同他打成一片的政治人物。毫无疑问，政治是富人的玩艺儿，牺牲美国工人的利益来玩这种把戏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在这些篇章里出现的是一个生疏的形象。陈词滥调中的蓝领工人，即那些自己有房子和汽车的称心如意的中等美国

---

\* 虽然有若干法案提交1973—74年度的国会会议，但是，甚至最好的法案（如果原样通过的话，而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充分解决当前制度中的不公平问题。

人，原来是掩盖真正问题和一种极不平等现象的一幅虚妄的漫画。当工人最后指望政治制度给予解决办法时，他所得到的反而是同一类型的冷淡和漠视，而且这往往是在他生活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域里。

很难不同意这样的概括：工人确实是真正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并且是他们自己国土上的次等公民。

##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政见

我们邻居艾尔的房子有一个小后院，向着郊外。后院外边尽是空地，在夏季的晚上，你在那里很容易觉得好象是在乡下，尤其是在车辆来去繁忙的时刻之后。

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假期里来看我，于是我们二人就和艾尔两兄弟一起烤牛排，几个月前，艾尔和我曾做好烤架，由于三脚的烤架上有一个轮子和另外两个完全不协调，我们初次使用时就出了乱子。我们想把火盆转向迎风的方向，一下子把价值四美元的瘦排骨和半袋木炭都翻在唯一的一畦花上，这是艾尔的妻子辛辛苦苦地在春天栽上的。她过了几个星期才把这件事当笑话来谈起，在翻倒的地方那时还可看到木炭末子。

我们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和艾尔的弟弟听，象人们通常讲这样的故事那样，夸大了我们损失的食物数量以及所造成的破坏。

我事先提醒过我的朋友，在初次见到艾尔两兄弟的时候，他们似乎有点象阿尔奇·邦克<sup>①</sup>那样的类型。艾尔管黑人居住区叫做“黑鬼镇”；到目前他还深信不疑，城里仅有的一家黑人拥有的银行由于某种原因是靠他的税

---

<sup>①</sup> 美国电视长篇连续节目中一个漫画化的落后工人人物形象。——译者

款维持的。

但他也和同厂的一个黑人工人查利有着异常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在下班以后一同去喝酒，有时还互相串门儿。当查利进了医院，艾尔差不多天天去探望的时候，我看出他们的友谊的全部深度。

许多对工人有所了解的人在不同场合都有过这样一种混乱的反应。精神病专家罗伯特·科尔斯比任何别人更清楚地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一点。在引述了一大段他认识的一个工人的话之后，他写道：

我认识这个人越久，听他谈的话越多，我就越难于把他称作这种人或那种人；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多少觉察到从他言语中听到的、更重要的是在他日常行动、处境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混乱和前后矛盾。他谈到现时代、黑人、学生和大学教授时表现出……气愤和轻蔑。……他可能是荒谬的、刻薄的、心胸狭窄的，并可能逐步发展为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合并发作，而这只会使他日后选作攻击对象的那些人、即有钱有势的人感到高兴。

他也会和黑人在一起做工，跟他们轻松而亲切地谈天，跟他们一起吃饭，给他们出主意，或听信他们给他出的主意——买什么样的汽油，上那儿买一件家庭用品、一件小玩艺儿、一件衣服……1

那天我们都去看汽车竞赛，在闷热的白天之后，凉快的空气真使人感到舒畅。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享受晚间的舒适。

选举问题提出来了，艾尔的弟弟从越南回来不久，他以毫不含糊的话语表示了他对于赦免逃兵和逃避兵役者的想法的愤慨。听他那几句短短的话，的确就象阅读典



型的“硬帽工人”或阿尔奇·邦克的言论一样。

但不多一会儿以后，他说出了截然不同的话来。

他说，“那些进了监狱的家伙，我现在可真的非常尊敬他们。我并不比他们更愿意上越南去，可是我就没有那种宁可坐牢的勇气。我尊敬愿意坐牢的人。可是我瞧不起那些忽东忽西的家伙，我是说，象马丁·路德那样并不想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人，”他用缩短的方式称呼马丁·路德·金，那是南部人的习惯，他继续说。“如果他犯了法，他就甘心接受惩罚。”

我可以看到我那从大学里来的朋友的眼睛反映出他所感到的惊讶。他正在发现，艾尔和他的弟弟是复杂的。他们同任何别人一样地成长、变化和斗争，以求实现他们的理想，但他们与“阿尔奇·邦克”或“典型的硬帽工人”之流不同，那些人不过是体现了在街上偶然听到的一句话或电视新闻节目里一闪而过的一个形象而已。

夜深时回到我的住所，当我的大学朋友和我躺在床上等待睡眠来临时，他突然说，“你知道，他们真不是那种坏家伙。他们不过是跟别人不同罢了，你说对吗？”

最近几年，大部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见解的讨论都以“典型的硬帽工人”或“阿尔奇·邦克”投票这样一系列的概念为中心。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在自己的汽车上贴着“支持你们当地的警察”和“轰炸河内”等大字标语的家伙，或者是充满仇恨的建筑工人殴打学生的极端分子。

一些自由主义者确实认为这些形象是美国工人的确切表

象，甚至那些认为这些形象是不符合实际的老框框的人，也很少反对下面这个基本概念：工人是目前美国社会里一支基本上保守的力量。象《纽约时报》的一个劳工问题记者 A. H. 拉斯金指出的，“典型的工人——从建筑技工到鞋店店员——大概已经变成国内最反动的政治力量了。”<sup>2</sup> 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工人不比中产阶级更种族主义或军国主义。而认为工人在某些重要领域里确实更开明些的看法却根本听不到。

但是，当你看看从投票和民意测验得来的不容怀疑的全国数字时，这正就是人们所发现的东西。从大多数民意测验中，只能看出社会各阶级之间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很少一点的而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差别。在选举或其他投票中，即使是 1972 年，也表明工人仍然是美国政治中最“自由主义的”力量之一。

然而，歪曲的形象为什么这样地使人信以为真，是有其充分的道理的。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中以及在学术界中被描绘的工人形象一贯都是消极的，并且基本上赞同“阿尔奇·邦克”的那类陈词滥调。这种形象传播得十分广阔，以致没有一个人对工人的看法不受到消极的影响。

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中，除阿尔奇·邦克之外，还有别的电视长篇连续节目描写蓝领工人——杰基·格利森的“拉尔夫·克拉姆登”和威廉·本迪克斯的“赖利的一生”。三个都是可笑的滑稽人物，过于肥胖，愚昧无知，这里面有两个还是作威作福的家庭暴君。这些节目从来也不描写劳动世界、工厂或车间，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真实问题。

电影也加强了这种形象。虽然也有正面的人物，尤其是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但那几部风行的影片，如“乔”、“草狗”和“轻松的骑者”，却把工人描写成杀人疯子那样的狂人形象。在最近几年，这些影片在观众人数和受欢迎的程度上都大大超过已经摄制的正面影片。

单是这一点并不会成为决定性的影响。但它又被学术界用在工人身上的话语所加强了。就在一篇常常指定给高等学校各年级学生阅读的文章里，就出现了所有下面那些说法：工人有“固定不变的看法”，“不存在过去和将来”，“没有能力采取复杂的观点”，最后，“他们缺乏丰富多采的内心生活，他们的想象力实在是贫乏而有局限的”。<sup>3</sup> 诸如此类的描述大概不会促使人们对于作为人类的工人产生任何敬意吧。

一些理论也附和这种观点。人们知道得最广泛的对于工人政治态度的分析，是西摩·M. 利普塞特的关于工人阶级权力主义的观点。最初用来说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的这个理论，在他的解释下变成专门适用于工人的了。它根据寥寥数次的民意测验以及用铅笔填写的调查表（“F”表）的贫弱资料作出论断，说工人特别容易产生偏执和反民主的情绪，以及其他许多“保守的”性格特征。很多年来，这个理论和与其相关的一些理论通常都未引起争论，从而经常侵入传播很广的定期刊物里，同样也侵入几十种教科书和学术著作里。直到最近才出现系统的评论，指出现有的民意测验资料有许多实际上同这种论点相抵触，并指出这样的研究在方法上具有大量的主观因素，权力主义性格这整个概念实在“太难于衡量了，即使它确实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正如一个评论者所指出的，这样的东西固然暴露了著者们的主题有偏颇，但更多地

暴露了著者们本人的偏见。<sup>\*4</sup>

最后,公众对于工人的看法又受到 1970 年几百个建筑工人在纽约市中心区殴打学生的新闻的影响。工人与黑人或与学生的冲突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并且,由于没有人看到过几百个教授或工商业者参与大打出手,工人比较反动这一结论就好像是显然的了。

但是,无疑有几千个工商业者;甚至还有大学教授,他们对于示威游行的人的敌意恰恰与硬帽工人一样厉害。他们所以没有使用武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而只是因为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特别是在学术界中,为了任何理由打人都是受人谴责的。因此,举例说,虽然许多工商业者的政治态度比大多数工人保守得多,他们却显得“宽容大度”,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违反那些为了他们的社会集团而存在的、反对暴力的社会道德规范罢了。

但是,我们将看到,关于工人态度的事实展示出一幅很不

---

\* 不熟悉社会学研究工作的人很难认识清楚,偏颇和主观成分多么容易侵入带有堂皇的统计表和专门术语的那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专题研究中去。只要举出几个研究工作者的例子就行了,他们开始一次社会阶级研究时就抱有成见,认为阶级地位较低的人更易于偏颇。他们承认,在以前五次调查研究中只有三次支持他们的假设,但他们用下面这些话一笔抹杀了两次与他们意见不同的调查结果:“有很多独立的证据证明对黑人的偏见与当前的职业地位成反比,因此我们不能认真地认为……埃尔米拉的资料可能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另一项调查结果则说,“这种奇特现象无法予以明白解释,它使我们对这个资料产生怀疑,一如前面我们对埃尔米拉资料感到怀疑一样。”

可是他们自己的研究也不能说明工人们比中产阶级更有种族主义思想。这样,这里就有三份资料赞同这一假设,三份资料反对这一假设。然而,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说他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资料上有毛病……因为其他研究已经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会与偏见成反比”。<sup>5</sup>



相同的图景，它显得更复杂一些，并且也乐观得多。

## 二

一个工业城市的工厂附近的那些街道，在交接班之间的时间里走过，是最僻静的地方之一。这里店铺不多，人更少。巨大的厂房沿着街道投下好象看不见的灰色阴影，酒吧和弹子房的霓虹灯招牌象阴冷的森林里温暖的营火在发出召唤。

我走进最近的一家弹子房，坐了下来。我旁边是两个长着斯拉夫族长脸、穿着滑雪上衣的上了年纪的人。弹子台旁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杆子，照着他的白人对手打了一杆难打的安全球，把几个球紧紧聚集在弹子台中央，使对方没有机会把任何球容易地打进袋里去。

“打得好，你这个老妈妈，”黑人赞赏地说。

“就叫我明尼苏达的胖子吧，”对方回答。

在我的书包里的好几篇文章中，有几十处详细叙述全国许多地区黑种和白种工人间紧张关系和敌对情绪的描写。有一处描述了底特律一个黑种汽车工人在盛怒之下枪击三个白种工人的案件。另一处是一个考虑得最周到、情况了解得最多的工人问题记者写的，说黑人和白人之间充其量也只是在默默的敌意下互相容忍。第三处是关于反对在居住方面取消种族隔离的。第四处是关于密执安州庞蒂亚克城反对用车接送学童的抗议的。这样一张单子大概会使谁都对美国黑种和白种工人之间关系的任何改变感到无望吧。



然而，在那弹子房里，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互相对待的情形却与我从文章中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

我转了一下身子，继续观察他们。那个黑人刚打了一杆不容易打的球，他把台中央的那堆球打散，同时又把一个球打进袋里。他可能会接连得分，赢得这一盘。

“啊，你这个狗仔子，”那个白人开玩笑地说，“我本来应该在你打那一杆的时候给你捣一捣乱的。”

他们玩笑地互相用杆子对准对方，装做要打架的样子。没有人抬头看他们，没有人把他们当真。他们是一对伙伴，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在到工厂里去上晚班之前打一盘弹子。

我在裤子后面口袋里带着的笔记本里有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得出一条简单的结论，但它们提供了这个复杂难题的几个片断，这是流行的陈词滥调和整齐的统计数字都无法提供的：

跟加里的汽车出租站的一个小伙子一同乘车，他开车送我到能够领取所租到的汽车的地方去。他告诉我，他在工厂里做过几年工，接着，他突然踌躇了一下说，“这个城市的中心区正在逐渐凋零。”

我有充分的经验，知道如果直接提出关于黑人的问题，十之八九会得到一个不老实的回答，所以我和他谈起了我干过的一项工作，描述了一个全部是虚构的种族事件，然后才问他，他在工作中是否遇到任何与黑人有关的困难。

“没有，”他说，“哪有那种事。我们就是这样相安无

事。我是说，我们干活拿钱。没有争吵，也没发生什么问题。”

夜里，在路上，向另一个州里的另一个工业城市进发。我在芝加哥下了飞机，改乘汽车，这是一辆黄色的大众牌汽车，因为没有飞机飞往那么多工业城，许多工业城象加里那样，连飞机场也没有。

司机是一个工厂里的工头，一个星期熬两个夜干副业当司机。我们谈论了一些北部的事情和我刚从那里来的南部的事情。

“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喝一点酒？”当我们进入城市的中心区时，我问。

“旅馆里有一个酒吧，”他说，“可是在那里只会有你一个人是白人。”

“这我可并不在乎，”我说，“你觉得不好吗？”

“啊，去他的，有什么不好，”他完全诚恳地回答。“我自己也上那里去。只有你们南部人才觉得不好。”

我告诉他，我是在北部长大的，于是，他似乎同意地点点头，好象现在什么都搞清楚了。

我在汽车修配厂工作的第一天。午饭汽笛响了，我们跑出去从流动午餐供应车上买一份红肠面包或夹肉面包。我和教我干活的那个人坐在一起，但我很快发现我呆错了地方。上年纪的白种工人都沿着工厂的一边墙下坐着，青年工人在另一处，黑人又是一处。从十二点到十

二点半，三种文化集团象三个孤立的组织一样分得清清楚楚。

但到了五点钟，在梳洗时间里所有的人都混在一起了——黑人和白人肩并肩地站着洗他们手上和脸上的油腻。这些白人都是来自南部最闭塞的地区的，在十年或十二年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事。但现在这就象家常便饭一样为人所接受。

在南部，有一次我上一个加油站去买烟。一个面色火红的上了点年纪的家伙在操作唧筒。他正给一辆乘着一个黑种姑娘和一个白种男人的汽车加油。他们的车一开走，他就转身对我说，“你瞧，这真让我生气，一个黑的和一个白的这样在一起。”

“这可没有让我生气，”我正在想着旁的事，心不在焉地说。“如果他们爱这样，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了，”他回答说，“我想那倒也是真的。”

由于费了半个夜间也没有在纸上写下一个字，我多少是处在一种不快的心情中。

“你想一想定，”我不客气地说，“这让你生气呢还是不让你生气。”他有点吃惊，带着一种老实感到诧异的表情回答：

“这要看我在跟谁说话，我想。”

“好吧，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可得记住，这不让你生气，”我不快地说，转过身子就走开了，一边仍旧在想着我面前尚未做完的工作。

我走了几步之后,开始感到这样不客气有点不好。加油站的服务员是很寂寞的,我认识到他的第一句答话是很诚实的。刚才他只是想找个话题谈谈,当时他还以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他也许自己也不知道,对于那辆汽车里的两个人他真正的感想是什么。那两个人不过是他在空闲的星期二上午用来开始一场谈话的一个途径罢了。

在密执安湖南岸那一长列工厂区的某一段上,我同一个当工会职员的黑人乘车走着,观察他和交了班离开工厂的工人聊天。当有人喊他名字的时候,我们正关着车窗行驶着。他停了车,把车窗玻璃摇下来。

“你过得怎么样,”一个有点年纪的人问他。

“很不错,”他答道,“老婆现在随时都要生了。”

“我希望是个男孩,”那个白人高声说。“星期四见。”

在语声和目光里充满着真正的感情,不只是那一个人,他们两个同伴也一样。

最后的一个事实。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工会选举中,象其他一些工会一样,黑人经常被白人占多数的基层工会选为车间代表、副主席和主席。而且这并不是在一两个例外情况中如此,而是全国到处都可看见的情况。被称作充满紧张与敌意的这个地区,同时也是美国任何地方中最民主、最宽容的地区。

现存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性质和程度,是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已有这样一种看法:固然

白人的种族主义一直是美国的部分现实，今天工人的态度却一步步地变得更坏，正在对黑人的要求表示“强烈的不利的反应”，他们现在比中产阶级偏狭得多。这些想当然的变化已粉碎了自由主义者重新建立“新政”式的黑人、白种工人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的愿望，即使是至少选出过罗斯福为总统并允许组织工会的那种有限基础上的联合也罢。反之，宽容现在已被假设为中产阶级的特性。

证据的来源之一是民意测验。虽然对于一次测验是否真能预示实际的行为抱相当大的怀疑态度是对的，但假如人们关于这些问题没有更多的表示时，那末就按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测验，这些测验也还是有用的。不然的话，那就得走遍全国，就大量的问题进行讯问，才能获得关于工人们说些什么的类似资料了。

但真正的问题是，仔细的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多。哈里斯测验甚至没有把资料进行职业分类，几次盖洛普测验在“体力劳动”栏内把黑人和白人、男工和女工都混在一起。因为这些测验也是小规模，各职业集团之间的比较单单由于偶然性就可能有百分之六、七的误差，那就不能从这些测验中获取任何坚实可靠的资料。<sup>6</sup>

幸而，有几个研究克服了这些问题中的某几个。最好的、事实上是唯一一次写成专书的关于工人的政治意见的研究，是1971年出版的理查德·汉密尔顿的《美国的阶级和政治》。<sup>\*</sup>

<sup>\*</sup> 汉密尔顿按收入把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划分开来，其理由已在上一章说明。他还对北部和南部作了分别的考察，因为他发现，这两个地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此外，这里所引的1968年的材料并非采自这本书，而是从他在不久以后写出来的两篇文章中采取的。<sup>7</sup>



先来看北部（更确切地说是南部以外地区），这里列出的是汉密尔顿关于可称为一般平等权利态度的数字材料，这些数据是他从一份 1968 年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中计算出来的。

**1968 年南部以外不同阶级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sup>8</sup>**

（回答者为已婚白人，有经济活动力的家长）

问 题	赞 同 者 的 百 分 比			
	操作工、杂工 和服务人员	熟练工人	下 层 中产阶级	上 层 中产阶级
政府应保证黑人在 工作中得到公平待 遇	49	44	43	45
政府应保证黑人可 以进入任何旅馆或 餐馆	67	62	64	65
政府应保证白人和 黑人的子女进同一 个学校	55	40	48	47
黑人有权住在他们 住得起的任何地方	82	88	85	82

结论是明显的。在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完全没有重大的差别。事实上，工人们还表现得更进步一点，即使差别也不大。而且，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单纯的民主感情，而且还支持政府在工作 and 学校这些关键领域内加强平等的计划。

关于一系列多少有些相似的“平等权利”问题，另一个民

意测验组织、即全国意见研究中心在 1968 年作了调查。下面所示是南部以外体力工人与非体力工人的意见：

**1968 年南部以外不同阶级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sup>9</sup>**

问 题	蓝 领	白 领
你赞成使白人雇用有技能的黑人，从而使黑人能获得他们所能胜任的任何工作的公平雇用法吗？	89	88
如果有同样收入和教育程度的黑人迁居到你那一个街区来，你有意见吗？（百分比是沒有意见的人数）	83	88
黑人有权居住在他們住得起的任何地方——完全和白人一样。	85	84
黑人和白人应该进同一个学校还是应该分别进不同的学校（百分比是赞成进同一个学校的人）	80	89

必须承认，1968 年以后，在犯罪和人口限额之类的问题的影响下，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些也许已经变坏了。此外，关于一些象不同种族之间的男女约会之类较为有关风化的问题，采取宽容态度的就少得多（百分之六的工人赞同，百分之十三的白领工人赞同）。最后一点，这些问题是分明以最不刺激人的方式提出来的，使它们比较难于为人反对。

但即使如此，这些回答仍旧和通常的看法截然不同。如果蓝领工人的种族主义确实比中产阶级多得多，那末至少会看出某种表现。但是，对于这样一些的广泛社会问题，你并不能发现什么差别。

### 1968 年不同阶级南部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sup>10</sup>

(回答者为已婚白人，有经济活动力的家长)

问 题	赞 同 的 百 分 数			
	操作工、杂工 和服务人员	熟练工人	下 层 中产阶级	上 层 中产阶级
政府应保证黑人在 工作中得到公平待 遇	50	22	19	44
政府应保证黑人可 以进入任何旅馆或 餐馆	47	13	38	52
政府应保证白人和 黑人的子女进同一 个学校	35	14	20	34
黑人有权住在他们 住得起的任何地方	55	37	49	67

在南部，每一个社会阶级的总的宽容水平都较低，但突出的是熟练工人与工人阶级其余部分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操作工、杂工和服务工人在三个问题上的宽容程度正好与上层中产阶级一样，并优于下层中产阶级，只在一个问题上显然不如“高贵阶级”宽容。

然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与北部大不相同了。关于这点，特别使人发生兴趣的是，南部的许多工会领袖和其他观察者始终感到，南部的穷苦白人似乎往往对黑人颇抱宽容态度，并和黑人长期地相处得很好。许多作

者感到，这是因为“穷苦的白种滓渣”的低工资和低地位确实把他们造成一个受压迫的集团，这种情况比北部的白种工人严重得多。我们目前这个研究也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可以支持这种看法。（我们将看到，在罢工和各种行动中，南部各地现在可以看到工人中有不同种族联合起来的例子。）

另外一些对工人阶级态度的研究，虽然在方法上决不是仔细和有系统的，也呈现了同种的型式。1968年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所做的另一次大规模研究中，关于象“你赞成公民权利立法吗？”或“你赞成种族之间的接触吗？”之类的问题，没有出现阶级上的不同。那个研究报告指出，“不同职业水平的白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差别甚微。”<sup>11</sup>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以民意测验为根据，容易使人怀疑，当事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时，工人的行动是否会与中产阶级大为不同。赞成就黑人白人混合居住问题进行市民投票的表决过程，大概是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现实生活”的东西，有人作了一些研究，调查了人们在六十年代中期是怎样表决的。在伯克利和托莱多这两个城市，有一个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得出下列结论：

“在这两个城市，蓝领工人离白人的平均值并不太远，并且他们比白领工人（除去情况特殊的专门职业者）表现了更少的偏狭态度。事实上，在托莱多最偏狭的部分是收入低于七千美元的白领工人，他们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三。……在托莱多，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支持率略高于全市平均值，支持率最低的则为白领和熟练工人。”<sup>12</sup>

另一个在底特律就黑人白人混合居住问题进行公民投票

时所作的研究，集中在按工资收入分析的投票情况上。结果表明，低工资和低中等工资的人有百分之三十二投票赞同，中等工资的是百分之二十一，高中等工资的是百分之二十四，只有高工资一类以百分之五十二的数值高于低工资的。

总结这三例，再加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投票，这个研究报告的作者得出结论说：

“反对黑人白人混合居住的，在白领低工资工人中人数最多，而不是在[白种]工人阶级中最多。……[他们]在公民投票中对于法律的支持多多少少要超过他们的老板和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即业主和管理人员。……熟练工人是最表示反对的部分之一，但其他蓝领工人与白人平均值相当或略高一点。”<sup>13</sup>

单单这一情况就给了所谓工人是美国最坏的种族主义者这种神话相当沉重的打击。但还有其他的证据。

另一个研究者考察了大约十年以前十五个南部城市中对种族隔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白人投票情况。他发现，在十一个城市里，在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类别与地位较高的类别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在三个城市里，较低的一些类别比富有的更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在十五个城市中仅一个城市，工人确似乎比中产阶级差了一点。<sup>\*14</sup>

在较近的时候，钱德勒·戴维森教授研究了三个南部城市的、特别是孟菲斯的投票类型，想找寻证据，证明较低阶级在

---

\* 称这些类别为“工人”和中产阶级，实在并不正确，因为这一研究和下面一些研究都凭收入而不凭职业来划分，因此低工资白领工人约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混进来。但是，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以前的一些研究报告暗示，低收入白领工人不如蓝领工人宽容，因此就使“较低社会经济”类别显得比单独的蓝领工人有较多而不是较少的种族主义。



投票中与较高阶层相比有更多的种族主义。他观察了二十次预选,在这些预选中,都在两个候选人之间作明显的选择,一个在种族和经济问题是自由主义者,另一个在这两方面是保守主义者。结果十分清楚。在每一次单独选举中,一些低工资的类别倾向于比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类别更自由主义些。甚至在六次非党派选举或公民投票中(那是沒有按照党内指示投票的可能的),结果也表示,只有一次工人阶级的偏狭票较多,两次是中产阶级的偏狭票较多,三次沒有差别。<sup>15</sup>

因此,关于黑人白人混合居住或种族隔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现实生活”表决,以及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选举,都清楚地表明,工人如果有所不同,那也是比中产阶级稍稍进步些。认为在有关黑人问题上工人全是反动的,中产阶级才是“宽容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神话。一般所认为的工人形象,不外是根据几十个工人、有时是几百个工人参加游行示威而来的,而这里所提出的证据却是根据几十万美国蓝领工人的行为而来的。它和民意测验的资料一起,清楚地表明那些老生常谈是多么错误。

近年来的一些意见调查,询问了象“黑人是否推进得太猛了?”或“黑人是否在要求特殊待遇?”之类的问题,可是这些调查却在白种工人间发现了一种很现实的敌意。1970年的一次研究除上述两个问题外还询问了另一个问题,问起“黑人是否应该得到他们要求的東西”,结果发现,百分之七十的蓝领工人对这三个问题采取了“种族主义的”看法。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只有百分之四十二到四十三对全部这三个问题都采取

敌对看法。<sup>16</sup> 其他一些研究显示了较小的但相似的结果。

但是，虽然有这些新的敌对方面，似乎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即使在北部，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也远比今天恶劣得多。如果说在 1956 年的全国舞台上没有出现乔治·华莱士，那时候也没有其他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示威，那只是因为没有要求改变的压力而已。今天紧张关系比较明显，但那是因为黑人居住区的危机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黑人所提要求的性质，已以比白人反应快得多的速度发展起来。然而，我们仍旧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白种工人在接受黑人的要求方面已比五十年代的白种工人少了一些困难。

正如许多黑人领袖所指出的那样，被人大加吹捧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北部的“宽容”，特别在工人中间，大部分是以事实上种族隔离的严格制度为基础的。

以“不要穿过泽西南部”这句话为例，这是前几年每一个住在东北部黑人区的黑人都熟知的，因为黑人只要经过那个地区就会受到折磨。甚至在纽约，在五十年代后期，如果黑人胆敢上时报广场去，常常会有一个警察对他说，“滚回你住的哈莱姆区去吧”，除非他是去送信，或是打扫办公室。

在北部各地，确实实有几十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在那里一个黑人如在天黑后被发现，就有被痛打一頓的严重危险，除非他能证明他在那里是有理由的。学校里也有那么几个黑人学生，可是他们常常得结伴走回家去，特别是如果时间较晚。要是一个黑人胆敢搬进一个白人居住区去住，那末，往往就有人用枪把他房子的每一个玻璃窗都打碎。许多北部的工厂有黑白分开的个人衣物存放室和盥洗室，还有一套与密西西比

州一样完备的种族隔离制度。

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你才会明白，一种真正的改变已经发生了。在一些地区，非正式的种族歧视仍旧存在，在工厂里甚至还有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但清楚的是，普通的白种工人今天已与黑人有多得多的接触来往，并且在承认黑人的基本权利方面达到比以前大得多的程度。混合居住还没有被接受，但显然已经有所改变。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从美国开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现实。但从历史上看，它不能说变得更坏了。

民意研究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证实这种看法。正如汉密尔顿所指出的，“把 1942、1956 和 1963 年三个时候询问同样的问题所作的研究进行比较，除了微不足道的和零碎的例外，证明人们的态度有了巨大而持续的改善。”他还指出，即使是 1968 年所得的资料也“表明这种趋势在继续着”。<sup>17</sup>

但是，这里还有最后一点，有助于说明工人阶级态度中似乎存在的矛盾，在某些方面有着真正的宽容，但在某些方面还有明显的敌意。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黑人和白人这些概念进行思考，并把他们的关心置于一种抽象的平权主义感的基础之上时，工人态度的积极方面却是以共同的问题和他们对黑种工人所共有的不公平感为基础的。例如，请听一听罗伯特·科尔斯引述的一个工人的话：

“我对那些骗取福利金的人感到厌腻极了，更糟的是那些坐着不干活儿的嬉皮士；他们碰到困难时，就去找爸爸，可是那些黑人却老是干着、干着。但是，干出了什么来呢，谁是真正掌管这个国家的人呢？谁在发号施令，谁在捞取大笔的钱财呢？并不是那些贫

穷的黑人。我可以告诉你，决不是他们。自从他们被拿枪的人从非洲逮住，象牲口一样运到这里以来，他们干尽了累死的倒楣活，在这个国家又换到了什么呢”。<sup>18</sup>

或是听一听斯塔兹·特克尔访问过的一个兰加哥钢铁工人的话：

“……我没法真正憎恶整天和我一块干活的黑人。对于黑人知识分子我没有什麼敬意。对于白人知识分子我感到讨厌。我也讨厌好斗的黑人，当我正在累得要命的时候，他会对我大喊大叫什麼三百年的奴役；你知道我这话是什麼意思吗[笑]？我有一句话回答那个家伙——去找洛克菲勒、找哈里曼、找弄到钱的人。别来麻烦我，我们都在一块棉花田里，所以就别来打搅我[笑]。

“很可笑，老是有钱的白人在大声叫嚷什麼种族主义。他们是很安全的，不会碰到社会上与他们不利的强烈反应。你有没有注意到，老是说什麼‘找三K党人算帐去’，‘找白种去’，找波兰佬去’，‘别碰我，小子，因为我的名字叫约翰·林赛亲王，住在湖滨公路，公园大街’……

“我怎麼能憎厌黑人呢，他流汗的时候我也流汗。我们都在拚命干活。罢工的时候我拿着一块标语牌，他也拿着一块标语牌……”<sup>19</sup>

在工人们看见工人阶级的一个共同问题时，他们“宽容地”作出反应。但是，当问题提出全体黑人的需求，而不利于一切白人时，工人们往往忿怒起来，认为自己被人和富裕阶层混为一谈，觉得他们自己的问题被人忽视了。许多工人真心诚意地接受黑种工人提出的起码公平待遇的要求。但很少有人能够同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着重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改善



福利救济或努力了解犯罪黑人等问题。蓝领工人的“种族主义”表现得最剧烈的，是对黑人抗议中的这样一些方面：它们要让一般称作“流氓无产阶级”，即失业者解了体的家庭的需求与工人的需求相竞争。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切工人，黑种的和白种的，都有重大的问题和迫切的困难需要解决。现在也已经看得很清楚，把工人说成美国社会中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最糟糕的部分这种老生常谈，只是说必须把工人撇开的那套神话的翻版。当然，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有种族主义的潜流。但是，说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够宽容和转变，这种看法也不过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幻想。关于工人意见的实际资料所刻画出来的工人形象，似乎不如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把工人描绘成无产阶级圣徒那样。但它们也使人看出一种战略的轮廓，能把进步运动从近年来受其束缚的黑人与白人关系的僵局中解救出来，并让它重新开始前进。

理查德·哈彻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黑人市长。他是一个矮矮的漂亮人物，具有一种时而不拘礼节时而认真严肃的风度。当他描述他在1968年首次当选以来这些年所发生的事件时，他靠着椅背坐在那里，轻松地谈着，常常闪耀出一些颇具锋芒的机智。但当他谈到美国黑人所面对的广泛问题时，他坐正了身子，眼睛注视着听者，于是别人就感到他是竭力想说服你——使你懂得他试图说明的事情。他的办公室不大，是专供个人使用的，把日光挡住的窗帷使谈话似乎不象在阳光从窗户里射进



来的大办公室里那么郑重其事。

当我会见哈彻市长时，我并不知道他对于组成加里市人口的黑、白钢铁工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但考虑到他在选举中曾经遇到的艰难，我猜想他所看到的也许是这个问题的最不好的一面。

民主党的机器对他进行了严重的打击，而他只有少数几个白人同盟者。

在竞选运动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荒诞不经的借口，硬说出现了共产主义，哈彻一再被人指摘为一个狂暴的革命家或黑人权力主义者。为他做竞选工作的一些人回家时被人跟踪，还受到恐吓并实际遭受殴打。哈彻本人受到死亡的威胁，一场惊人的歇斯底里被煽动起来了。

斗争在选举前几天达到了顶点，一个白种妇人跑到哈彻那里，揭露了一个大量窃取选票的阴谋。只是在全国舞台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压力下，司法部出面干涉，阴谋才未能实现。

当我向他问起加里市的黑、白工人情况时，这些事情一一在我脑海里闪过。

“首先”，他说，“我认为，我和我的行政机构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我们根据选举的票数，认为百分之百的白种蓝领工人同反动的市参议员和新闻评论员的看法一样。（我猜想，当时许多白人关于黑人的判断在某一方面说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在我在任的头几年里，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在城市服务事业等方面，我们拼命卖力，力求付出过量的补偿。例如，下雪了，扫雪卡车就先

往格伦公园去(那是白种工人的居住区),然后才往城市中心区扫回来。可是这完全无济于事,因为那些政治代表干脆就利用这件事说,‘瞧,这就是我为你们作出的成绩。他们本来是确实不想这样做的,但我使他们这样办了。’

“但是,我们基本上认为蓝领工人自己并不真正想与我们来往,也不真正想同我们合作。我常常走到格伦公园的街上去,那里的人连话都不愿跟我说。当然,他们知道我是谁;受到这样的对待之后,你就可以说是真的开始变成惊弓之鸟了。

“但是,当有一位市议员和其他一些人决定要发起一个运动,把这个市的整整一个区划出去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危机。那确实迫使我努力克服我自己的一些保留态度。如果城市的那个地区真的划分出去,我就会眼看着其他的一些地区也照此办理;所以,显然在这一步上非加以制止不可。

“这样,那时我才开始真正同人们谈话了,甚至同不想和我谈话的人谈。我发现,有些人实在并不是关心我,而是感到,如果划分出去成为事实,他们就得付更多的税。他们同意在他们的家里举行会议。这样,有六、七个星期的一段时间里,我在那个区里一晚上得出席三次、四次、五次会议,在那里会见人们和直接跟人们谈话。

“我发现,与我猜想的相反,关于黑白关系的整个问题是有许多不同意见的。有些人抱一种‘要么接受要么舍弃’的不容商量的态度。有些人是真正抱有敌意的,你

可以从他们的言语里感觉出来和听出来。其余的人抱着很积极的态度。你知道，‘我一辈子跟黑人打交道，和他们一起干活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他们就是不让你娶他们的女儿，对于和平共处他们没有问题。那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接着，在白人那方面，我想他们第一次发现了他们一向听到的谣传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主张把白人都杀光那样的谣言。有些人真的问我那样的问题，当我说在那种话里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实’时，他们会惊讶起来。但结果是，他们开完那些会回去，就开始去找朋友们说，‘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刚会见了市长，他说……’这马上就传播开去，它是那么成功，一下子就把当时搞得火热的整个分市运动煞住了。不仅如此，那个发起这项运动的市议员当时正在竭力竞选国会议员，他也在一个自由主义者手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连在他自己的那个选举区里也没有获胜，当然更谈不上在那州的众议员选区里了。取得那次胜利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和精力，但它表明，这种战斗是可以获胜的。”

### 三

几千名大学生缓缓地列队走过市中心区的店铺和大楼。这是 1969 年，在中西部的一个城市里，问题是越南战争。

我的一个邻居是密尔沃基蓝领工人出身的越南战争退伍军人，他排在靠近最前面的地方，在“越南战争退伍

军人反对战争”的旗帜下行进着。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高大的年青人，穿着一件沾满油漆的罩裤，一副工作手套从他的后边裤袋里挂出来，正在对经过的示威队伍高声喊叫。他气得满脸通红，当他咒骂行进队伍时他的太阳穴上清晰地突出了青筋。他毫不含糊地喊叫着说，他也曾“去过那儿”，他知道真相。

大多数游行的人避开他，移向街道的中间，但我的邻居走上前去。在越南新年攻势时，他曾经遭遇过越共敢死队冲进他的阵地并以肉搏战告终的冲锋，所以，大概任何人都不能吓倒他。

“第一骑兵师的吗？”他问。

那个小伙子打量他一下，回答说，“对啊。”

“我也是，新年攻势时我正在顺化。”

“是吗？”小伙子说，显得比较亲近些了。

他们开始互相叙说他们都知道的连队军官和其他一些人的姓名。经过了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回忆之后，我的邻居突然说，“瞧，咱们曾经去过那儿——咱们知道那儿发生的事情。”

“对极了，”对方答道。

“那么，你知道我们首先应该永远不再上那儿去——你知道，那不是我们去的地方。”

“是吧，”那个小伙子疑惑不决地说。

“行了，咱们谈的全在这儿了，”我的朋友答道。

“是的，可是我就是没法同意这些该死的毛孩子的看法，他们不知道我们的遭遇，光说我们是一伙杀人犯，说

越共全都是圣徒。”

“我的屁股上就吃了六颗重的子弹，这就说明那些话不是真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还有任何别人在那一团糟的局面里给打死。”

“我同意你这一点，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些嬉皮士。”

“好吧，也许你愿意跟退伍军人一起反对战争吧——咱们也全都在那里呆过。”

我木然地静听着这一大段话。在五秒钟里面，我的邻居不只把一个好象疯子那样的人改变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还建议他加入示威游行。虽然那个小伙子不肯加入，他内心的变化是惊人的。这里发生的显然不只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个问题涉及阶级和阶级特征。那个反对示威的人瞧着排队走过的学生，心里是怀有强烈的敌意的。同一个他认出是跟他一样的人、一个退伍军人兼工人交谈之下，看来好象不可改变的反映就变成了同那些游行的人没有什么很大差别的观点。一个人随便形成的假设又一次证明是错误的了。

自由主义者已趋向于把蓝领工人对学生的敌意——对于“激进”战术，如占领大楼、焚烧国旗的一种反应——与蓝领工人关于战争本身看法混为一谈。但这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将会看到，工人阶级对嬉皮士和焚烧国旗的敌意并不是以与他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相同的那种假设为根据的。

在1964年初，民意测验表明，蓝领工人也许比任何地位较高的集团更其“反战”。甚至一些企图证明相反情况的研究



报告——认为工人是最反动的——都不得不承认，情形就是如此。有一小群自由主义者批评我们卷入战争，但主要的反对来源并不来自中产阶级。事实上，各阶层采取态度的情况很近似朝鲜战争的时候。那时，蓝领工人也更倾向于要求结束敌对状态。<sup>20</sup>

然而，战争继续下去，要找到任何对工人阶级意见的正确研究，就成为不可能了。从不同问题得出的答案，以及没有把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北部和南部分别开来的做法，使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持几乎任何一种解释。对于阶级和对于越南战争意见“统计资料”，从来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

然而，作为现存民意测验的一个例子，有 1970 年的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至少是把范围只限于北部白种工人，其结果如下：

1970年北部白人赞成立即(或在十八个月内)

撤回军队的百分比<sup>21</sup>

工人阶级	48.9%
中产阶级	40.9%

还有许多旁的研究提供了类似的比较，然而，它们虽然貌似动人，事实上，有能力的研究者还可以在那些资料的空白处开进一辆小卡车去。例如，有的资料说，工人倾向于选取“极端”立场，鹰派和鸽派都有，中产阶级则比较容易接受“支持总统”的呼吁。<sup>22</sup>

但是，各种各样的民意测验都不支持这一说法：工人都是主战的，中产阶级是反战的。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已经明显，各个社会阶级的大部分美国人都已非常厌倦战争，认为我们

早就不该卷进去。

其次，还可以怀疑，民意测验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但公民投票，这次是关于战争的，又提供了一些“现实生活”行为的说明。研究了六次公民投票之后，得出下列结果：

有三次（迪尔本，1966 和 1968 年；旧金山，1967 年），工人阶级居民区比中产阶级居住区更倾向于支持反对战争的公民投票。只有在旧金山那一次，黑人构成重要的因素。

有两次（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弗利山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在工人阶级地区和中产阶级地区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只有麦迪逊的熟练工人比较倾向于鹰派。

只有一次（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的结果是符合流行的老生常谈的。在那个城市，专门职业和管理人员居住区明显地比工人阶级地区对公民投票表示较大的支持。

这一研究报告的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对战争抱不赞成态度的，在工人阶级方面似乎比社会地位较高的那些阶层来得多。在大多数居住区，每当具有较低社会地位特征的投票人的比重增长时，反对战争的票数也跟着上升。”<sup>23</sup>

由此可见，就越南战争问题来说，那种老生常谈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证据再度表明，美国工人实际上可能比中产阶级略为不军国主义些，而不是更军国主义。

然而，这个结论似乎又难于和工人阶级意见的其他一些表现相协调，例如许多工人明显地作爱国主义的表演，把国旗图案贴在汽车上，在他们的大门上悬挂国旗等。

还有，甚至更难理解的是民意测验所清楚地表示出来的情况：工人们固然对战争本身并不热情，对于学生的抗议和示

威游行却反应强烈,确实怒气冲冲,叫人望之生畏。

下列一些从不同来源得来的测验结果,虽然肯定不能说是多么精确,但也许并不太错:

	<u>蓝领</u>	<u>白领</u> <sup>24</sup>
对于学生的示威游行抱强烈敌意(1970年)	50	30
认为学生的抗议和示威游行是不正当的(1970年)	62	53
认为学生的抗议是暴行(1968年)	43	—
认为焚毁征兵卡片是暴行(1968年)	(工会会员) 63	—
认为警察殴打学生是暴行(1968年)	45	—

在这方面,工人显然是不宽容的,特别在最后两个问题上,对这两个问题,多数人认为焚毁征兵卡是暴行,警察打学生反而不是。

这些统计数字所提出的问题是明显的。为什么有许多工人自己也反对越南战争,但对学生和学生的抗议又那么抱敌意呢?

许多评论者着重地提出“对于传统社会准则的威胁”以及“旧式的爱国主义和道德观念”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这二者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1968年,这种敌意达到了顶点,那时正是向美国工人宣布“公平待遇”二十年、即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在那时候出生的孩子到达大学入学年龄了,结果发现这个诺言已被背弃。上了年岁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孩子进了军队或工厂,大学则仍旧为中产阶级保留着。这样,当学生们开始罢课或烧毁国旗时,工人们最感到反感的是这样的事实:这些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而这些人正是使他们的孩子被送到国外去打仗的人

——因为学生具有 2-S (学生) 缓役权 (工人所得不到的另一个中产阶级优惠权), 他们是遭受不到危险的。最后, 当学生开始把警察叫做“猪”的时候, 这里又增加了阶级优越感和势利态度的最后一个因素。\*

一个工人描述他对学生的看法如下:

我有一个儿子, 我的最小的儿子, 在越南。他得不到机会。他不能用进大学的办法躲过这一关。他说, 所有在那里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他们是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出身的, 他们之中有许多对于拉他们到那里去打仗恨得要命, 后来被打死了。他们就是得不到大学里的孩子的那种幸运。

当然, 我的孩子是愿意尽他对国家的责任的, 如果他必须尽的话。我也是这样想。可是, 我们想不通的是, 那些戴着珠项链<sup>①</sup>的

---

\* “猪”这个词作为警察的浑名在六十年代流行于学生中间, 是美国至今还存在的阶级偏见的一个触目的例证。虽然六十年代大多数“激进派”学生会否认他们使用这个词是中产阶级对于一切工人的优越感的表现, 工人们却清楚地认识到这究竟是什么。

“猪”这个词一直是上层阶级嘲笑穷人的一种侮辱称呼, 这是因为猪的形象是在污物中生活, 吃泔水, 由于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而长得特别肥胖。

这些特征并不与学生对警察行为的批评有关。并非偶然, 在三十年代当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时, 不论公开或私人之间, 他们把警察叫做“暴徒”、“恶棍”或“雇来的猩猩”而从来不说“猪”。同样地, 在其他国家, 如墨西哥, 农民和工人要找一个比喻来描写政府凶恶的别动队时, 他们选取的词是 *halcome* (兀鹰)。这些形象很好地表达了普通老百姓对于官方当局不公正行为的真正批评。但“猪”这个词与警察的非法行为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有优越感的人高高在上地用来说下层阶级缺乏教育和“文化”的一种侮辱称呼。学生也许自己也不明白他们的这种动机, 但工人完全清楚地知道其中的道理。警察往往是他们的邻居或亲戚, 如果警察是“猪”, 他们也是“猪”了。(黑人区的黑人也用“猪”这个词, 但这个词具有根本不同的含义, 那是穷人用来指社会阶梯上在他们之上的人的, 如“有钱的猪”这种通常的说法。)

① 美国宣扬和平和博爱的“嬉皮士”喜欢戴的一种象征博爱的装饰品, 他们自己称之为“博爱珠”。——译者



孩子——从漂亮的郊区来的阔孩子——当我的儿子不得不上那儿去而且可能会掉脑袋的时候，怎么都能躲过的呢。他们安然地躲过了……后来，当他们看到他们快要从大学里毕业，也可能被征去当兵的时候，他们就捣起这种乱来。”<sup>25</sup>

这样，阶级问题又纠缠到工人阶级“反应”的这一领域里来了。工人当时是有所“反应”的，但主要是针对着这一事实：他们的孩子上越南去，中产阶级的孩子则进了大学。似乎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人关心到这一具体的不公平状况。

#### 四

1972年的选举也已被援引作为蓝领工人中掀起的保守狂潮的证据。乔治·华莱士明显的号召力以及尼克松引人注目地夺到一些蓝领工人选票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指出是工人政治立场基本上向右移动的表现。

关于1972年选举以及为什么它会得到那样的结果的详细讨论，必须留到后面一节讨论。但是，蓝领工人日益增长的不满、劳工队伍结构的改变以及自由主义者的战略本身，都在华莱士和尼克松的稀有现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决不是工人的态度不知怎么自发地“右倾”的简单问题。特别是最后一点，即自由主义者战略中的错误，是工人阶级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还有另外几点必须在这一章里提出，这只是因为从选举中暴露出来的真正变化在自由主义者有几部分的成员中被荒唐地夸大了，从而造成了一种人心惶惶的图景，似乎出现了一种来自美国工人阶级的法西斯威胁。



例如，有一位作者这样总结了那次选举：

……只要“中产阶级社会”英勇地坚持它的种族隔离，它的军国主义，以及它那不屈不挠地维护贪污腐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其他卑劣作风，〔麦戈文〕就不大可能成为麦戈文，也不大可能是圆通随和的——至少在结果上说是如此。有些预言家，特别是约翰·加德纳，曾经宣布中产阶级社会漠不关心态度的结束，但在选举前的阴暗日子里，漠不关心态度之所以看来似乎已经过去，只是因为它被一种更坏的事情、即积极维护中产阶级社会一切最坏的罪恶的行径所代替了。<sup>26</sup>

但是，这是真的吗？投尼克松和华莱士的票是冷酷的事实。但是，说工人已全部变成反动派的结论则不是事实。的确，我们至今所看到的材料是与这种说法相矛盾的。虽然它已表现出真正的种族主义，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反动的工人”和宽容的优秀人士。

例如，投华莱士的票，的确是一种反动的迹象，但甚至在1968年，人们就已经看出，在种族主义之外，他还巧妙地掺进了一种“人民党的”或说得更确切些一种“有级阶意识的”迎合工人不满情绪的号召力。他说：

那么，在合众国的这些州里今天存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是假知识分子政府的倾向，在这种政府里，有一个精选出来的优秀人物集团写出了官署里的指导原则和法庭的裁决，他们从一些讲坛上、一些大学校园里、一些报馆编辑部里发表言论；他们看不起街上的老百姓、玻璃工人、钢铁工人、汽车工人、纺织工人、农业工人、警察、美容师、理发师、小商人；他们对这些人说，如果我们不给你们拟定一个指导原则，你们连早上怎么起床、晚上怎么睡觉都不知道……<sup>27</sup>

即使在评论员集中注意到他打进北部的时候，他在 1968 年所获得的工人阶级支持仍旧绝大部分都在南部。(他只得到百分之八左右的北部工人阶级选票，他的最大支持来自南部的小城镇和农业地区。)<sup>28</sup>

斯卡蒙和沃顿伯格在事实上已经指出，华莱士的真正问题是人们看出他在种族问题上过于偏激，这损害了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号召力。他们说：

……当竞选渐近结束时，人们越来越看出华莱士是个地区性的候选人，并且是一个不会有效地处理法律和秩序问题的人。总之，华莱士走到离社会问题太远的一边去了——如果美国人民想要秩序和结束混乱，他们也不会想从一个被发觉为极端派或种族主义者那里达到这一目的。<sup>29</sup>

这话符合我们从北部工人那里听到的反应，那就是，固然华莱士“说了一些真正漂亮的话”，他是“太偏激”了，实际上不会得到他们的选票。

然而，在 1972 年，在他被人打死以前，华莱士确实似乎比在 1968 年时有力量得多。虽然没有人作过十分精确的计算，他确赢得了某些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多数选票，或者往往是获得了有份量的少数票。

但是，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华莱士的内心深处曾改变了他的种族隔离主张，他在 1972 年的公开言论却与 1968 年大不相同了。

他小心谨慎地避免说出露骨的种族隔离甚或“种族主义”的言论(这里说的是纯粹意义上的那种“种族主义”，主张黑人生来是低等的，或是说，不配享受基本的民主权利，而只能受

到对付未指明的“犯罪分子”那样的巧妙对待)。在竞选期间，他宣称他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但他也声称赞同在学校里取消种族歧视。当匹兹堡的黑人企图参加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时，他替那些排斥黑人的工会辩护，说它们知道“各种种族的人都有权工作”，说它们“遵从国家的非种族歧视的雇用政策”。他说，他只关心“不够格的”工人的问题。<sup>30</sup>

这当然没有使他的种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同他疏远，因为他们知道，“老乔治”使用这种手段时只是在玩弄政治手腕。

但这却帮他获得了数目大得多的工人，这批工人曾认为1964年甚或1968年的华莱士的观点“太偏激”了。请看一看《纽约时报》关于1972年投票选举华莱士的一个蓝领工人的下列描写：

……杜威·伯顿，二十六岁，矮小而结实，嗓音沙哑，笑的时候露出有缝的牙齿……他的工作从早晨五点五十二分开始，那时第一辆汽车在装配线上在他面前移过。他说在他地方基层工会当主席的那个黑人是“我们有过的最好的主席”。对于他的儿子戴维跟黑人同进一个学校他没有意见；如果有一家黑人搬到他住的街区来，他也不会反对。他相信，他们会比街角上那些靠福利金生活的白人更好地照料他们的家，那些白人的行为才让他恼火。

但他竭力反对汽车接送学童。甚至不愿让几个黑人孩子单程搭乘三个街区路程的汽车到他儿子的学校里去，他说，“我的孩子决不会为了取消种族隔离同黑人一起搭车到底特律或任何别的地方去。汽车接送学童是我关心的唯一问题。那是这次竞选中的最大的问题……”

……但他也坚决表示，“如果有一对黑人夫妇在这里买了或租了一幢房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戴维他们的学校去上学，并且交付

税款,那就很好。”

……1968年伯顿先生投的是休伯特·H. 汉弗莱的票,认为他是“从罗斯福民主党人那条长线上下来的”工会工作者。……他的岳母维奥莱特当时倾向于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的华莱士先生,但伯顿先生把华莱士叫做“种族主义者”,劝她跟他投一样的票。

……伯顿先生没有当过兵,“丝毫也不关心战事”。

“这从来同我没有关系,”他说。“我关心的是人被杀死。这次战争结束了,还会有另一场战争。也许这只是因为战争可以使大工业维持下去,使人们有职业。”

“你瞧,我们正在打一场内战。你在新闻片里看见三十个越南人从一条马路上跑来,你却不知道他们是朋友呢还是敌人。”

伯顿在11月7日投了票。他勉强地选择了乔治·麦戈文。“我确实不认为麦戈文会获胜。可是,如果我们投了他的票,我们也许可以表示给尼克松看,我们需要什么,工人需要什么。”<sup>31</sup>

杜威·伯顿无疑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投华莱士票的人,但有几百万象他那样的工人在1972年给华莱士增加了选票,这些工人并不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他们也并不维护“美国中产阶级社会最坏的罪恶”。

蓝领工人投尼克松的票,也不能看成是工人现在与“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相比已是可怕的保守主义者的证据。

在尼克松争取到工人阶级的选票时,人们表达出来的震惊和恐惧,实际上大都是以许多评论员认为“工人愚蠢”这一偏见的变种为基础的。有这样的设想,认为在每一次选举中中产阶级对于各种问题都会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工人则“在传统上是属于民主党的”。(换言之,他们太无知,不会看报,不会每四年一次决定他们要谁当总统。)所以,连工人会不再



投民主党人的票这一看法都被人当作欺人之谈。工人应该保持安静，乖乖地投票，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属于民主党的”。

但是，在选举那天，人人都在作出选择，工人每次投票时确实都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充当总统的人。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谁提供了最大的支持——谁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问题本身作出了回答。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得到了工会会员家庭的选票百分之五十四，即一半多一点。然而，上层中产阶级、即专业人员和工商业者给了他百分之六十九的选票。甚至受过大学教育的“宽容的”自由主义优秀人士，就是一直被人描写成偏见的汪洋大海中理智的孤岛的，也给了数目惊人的百分之六十三的选票。即使我们把黑人在工会会员中所占比例比在较高类别中为多这一事实计算进去，那也不能推翻阶级与对尼克松的支持之间的这种基本关系。<sup>32</sup>

最后，被许多评论员指出的一个事实必须在这里再提一下。“保守的”蓝领工人给尼克松的选票并没有越出总统竞选的范围。当工人转向国会议员和国家机关人选的候选人时，他们仍旧投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票，表示被否决的只是候选人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

1972年10月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事实上使人们看出，如果爱德华·肯尼迪当候选人，他会获得蓝领工人选票的半数以上。在那次调查中，麦戈文得到百分之四十四，尼克松则得到百分之四十九。但在肯尼迪-尼克松竞选中，肯尼迪获得工人阶级选票的百分之五十三，尼克松仅得百分之四十一。



由于黑人几乎一致投麦戈文的票，这百分之十二的变化是由下一情况造成的：白种工人表示，只要候选人合他们的心意，他们继续愿意投“自由主义者”的票。<sup>33</sup>民意测验工作者路易斯·哈里斯也作出下列结论，虽然他使用的是不同的分析方法：

选举后完全没有迹象表明，尼克松的当选反映出选举人方面的一种深切而持久的愿望，要求集中力量处理那些以犯罪、放任政策以及对改革的抵制等问题为中心的所谓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问题”。<sup>34</sup>

## 五

本章所举的证据全部可以归结成一个结论。认为工人是人口中最保守的部分这一看法，正如认为工人是个富裕的阶级这种看法一样，根本是一个神话。虽然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存在，工人在许多问题上却并不比中产阶级坏，或许还要好些；并且，促使他们反对黑人和学生的那些问题之中，也没有一个是来自任何“不可避免的”保守主义的。我们后面还要更仔细地讨论选举问题，但这里必须指出，固然选举问题对于民主党人来说曾是一种不幸，真正的危险却在于人们可能会从中得出不正确的教训。

目前，情况似乎正是这样。民主党关于怎样夺回他们失去了的蓝领工人支持的问题，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内部的纷争。但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为了赢回蓝领工人，我们得向右走多远；为了在下一次把一个民主党人弄进白宫，自由主义者必须从他们帮助黑人和反对战争的目标后退多远？”

我们在这一章里所看到的每一件事都表明这是错误的。在种族和军国主义问题上，工人并不是盲目地反动的。他们最最恼火的是他们的合法需求遭到忽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是阶级不平，是美国政治惯常给予他们“不公平对待”的那种方式。

所以，决不是企图走向尼克松的右边，那是已经很有经验的工人所不会接受的，并且无论如何也是近乎不可能的；从民意测验和公民投票都可以看出，所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向前挺进。如果自由主义者能解决一切工人阶级、黑人和白人、工作上和社会生活上的需求，而不是盲目地支持那些常常损害白种工人而让富裕阶层全然无损的方案，那么工人自然会有所报答的。同样，为了赢得工人阶级的选票，不需要把军队和钱送到地球上所有的傀儡独裁政府那里去。工人反对这样做，象中产阶级一样。另一方面，还是不要再做出那些趋于极端的行爲，如把他们的邻居叫作“猪”或支持杀死他们孩子的军队的胜利吧。最重要的是，如果自由主义者照顾到我们在前两章里所说的问题，资料表明，工人自会提供他们的支持。参议员弗雷德·哈里斯要言不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只要进步不是只对别人有好处，对他没有好处，那么蓝领工人是会继续进步的。”<sup>35</sup> 这一直是蓝领工人心怀不满的主要根源，在它有所改变以前，将继续如此。

前面已经引述过的戴维森教授，以下面一段话概括了他的研究结果，这段话既适用于他在那里进行研究的南部，也适用于整个美国。

那么，归根到底，未来的南部政治形势主要要看候选人有何贡

献。我们已经指出，许多较不富裕的白人会投黑人所投的候选人的票，只要这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也符合他们的正义感。南部白种选民中有一大部分愿意接受进步的改革。候选人如果对这一事实不加考虑，那就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自己了。<sup>36</sup>

## 第五章 工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 —

无论如何，工会将是决定工人在今后的年代中扮演什么角色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它们从来也不能命令工人们应该想什么或做什么，但是和工会比起来，在对工会成员的生活和观点的影响方面，其他机构是望尘莫及的。

有一个时期，这种影响是被自由主义者基本肯定的。虽然在三十年代的工会中，有很多可以批评的东西，自由主义者却认为工人运动、特别是产联，是社会中最进步的力量之一。但在近几年中这种看法已经明显地改变了。种种问题，从三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消失，到工会内部的腐化、缺乏民主和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对于那种肯定看法的信心。

自由主义者所作的批评大部分是有根有据的。上面讲到的几个问题，并不象“富裕”或“权力主义”的概念那样是一些具有恩赐意味的神话，而是冷酷的现实，并且，一些最强烈的谴责事实上并非来自工会外面的工人，而是来自进步的工会会员本身。

但是，这些缺点连同象工会支持越南战争这样的事件，使得很多人得出结论：工会不仅背离了它们的理想，而且已经断然地从进步方面转向反动方面。

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系列关于工会问题的作者们指出的那样：

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往往认为工会是美国最反动的力量之一，是一个只关心金钱和维护现状的特殊利益集团。<sup>1</sup>

这种观点突出地说明工人和管理人员已经基本上变成一丘之貉。例如，杰夫·格林菲尔德和杰克·纽菲尔德在《人民党宣言》中宣称，“的确，观察工人和管理人员有时就象观察奥韦尔的《畜牧农场》里的猪和人一样，你说不出彼此有什么区别。”<sup>2</sup>

这种观点显然把工会看作美国社会中一支基本上保守的力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以尊重工会运动的“最好传统”或“基本理想”的言论来保卫那个辛辣的结论。但是，如果人们甚至不能把进步人士认为是保守的企业同工会区别开来，那么工人运动就显然是一支基本上保守的力量了。

如果这种观点有事实作为佐证，未来的前景就会显得异常暗淡。但是很幸运，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尖锐地批评美国工会的缺点，指责它们背离了它们自己的理想，同时又全然否定它们客观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这种看法。固然，谁要在美国寻找象中国红卫兵那样的组织，都会深感失望，但是，用现实的和实际的眼光来看问题，工会的作用在美国政治和工人日常生活这两方面都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在不少重要的地区里，我们都能够证明工会是美国社会中最进步的力量之一。

但是，在能够证明这一点之前，还需要稍为看一看工会的日常工作和它们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因为，象在工厂里的生活一样，工会的日常工作的多半是外人所看不见的工人阶级生



活的一部分。

当我楼下的邻居沃尔特敲门时，我正在看电视。

“怎么啦？”我一边让他进来一边问。

“他们又干了一次。这回老头儿布雷德利没拿到他的加班工资，所以我得打个电话给代表，可是我的电话坏了。”

他那庞大的、灰熊般的身体几乎把门框都塞满了，所以他进门时我得让到一边去。沃尔特原来出身在青脊山，不过他那锐利的目光和机敏、轻松的笑声却不象南部山里人的样子。

他本来在一家汽车公司里当柴油机技工，但他现在的职位却是在那个雇用着他的汽车修理厂里当十多个人的车间工会代表。

“你认为这是故意的吗？”我问。

“嗯”，他慢慢地说，“也可能只是搞错了，但这是第二回啦，我想他们也许是想耍我的好看，借此摆脱工会。”

“你真是在给一些可爱的人服务了，”我讽刺地说。

“一伙地道的狗仔子，”他回答说，同时拿起电话筒。

他所指的那个“代表”是工会的地区代表，负责许多类似沃尔特在那里工作的那种小厂。工会总部在北边另一个城市里，乘汽车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在日常工作中，沃尔特是这个工厂里唯一的工会代表。

象所有的车间工会代表一样，沃尔特不从工会拿薪水。但是他在发生问题时有权放下手里的活，挺身而出

同经理辩论或提出申诉。一个声音通过电话线传过来了，于是沃尔特开始向代表叙述问题，并时常停下来倾听他提出的问话。

“真见鬼，不错，我不能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故意的，但我敢打赌他们是故意的。我是说，就算这是个偶然事件，那他们也不应该老是骗人吧，是不是？”

我听着的时侯，把手伸过去，从沃尔特的后裤兜里抽出那份很破旧的合同副本，开始从头到尾地翻阅。我记得，当沃尔特最初当选车间代表时，我们曾用了一个晚上把它看过一遍，并尽力去理解复杂的法律语言。从那时起，沃尔特就一点一点地在文件的旁边空白处记下一些意思隐晦的按语，比如在他的受保护的权力那一段旁边，有这样一条，“对 SS 不得 f”<sup>①</sup>。我看出 SS 无疑是指车间代表，对于他那简洁的解释，我忍不住马上笑了起来。

沃尔特结束了谈话，挂断电话。

“有什么可笑的？”

“下一次合同该由你写，”我边说边指给他看那一段，“我更喜欢你的说法。”

他微微一笑，把合同放回口袋。

“代表说他明天就来。那该使他们有点心惊肉跳了。”

“给他们点儿厉害看，”我说。

“我正打算这么做，”他边回答边跨出门去，下楼回他的房间去了。

---

① 如下面所说，“SS”表示“车间代表”，“f”可能是指“开除”。——译者

离我楼下的邻居一千哩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钢铁工人地方基层工会的办公处。我坐在那里的那个办公室还算大，但是四张写字枱和十多个转来转去的工人让人觉得它还不如一个电话间宽敞。工人们在同显得不公平的管理行动进行斗争时，就到这个房间里来寻找工会的支援。

坐在我对面的是地方基层工会的黑人副主席，申诉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正在向电话里说话，越说越恼火。“你瞧，”他说，“我收到了选举大会的一张条子。一百零九人出席并投了票，可是有人算了八小时的时间损失。现在我不管他是不是掰着他那些该死的手指头算的，把一百零九票加起来也用不着花八个钟头。我要把这件事提交给执行委员会。”

谈话继续着，变得更尖锐一些，但还是重复着同样几点。我开始倾听排成队的那些人逐一向那专门负责他们那样的问题的粗壮汉子解释他们的申诉。

首先是个一头金发、留着山羊胡子的年轻漂亮的家伙。他顶多只会是二十五岁，讲一口带着浓厚的东欧口音的英语。

“我当过三次电铲操作工了，”他说。“可是那个监工，他说我没干够……”这时有人开门进来，开始同房间另一头的一个人大声交谈，余下的话就听不清了。

行列中的下一个是个年轻的黑人，穿着长长的黑色外衣，戴着一顶在我国很多地区成为嬉皮士流行样式的编织的便帽。工会的人很熟悉他的问题。这个年轻的黑

人几个月前就曾提出过一次申诉，并在一位仲裁人干涉下获得了胜诉。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怀有敌意的监工的目标，好几次险些被开除。现今他又在他最近一次的工资单上发现了一个错误。

工会的人安静地记了下来，然后打了个电话。他转向那个年轻的黑人，建议他们首先跟预谋中的解雇作斗争，然后再去管工资袋里的错误。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哪种策略更好些之后，他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个年轻的黑人高高兴兴地走出去，他的引人注目的服装达到了它的目的，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

他后面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白种人，穿着一件滑雪紧身上衣和一双厚胶靴，要求在工厂里干点什么活儿。

他的问题是，是否可以把他提升到另一班里去补一个空额。这个“申诉干事”很快地翻阅了一下在他桌上放着的两大本簿册之后，同意说他是合格的，并答应和监工去联系一下。这个人站起身来，在离开之前说了一句“谢谢你”。工会干事向他报以微笑。

## 二

在理论上，谁都知道工会并不是政党，也不是象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联盟那样的“事业”团体。可是在实际上，许多争论都那么完全地集中在工会活动的政治或立法方面，以致看起来工会就几乎象是政党或“事业”团体了。但工会基本上是地方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为给它们的会员争取具体利益。要这样去了解工会，那就是，首先着手了解的地方不是在劳联-

产联的华盛顿总部里，而是在往南几百哩地一个低工资的、最近才有工会组织的工厂里；我们应当去倾听的第一个人不是劳联-产联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前面提到过的车间代表沃尔特，听他来描述在他们组织工会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老是把人调来调去，只要他们想那样办，就强迫加班加点。有一次我一口气干了九天，一天干两班，因为他们缺乏人手。如果最后那天他们没有弄到人，我就要辞职不干了。

和我们一起的一个人已经在那儿干了大约十年，他做梦也想被提升为机械工。可是当那儿有了个空缺时，老板却把他兄弟的女婿安置到这个职位上。这小子让那家伙的女儿怀了孕，不得不和她结婚，于是老板就给了他一个工作。

这是第一个合同。它里面有许多错误，这些我们下一次再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有了一些规定。现在当他们胡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跑去说，“现在这可不行。”他们也得把你当个人对待。在组织工会之前，如果我那样说，他们就会叫嚷，“拿着你的衣服滚出去。”可是现在他们明白，如果他们胡来，站起来走出去不干的就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他妈的工厂了。

工会还为工人们商订了一个养老金计划和略微增加工资的办法。经济上的好处是微小的，但是，正如沃尔特所说，“第一个合同里主要的事情不过是建立工会。签订第二个合同，才是认真考虑事情的时候。”

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各工会得到的好处很不平衡，但当它们“认真考虑事情”的时候，它们普遍给自己的会员争取到重大的利益。例如，劳工部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蓝领工人工会会员平均[收入]……比与他们地位相同但未入工会的人多大约二千美元。”<sup>3</sup>另一个比较——那是有名气的报刊上很少



见到的一次比较——指出工会会员显然比可资比较的非会员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某些工业部门中高到百分之四、五十）。此外，这篇文章指出，他们有更好的附加福利待遇，如假期、较好的保健和工作提升规定，还有申诉办法。它得出结论，“好处多于坏处，这好象没有什么疑问。”<sup>4</sup>

除了具体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些不大能用数字来表达的利益，比如当“他们必须把你当人看待”时所产生的尊严和独立地位。

有的时候这些东西会比具体利益更加重要。如旅馆和餐馆雇员工会国际副主席迈拉·沃尔夫冈所说：

我得出结论，那些加入工会的〔较年轻的餐馆工人〕之所以加入，是因为他们愿意身边有个把老板叫做狗崽子的人。他们心痒难熬地想叫他狗崽子，可是他们不敢叫，因为他们想要那笔额外的钱。于是他们就在工会里找代言人。因此，我的公开态度就得是做一个捣乱的总头头。<sup>5</sup>

孟菲斯的垃圾工人——马丁·路德·金就是在他们的罢工中被杀害的——选择“我是一个人”这句口号来表示加入工会对他们的好处，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工会就是把民主带进美国工业界并使工人摆脱从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完全无权地位的唯一力量。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他们最基本的任务、即为会员争取具体的改善方面，工会通常都很尽职，并且往往干得很出色。它们起到了深远的积极作用。

在美国，地方基层工会之上有各种全国工会一百八十五个。虽然有些很大，多数却规模很小，这些小工会大部分隶属

于劳联-产联这个联盟，但就是在这里面，它们也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十四个有势力的大工会拥有的会员总数超过美国有组织工人总数的一半，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会的会员数都不到五万人。

### 不同大小的工会数<sup>6\*</sup>

工会的会员数	拥有这个数量会员的工会数	
1— 50,000	112	} 占工会会员总数的47%
50,000—200,000	46	
200,000—400,000	13	
400,000—2,000,000	14	占工会会员总数的53%

\* 二十个最大的工会及其会员数开列如下：

#### 二十个最大的工会，1971年<sup>7</sup>

工 会	会 员 数
1. 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	1,829,000
2.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	1,486,000
3. 联合钢铁工人工会	1,200,000
4. 国际电力工人兄弟会	922,000
5. 国际机器工人工会	865,000
6. 木工工会	820,000
7. 零售店员工会	605,000
8. 国际劳工工会	580,000
9. 混合切肉工人与屠宰工人工会	494,000
10. 旅馆和餐馆雇员工会	461,000
11. 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	444,000
12. 妇女服装工人工会	442,000
13. 服务业雇员工会	435,000
14. 电讯工人工会	422,000
15. 工地技术员工会	393,000
16. 服装工人联合会	386,000
17. 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	325,000
18. 管工和管道安装工人工会	312,000
19. 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	300,000
20. 乐师工会	300,000

然而，比工会大小更加重要的是产业工会和熟练工人工会之间的区别。熟练工人工会常常被指出是工会运动中的保守派，但这并不一定说明熟练工人工会也是本质上有所不同的一类劳工组织。

一个产业工会把整个的工厂、车间或已雇有工人的其他工作场所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一个熟练工人工会则把具有某种技能的个别工人组织起来，除了工资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以外，这种工会还必须主要关心保证它的成员能找到工作。

这个基本的区别导致了一个关键性的后果。按照产业工会的本质，它趋向于把工人们联合起来，使他们集体地与公司对抗。对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等要求，都使工人的需要和公司的需要对立起来，而不是使工人同工人相对立。特别是在战后时期，当很多公司都不再使用工贼，并以稳定的办法按工龄长短来决定在萧条时期解雇哪些工人的时候，三十年代存在于工人之间的许多主要冲突根源就都消除了。

熟练工人(特别是建筑工人)一般都没有永久性的工作。工会在完成一项计划时刚向他们调查了不多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他们就又失业了。

所以，以参加工会的木工为例，他们就不能长期地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大雇主。他们反而从其他蓝领工人那里受到最直接的威胁。有如我们所看到的，失业是一个主要问题。在1970年，有百分之三十的木工在这一年的某个时期是失业的。<sup>8</sup>

其结果是，建筑技工不但不能发现与其他工人的共同利益，反而往往陷于与同行工人对立的地位。例如，在非常现实

的意义上，一个管子工与一个小店铺业主的共同利益倒比他  
与装配线工人这样典型的“无产者”的共同利益多一些。

在过去有好多年，当 they 有足够的的工作的时候，这种冲突  
就由于一种非正式的休战而平息了。在这休战期间，加入工  
会的技工修建了一些最大的建筑物（这样的工作比较受人欢  
迎，因为它们保证了比较长期的就业），而那些非会会员工人却  
干些较小的工作，包括绝大多数的一家独用的住宅。\*

然而，在近几年中，这种休战状态被破坏了，许多承包人  
已经转向非会会员工人，甚至象旅馆和商业大楼那样的大工程  
也是如此。<sup>9</sup> 同时，预制构件和油漆喷雾器之类的革新也减少  
了某些工作所必需的人力，淘汰了其他一些人力。

这些变化是建筑业发生很多骚乱的基本原因。接近于大  
打出手的严重冲突，虽然还不是那么有名，却已经在会会员工  
人和非会会员工人之间出现。佛罗里达州有很多正在修建的工  
程，那里传说发生一些殴打和有人遭受重伤的骇人听闻的事  
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普鲁士市，一些非会员承包人宣称，有  
一千多名费城工会会员参加袭击一个承包人的设备和建筑，  
造成三十万美元的损失。<sup>10</sup>

要求各建筑工会保证给予会员以工作的压力，也导致这  
些工会互相争斗。有时，比如管道安装工和勤杂工这两个工  
会都声称有权从事某些工作，结果就引起那种关于权限问题  
的罢工。不但工会和“工贼”之间有冲突，在各个不同的工会  
之间也已发生过冲突。<sup>11</sup>

---

\* 因此，当人们把他们的房屋造价太高归咎于工会时，建筑工会是有理由  
感到愤慨的。

5

这种同样的压力也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担任闲职”的情况，那就是，工会强迫承包人雇用不需要的劳力，使它们的会员不致失业。

从基本上说，建筑行业还遇到三十年代最不易解决的问题。普遍的工作不牢靠的情况造成严重的关系紧张和冲突，而这些在工人和经理部门之间却不如在工人和工人之间出现得那么多。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基本现实影响着熟练工人行业的种族政策，内部事务和政党关系。

但是，至于说到工会在全国舞台上所起的政治作用，那么主要的力量是劳联-产联，在美国的一百八十五个工会中有一百二十个隶属于这个联合组织。

顾名思义，劳联-产联的中心问题也许就在于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工会，而是一个联合组织。正如一个工会职员所指出的：

劳联-产联并不出面谈判合同或处理申诉问题。它的基本作用是政治性的，对立法进行院外活动，支持候选人等等。它也在关于权限问题的争论中充当仲裁者，并做一些调查研究和其他事情，但它大部分的精力是用在政治上的。<sup>12</sup>

虽然一些最大的全国工会都在政治舞台上独立活动，大多数工会却只有有限的活动范围。如另一个工会职员所说：

工会能够起到的政治作用委实非常有限。因为人们摸不清工会是干什么的，他们以为我们能把全部时间都用在政治上，其实我们的办法实在非常少。我们主要应该对我们所代表的工人们负责，管理养老金基金，保证它处理得当，经办一些申诉和合同，并办理我们的其他工作。因为美国没有工党，人们有时候就希望工会来



充当那个角色。但是工会没有能力，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那种事。<sup>13</sup>

我们将会看到，这与美国工会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讨论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乃是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污点。

### 三

工会种族主义和对黑人不公平的证据是很明显的。如同美国社会的其他许多部门一样，工会也犯了严重歧视黑人的罪行。但是，要想理解所涉及的问题，有必要把产业工会和熟练工人工会分开来考察。

在工业中，黑人获得加入工会的许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指出，如果产业工会希望得到任何力量，它们必须依照它们的性质，把一个工厂或车间里的每一个人组织起来。甚至在三十年代，人们就认识到，把黑人拒之门外而建设起一个有生命力的工会是不可能的。单就会员问题而言，产业工会是美国最没有种族隔离的团体。

但是，黑人们在提升和获得工资较高的需要技能的职业方面是确实遇到问题的。1971年，黑人在工业中只获得百分之五点四的需要技能的工作。<sup>14</sup>

产业工会有一个在理论上民主的工龄制度。在好几个有能力做一种需要较高技能的工作的人中间进行选举时，工龄制度就有规定，为这家公司工作时间最长的那个人将被选中。

但是，一个大的工业工厂往往分成若干部门，工人的提升就只限于在他们那个部门中有缺额的一些较好的工作。一个

部门与另一部门相比,提升的机会可能有很大不同,黑人时常被骗去做一种实质上是不可能提升的工作,这种工作往往是工资最低而且是最脏的。例如,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一个纽约分厂里,联邦上诉法院发现:

这是美国北部职业上典型的种族歧视的一个缩影。分配工作的做法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黑人工人被分派在十一个包含工厂中较热和较脏工作的部门中。黑人被排除在工资较高和较干净的工作之外……公司与工会之间在1963、1965和1968年达成的全国范围的协议中,包含着普遍而又长期的公然表现种族歧视的录用工人和分配工作的做法。<sup>15</sup>

虽然如法院所指出的,在工会和公司之间的共同协议中规定了工龄制度的一些种族歧视办法,我们还应当指出,从四十年代以来工会一直没有能够对各个部门雇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进行任何直接控制。固然它们默许种族主义,但作出导致今天不公平状况的具体决定的,却是人事负责人和工头们。

在需要技能的行业中,情形就不同了,黑人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加入工会。如下面那张图表所示,在很多例子中,黑人会员的数目都非常少。但是,一般人错误地认为:这种歧视是由于想同黑人分开的简单愿望;工厂工人由于某种原因能够同意与黑人一起干活,建筑工人却不能这样。常常有人说“经济”问题掩盖着单纯的种族主义,这种说法也根本是错误的。

在大多数建筑工地上,你会看到黑人在搬木头或干其他的苦工。他们是黑人在其中占很大比例的非熟练工人的国际劳工工会的会员。他们或多或少和工厂工人一样同白人在一起工作。相处的方式从十分愉快的谈话和打趣,直到怀有真

<u>熟练工人工会</u>	<u>会员数</u>	<u>黑人所占百分比</u> <sup>16</sup>
机械行业:		
锅炉制造工人	138,000	4.3
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	921,000	1.8
管工和管道安装工人	311,000	1.2
钢铁工人	177,000	2.0
金属薄板工人	120,000	1.0
其他行业:		
木 工	820,000	3.6
工地技术人员	393,000	3.7
油漆工人	210,000	3.7
泥水行业:		
砌砖工人	142,000	7.4
抹灰工人和混凝土泥水工人	68,000	18.3
盖屋顶工人	24,000	16.8
杂 工	580,000	28.5

正敌意的偶然事件，他们的态度一般是冷淡的但又是互相容忍的。在报纸上关于黑人在建筑工地举行示威游行的描述中，我们常会碰到一两句形容黑人杂工在越过纠察线时所面对的为难处境的话。

然而，如同在产业工会中一样，黑人被排除在高工资的需要技能的工作之外，而集中在不需要技能的杂工的工会和“泥水行业”——需要技能的建筑工作的最低一级——中。产业工会和建筑工会之间的区别是前者的黑人比后者仅仅多百分之二。我们前已提到，工业中有百分之五点四的需要技能的工作为黑人所占有，与之相比，建筑行业中却只有百分之三点三。事实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今天仍然是美国工会运动在实现其理想时所遇到的最可悲的失败。

但是，为了正确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证明三个论点。第

一个是由帕特里夏和布伦丹·塞克斯顿——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中两个进步的工会工作者——提出来的，这就是，“甚至在排挤黑人最厉害的木工工会中，黑人会员也占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这比北部大多数大学院系中黑人的比例还高些。”<sup>17</sup>

第二点，如果进步人士不能认真对待充分就业和政府保证工作的原则，黑人参加需要技能的工作的问题就一定会变成这种情况：比方说，为了雇用一个人黑人，就得使一个白人木工失去他的工作，或者得让一个波兰人去管理焦炭炉，才能使一个黑人得到较好的工作。于是这个白人木工就得靠救济金过日子，而那个波兰工人就得代替那个黑人得癌症（焦炭炉管理工常常会得癌症）。

这不是作为一个反对种族公平的论点提出来，而是要表明其中的一些困难。我们已经看到，黑人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较大的阶级不公平问题的一个部分。当种族公平原则要求黑人不遭受失业的打击时，彻底公平的原则却要求任何工人都不应由于节约措施认为他没有价值而遭受这种打击。终止工会中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这一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争取结束黑人的失业、低工资和贫困的斗争，则是一个必须由美国经济体系而不是单独由工会来提出的要求。\*

最后，黑人在工会本身内部所起的作用和所得的待遇比

---

\* 关于白人工人在这一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有些人表现了一种自我欺骗和与现实缺乏接触的倾向，那会使一般头脑容易冲动的年轻人感到嫉妒。例如，1971年的劳工部部长霍奇森把增加黑人名额的“唯一”结果说成“某些白人雇员的前程的……毁灭”。<sup>18</sup> 把这种巧妙的委婉说法翻译成基础英语，意思就是：去干低工资、坏条件、象看焦炭炉那样最容易得癌症的工作的，将不是黑人工人，而将是白人工人了。成为不公平的是工作本身，而不是干这工作的人的肤色。但是“某些白人雇员的前程的毁灭”这句话却巧妙地回避了这个现实。

他们在熟练工种方面的待遇要好得多。帕特里夏和布伦丹·塞克斯顿还指出：

虽然他们的代表人数是不足的，黑人已经在工会中比在任何其他社会团体中赢得了更大的势力。为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和库克县的城市联盟进行的一次关于黑人无权力状况的研究，发现工会拥有的黑人政策制定者的百分比（百分之十三）比任何其他私人团体都大。在往往拥有大量黑人的福利和宗教组织里，制定政策的职位中只有百分之八为黑人所占有。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激进学术观点的堡垒）中只有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的代表……大学里三百八十个制定政策的职位中只有五个为黑人所占有。

在四分之三的前产联的地方基层工会里，领导人员中都有黑人代表。在五分之二的前劳联地方基层工会里，没有黑人代表，但三分之一的地方基层工会的领导人员中有百分之十五或者更多的黑人。从这个研究报告上看，甚至劳联都比芝加哥的大学、教堂、福利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情况要好一些。这些团体中有些正在认识到，它们象金属薄板工人工会一样，无法借口“缺乏足够的合格的黑人对象”而为自己开脱。

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有大约八十个黑人担任专职国际代表……也许只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城市联盟雇用人更多的黑人政策制定者。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二十二名成员中，有两名黑人，有些工会的全国部门的主任也是黑人。<sup>19</sup>

上述情况完全不能说工会中所存在的明显不公正状况已不存在了。但是它却提出了一定的警告：还不能把工会看作“毫无希望”而一笔抹杀，除非准备把美国社会中每一个团体和每一股力量都说成是毫无希望的。



#### 四

药房和医院工会的 1199 地方基层工会的总部，同纽约时报广场只隔着几条街，挤在两座古老的建筑物中间。它代表着纽约地区大约五万个医院工人，他们大部分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前厅里是这个工会的会员们的绘画和雕刻展览。单是这一点就表明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工会。确实，1199 是很特殊的，值得我们考察一下。

1199 从一开始就反对越南战争，六十年代的每一次和平示威游行都有它的会员参加。马丁·路德·金称它为“我所特别喜爱的工会”，而它的总部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规模很小，但它在组织未经组织的群众方面却是最进步的工会之一。1969 年，1199 工会同马丁·路德·金夫人和她丈夫的其他伙伴合作，争取到了大部分医院黑人工人的关键性罢工，声势之浩大震动了整个南部，这时，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了。

左边是一排电梯，我犹豫了一下，想去看看那些绘画，但是我的手表告诉我，已经是上楼去看这个工会的行政秘书莫·福纳的时候了。

我曾在一年以前见过他，那时我就发现他具有许多好的工会工作人员都具备的两个典型特点。第一是惊人的精力和在压力下工作的能力，第二是认为别人也能这样做。同他四十五分钟的交谈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答

应为某一件事打几个电话，后来为了找出会议厅里扩音器嗡嗡响的原因，又检查了一下扩音系统的线路，全都因为我偶然提了一句我在几年以前修理过无线电。这真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态度，“有的是事情要做，只要你在这儿，你就能帮忙解决。”福纳和其他几个 1199 的领导人都分明相信，工会仍旧是个社会运动，而不是个企业。

当我乘着电梯上去时，这些情景掠过了我的脑海。接着电梯门开了，我走出电梯，穿过一间宽阔的等候室，走进了福纳的办公室。

我立刻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自从一年以前我同他分手以来，仿佛他一直就没有站起来过。电话铃正在响着，他手上有两件事正在进行。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靠在椅背上，伸开两臂说，“行了，你想知道些什么呀？”

在谈话的某个时刻，我问起他有关贪污的问题。因为我和他有私人交情，我希望能得到比同工会的人们谈起这个问题时所得到的—般回答更多—些的东西———般的回答都是说：“噢，这样的事不多，”和“银行员也干这种事。”

福纳同意，公众的印象比实际情况要坏得多，但是他接下去超出概括论断的范围，作了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论证。他说：“一个重要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比较新鲜的，就是养老金基金问题。现在甚至一个小工会都有几百万块钱要管理和投资。就一个大工会来说，数目可能达到几十亿。另一方面，有大笔款项而缺乏监督，那显

然就要招致滥用，而且现在还存在着一种在法律意义上甚至算不上贪污的更巧妙的贪污。

“举例来说，一个普通工人出身，当过车间代表的工会职员，对于工人运动的理想是会有一些富于战斗精神的看法和一些感情的。但是他突然面临着管理几百万美元的巨大责任，并且要处理得很好。这样他就必须从本质上变成一个投资分析家。他开始把时间花费在同银行家和生意人打交道上面，在这个圈子里活动。他的思想方法必然会发生变化。他和以前激发他的东西失去了联系，于是他开始不再感到工会是一个社会运动。

“这一类的‘贪污’比起那些偶尔挪用公款或用工会的钱给自己盖房子的人普通得多，并且确实对今天的工会有大得多的影响。”

## 五

工会的辩护者们对于非难贪污问题的回答，往往是经统计资料证明了的这样的事实：“因挪用公款而被逮捕的银行员比工会职员更多。”他们还可以同样正确地补充一句，公司偷漏所得税所构成的盗窃比工会方面任何骗钱的行为都大得多。

但是，这样地把蓝领工会的犯罪行为同中产阶级“层出不穷的罪行”相比，却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贪污和不民主作风的存在已使很多人得出结论：工会不能成为一支争取变革的力量。我认识的一个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主持者说，“一个团体既然有那么多的贪污行为，而内部生活中的民主又那么少，

怎么能够在美国政治中起积极作用呢？”\*

一般地说，产业工会的贪污腐化现象似乎比其他工会少一些，这部分地是它们的结构所造成的结果。基层的产业工会并不控制其成员的工作，这就消除了一个重大的权力根源，并且，产业工会中的行政管理工作更加集中，这就意味着流动在外面的产生诱惑的钱款较少（例如，养老金基金常常会招致最大的弊害，但在那些大产业工会中，养老金基金不是由地方工会管理，而是由全国工会掌管的）。

关于这点，有一则有趣的实例。在三十年代，肉类产品是由两个工会处理的，即有技术的劳联屠宰工人工会和被组织在产业工会中的产联屠宰加工厂工人工会；屠宰工人工会一般认为已被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所渗透，而只隔一趟运货汽车路程的屠宰加工厂工人工会一般来说却没有受到影响。产联组织者的斗争精神和献身精神起到了确实的作用，但是根本原因则是这两类组织的结构不同。<sup>20</sup>事实上，近几年对于贪污腐化的揭露多半集中在非产业工会身上。<sup>21</sup>

然而，在任何大工会中，都存在着一些腐化的基层或工作人员。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一个地方基层工会领导人所

---

\* 要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题，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很多人对所有的工会都有不好的印象，那是因为，虽然新闻界对最坏的罪犯作了卓越的、必要的揭露，对于一个并不引人注目但是诚实的并合理地公开的地方基层工会的描述，却并不是“新闻”。所以，许多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什么也看不到，而只能看到一些对极端不公平现象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比如在联合矿工工会里（在1972年反抗的普通工人候选名单胜利之前）的那些事：滥用养老金基金，漠视安全的要求，完全压制民主，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施加暴行，最后竟然野蛮地枪杀反抗者领导人乔克·亚布隆斯基和他的一家。事实上，新闻界本来应该以更多的注意力来揭发这伙丑恶的家伙，但如果认为历史悠久的联合矿工工会是十足“典型”的例子，那就错了。

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以诚实著称，这是它当之无愧的；但是，你如果找一找，还是会发现坏的基层的例子。不过，我的老天爷，你在谈论的可是一个有着上百万成员的组织呀。只有在坟场里你才会发现一百万人中没有一个坏人。”<sup>22</sup>

五十年代提供了各种各样贪污腐化的事例。1952年，联合纺织工人工会的领导成员向劳联要求一笔数目很大的补助，用在组织工作上。经过调查后发现，工会的基金正在被用来为领导人员购买两幢房屋和其他一些个人财产。酿酒工人工会在1959年由于“任人唯亲，帐目不清，给工会职员巨额工资和费用报销”而受到调查工会贪污问题的麦克莱论委员会的控告。<sup>23</sup>

需要技能的行业、特别是建筑业享有坏得多的名声。但是在这方面，必须把涉及工会与管理部门之间共同剥削工人的肮脏交易(关于这点，我们一会儿就将看到一些例子)的最可憎、最不可原谅的“腐化”，同并不直接损害会员利益的非法活动区别开来。

行贿受贿的行为充斥整个建筑业。承包人贿赂建筑检查员，警察拿到一份“辛苦钱”，城市官吏、国家官员以及甚至联邦政府都卷进了一种已经成为公认的制度的分赃的纷争中。<sup>24</sup>

一些工会职员也卷了进去，强迫承包人从他们女婿的公司里买材料，要不然就用“劳资纠纷”的威吓来勒索。但是，这类勾当通常和工人本身的处境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因为建筑工会地方基层领导人的薪给一般都比产业工会领导人的薪给高得多，个人进行投资的机会就比较多，其中有些可能是



不正当的(例如,一个承包人把修筑一条新公路的地点偷偷告诉一个工会职员,那个职员就去买下那边的地皮)。

但有的时候这种交易确实损害了工人。非工会会员承包人贿赂工会职员,以换取雇用非会员工人的默许,而其他那些拒绝付钱的承包人就受到了损害。<sup>25</sup> 承包人还可以贿赂工会职员,以换取违犯合同中的安全规定、人力标准等等的权利。

事实上,整个制度都在鼓励贪污。正如油漆工人工会的一个职员弗兰克·舍恩菲尔德所指出的,“如果工会业务人员不同雇主合作,雇主就不愿雇用他的工人。这是一种奖励贪污的腐化办法。一个贪污腐化的工会业务人员可以使他的全班人马都有工作,虽然他们可能必须去做那些没有订在合同里的事情。诚实的业务人员力图执行合同,他手下的人就没有工作。<sup>26</sup> 这些机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建筑业和其他类似的工会中,工会控制着工作。杰克·巴巴什说:

工会业务人员在分配工作方面必然能够行使很大的权力,这就使他的地位容易进行敲诈勒索的活动……这种活动可能会采取工会会员向工会业务人员支付回佣以换取……分配工作的形式,东海岸码头工人那里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如此。它还可能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会业务人员与雇主相勾结,收受贿赂,允许雇主偏离合同规定的劳动标准。<sup>27</sup>

但必须指出,固然需要技能的行业的工会中存在着贪污腐化现象,它们大体上还是为它们的会员赢得了很不错的工资。

掠夺工人并损害他们利益的真正不可容忍的贪污腐化,发生在几个特定的地区和工会中。最重要的是发生在大城市

那种低工资的、临时的或“辅助的”劳动力市场，那种市场是很难组织起来的。迈克尔·哈林顿指出：

经济底层社会是很难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使它成为两种敲诈取财者——劳方敲诈取财者和他们经常的伴侣、即资方敲诈取财者——活动的理想场所。……[在餐馆里]这种交易十分简单。不诚实的工会人员常常会向不诚实的餐馆老板索取一笔贿赂。为了报答这笔钱，那位“工会工作者”就答应资方只付比工会规定的一般工资低得多的工资。……有些波多黎各人是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工会的会员。他们在那些工会组织中的权利只限于缴纳工会会费。企业老板是工会敲诈取财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他付款给这个工会领导人。作为报酬，他取得了不受工会组织限制和发给饥饿工资的权利。<sup>28</sup>

这些工会有许多是劳联-产联以外的“独立”工会，另一些则是在五十年代时而参加时而退出的工会。<sup>\*</sup>在一个案件中，联邦法庭发现一个拥有两万会员的工会的领导人从工会养老金基金中支付大笔款项(据说超过五万美元)时，有“盗用公款、密谋策划、伙同作案”的情况。其他几个案件牵涉到滥用某工会视力计划的基金以及实际上答应永远禁止罢工(甚至在目前合同期满之后)的各种“情投意合的”协议。<sup>29</sup>

有些工会，例如东海岸码头工人和海员工会，以及矿工和货车司机工会的旧领导，都有贪污腐化的坏名声。但一般地说，如博克和邓洛普在他们对工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工会会员从不中用的和没有想象力的管理工作那里所受的

---

<sup>\*</sup> 劳联-产联之外也有一些很好的工会，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它们中间有一些是麦卡锡歇斯底里的受害者。

损失,无疑地比他们从贪污腐化方面损失的要多。”<sup>30</sup> 虽然这样的提法很难说是最高明的,但它确实把这个问题很正确地提出来了。\*

工会民主和普通会员参与管理的问题更加复杂一些。关于会员参加集会或无异议的选举的统计资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会员们基本上感到满足,或者认为两个可能当选的领导人的观点没有什么差别,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知道人们对他们已经暗中作好布置,如果他们兴风作浪,就可能遭到麻烦。

一般说来,工会可能和一个大城市的市政府差不多同样民主,这是一个不很高的准标。工会在职人员有许多有利条件,能够象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政治机器那样进行赏罚。有时候,他们可以使用工会报刊而不让反对派有答复的机会。选举票可能被故意搞得乱七八糟,工会集会可能被一个有手腕的主席所操纵。

在最坏的情况下,选举可能被操纵,投票规则变得显然很不公正,持不同意见的人被解雇,有时还会受到恐吓或殴打。

人们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最糟糕的工会上面,在那里既使用暴行和恫吓,又使用一些比较巧妙的方法。全国海员工会、联合矿工工会(1972年普通会员候选名单胜利之前)

\* 有必要谈一下货车司机兄弟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有一位非常了解他们的地方基层工作人员试图给他们作这样的评述:“你必须理解的是,简直不能把‘货车司机兄弟会’当作一个团体来谈论。各个地方基层工会都各自为政;有几个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是你所碰到过的最有斗争精神的那种人,其余的却是一些道地的骗子。在我国的很多地区,货车司机地方基层工会可以当之无愧地赢得交易好手的名声,并给会员们弄到真正的好合同。但是,在有些地区,它们签订真正‘情投意合的’协议。你确实应该调查一下每一个具体的事例。”<sup>31</sup>

和其他几个工会，已经因为独裁统治和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施加暴行而被引证过多次了。<sup>32</sup>

但是公然的独裁统治并不典型。比较普遍的是使用这一类的计策：如拒绝把工作给予持不同意见的会员（在有工会职业介绍所的情况下），或者根据显然捏造的理由滥用工会章程中那些允许把工人逐出工会的条文。很少有几个工会真正能接受秘密会议的意见，并且甚至愿意为一个批评者辩护，比方说，如果他被公司开除的话，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却是这样的工会中的一个。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或秘密会议必须小心翼翼地处于某种限度之内，不然就会遇到被逐出工会的危险，或者至少也会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发现种种障碍。产业工会又会比其他方面的那些工会好些，但必须指出，缺乏充分、公开的民主和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是美国工会的一个仅次于种族主义的主要弱点。

但是，在试图判断这些缺陷对于工人运动未来作用的影响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大多数工会里普通会员参加活动的情況比美国其他社会团体高出一筹。实业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民主。一家大公司的一位女秘书告诉我说，因为她偶然对另一个秘书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个秘书把她“告发”了，于是她那“缺乏循规蹈矩的态度”就使得她被叫进人事办公室，问她是不是“到别的地方去会更恰当些”。在大学生活中，任期制往往被用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教授，就象各工会经常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普通会员一样。甚至在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那样以自由主义闻名的大学里，校方用各种手段来对付不受欢迎的持不同意见的教员，而这些手



段都可说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工会领导人所非常熟悉的。在一点上,工会是异常民主的。对会员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工会同管理部门商订的合同,由普通会员表决确定;六十年代被工人拒绝的合同数量之多,足以表明这一权利对于工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只能选举那个作出最中听的诺言的人,然后希望他信守诺言;与此不同,合同批准权却使工人能够对于工会活动的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所以,虽然那些问题都是现实的和严重的,但是要象那位政治竞选经理人那样抹煞工会的进步潜力,却需要一个严格的双料标准。事实上,当我们转向政治时,看得很清楚的是:工会在全国舞台上已经起了基本上进步的作用,它们的潜力是巨大的,能够在未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六

当我步入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总部的“团结楼”时,关于我去拜访的那个人,即欧文·布卢斯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五个副主席之一和工会的“通用汽车处”的头头——我是知道得很少的。“团结楼”位于离底特律市中心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个黑人居住区,隔河与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之一相对,是一座并不华丽的大楼房。

我在同别人的谈话中一再听到布卢斯通的名字,谁都说他是一个我应该见见的人。我的约会订在十一点钟,刚到这个钟点,他的秘书就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

布卢斯通不象人们通常料想中的一个典型的工会领



导人。他言谈明晰透彻，知识渊博，使人想起“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来；如果他当初选择了这方面的职业，他就会成为这样一个教授：他的课堂里总是座无虚席，他的学生会想出各种借口到他的办公室去，希望和他谈谈话。

倾听他讲话的时候，人们就听到他有系统地从他所表达的意见上砍掉不必要的浮夸辞藻，集中申述它们有用的核心。他是一个实行家，同时又善于思考，并且把问题想得很深。然而，使布卢斯通出类拔萃而又那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十分明显地把一些概念作为工具来使用，而不是玩弄它们。

谈到某一个问题时，他说，“工人运动应该表现为一种准公共机构。它必须在伦理上和道德上都高于群众。它应该具有一种在我们这类社会通常不大可能有的纯洁性。它必须是一个专心从事于远远超过眼前利益的社会事业的运动。在工人运动内部，两种不同看法之间的差别就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许多按工联主义原则办事的工会——‘我能够替下面的人搞到好处，那才是重要的。’但还有其他一些工会，却是从最有利于我国最大多数公民、甚至全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事项来考虑工会运动的。工人运动内部的这个差别是很鲜明的，我但愿整个工人运动最后都朝这个方向前进：把自己看作一种事业、一种社会运动，尽管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工人运动。这意味着要具有一种着眼于全体人民福利的开阔眼界，这种福利有时可能与工会所代表的最直接的少数人的利益和幸福相抵触。这是工会需要处理的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我

很高兴地想到我们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已经成为那样的一个工会,并将继续是那样的一个工会。在工人运动中,有些人嗤之以鼻,他们说,‘这些人是空想家,’‘这些人是不现实的,’但我认为他们才是不切实际的和不现实的。归根到底,正是那些有理想的、在前进道路上看得远的、努力推动整个社会朝那个方向迈进的人,才是切合实际的和现实的。”

“工联主义”一词背后的真正问题是工会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正如布卢斯通所解释的,即工会在多大程度上是朝前看并以整个社会为对象,还是局限于一种有限的而且基本上是采取守势的作用这个问题。“理想主义的消失”和工会成为公司结构的一部分这一非难,最终都归结到这个问题。

“工联主义”的内容存在于工业的产联(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各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发生的变化中(劳联的熟练工人工会一直是“工联”,并且,它们还引以自豪,甚至在萧条时期也是如此。那时它们同共和党人纠结在一起,甚至不顾几百万失业工人,令人惊讶地反对失业保险)。<sup>33</sup>

这个变化基本上是接受一定时限的集体合同,以及只有当合同被违犯时才使用罢工。

从根本上说,车间代表制和立即处理申诉的办法被削弱了。全国工会在订合同时尽力达成最有利的协议,但在合同里未具体载明的事项就成了经理部门的“特权”。一般说来,地方基层工会丧失了对于基层问题——如雇用政策、职业保健和安全、工作规章等等——进行罢工的权利。车间代表变成了

解释合同的律师，自发的斗争精神不是被导入那个框框，就是在野猫式的罢工（即未经国际工会批准的罢工）中爆发出来。经理部门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使申诉手续比以往更加拖拉和繁复。<sup>34</sup>

工会领导人就陷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显示出能控制住普通会员，他们就可能在协商时得到一个较好的合同。这样，基层的问题和自发的斗争精神就成为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如果经理部门感到工会不会阻止未经批准的罢工来“实现”合同规定它应办的事项，他们就不会愿意做那样的交易。而且，虽然扣除会费——即预先从工资中扣除会费——的办法可以减轻工会的工作，便于它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但这在工人同工会疏远方面却加上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自由主义者所抱怨的理想主义的消失，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丧失，是接受一系列削弱他们所能起到的自发的斗争作用的限制。大多数工人仍旧支持工会，认识它们在工厂日常活动中的价值。但是，在工会所保护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工会的作用确实有了某种程度的减损。

这个变化的原因，比领导人为了换取“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和“特殊供应”而做的一次简单的出卖活动更复杂一些。

首先是 1948 年那个不吉利的亨利·华莱士竞选运动。他的支持基础来自产联各工会；但当杜鲁门抢先把他花言巧语的百分之九十的讲话内容说了出来，并夺去了他的大部分支持者时，产联就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杜鲁门完全不必依靠它的帮助。

此后不久又出现了严重限制各工会以前所拥有的特权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许多左翼的工会领导人和整个工会被劳联和产联开除,这也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候,预示着麦卡锡时期的开始。最后,人们广泛地相信,战时生产的结束将导致另一次经济萧条,这使很多工会为了准备度过它们所预料的那场危机而力图巩固一些既得利益。大多数研究者都忘记了,在签订工会合同以前,工资是常常既有上升又有下降的。保障工资标准的诺言和其他某些有保证的协议在今天听起来可能无足轻重,但在 1948 年却不是这样。

然而,理解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等于就是为它的后果辩护。虽然“工联主义”的经济利益是很现实的,它在最好的时候也是一种无能的哲学。在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样一个技术迅速改革的时期,它会成为灾难性的。

各工会并没有用切合实际的纲领来对技术进步的挑战作出反应。相反,每个工会都被迫用一些零碎的办法进行自卫,以期减轻自动化的冲击,而不是在美国社会里把它自己结合进劳动和劳动者的新概念中去。

但是中心问题又一次成为这样的问题:这些变化是否已经把工人运动变成美国社会中的一股保守力量。

回答必须是否定的。一些事实很清楚地表明斗争精神有所衰退,“面包和黄油”工联主义局部地战胜了一种较为广阔的社会观。但是,一次后退并不等于是对社会所起作用的一个决定性改变。许多产联工会在三十年代斗争性较强,社会觉悟较高,但甚至在今天,就政治范围或它们帮助美国工人的作用而言,它们也并不是“反动的”。



工会运动中一位“被遗忘了的人”，老年的黑人组织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不被人赏识的一场斗争——“把南部组织起来”的企图——中战斗过的人，发表了下述议论：

你们知道，现在的工会基本上不是激进的团体。它们的工作是维护它们的会员。回想三十年代，我们那时是富于战斗性的，但当时的形势需要斗争性。那时他妈的整个国家都遭受你们年轻人所不能相信的痛苦。我的叔叔总是吃垃圾，真正的垃圾。他到饭馆后面去，在垃圾桶里拣东西吃。

现在既然事情象那个样子，你们就会看到出现某种行动。我觉得我自己天生就是个惹是生非的人，我看不惯在一个老牌的工会里头头们那种只图私利的勾当，但是我看出，一旦你们在工会活动中打了胜仗，你们会员的生活开始上升，你们就不能保持以往的那种精神了。

但我是个工会会员，到死也是工会会员。也许你们年轻人是对的，我们需要一场革命。但是我不喜欢听你们骂工会一钱不值。你去问问我们今年组织起来的一些人好了，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工会为会员出了什么力。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个运动中该死的“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太多了，骗子手也不少。可是我不久前还是回到我1965年在那里做过组织工作的一家肉类加工厂去了一下，真见鬼，你认不得那个地方了。你们年轻人不记得那样的事情，可是我记得。<sup>35</sup>

正是这样的观点值得使人们深思一下，可不要因为工会缺乏进步的理想而把它一笔抹煞。

## 七

我正坐在一间作为国会议员竞选助手“办公室”的用



纤维板墙壁隔出来的小房间里。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我在两年前就认识了，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国会议员的第一次不成功的竞选运动中一起出过力。

“关于你上次讲的话，我一直在考虑，”那位助手开始说，谈起我们在几个月前关于工会作用的对话。“我确实明白了你的观点。我是在南部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那儿有一个大工会是腐败的，而且人人知道。

“但是，虽然他们只是坐在委员会里，从旁注视着劳动人民进行活动，他们却显然是真正能施加压力，要求作出象样的国内立法的人。

“在国际事务方面，他们使我气得发疯。

“但是你不能不说，在国内问题上，他们不仅是好，而且只有他们才能竭尽心力真正把事情办妥。没有他们，这个国家就会很快向右转，快得叫你脑袋发晕。”

比起任何其他方面来，工会、特别是劳联-产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明显地揭穿所谓它们多多少少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反对进步势力的指责是浅薄的。使这样一种解释成为可能的因素是劳联-产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它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乔治·米尼和劳联-产联的执行委员会一般都支持这场战争，而大多数进步人士则加以反对。在这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基本分歧。

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的支持却决不是铁板一块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由于劳联的立场而深感不安，于是外交政策就成为他们与劳联-产联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他工会

也很不愉快，1967年召开的一次工会工作者反对战争的大会——“劳工领袖要求和平大会”——包括了五百二十三名工会职员，其中有来自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混合成衣工人工会、混合切肉工人与屠宰工人工会、国际木工工会的高级职员，以及正式支持这场战争的较小的工会和大工会的许多代表。<sup>36</sup>

到1972年，第二次劳工争取和平支持者大会吸引了一千多名代表，其中包括美国州、县、市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货车司机兄弟会的三位副主席，以及1967年出席过的工会以外的一些单位。<sup>37</sup>但是，就算六十年代中期工人一般地倾向于赞成战争，他们在国内事务上的记录也显然是进步的。

在黑人问题上，1963和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不仅得到劳联-产联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在确保它们的通过上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工人本身坚决要求通过公平的雇用条款，不但适用于管理部门，也适用于工会（在工会种族歧视问题上所以有这个似乎矛盾的立场，原因是工会领导想把“棘手问题”推给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说是全国性的法律迫使他们实行所需要的变革）。而且，各工会曾一再支持黑人候选人，反对提名种族保守分子担任最高法院职务或其他公职。实际上，对于每一个不仅有利于工会会员、而且有利于下层社会所有美国人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各工会支持的记录一直是坚定而有力的。从高等教育经费到福利基金和老鼠控制，它们都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在充分就业问题上，它们的记录是无可匹敌的。

而且，在一系列有关消费者和其他“人民主义的”问题上，它们的作用一向是无与伦比的。在税则改革、消费者保护和

选举改革方面,他们拥护了自由和进步的事业。

让我们以第九十二届国会为例。下面就是劳联-产联所支持的议案清单:

#### **职业和经济问题**

- (1) 公正的工资-物价管理。
- (2) 有利于工资收入者而不是有利于公司的税则改革。
- (3) 开辟职业门类和采取充分就业措施(包括给予失业者工作的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立法)。
- (4) 反对危害贫民救济社会计划的税收分配。

#### **住房 and 大规模交通系统**

- (1) 进行院外活动,促使建设更多的低收入者住房和更好的快速交通系统,以利于穷人上下班。

#### **污染问题**

- (1) 支持保护工人不受“环境敲诈”的法律(如果污染标准被强制执行,那就会有失业的危险)。工人也支持把二百四十亿美元用于反污染设施和加重对于污染罪行的刑事处罚的法案。此外,工人也支持对农药、有毒化学剂和噪音的控制立法(他们也支持阿拉斯加土著关于一百年前政府答应给他们的四千万英亩土地的要求)。

#### **医疗卫生、教育和福利**

劳联-产联支持:

- (1) 实行国民健康保险。
- (2) 培训卫生人员。
- (3) 增加教育补助。
- (4) 车送黑人儿童上学和反对学校中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
- (5) 增加对贫穷学生免费供应学校午餐计划的费用。
- (6) 增加经济机会局、法律服务和综合儿童发展计划(日间托儿就

是其中一部分)的基金。

(7) 增加福利金(其中包括好几个地区的改善措施)。

### **消费者保护**

(1) 支持创建一个独立的消费者服务机关和采取一些扩展其权力的措施。

(2) 支持产品安全法规,包括对违犯安全法规的刑事处罚。

(3) 支持保证生产较有意义的产品的立法。

(4) 支持无误差保险。

(5) 支持改善防止汽车碰撞标准的汽车安全立法。

(6) 支持更好的鱼、肉检查法规。

### **公民权利、公民自由权**

(1) 支持加强实行公平雇用法规的强制权力和办法。

(2) 反对提名威廉·伦奎斯特担任最高法院职务,因为他是个“反对公民自由权”和在种族问题上的保守分子。

(3) 支持废除“紧急拘留法令”(该法令是用来对付黑人暴乱者的)。

### **选举和国会改革**

(1) 赞成改革竞选办法。

(2) 支持工人扣除一部分所得税作政治捐款之用。

(3) 支持直接的、全民的总统选举。

(4) 支持给予哥伦比亚特区以自治权。

(5) 支持其他使国会更加负责的改革。<sup>38</sup>

这个清单很长,但重要之处在于从这里可以看到工会所支持的自由主义措施的数目和范围。

此外,正如那位国会议员竞选助手所指出的,劳工对于很多法案的支持都很积极,并在取得它们的通过上很关重要。由于劳工在其立法部的领导下进行院外活动,以及政治教育

委员会支持自由主义候选人(虽然他们同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在战争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劳工就成为华盛顿的一支主要的进步力量。约翰逊和科茨引用了劳联-产联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一个民主党党员竞选总统的重要力量,并且很可能是能够在众院和参院形成比较进步的多数的唯一内聚力量。”<sup>39</sup>

他们两个人自己也指出:

毫无问题,工人的院外活动有助于为主要社会立法(包括六十年代中期的力量法律)赢得当时迫切需要的中间派和保守派的投票。“当你要进行任何有关日间托儿和法律服务这类问题的顽强战斗时,”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说,“你不妨说你的议案可以得到劳联-产联的支持。那种支持给议案增添了令人兴奋的威望。”<sup>40</sup>

考虑到工会的观点和它的力量,我们的确不能不得出结论,劳工已是美国争取进步的国内立法的主要力量。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选举权法”,因而也就不会有竞选运动中的黑人核心小组。虽然劳联-产联支持战争,但如果没有许多获得劳工支持的鸽派参议员,那么很多最有价值的社会计划就无疑地会在国会被否决,就是国会本身的成分也会保守得多。事实上,甚至当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竞选运动期间被劳联-产联攻击时,他在工会的政治记分牌上也还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有利评定。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劳联-产联的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评定通常都和自由主义者的评价相同,除非问题涉及到外交政策或是美国的失业问题。例如,在九十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政治教育委员会采取的立场与美国人争



取民主行动联盟相同，除了关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和超音速运输机这两个与职业有关的问题。同时，劳工和右翼的美国人争取保守行动联盟在每一个单独的问题上意见都有分歧。<sup>41</sup>

工人从他们的工会那里接受的政治观点也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观点，有时比那些不把工人运动当成一支争取变革的力量的自由主义批评家的观点要“激进”得多。

这里是工人们在他们的工会报刊上读到的一些东西。关于福利问题，《劳联-产联新闻》上写道：

缺乏还不错的工作机会而不是不愿工作，把几百万没有配偶的家庭中的母亲锁进福利救济系统……在“帮助有儿童需要赡养的家庭”计划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极度贫困的母亲和孩子……

迫使受福利救济的母亲出外工作……即使有工作的话，也将使学龄前的儿童得不到适当的照顾，使学龄儿童在课外时间和暑假期间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监督。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让母亲照顾那些孩子，没有别的办法——那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安排。”

关于马丁·路德·金，钢铁工人工会的一本小册子写道：

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领袖之一，小马丁·路德·金把生命献给了非暴力的反对种族歧视的事业。他仿效甘地的办法，用非暴力手段向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作斗争……他的一篇讲话“我有一个理想”感动了整个民族的灵魂。1964年，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成为一个反对战争和贫困的国际发言人。

关于军事支出，钢铁工人工会又写道：

但是，政府对预算作了方向错误的削减和扣押，其不幸、惨痛和讽刺之处就在于这一事实：它需要更多的钱用于军事方面。国

防预算将有所增加，尽管我们在越南的卷入已经明显地接近结束了。这种对于轻重缓急的颠倒的考虑是讲不通的。

关于手枪控制，电讯工人工会的报纸写道：

要到我们有勇气坚决消灭无执照的枪支时，我们才会阻止在美国日常发生的残忍的、毫无意义的枪击和杀人。

关于劳工本身，《机工报》写道：

有人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可以根据“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永久的斗争这一线索来编写。很难认清，仅仅四十年之前，美国和加拿大劳动人民的极大多数是被算作“无产者”的。那时他们的工资很低。他们的工时很长。他们对于职业或对于在职业问题上受公平对待的要求是不存在的。

我们还绝对没有完全纠正工作场所的一切不公平现象。事实上，在美国和加拿大，集中了的公司财富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十九世纪各种“逐渐穷困潦倒”的理论再度流行起来。

最后，电讯工人工会主席有这样一段话谈到乔治·麦戈文：

他的敌人把他叫做激进主义者。他们说他们赞成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很象富兰克林·罗斯福赞成当时不得人心的社会安全法令一样）。

可是，每一个称职的劳工领袖都曾被称为激进主义者，都曾赞成过不得人心的事情。躲在旧时代发了霉的顶楼里是创造不出进步事业来的。冒险地进入新的荒野并征服那些荒野才能创造出进步事业来。<sup>42</sup>

应该承认，这些引文是从比较平凡的文章里选出来的，而且，由于保守的建筑业工会的杂志里几乎没有政治评论，所以没有从那里选录。但是这里也没有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美国

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或者任何被称为对于工会保守主义的规律是“进步的例外”的工会。

同时,有一点是必须看到的。与那些达不到工人手中的、销数至多几千或几万份的自由主义杂志不同,工会的报刊是在几百万工人中间传播的,并提出与《读者文摘》之类杂志的保守观点相对立的坚实的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工会报刊篇幅狭小,不容许从那些关于经济和工人问题的观点都是进步的论文中摘出一小部分来刊载。因此,完全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工会不能满足“革命派”的要求,它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以及在美国社会本身,却基本上起着一种进步的作用,而不是保守的或反动的作用。

## 第六章 当前的局势

### 一

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自由主义者把劳工看作是一个他们希望很快会觉醒过来的“沉睡的巨人”。但是，1968年华莱士的竞选运动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突然之间，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等待已久的劳工的“觉醒”与其说是将为自己增加一个有力的新同盟，还不如说是预示着对于进步的一种威胁。1970年对和平进军游行队伍的攻击以及1972年选举中被误解的一些事件，似乎把这种观念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巩固了下来；有些自由主义者现在断定，可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让劳工再去沉睡。

但美国工人阶级是不会“再去沉睡”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也不应希望它会这样。华莱士、“硬帽工人”和1972年蓝领工人的投向尼克松，只不过是劳工的这种“觉醒”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正是蓝领工人的不满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因为这反映了六十年代劳工队伍中发生的两种基本变化——黑人的大量拥入以及工业美国的工场和工厂中新的一代的出现。

### 二

自从1971年冬天俄亥俄州洛兹城的青年汽车工人的那

次罢工以来,青年工人受到了报刊很大的注意。《生活》周刊、《花花公子》杂志、《新闻周刊》、《哈泼斯》月刊的记者纷纷聚集到那个工厂来,同青年雇工们谈话,回来后都报道说,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工人。<sup>1</sup>

但是这种变化并不限于洛兹城或汽车工人。许多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美国各地新的一代工人之中存在着一种“青年的反抗姿态”。

当我向一个地方工会的领导人问起他们的情况时,他回答说,“他们是不同的,没有关系,出不了啥问题。他们受的学校教育较多,提出的要求较多,要是发生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他们动不动就会闹翻天。”我和欧文·布卢斯通谈话的时候,他主动地提到了这个话题。“工厂里存在着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就象在整个社会上一样。进入工厂的青年工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比上一代受过更多的教育。研究报告表明,当前加入工业工人队伍的工人,平均受过大约十二年的教育,而上一代是八年。受的教育多了,对于未来能够提供些什么便抱有更大的希望。愿望是更高了,我们目前情况的一个方面是个人在‘干他自己的事’,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健康的,是一个极好的迹象。”

这些青年工人的反抗性不但表现于提出更多的要求,更难容忍对工人阶级生活的糟踏,或者只是留起长头发来,而且还表现于另一些新的和惊人的方面。

最常见的现象是旷工。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旷工现象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一倍,一些工厂的工人每逢星期一或星期五有多到百分之十五的人不去上班。他们常常



连什么理由都不说,也不交一张很容易弄到的假的医生病条。很多汽车工厂已经不再认真想执行旷工处分条例。

人员流动率也非常高。有些工人只工作到收入已够过一阵子为止。少数的人根本感到厌倦,在轮班工作的时间内中途走掉,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工作岗位。

不满情绪的另一表现是干活马虎,有时发展到小破坏的程度。这包括把工具焊接在汽车挡泥板上、刮伤油漆、撕破座垫材料,直到蓄意进行毁坏,例如在一个制药厂里,有人把几品脱的次等酒倒进了制漱口剂的小缸里,另一起事件是把绿色染料掺进狗的饲料。<sup>2</sup>

吸毒的突然大量泛滥也是青年工人新作风的一个方面。正是由于工作的性质单调无味和令人失望,大麻、安非他明,甚至海洛因越来越盛行。特别是安非他明,作为一种兴奋剂,越来越受长时间工作或在加速装配线上干活的工人的欢迎。在一些工厂里,吸海洛因成瘾的人在厂里当场昏厥过去。在青年工人比较集中的晚班,当工间休息时,拿一支用大麻叶制成的香烟相当公开地传来传去,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sup>3</sup>

最后,日益增多的青年工人怀疑、甚至拒绝接受陈旧的规章制度和服从工头的指挥。他们这种新的过分自信的态度,不受关于大萧条的记忆的阻碍,表现于对雇主提出空前数目的申诉以及许许多多对不公道的劳动管理惯例的指责和请愿,甚至干脆拒绝遵守条例。有一个钢铁工厂因工人违反条例而采取的纪律处分,从1965年的几百起,上升到1970年的三千四百起。过去工人受到了三次纪律处分就要被解雇,现在有的受了八次处分还留在厂里工作。<sup>4</sup>

然而，虽然一种新的不满精神的迹象已经在美国各处出现，足以代表青年工人造反精神的，却是 1971 年冬天在俄亥俄州洛兹城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里发生的抗议和罢工。这次斗争之所以意义重大，不是由于它的具体争端，也不是由于通用汽车公司行政方面采取了异常的高压手段，而是由于青年工人敢作敢为的姿态和无比的精神，这种精神似乎暗示未来年代里会出现逐渐加强争取改革的普遍压力的可能性。

洛兹城斗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71 年秋天，当时数百名工人受到解雇，他们的工作有许多被分摊给其余的工人。

这个加速措施导致了一次未经协调但是具有摧毁性的反击。许多工人让装配线上的汽车传送过去而不进行必要的操作，有时还采取故意的破坏行动。当是否要举行罢工的问题促使工会召开一次会议的时候，异乎寻常地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参加了会，实际上一致通过实行罢工。

在罢工期间，工人不让没有参加罢工的办公室职员进入厂内，他们还创造了“白衬衫”这个词来突出双方面的区别。二十九岁的当时地方基层工会的主席加里·布赖纳用几句话概括了罢工工人的精神。“这些家伙都成了老虎。他们真正有了勇气。过去工会开会见不到他们。现在我们听得他们在自助食堂里唱《团结歌》。”<sup>5</sup>

虽然这次罢工三个星期就解决了，并且听得到的让步只限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洛兹城的罢工却对通用汽车公司和整个企业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固然这决不是工人第一次为了工厂的加速制度之类的问题而实行罢工，工人自发的斗争性却是惊人的。老资格的劳工领袖拉塞尔·吉本斯把这次罢工

叫做“自从 1937 年弗林特静坐罢工以来工人反抗的一个最惹人注目的实例。”<sup>6</sup>

不过，虽然这次罢工是惹人注目的，它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工会工作人员们指出：俄亥俄州诺伍德的老一辈工人当时正在为类似的问题举行着时间长得多的罢工；在压力加强了通用汽车公司其他一些工厂里，工人们没有达到罢工程度的严重不满情绪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在青年工人的态度、生活方式、行为等方面，却有点很新的东西。五十年代劳工的沉默，虽然被那些对当时工厂没有第一手经验的作者所夸大，在一定程度上却是非常真实的。这种情况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对当前不满情绪表面化的部分解释是，这两种因素都不适用于新一代。

沉默的第一个原因是遗留着对萧条时期的记忆。对于在那些年代里生活过来的工人来说，与他们仍然受到雇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事实相比，对工作的不满总是次要的。那一代的工人没有在任何深长意义上满意过他们的工作，但他们由于三十年代的经历而予以容忍了。

然而，他们之后的一代工人在看待工厂方面却不是同领救济粮的队伍相比，而是同中产阶级所担任的工作相比的。经过这番对比，中产阶级当然显得优越，工人就感到深刻的失望和理所当然的不满，这种失望和不满是没有被他们父母在找到工作时所感到的那种感恩心情所冲淡的。

过去的年代里制止了不满情绪的第二个因素是美国的理想这种神话。中产阶级是把富裕社会作为事实来理解的，而工人阶级是把它作为诺言来理解的，这个诺言说他们是最后

一代的工厂工人了，他们的子女几乎肯定将升入富人的行列。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令人感到舒服的神话，但回顾起来，也是一个残酷的神话。1970年，在所有十八岁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大学或甚至在技术学校读书。至于劳工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他们有三分之二以上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sup>7</sup> 新的一代工人正在进入他们父辈在他们之前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工厂。但是同他们的长辈不一样，他们进工厂时无所恐惧，也不抱幻想。

除了这些根本的因素之外，现在进工厂的青年工人确实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一部分。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已经看到抗议和造反为其他几类工人赢得胜利。往往被认为是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对于美国“制度”的绝对无疑的信心，对青年工人来说是大大减损了。使之减损的不是赫伯特·马库塞和查尔斯·赖克的言论，而是盘旋在岷港和湄公三角洲上空的直升飞机上所看到的景象。美国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这一点虽然没有以任何清楚可取的设想明确表达出来，各种看法也很不一样，但是在各种看法中都普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愤世嫉俗态度，一种觉得有什么事根本不对头的感觉。

这种愤世嫉俗态度在工人个人身上产生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新的反抗文化——一种对于老一辈蓝领工人生活方式的强烈否定。它特别不赞成把生活保障和财物当作必须为之牺牲目前幸福的唯一目标。虽然他们驾驶的是花哨耀眼的“强力汽车”，并且不象一般大学生那样容易把物质商品置之度外，但是青年工人完全和其他青年一样能够感到美国社会里的浅薄无聊和希望落空。虽然他们会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这种感



觉，但是一个人应当活得有意义和必须认真实践生活的这种想法，对他们也是同样起作用的。不少人深深受到了反抗文化中那些同学生界的那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知识分子自负无关的成分的影响。

关于青年工人有一点没有受到多大注意的，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从表面上看来，情况是矛盾的。一方面青年工人为华莱士提供了不少蓝领工人选票，而在发生种族争吵时，这种争吵又往往出现在青年工人之间。

事实上，虽然工会和工厂管理部门都不愿谈暴力的问题，但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例如在底特律，据消息最灵通的劳工问题记者之一 B. J. 威迪克和《新闻周刊》的报道，许多工人，甚至地方基层工会的领导人身上都带着枪以便保卫。<sup>8</sup> 一个黑人汽车工人开枪打死两个工头和一个工人的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注意，特别是因为陪审团参观了出事的工厂，看到了他工作的条件之后，在法律上宣布他为精神错乱。这种事件不多，但是国内其他地区也发生过类似的枪杀事件。<sup>9</sup>

不那么耸人听闻，但更广泛地发生的却是在工业工厂或车间发生的殴斗或仅仅是紧张关系。特别是工头，不但受到黑人的袭击，也受到白人工人的袭击。威迪克所得出的“厂里的黑人 and 白人工人充其量只是互相容忍罢了”，这一忧郁的结论，很能说明许多地方的情况。<sup>10</sup>

可是与此同时，许多青年工人似乎更受与他们地位相当的学生的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且往往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少偏见。例如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里，肯跨过界限去选举一个黑人的，往往是较年轻的白人工人。



他们的相同的问题也会把他们集合到同一边。一个钢铁厂的黑人青年工人对一个记者说，“有些白人小伙子真不错。不是全体，但是有不少人越来越看得清楚了。我们提出申请，要求给车间选一个新的工会工作人员[车间代表]，上层的那些白色混蛋[年长的工人]没有一个肯签名。但是那些挺帅的小伙子却签了名。”<sup>11</sup>

在缺少仔细的研究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切实可靠的概括，但是有一个关于青年工人职业态度的大规模和仔细的研究，倒是从政治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研究的结果发现青年工人比年长的工人更多地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百分之四十三对百分之三十），他们对越南战争和污染问题比他们的前辈关心得多。

最后，虽然青年工人比年长的工人更可能投乔治·华莱士的票，他们也说“黑人也想象其他美国人那样能够出人头地”，并且只有少数人认为公司或工会对少数民族照顾得太多了。投华莱士的票显然并不就等于是恶毒的种族主义的表现。<sup>12</sup>

关于和他们有接触的人的意见，钢铁工人工会的一个工会工作人员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他们不象老年工人那样对种族问题抱有成见。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在学校里学来的呢，还是由于家里的训练。”

欧文·布卢斯通也大胆地提出了下面的看法：“我认为他们的反战情绪更多，虽然这种讲法不免过于笼统。如果你从百分比和比例上考虑，那么比例确实是比较高的。至于种族偏见的问题，由于这同家里和社会上的经验有那么多的关联，而同工厂里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很难加以估计。我

认为一般说来,青年人中对于机会均等、公民权利以及不论肤色人人平等这些生活现实,要比许多年前容易接受得多。但是即使在那时,甚至远在1944年,当底特律市内发生了种族暴乱的时候,整个市内只有一个沙漠中的绿洲,那里人们和平相处,一同工作,那就是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所属的一些车间里。”

当我问加里市市长理查德·哈彻对青年工人的看法如何时,他倾身向前,以真挚的感情说道:

“他们是我消除隔阂的真正希望。年长的工人对于我不论做什么事都不免吹毛求疵。但是我发现青年工人开朗得多,并且能够正确评价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些事情。

“我个人尽量做到通情达理并和青年工人加强联系。我相信我是本市有史以来第一个参加一次碰来碰去都是披着长发及肩的青年蓝领工人的音乐节的市长。

“事实上,许多曾在选举中反对我的那些政客发动了一场反对批准举办摇摆舞音乐节的运动。

“组织音乐会的青年蓝领工人是很认真负责的,但是那些政客实际上在煽动歇斯底里,号召所有‘有血性的美国人’起来制止‘嬉皮士’骑到他们头上。

“这些年青工人最后打电话对我说,‘市长,我们不想给社会造成麻烦,所以如果我们取消这次音乐会,也许是最符合社会利益的。’

“但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打算继续进行,我是会支持他们的。他们于是决定不举办室外音乐会,改为举办室内音乐会,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危险。

“由于这次事件,青年工人发现自己能够同市的行政方面建立

良好关系。我们将满怀希望地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也许是在他们身上，我们有可能打破那种代代相传的种族主义循环。我认为青年工人真正是地平线上出现的最光明点。”

### 三

随同青年工人作为六十年代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新组成部分的出现，黑人也成了一种重要的和有时是举足轻重的新力量，特别是在我国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地区。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增长是惊人的。在1954年，约有三十万黑人技工、工头和类似的工人。在1969年，约有七十五万人。机械操作工的人数从一百三十万跃升至二百一十万。<sup>13</sup>再加上杂工和服务人员数目的增长，可以看出其影响显然是很深远的。

这种影响可以从工会中黑人会员数目的增长上看出来。今天大约有三百万黑人工会会员。这使工会成为除教会之外美国最大的黑人组织。在几个重要的工会里，黑人现在几乎占了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些工会包括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钢铁工人工会。在会员人数有五十万的美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黑人占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他如切肉工人与屠宰业工人联合会、邮递员和邮政雇员工会、美国教师联合会也是如此。至于在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中，所占的比例则几乎高达一半。

黑人控制了这些工会的许多地方基层工会。单是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钢铁工人工会就有四十多个主要地方基层工会

主要或全部由黑人管理。<sup>14</sup>

劳工运动事实上成了黑人在美国所拥有的最坚强的力量基地。近年来黑人在国内政治生活方面收获很多，但他们在工会运动中的势力和影响据保守的估计也要大五到十倍。

人数增加的结果是，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美国教师联合会、钢铁工人工会这样一些工会里，产生了黑人核心小组。在前两个工会的一些地方基层工会里，这些核心小组已经成了地方基层工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公认的部分。在别的工会里，这些核心小组也被承认是一股现实力量，虽然这种承认有点勉强。这些黑人核心小组往往是由老资格的黑人工会会员所领导，它们的工作重点放在黑人必须有足够的代表之类的工会内部问题上，并要求工会对美国黑人的危机给予更大的关心。例如在钢铁企业里，因为黑人现在已占会员人数的大约百分之二十，它们在全国大会上提出，五人执行委员会中应当有一个黑人执行委员。这种斗争仍在进行着。

最后，六十年代工会在两个关键性的领域得到迅速发展：政府雇员方面和美国南部。政府雇员成立工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吸收了几十万不熟练和半熟练的服务人员，例如垃圾搬运工、邮政工人、医院工人、街道清洁工和监狱看守员都成了有组织的劳工。这些工人和私人企业中的工人相比，工资普遍微薄，并且常常都是黑人。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往往和三十年代最富于献身精神的静坐罢工者具有同样坚强的斗争精神。他们正在把一股新的斗争热流注入工会。

公务人员工会的发展非常惊人。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在1957年有十五万五千会员——今天已有六十万会员。

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的会员从1957年的六万四千跃增为1970年的六十万。美国教师联合会的会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从五万增加到二十一万三千。<sup>15</sup>

在美国南部，工会组织也有巨大的增长。1960至1968年间，在南部十二个州里组织了一百万新工会会员。1970年工会会员共有二百七十万人。到1980年，可能会有四百万人或更多一些。除了他们对工会的影响之外，这些新会员对南部民主党的政治生活也会有积极的影响。

帕特里夏·塞克斯顿和布伦丹·塞克斯顿在概述这些变化时得出如下结论：

“……七十年代的工会将更近似三十年代的产业工会联合会，而不是象六十年代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不断变化的会员人数和领导人员，以及打进尚未组织起来的新地区的那种努力，将使工会具有一种新的强大势头。许多工会的会员将是更黑、更年轻、更有教养，并且或许更富于斗争性。这些会员还将带进一些同他们更相似的领导人。”<sup>16</sup>

所有这些发展似乎表明行将发生积极的变化，而不同于一般人把六十年代的劳工看成越来越反动和越来越无所作为的那种情况。

象以前一样，那种一般人的看法确实是很平常的，但不是很明智的。仔细观察一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劳工方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会发现知识分子的教条同工人阶级的现实又一次大相径庭。



#### 四

理查德·斯卡蒙和本·沃顿伯格合著的《真正的多数》很好地表达了对近年来劳工行为的一般公认的解释。

他们认为 1968 年的选举可以证明劳工的政治觉醒——这似乎是在华莱士现象中一夜之间突然爆发出来的——是和过去年代里的劳工斗争精神截然不同的一种东西。这次燃起蓝领工人怒火的，是毒品、犯罪、淫书淫画和爱国主义等混合在一起的“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生计”问题显然成了次要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保守主义。

可是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不是 1968 年春天华莱士在北部工人阶级选举区里开始吃香时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在整个六十年代，普通工人对于“老式”经济问题的不满日益增长。这表现为拒不接受合同，自发进行罢工，把工会旧工作人员更换为斗争性强的新工作人员。

首先和最明显地表现这种情况的是罢工。尽管失业率很高，1970 年有三百万以上的工人丢开工作参加了罢工。这是自从朝鲜战争以来卷入停工的人数最多的一年。1946 年以来，没有象这么多工种的工人参加过这么长期的罢工。<sup>17</sup>

表现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另一情况，是越来越多的调停办法被广大普通工人所拒绝。博克和邓洛普指出，“联邦仲裁与调解局公布说，会员拒绝的事例（指有联邦调解人员积极参加的谈判）由 1964 年的百分之八点七上升到 1967 年的百分之十四点二。……毫无疑问，拒绝率是上升了；必须把批准过程认真地看成是普通工人不满情绪的表现。”<sup>18</sup>

未经全国性工会授权的那些自发性罢工也有了蓬勃的增长，有时一连持续好几个月。允许地方基层工会因局部性问题而举行罢工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有时发现，即使全国性的讨价还价的谈判结束以后，所属的大多数地方基层工会还会继续罢工（五十年代的后期和六十年代）。在其他一些工会里，地方基层工会尽管受到上级领导的威胁，在协定签字之后仍然拒绝复工。

可是六十年代最有意思的发展，是对工会现任领导人的一系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挑战，以及在那些年代里出现的崭新的斗争精神。

这种挑战发生在好些大工会中。例如，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在其受到尊敬和富于斗争精神的三十年代领导人菲力普·默里逝世以后，由戴维·麦克唐纳接任领导工作，他因“无所作为和凯迪拉克高级轿车”工联主义而受到广泛的批评。到1965年，不满情绪增长起来，于是在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中，I.W.艾贝尔取而代之。这主要是由于普通工人斗争性的压力所致。

在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里，保罗·詹宁斯于1964年取代了詹姆斯·凯里。这同样也是一次竞争激烈的选举的结果，在这次选举中，连劳工部都不得不介入，以防止偷换选票。这次改选终于产生了更大的斗争性和更有利的合同。正是在詹宁斯的领导下，举行了那些反抗通用汽车公司的史无前例的罢工。

其他一些工会在乔治·华莱士登场之前也早就感到了普通工人的压力。石油、化学与原子工业工人工会于1964年，

联合橡胶工人工会于 1966 年,都由于普遍不满旧领导人的斗争性不强而选出了新的领导人。

最后再举一个变化的例子,那就是 1964 年选上了杰里·沃夫担任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沃夫是一个大工会的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变成劳联-产联中斗争性最强和最进步的工会之一的变化。

总的说来,象一位作者所指出的,“到 1966 年秋天已经能够看出,除了联合食品加工厂工人工会这个例外,所有在三十年代出力组成了产联的主要工会都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反抗。六十年代煤炭、汽车、橡胶、钢铁、电气和航运等企业部门的主客观条件,现在正在革新他们在三十年代促使成立的那些工会。”<sup>19</sup>他指出《生活》周刊于 1966 年曾提到“新的工会斗争性”,《幸福》月刊也注意到了这种趋势。必须指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华莱士竞选之前,也就是正当学生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赫伯特·马库塞关于把劳工全部统合在“体系”之中的幻想所迷惑的时期发生的。

“蓝领工人的觉醒”常被忽视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普通工人中真正斗争精神的生长,这种斗争精神表现为在六十年代中产生而日渐增长的与公司方面“较量”的决心。举几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就够了。

1964 年,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东海岸与西海岸)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了一场全工会的自发性罢工,这场罢工不顾工会领导的阻止,关闭了所有的港口。争端的兴起是由于在那已经谈妥的协议中同意解雇工人。

1966年，航空机器工人工会(隶属于国际机器工人协会)举行了罢工，使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航空运输陷于停顿。他们拒绝了领导人所制定的第一个合同草案。约翰逊总统在第二轮谈判时进行了干预，企图使所增加的工资不超过那段时期百分之三点七的指标。这同样也被拒绝了。该工会四个最大的地方基层工会由于政府的干涉而感到非常恼火，号召建立一个劳工的第三党，以便“为劳工的最大利益服务”。最后的解决办法还是冲破了百分之三点七的指标。

1966年，后来又在1970年，两次反对通用电气公司的罢工表明了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1966年，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在一次冲破了约翰逊的指标和通用电气公司行政方面家长式手段的罢工中，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由十一个工会组成的联合阵线。当时他们只提出了一项建议，并且采用与公众联系的技术把这建议“推销”给了广大会员。但是，甚至在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胜利之后，千千万万的工人仍然由于工作条件等厂内问题和申诉程序问题而拒不回厂工作。

1970年，另一次通用汽车公司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工会终于又争取到了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时代》周刊指出，这次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罢工工人“是那样地团结起来激烈反对他们的雇主，就象三十年代参加工业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批工人一样”。

1970年，邮政工人工会的一次自发性罢工震撼了美国。这次罢工受到工会的反对，并且也是违抗联邦法律的。它体现了那些受反罢工法损害的工资微薄的公司事业工人的一种新型斗争精神。



1971年6月，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纽约地区理事会同其他一些工会一起，简直使纽约市陷于瘫痪。他们封锁了桥梁，不去过问那些应当送进焚化炉去的垃圾，关闭了污水处理厂，让未经处理的污水注入河流，此外还采取了其他各式各样的行动。这次争端是关于低工资工人（每年平均工资七千五百美元）的养老金计划问题。但是它象邮政工人的罢工一样，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决心以最旺盛的斗争精神进行战斗，不再与规章条例“合作”，特别是当这些规章条例明显地对工人不公平的时候。<sup>20</sup>

这些事实揭穿了用“社会问题”来说明美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多么肤浅。工人阶级决不是象流行的想法所认为的那样，采取“自动靠边”的态度。从全国范围来看，激起千百万工人积极参加抗议行动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事实上，凡是共同利害关系使黑人与白人工人联合起来的地方，争取达到经济目标的斗争常常确实克服了种族的两极分化。在北部，这种情况出现于撇开种族主义来处理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种族或邻里居民集团中间。例如：

1972年在芝加哥，代表美国各地工人阶级种族邻里居民集团的一千六百名黑人和白人代表，举行了一次全国住宅会议。他们讨论的问题是“街区爆破”<sup>①</sup>；被称作敌人的不再是黑人或白人，而是联邦住房管理局和利用种族恐惧进行牟利的金融机构网。这次会议是很不寻常的，不仅因为它是白人

---

<sup>①</sup> “街区爆破”指投机者放出空气，说少数民族可能进入某地区居住而使该区房地产价格下跌，恐吓房地产所有者匆忙低价抛售的一种房地产投机活动。——译者



工人阶级居民区领袖从未举行过的一次最有代表性的集会，同时也因为它仔细弄清楚了黑人和白人工人的共同利益，并且代表们还很有见识地排除了种族主义。

1970年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市，代表加里、哈蒙德和东部芝加哥一百四十三个组织的一千人开会建立了卡卢梅特地区居民代表大会。这个大会集中讨论了与居民有关的问题，如环境污染、政府贪污腐化和税收改革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特别同美国钢铁公司有关。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地方基层工会领导人、家庭妇女、专业人员、钢铁工人，以及黑人和美籍西班牙人。大会强烈地抵制了任何种族方面的分裂，因而引起了本地三K党、伯奇分子<sup>①</sup>以及民主党中反动分子对它的愤怒。

在底特律，几年前由波兰人牧师和黑人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组织的“关于大底特律波兰人会议”，把注意力集中于波兰人和黑人在共同需要方面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这个组织获得了居民中重要人物的支持，并提供了一种不断发展的进步力量来对抗两极分化。<sup>21</sup>

但是意义尤其重大的是南部发生的事情，那里低工资工人为了组织起来而进行的奋斗，往往创造出动人的种族合作事例。

在密西西比州，严重贫困的白人伐木工人和木材拖曳工人，有些过去还是三K党成员，同黑人一起参加了罢工行动。他们得到了黑人州长竞选人查尔斯·埃弗斯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帮助。许多白人后来在选举中投了埃弗斯的票。

---

<sup>①</sup> 指约翰·伯奇协会会员。该会成立于1958年，鼓吹种族主义，主张发动核战争。——译者

在南卡罗来纳州，白人钢铁工人在一次罢工中要求南部基督教领导会议给予帮助。黑人居民和白人居民都支持了他们。最后的胜利也正是由于这种联合阻止了公司在种族方面来分裂罢工者。

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市政工人要求工会承认的一场斗争是由黑人发起的，但是后来扩展到白人，连工会组织者都参加了。而且，面临着从种族方面来分裂运动的企图，联合始终坚持了下来。同类的事情也发生在亚特兰大、彭萨科拉、圣乔港和其他许多城市。<sup>22</sup>

在记者们去采访这些新闻的时候，他们发现白人工人说着下面这样的话：“说到变化，当然是变啦，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捉摸，我自己、我的儿子和其他伐木工人，跟黑人伙伴们一起拉开一条罢工纠察线，我老婆和女儿跟黑人妇女们一起到坎顿去买食品，这样就把我们很好地团结到一块儿啦。”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黑人说道，“我决没有想到会在南部看到黑人和白人象这样进行合作。”另一个白人，这次是密西西比州的，告诉一个作者：“我们州里白人歧视黑人的现象不象从前那么厉害了。从前黑人跟白人总是搞不到一块儿，黑人总是低人一等。可是我告诉过我的这位朋友（指着他那地方基层工会的一位黑人工作人员），我或许不知道做黑人是什么滋味，但是我可确实知道，给公司管理部门把自己当黑人对待是怎么一种滋味。黑人可以看到白人也象黑人那样一直受到欺骗。在公司挑拨之下，我们互相斗了很久，可是现在我们——我们有些人——在一起战斗啦。”<sup>23</sup>

南部的这样一些事件很容易被当作“例外”而加以忽视，

但是它们却有特殊的意义。不象北部某些地方有短期的经济利益冲突(例如熟练技工与失业黑人之间的),南部争取工会化的斗争表明,当斗争是以真正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时候,尽管有种族主义,仍然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胜利。

把所有这些事件加在一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整个六十年代,围绕着美国蓝领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方面的问题,出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斗争精神。这种觉醒推动了几百万工人去否决旧的领导人,进行较长时期的罢工,拒绝调解办法,并在有些情况下关于工作安全和工厂生活中的权力主义提出新的要求。乔治·华莱士以及抗议用汽车接送学童不是仅有的不满迹象。事实上,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黑人和白人劳工这种更基本的抗议冲击中的插曲。

但是,在政治领域内,有一种很明显的向右转的趋势。在整个六十年代,从蓝领工人的不满中得到好处的,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派,而是乔治·华莱士和其他保守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问题的解答不在工人阶级的富裕、权力主义或“固有的”保守主义方面,因为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神话,而不是事实。要弄清楚工人在政治上为什么表现得“保守”,不应当尽在工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应当看看政治制度本身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 五

蓝领工人投了乔治·华莱士的票,很多人觉得非常出乎意外,但是在整个六十年代,他出现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

首先,北部黑人的人口一直在迅速增加,许多北部城市人

口的成分基本上都改变了。因为象在便餐台上吃饭一类最低的民主权利本来就已存在，六十年代北部黑人提出的要求就直接集中于最敏感的就业和住房问题上。最先发生的一些主要斗争，实际上就是针对工会排斥黑人和事实上住房种族隔离的做法的。因此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远比南部存在的争端来得尖锐，并更加直接威胁到白人工人。

后来，那种长期抑制的失望情绪爆发为黑人区的闹事，明显地加强了白人工人的恐惧和敌意。比这些闹事对工人“守法”精神的冒犯更为重要的，是纯粹的恐惧。尽管这些闹事证明绝对没有发生对人的暴力行为，但是对于那些往往住得离黑人区较近并且可以看到火焰和有时可以听到喊声的城区工人来说，它们的影响是使人胆战心惊的。我认识的一个芝加哥工人就曾手持猎枪彻夜不眠，眼睛盯着窗外，耳朵听着几个街区以外的玻璃碎裂声。就美国工人阶级中已经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强烈潮流来说，这些暴动必然要破坏原先的平衡，把工人阶级对黑人的恐惧和敌意提高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再结合关于越南战争的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不管自由主义者方面采取多么圆滑巧妙的策略，都阻止不了保守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增长。

六十年代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根本没有认识到美国蓝领工人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反应的危险，他们仍然认为工人是富裕和自满的。所谓阶级不复存在的神话盛极一时，自由主义者把黑人看作是国内社会不平的一种“最后边疆”。劳联-产联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使很多人形成了一种概念，认为工人不再是一个即将加入进步行列但现在还沉睡着的巨人，而是自满



的白人多数民族的一个永久嗜睡和保守的卫士。

因此，伟大的社会<sup>①</sup>时期中的社会方案，沒有一项是旨在为全体劳动人民新的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要求进行斗争的。相反，它们是完全着眼于黑人或最贫困者的。曾经使民主党一度成为“人民的党”的革新的社会方案，现在在工人看来完全是为了别人，而不顾他们的需要。正当对于一些合法问题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那种高昂的不满情绪时，自由主义者对工人感到厌恶。在六十年代中期，工人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往往受到谴责，但是他们得不到满足的真正需要却很少被人注意。

其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1968年，休伯特·汉弗莱只获得了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蓝领工人的选票勉强达到了一半。剩下的选票分别由华莱士和尼克松获得。<sup>24</sup>

然而，在1968年的混乱之中，蓝领工人发出了一个当时根本没有被理解的“信息”。在预选中，罗伯特·肯尼迪接连在以前放弃给华莱士的选举区里获得了胜利。

除非工人在自己门前草坪上插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感到不满，但并非必然是反动的”，就没有比这更清楚的方式来表明情况正是如此了。

这本来应当促使自由主义者重新估价一下他们的战术和战略，以使用一些方案来证明进步分子仍然是真正愿意为工人对社会和经济的理所当然的不满进行斗争的唯一力量，并表明真正关心他们的需要，借以抵消蓝领工人的不满。

---

<sup>①</sup> 伟大的社会是1965年1月约翰逊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内政纲领。  
——译者



可是与此相反，他们只是把有关权力主义和相对富裕的神话花样翻新，以便从中解释“强烈的不利反应”或“保守主义”现在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许多自由主义者没有把蓝领工人投尼克松和华莱士的票看作是为工人进行战斗的号召，反而理解成为局势已经毫无希望的证据。

结果，曾经在1968年投票选举乔治·华莱士的工人没有获得什么理由来改变自己的主张。他没有看到自由主义的进步力量抛弃那些带着优越感表示关心的神话并恢复作为他的代言人的传统身份，反而看到接连出现许多确实损害他的真正利益的方案。从方案和言词中透露出来的，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和对他的正当不满情绪的漠不关心。

因此，自由主义者的战略本身就是工人“向右转”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存心要把工人赶到华莱士和尼克松的怀抱中去，但可怕的事实是，客观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看看过去几年的一些主要问题吧。

在种族方面，阶级不复存在的神话导致自由主义者不把工人和中产阶级混为一谈，因而掉进了反动武器库中最老的陷阱之一，即挑拨白人工人反对黑人，而不是去寻找那些可以团结他们的问题和方案。

汽车接送学童方案是很典型的。它忽视了教育中阶级不平这种较为深刻的问题，以及学校对黑人和白人工人来说都是失败的这一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没有得到公平施行，有钱的人可以把家搬到远郊区，或者把子女送进私立学校，因而能够避开这种问题，而白人工人在这两方面都不是财

力所能办到的,就不可能有这种如意的选择。在工人看来,自由主义者为了黑人的缘故,情愿损害蓝领工人子女的教育的质量,而不愿损害他们自己子女的教育的质量。汽车接送学童方案根本不是寻求那种不致于刺激工人的帮助黑人的办法,而是允许富裕的人逃避任何牺牲,使负担集中地落到境况不很好的人的身上。

黑人比额制度也是这种情况。到1972年(当这种制度在大学里建立的时候)为止,这种制度只应用于如建筑业这样的工人阶级的职业,因而又使中产阶级不必作出任何牺牲。充分就业作为一个可能促进团结的方案,实际上没有被看成是一项可以认真采取的办法而受到忽视。自由主义者这种可悲的近视,被理查德·尼克松巧妙地加以利用了。正如《新共和》周刊所指出的:

不管是有意无意,政府为了本身的目的,要挑拨白人和黑人劳工的关系,这是它能想出的最高明的花招了。正当1969年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打击到工会的时候,政府开始谈论给黑人职业比额的问题,提倡在建筑业中给少数民族以照顾。(为费城少数民族雇用方案辩护的司法部律师之一是威廉·伦奎斯特。)政府使劳联-产联对这问题发生分裂之后,并没有把职业分派给黑人。政府在煽起了蓝领白人工人对“比额”的不满之后,曾利用这种不满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打击了麦戈文。<sup>25</sup>

公共住房问题对工人的影响也是沉重的。某大城市的一份报纸刊载了一幅地图,指出了建造在白人区的住房工程的地点,以及设计这些住房工程的人员所住的地区。黑人区之外的每一处住房工程都在南市工人阶级地区,而每一个白人

设计师都住在北市中产阶级地区。<sup>26</sup> 又是富裕阶层摆脱了任何损害。

另外，同让一个黑人自由选择住处这样一个单纯的民主问题不一样，在社会-经济方面消除种族差别，把那些严重贫困的人和已经脱离了贫困的人紧挨着放在一起，是牵涉到一些真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公共住房工程往往比周围房屋的人口密度要大，建造质量要差。任何房地产经纪人都承认这样的住房对于邻近房屋的价值是有影响的，即使住户是白人也罢。工人阶级居住区为了经济和社会原因，而不是为了种族原因，往往拚命设法不让穷苦白人搬进去，最近又不让低工资的白人工人搭盖活动房屋。（事实上，稳定的黑人居住区也有反对在他们住区之内建造公共住房的，如果这些住房是供下层黑人居住的话。）自由主义者帮助黑人的努力又一次使黑人的需要直接与白人工人的要求相对立。

正是在阶级偏见最明显的这三个方案上，工人所表现的种族主义最为严重。虽然工人对福利救济深抱敌意，并往往唯恐黑人候选人当选担任公职，但在这些方面都未曾出现暴力冲突或广泛的激烈抗议。固然，也有最露骨、最莽撞的严重的种族主义。但明显的是，对于车送学童、黑人比额和公共住房这三个方面的敌意要严重得多；并且，因为这些方案没有把满足黑人需要作为解决一切工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总措施的一个部分，却把黑人生活改善与白人工人客观利益直接对立起来，它们另外又使许多工人失去了好感。

这个单子并没有列举完。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有关种族的各种方案不必要地使工人同他们疏远，自由主义者有关和平

和人类生态学方面的各种行动也同样是有缺点的。

关于人类生态学方面：抗议者不但无视工厂内部的污染问题，而且往往表示了这样的态度：“现在把凡是有污染的工厂都关闭掉，等下一届国会会期再提出一项议案来帮助工人。”

关于超音速运输机的投票，是说明实践结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反对超音速运输机的环境影响论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但是另一方面，劳联-产联却估计它能够产生二十万个职位。劳联-产联拥护超音速运输机是因为，经过一番改变，它可以提供一个和平时期的方案，以代替建造更多的轰炸机或喷气机。

人类生态学的力量终于否决了超音速运输机，但是他们所说的作为更有用的替代方案的那些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又在哪儿呢？保健、运输和污染控制方面可以雇用二十万人的那些新职位又在哪儿呢？

国防开支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到六十年代中期，数目非常巨大的工人职业显然有赖于军事开支。象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那样的工会，甚至在1968年之前就制定了精密详尽的计划，以期保证有秩序地转入和平时期生产而不致使蓝领工人在进行转变时失业。

但是在1972年，当乔治·麦戈文在国际机器工人联合会的大会上讲话时，他对于转变时期如何保护工人的职业问题并没有什么清楚具体的计划。当时，几千名原来的航空空间工业工人已经在驾驶出租汽车或从事远在他们技术水平之下的职业了。到1972年才来保护这些工人，那是已经太晚了。



如果保护工人的明确而一贯的运动曾经作为自由主义者议事日程上的一项重要项目，这个问题本来在 1968 年就可以解决了。

甚至在象工资冻结这样有关“生计”的问题上，工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原来的同盟见义勇为，出来帮助他们。对于六十年代后期工人要求公平控制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大约只需要十五分钟就能够看出，尼克松提出的方案是一个公正方案的偏袒企业的拙劣可笑的模仿。任何想要为美国工人仗义执言的人，在一听到尼克松念完讲稿的时候就应当大声说他“不公平”。但当乔治·米尼正是这样做的时候，许多自由主义者却和保守主义者异口同声地斥责他的批评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自私自利”要求。这本来是自由主义者对蓝领工人的经济不满表示真正关心的绝好机会，但是一连过了几个星期，民主党人才开始响应米尼的指控。在那几个星期，保持沉默和叫喊“贪婪！”的混合做法很难指望工人相信民主党人是他们的保护者和朋友。\*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自由主义者也同样失去了机会或是采取了有害的行动；但问题是清楚的。1968 年投票选举乔治·华莱士的那位工人从那以后并未看到有什么足以使他改变主张的东西。华莱士提出的“给他们送个信！”这一有力的口号，正是配合蓝领工人日益增长的愤怒的。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有什么高深的社会政治理论或是象马库塞或赖克的那种关于

---

\* 那些以保护人自居的自由主义者批评米尼和其他一些劳工领导人“脱离”他们的会员的时候，应当想起米尼的行动。在那个关键时刻，全国只有他这一个呼声要求为美国工人主持正义。



“觉悟”的不可理解的冥想，才能懂得为什么会有“向右转”和“出现共和党多数的现象”。进步分子之能够赢得美国人民的大多数，从来只有依靠提出一些满足普通人民需要的方案才能做到。工人在自由主义者那么明确地抛弃了他们之后也开始抛弃自由主义者，那是毫不足奇的。

可是，有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认为麦戈文在迈阿密滩之后<sup>①</sup>也曾提出过这样一个方案，但他还是一败涂地了。在他选举惨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认为尼克松的胜利“证明了”进步分子不可能重新获得劳工的支持。

但是，尽管已经认清在竞选运动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麦戈文是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破坏和颠覆计划的苦头，但对蓝领工人的投票情况进行仔细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选举结果对于未来具有明显的影响。\*

## 六

麦戈文的竞选运动从好几方面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在对待劳工问题上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和过失。亲眼看到那次竞选运动的人都知道，麦戈文的助手对于工人和工会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

<sup>①</sup> 指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滩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麦戈文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译者

\* 关于水门事件的揭发，以及特别是尼克松竞选运动在破坏马斯基和麦戈文总统候选人资格方面所起的还未经揭露的作用，确实使人很难判断什么是真正的错误和哪些是“卑鄙的手段”。然而，尽管这样一些活动可能严重地影响了他的选举，但是，如果没有上层的渗透，下面要讲到的关于麦戈文本人的立场和作用，大部分是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的。

但并不是唯独麦戈文犯了这种错误，别人都是圣贤。近年来有很多人不了解劳动人民，又不积极支持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并不限于麦戈文或民主党的“新政策”派。在上面谈到的那些方案大多数都在破坏蓝领工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的时候，乔治·麦戈文还是态度暧昧。

可是要了解尼克松竞选的压倒的优胜，特别是要了解他所获得的劳工选票的情况，必须知道关于麦戈文的一件关键性的事实。在十分现实和实际的意义上说，他决不是一个真正够格的总统候选人。这不是侮辱，而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麦戈文从选举之前两年决定参加总统竞选起，一直到预选的中期，一直进行了通常所谓“教育性”或“论争性”的竞选运动，企图利用在竞选中出头露面和当众发表演说机会来提出他的观点，而不是设法获得最大限度的选票。

显然，其主要目的在于选举获胜的政治家是会小心地降低他对一些问题表态的调子的。他会设法同他所需要的人物和组织搞好关系，避免对非常不得人心的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如果这些问题并不十分重要。

但是，在竞选运动的早期，新闻报道就注意到麦戈文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要巩固他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为和平的主要拥护者的自由主义地位。这是一个绝对可敬的角色，如果麦戈文后来没有确实成为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并负有击败理查德·尼克松的责任，那本来是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在狭义上说，麦戈文之获得提名为候选人是靠了他利用代表选举程序方面的改革。经过精心的组织，亲麦戈文的代表在全国各地取得了胜利，虽然他们往往并不真正代表他们

自己的地区。

但是，麦戈文得以提名为候选人的更深刻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民主党分裂成为敌对的两派，一方是劳工，另一方是青年、黑人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联合。

把劳工或自由主义者描绘成某一方面的坏人是容易的。但这样就回避了问题的要点。乔治·米尼曾经支持过众议员戈尔、哈特、肯尼迪、梅岑鲍姆和其他一些自由主义“鸽派”，虽然这些人的共和党对手在外交政策方面同他更为接近。同样，党代表大会期间支持麦戈文的许多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最初都是马斯基的支持者。

事实上，尽管麦戈文拥有与他不相称的广大代表的支持，如果民主党曾经有人提出既能吸引蓝领工人又能吸引自由主义者的前后一贯的进步纲领，麦戈文本来就不会被提名为候选人的。爱德华·肯尼迪是唯一同双方甚至关系很不错的人物，而既然他拒绝参加竞选，那就确实再没有人能够哪怕在语调上弥补这个缺陷了。

1972年的问题基本上是1968年情况的反映。那一年汉弗莱也是由于没有搞好同盟关系而只获得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其余的选票分别由尼克松和华莱士获得。

竞选运动展开以后，麦戈文在某些工业区的确显示了力量，特别是当他在马萨诸塞州一家制鞋工厂突然“发现”了蓝领工人之后，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在选举中或许真会赢得蓝领工人的大量选票。

但不幸的是，麦戈文在预选期间对威斯康星州工人讲的话，不是他几个月前在大学里一直发表的言论。他“发现”蓝

领工人太晚了，来不及形成一种前后一贯的看法；他受到了自己以前为“巩固左派”而采取的一切主张的束缚。除了那些显然不得人心的问题，例如准予开设妓院、特赦等等而外，还有这经济方案中更为严重的缺点。甚至在语调上，他那半吞半吐的学究气很重的难懂的话和有关再分配的抽象概念，也是很不宜于吸引蓝领工人的。他的讲话事实上在两个方面确实威胁了他们：

首先，由于他脱离了职业问题来谈论收入再分配，没有提到有象样的收入的充分就业问题，这就可想而知，工人会认为好象要由在职工人来维持那些歇着没有活干的人的生活。此外，把年收入一万二千美元作为征税的起点，也多半是再坏不过的选择了。所有的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认为这是一种威胁，要把他们困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上。每一个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工具和模子制造工的装配工人，不能不感到这个计划要限制他在经济方面获得任何显著的进展。自然，当数学没有能够算出什么结果，麦戈文只好完全放弃它的时候，他已为时太晚，难以取得许多工人的信任了。

麦戈文竞选运动中另一个极为严重的缺点，是他对工会所采取的态度。尽管双方面都拚命自吹自擂，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一般所说的麦戈文在参议院的反劳工记录，甚至不在于他对战争的看法，而是在于只要注意州代表的选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麦戈文和工会根本是站在对立的两边的。双方互不妥协，不想和好。麦戈文的势力在不少州里同劳联-产联提名的候选人进行了斗争，往往在策略上挫败了他们。直到竞选运动的最后几个星期，乔治·米尼还在说他



将“拥护华莱士以外的任何民主党人”，因为他确信劳联-产联将通过汉弗莱和“长手”·杰克逊<sup>①</sup>在代表大会上发挥作用。在他突然发现麦戈文也许已经把代表的多数拉到了手，并且发现劳工在民主党内已经完全失去影响之后，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米尼和劳工领袖对于党内改革的不妥协态度，以及他们对“毛孩子和疯子”<sup>②</sup>的不予考虑，确实在造成他们自己的孤立状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还从1968年的情况中得出了错误的教训。问题不在于劳工自发地几乎选上了休伯特·汉弗莱，而在于他只获得了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和工人选票总数的仅仅一半。认为不需要实行某种妥协的想法，充其量也是目光浅短的。

可是，如果说米尼抱有不依靠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学生就可以使民主党获得胜利的幻想，麦戈文则在代表大会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比他更胜一筹，宣布他用不着“劳工头目”。当时一般认为他们是不得不跟着走的，因为他们是“传统的民主党人”，并且是有理由希望尼克松下台的。他这种关于“劳工头目”以及关于赢得“青年”或“感情疏远者”的选票（从而绕过工会）的言论，暴露了麦戈文的“人民主义”是多么肤浅，同时也打破了他建立一个持久的多数的任何真正的希望。麦戈文势力在预选中同工会对立起来，从而在道义上不再有理由取得对民主党和一般社会改革的真正领导权。形势要求建立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同盟，而在这个中心任务上，麦戈文

---

① “长手”·杰克逊是亨利·杰克逊的外号。——译者

② 此处指学生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译者



失败了。

在党代表大会之前的几星期中，很难说当时本来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即使麦戈文试着这样做了，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恐怕仍然会拒绝加以支持。但是由于他没有能够建立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联合，在他抵达迈阿密的时候，他已经失败了。

整个这种情况在代表大会上都暴露了出来。尽管麦戈文竭力否认所有他以前采取过的立场，他却无法否认他的支持者的社会成分。在电视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麦戈文的人民主义显然是花言巧语而不是现实。一个车间工会代表说，“我看到的工人只有戴华莱士帽子的，”一语道破了麦戈文失败的中心问题。美国人民看到的不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同盟以击败理查德·尼克松，而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激烈派系斗争，其结果是麦戈文作为胜利者出现。即使政纲中象大麻烟合法化和准予开设妓院等这些极端条目被否决了，它们却表明了麦戈文赖以获得早期支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关心和什么样的问题。麦戈文发现工人阶级太晚了，来不及真正把他们包括在他所提倡的联合之中。他是得到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后离开代表大会的，但他没有获得为击败理查德·尼克松所必需的那种同盟。不管工人们对他的诺言有何想法，他们总觉得他并不真正是“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麦戈文的学生队伍在1972年的代表大会上确实击败了工会，但这种胜利恰恰是不需要的。他们以出色的组织和高明的政治手腕分裂了能够保证美国进步的仅有的两股力量，而真正吃亏的是麦戈文以及黑人和蓝领工人。

但是尽管如此，随后的竞选运动的一个方面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就是，虽然劳联-产联本身决定保持中立，各个工会却并非如此。麦戈文得到了一个又一个工会的同意，直到代表美国工人大多数的一些工会也公开表示支持。其中不仅有传统上自由主义的工会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和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而且还有国际机器工人协会、美国电讯工人工会，以及石油、化学与原子工业工人工会和其他许多工会。

对于这些工会中的许多工会来说，麦戈文并不是他们真正中意的人选。他们本来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人，他的作风和立场比较容易为会员们所接受。但是他们与其说是由于喜爱麦戈文，还不如说是由于对民主党前途抱有责任感以及有必要采取一个反尼克松的立场，他们才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反常态，不顾安危地跨了出去，明明知道麦戈文非失败不可，然而感到有支持他的必要。

他们也确实为麦戈文卖了力气。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敌对情绪，产业工会的领导人坚守了阵地。某些工会进行的秘密民意测验表明对乔治·华莱士的支持达到惊人的程度——有一个工会达到百分之四十，另一个较小的工会接近三分之一。但是许多工会报刊在封面上刊载了麦戈文的巨幅照片，刊登了例如这样的招贴画：图上画着一个工厂工人，嘴里说着，“如果你干活是为了糊口，你怎么能投票选举理查德·尼克松呢？”<sup>27</sup> 一些工会领导人遍访各工厂，同工人谈话。虽然没有象样的统计数字，但现有的数字似乎表示，象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这样的北部工会的会员是给麦戈文提供了多数选票的美国少有的几个集团之一。

提起这些事实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1972年7月，麦戈文还在批评“劳工头目”，他的竞选运动经理人弗兰克·曼凯维奇还在告诉工会职员说“美国人的情绪是反对大劳工和大企业的”，支持麦戈文的学生还在为他们在反对劳工的运动中所获得的“胜利”而洋洋得意。但是到了1972年11月美国投票的时候，一般的劳工，特别是产业工会会员给予“支持”，但批评他们的人却没有这样做。受过大学教育的自由主义优秀分子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选举乔治·麦戈文，而美国工会会员有将近一半人投了他的票。如果不是那些劳工头头同他们的工人那么缺乏联系，乔治·麦戈文最后真说不定会同那位吃素的候选人并驾齐驱，胜负难分呢。自由主义者现在把所有的工会丑化为1972年竞选运动中的罪魁祸首，实际上许多工会却是没有被歌颂的无名英雄。

对这些事件似乎讨论得过分详细，但从中得出的结论与前途很关重要。

蓝领工人“向右转”的根源并不是什么不能逆转的神秘的社会心理过程。如果工人“在传统上拥护民主党”，那也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在传统上”支持他们。工人中间日益高昂的斗争精神和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很大一部分是正当的不平之鸣的反映。然而他们发现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满。事实上，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民主党在工人中间影响的不断削弱是同那些年代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对蓝领工人的漠不关心完全平行的。甚至在乔治·麦戈文被提名之前，1972年的选举就几乎肯定已经失败了，因为唯一有生命力的进步联盟、即自由主义者与劳工的联盟

沒有建立起来。

但是，1972年竞选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标签和职位，而是更为深刻。尼克松一举而损害了黑人社会和白人工人的真正利益，表现了近乎天才的能力。只要尼克松所代表的利益的联合势力当权，黑白工人的迫切需要就没有得到满足，也不会得到满足。那种联合势力的性质要求黑人对抗白人，同时对这两方面都很少出什么力气。

同样，唯一能够击败他或他的继任者的进步多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与黑白工人的联盟。他们的共同利益的逻辑发展正象使他们陷于分裂的互不信任和敌意一样有力。

## 第七章 将来

---

在前几章中呈现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情景，和流行的陈词滥调所说的大不相同。工人既不富裕，也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十分保守。至于所谓他们趋向右倾，这固然同保守主义的任何必然的发展有关，同自由主义的战略家们所犯的错误也有关系。

这一切都表明蓝领工人可以成为争取美国进步的一种力量。很明显，在范围广泛的许多问题上，工人、黑人和自由主义者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也就存在着联盟的基础。

虽然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但要使它成为现实却还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同美国工人阶级中确实存在的种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真正因素一道，要克服近年来错误所造成的互不信任的残余，是不容易的。

此外，新的争端和新的问题正在产生。它们所起的影响的性质还不清楚，但是它们不仅对劳工将来的政治作用和行动，而且对蓝领工人自身的前途也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对它们产生的威胁和机会都没有认识，对于未来岁月中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考虑。



## 二

第一个并且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工人的工作和就业保障的威胁正在发展。失业问题确实实仍然不仅是黑人，而且也是一下美国工人所面临的最严酷的问题。\*

乍看起来，似乎很难发现足以证明这是真实情况的证据。观察一下近年来失业率的变动就可以看出，尽管还发生衰退现象并使失业人数猛增，可是在六十年代，失业率普遍下降，无论如何，直到 1969—1972 年尼克松衰退时为止都是如此。甚至那时候蓝领工人的失业率都从未显出有恢复到三十年代的迹象，甚至也与五十年代末期不同，那时有百分之十三的机械操作工和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熟练工没有工作。而在六十年代中期，在最低点时，只有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机械操作工和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熟练工在寻找工作。<sup>1</sup>

但是，象我们所看到的，即使不谈这种失业率未能充分反

---

\* 虽然能源危机是这个问题中宣传最广的一个方面，它的长期影响至今还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出来。就阿拉伯石油抵制所造成的解雇的程度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短期的，可以改变的，并且可以认为既是由阿拉伯人操纵的，也是由石油公司操纵的。（其实，在汽车工业方面，尽管有石油抵制，如果底特律愿意早一些着重生产小型汽车，本来基本上是可以避免情况最坏的解雇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石油价格是牵涉范围较广和长期的趋势的一部分。所有原料和商品的价格，从粮食到铜、铁矾土和稀有金属，在工业化国家 1972—1973 年同时发生的世界繁荣时期的影响下，近年来都直线上升。这种变化可能标志着战后廉价原料时期的结束，它对美国的就业确实具有一种潜在的长期威胁。

但是，在象日本这样一些实际上没有资源的国家，而不是美国，会更深深感到任何真正突然的变化。美国在资源方面仍然是最能自给的国家之一。其实，同欧洲与日本相比，美国的竞争地位实际上会有所改善，虽然我们对原料也要付较高的价格。

映实际情况，这种乐观的分析也没有真正抓住要点。这样一些总失业统计数字似乎显示出，比如说，自动化就对美国工人没有任何破坏性的影响。工业似乎也没有迁往南部，迁往郊区或最近迁往其他国家的趋势。

但是所有这些趋势已经使美国黑人工人和白工人都受到很大损失。它们没有象三十年代那样造成大规模的失业，但是它们却在整个美国引起一系列的危机和牺牲。只有观察一下具体的个人遭遇，才能看出一个自动化的或关闭而迁往南部的北部工厂所产生的整个影响。

例如，一个四十岁的雇员找到一个类似的工作，但是他失掉了养老金，最后变成统计资料中的贫穷老年人之一。另一个三十五岁的人只能找到一个收入为原薪一半的加油站服务员工作。实际上，战后美国的自动化和工业的迁移确实对成百万工人造成这样的后果，其中没有一个人在全国蓝领工人就业状况统计资料中表现出来。

例如，人们往往忽视自动化，因为它并没有实现它会在十年左右完全结束体力劳动的预言。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所作的最广泛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在1963与1967年之间，直接由于采用自动化机器而解雇的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一。这个研究还指出，由于采用新机器而使他们的工作遭受任何变动的，每年只有劳动力的百分之二、三。<sup>2</sup>

这个研究所指的劳动力包括专业人员、企业家和跟工厂生产工人一道的所有其他每一个人。但是即使人们假定对蓝领工人的影响为对其他人的五倍，这个危机也仍然不象是真实的。

但是，如同作者们所说，“在没有技术改变时本来可以雇

用的工人现在是不需要了。最后受雇的一批工人必须等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自动化的这种隐蔽的影响为下面的事实所证实：许多工会在谈判时要求在它们的合同中加上关于减少人员的条款，规定只有在工人退休或辞职时才可以采用自动化设备。<sup>3</sup>正是那些失业的或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年轻工人最感受到这种影响。

此外，在很快采用自动化的各个地区，它发生的影响是不平衡的。例如在纽约市，自动化电梯在几年的时间里淘汰了四万个工作。<sup>4</sup>另一个自动化的影响的生动例子，可以由五十年代末期阿摩尔公司关闭了若干中西部工厂这件事看出来。在发生了这种变化的城市中，有两个城市几乎半数被解雇的工人一年以后还在失业。在关厂后三年，东圣路易斯阿摩尔公司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还没有工作。这种关厂是在一个衰退时期发生的，不是所有关闭的工厂都产生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正如一个评论员所指出的：“这个变化的重担只不过是落在雇工和社会服务机构的身上。有些[雇工]以后从阿摩尔自动化基金会得到训练……但是，截至1963年11月，在大约二千五百名合格的工人中，仅有二百二十名重新受到训练，实际上新技术都毫无例外地属于较低等级的工作和给以较少的工资。”<sup>5</sup>

目前正感到自动化威胁的一个主要类别是钢铁工人。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在其他国家已经在运转，在美国兴建的每一项新设备都比以前的设备更自动化。其他国家更先进的技术有助于使外国钢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廉价的进口货，就象自动化一样，已经在逐渐地减少钢铁工人的人数。对于他

们来说，自动化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最后，采矿机械化造成了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大规模失业和贫穷，以及成千上万“山区乡下佬”迁移到北部一些城市的现象。其中有些人目前住在象密执安州沃伦这样一些城市和地区，在底特律汽车工厂工作。但是在他们在矿里的最后一天到进入工厂的第一天之间，有十年丧失工作的经历。只有当人们仅仅注意总失业人数时才会忽略这个经历，而自动化的影响才会好象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数字也掩盖了工业迁徙的影响。工业迁移到郊区的趋势是中心城市黑人和贫穷白人居民遭到危机的主要因素。芝加哥官员保罗·齐默勒在国会的工业位置政策委员会作证说，“单单在芝加哥内城，在1955和1963年之间，就净损失了约四百个制造业公司和约七十万个制造业工作。……由于有歧视性住房惯例、郊区划分地区条例、不够用的公共运输系统……大多数住在内城的工人不能到郊区重新安置的制造业工厂继续工作。”<sup>6</sup>

在纽约，《时代》周刊指出，“制造业就业人数自1959至1965年从百分之五十四跌到百分之五十一，并且预计在十五年内将跌到百分之四十二。”该市经济发展机构的负责人估计在二十年时期内将失掉二十万个制造业工作。<sup>7</sup> 一个城市跟着一个城市重复了这种型式。工厂迁移到只能坐小汽车才能到达的郊外工业区，这自然就排除了贫穷的黑人，并且损害了它们丢下的中心城市的税收基础。

对于这种迁移，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许多工厂在最高效率下进行工作，就要扩展面积，而郊区的土地比较便宜。建设



费也比较低，并且许多中心城市的拥挤情况使运输原料和制成品都真正成为问题。

但是，此外也牵涉到一些不那么冠冕堂皇的因素。纽约经济发展局局长肯尼思·佩顿说，“在决定一个工厂的地点时，特别是在一个工业区，常常在这决定的中心包含一个逃避的问题。”<sup>8</sup> 郊区防止污染条例常常是不严格的，并且各种税率也比较低。当地各地段又常常提供其他的引诱或服务，为了争取工厂缴纳的税款而彼此竞争。从企业观点出发，迁到郊区去完全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它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使许多北部中心城市变成象阿巴拉契亚山区城市那种停止活动的永久失业的孤立地区。甚至对于那些能够作些调整的人，这也意味着不是长时间地在城郊之间往来奔波，就是为了在近处安家而债台高筑。

但是工业的迁徙不仅限于到郊区去。工业从北部重新移置到南部的措施也一直在加速进行。在1947和1965年之间，东南部和西部的就业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四，而大西洋沿岸中部和东北地区，就业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点五。除纺织业外，化学和木材产品工业已经变成主要的雇主。在制造业中被雇用的南部人口的百分比现在已和北部相接近。<sup>9</sup>

除了许多地区作为对工业起引诱的作用而提供的大量减税和污染标准不严而外，低工资和没有工会组织是把一个工厂接着一个工厂吸引到南部去的磁铁石。发表在一个公司刊物上的一篇文章极其坦率地概括了把工厂设在萧条地区的一些有利条件。除了没有工会以外，他们还提到在阿巴拉契亚山区找工作的竞争非常厉害，工人们为了每小时三美元和稍



多一些的“高工资”开汽车单程跑五十到八十哩的路程去上工。他们描述一个制造商愿意经常倒换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并接受因之造成的在时间和效率上的损失，因为把工资保持在大约每小时二点二五美元的水平，他就能够赚钱。<sup>10</sup>

新英格兰的许多城市，由于各式各样的工厂迁往工业基础较少的南部草原，就正式变成了长期高度失业的萧条地区。事实上，正如进行这一研究的作者们所指出的，“对于许多新英格兰的地区来说，情况已经回到原来的样子。象马萨诸塞州福尔河这样一些城市，它们的一些工厂在三四十年前曾迁往南部，现在工业正在迁回来，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多半是受了由于工业的迁离而最后压下来的低工资水平的吸引。”

在许多情况下，黑人工人首先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但白人煤矿工人、纺织和造纸工人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最近的工业外迁的趋势，本来属于美国人的工作日益“输出”到其他国家去，所以除了上述这些工人之外，还必须加上电子、服装和汽车业的工人。

在最近几个月，主要由于劳工从拥护自由贸易转到支持非常严厉的伯克-哈特基法案，这个问题特别成为重要新闻。伯克-哈特基法案是一种保护主义的措施，其中包括严格削减可能进口到美国的货物数量以保护美国人的就业。

没有人否认一个真正的问题已经出现。在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出口大大超过进口，除纺织品外，“日本制造”的标签只是对半导体收音机、塑料玩具和其他勉强够格的廉价产品的一种代用语，而在最近几年，进口已经扩展到例如汽车、钢铁以及象立体声收音机、彩色电视机这类高质量电子设备

品的关键方面。近年来,贸易差额已经起了变化。1972年,即在美元贬值前,美国的进口超过了它的出口。当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开始感到这种压力时,特别是在1971年罢工以后,劳联-产联就大大加强了支持保护主义的运动。

许多美国人失了业。1973年3月号的《幸福》月刊说,1966年以来电视机、收音机和电子元件方面有八万七千人丧失了工作。国际电气工人工会主席保罗·詹宁斯说,电子工业方面有一十二万一千人失业,这使他的五万名工会会员受到影响。联合制鞋工人工会也受到外国进口的打击,在十年多的期间已有一万六千五百人失掉了工作。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在两年内(1969—1971年)有二万五千一百八十六人失业。关于外国竞争对美国就业的影响的其他比较推测性的估计是:钢铁工业有十万人失业,汽车工业的情况与此相等。<sup>11</sup>

《幸福》月刊的文章刊登了受到外国竞争影响的年约四十几岁的六个老工人的照片,巧妙地突出表现了人们所受的损失。两个人现在失业了,三个人找到了工资比较低的新工作,只有一个人由于他的工厂停闭而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失掉养老金、较低的工资、失业和被搞垮的生活,都是这一变化施加给美国工人影响的一部分。

但是国际贸易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有几个工会象企业一样担心进口限额可能引起其他方面的失业,并实际上使情况更加恶化。

劳工以前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大抵是以三十年代的悲惨经验为依据的,那时贸易壁垒引起贸易壁垒,其发展结果,如

果不是三十年代遍及全世界的萧条的根本原因，也肯定是无助于解决这种萧条问题的。甚至在 1971 年，即在这个问题成为头版标题以前，美国工会的加拿大分支机构对于伯克-哈特基法案对他们的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大喊大叫，认为是对他们下毒手，这种反应终于迫使该法案在其条款中排除了加拿大。欧洲工会和共同市场各国也越来越担心保护主义的威胁，而新成立的欧洲工会联合会则已经暗示有可能对于任何严格限制进口货的措施采取报复手段。<sup>12</sup>

但是劳工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危险。许多人认为伯克-哈特基法案中保护主义色彩最浓的条款是一些讨价还价的细目，有意识地显得很极端，以便引起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取得切实可行的妥协。许多工会希望予以突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外国竞争，而是美国多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具体作用。目前使“外国的”竞争和蓝领工人失掉工作的情况大大不同于前几年的问题是：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和电子元件往往是在海外开设工厂的美国公司生产的。对于工会来说，这不过是象前几年许多工业迁往南部那样的“逃走工厂”的另一变种。

自由贸易的论点，如经济教科书里所说的，往往引用厄瓜多尔这样一个国家为例，那里有气候、土壤、劳动力等等的有利条件可以廉价生产香蕉。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则有熟练的工程师和尖端的技术可以低价地生产拖拉机。教科书中指出：因此专业化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全世界可以有数量最适当的香蕉和拖拉机，而不是让两国在效率很低的情况下竞相生产这两种东西。

但是，这种吸引人的论点(叫作“可资比较的有利条件”)未必适合现代的实际情况。对于许多公司来说，使墨西哥或台湾比瓦茨或纽瓦克更有吸引力的并不是土壤、气候、原料或其他自然因素。相反，更有吸引力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的情况，即低工资和软弱的工会或不存在工会，再加上象低税收这样一些高度人为的诱因。

外国的工资的确是太叫人高兴了。在墨西哥，工厂雇工的每日工资从二点八美元到四点三二美元不等。在台湾，一些装配工所得的工资还不到他们美国同行的九分之一。<sup>13</sup> 一个刚从墨西哥物色新厂址旅行归来的服装业经理坦率地说，“一个设立在那里的工厂会使管理部门感到头痛。但是，他们工作整天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在美国这里一小时的工资，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没有工会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代表赫伯特·梅尔在国会作证说，多国公司“鼓励支持反工会的措施，容许甚至帮助各公司拒绝承认工会，拒绝参加集体谈判。”

一个工会杂志《机工报》说，“朝鲜有一条特殊法律把罢工的权利给取消了，并对多国公司雇用的工人采取强制仲裁。……马来西亚政府对任何新迁入马来西亚的工业提供条件：在三年期间内不准工会进行活动。”<sup>14</sup>

但是，许多工会批评的焦点，是税则方面的有利条件，这种税则人为地使国外生产比国内生产更有吸引力。由于国外税款可以用来记入美国税款的贷方，劳联-产联的《美国劳工联合》月刊说，“美国法律奖励在日本进行生产的公司而不是



奖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司。在一百万美元(应征税的收入)中,设立在日本的公司可以获得六万三千美元,即百分之六点三,这是一笔不小的税收减免。……实际上国外的生产者只要不把利润弄回美国,就可以逃付在外国赚得的利润的任何税款。”<sup>15</sup>

这篇文章提到,一家大公司把设在印第安纳州的工厂关掉,在香港开张。它干脆把利润投资到百慕大和波多黎各的债券上,就丝毫不付美国的税款。

关税的有利条件也促使职业外流。尚未装配起来的运往国外的部件和材料,在其成为制成品运回国内时,只征收其增加价值的部分,而不照其他进口货征收税款的办法办理。结果是成百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制造福特斑马牌发动机的工厂,现在都设立在刚刚越过墨西哥边界的地方,雇用了四万名墨西哥人来代替美国工人。<sup>16</sup>

最后,公司应负责任的其他方面的标准,如污染限度等,一般地说在外国都是较低或者根本没有的。

遗憾的是不可能准确地估计由于多国公司而丧失的美国的职业数。由于进口而丧失职业的总额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其数字在五十万到一百万之间。虽然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研究报告提出,只有百分之十四的进口货来自以美国为基地的多国公司,但是这个数字很明显地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它没有包括合营企业在内(从少数但很重要的有美国股份的外国公司进口的商品——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日本的五十铃汽车公司有巨额的投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占有三菱汽车公司百分之十五的股份)。<sup>17</sup> 一个保守的估计认为已经丧失了几十万个



职业,并且也许比这多得多。\*

在最好的情况下,象这样丧失数以万计的职业也会给许多工人造成严重的问题。虽然1962年工会要求政府作出“调整协助”,用职业训练和现金贴补的方式来帮助工人,并且取得了胜利,但是基本上那是一纸空文。它把一个几乎是办不到的证明的责任——表明进口和特殊的关税让步是造成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推在工人身上。1963年提出了涉及几

---

\* 这个论题确实提出一个迄今在本节里而且实际上在全书里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对美国工人的问题是脱离了总的世界范围而孤立地加以论述的。也许看起来这种对美国人就业问题的关切,忽视了第三世界人民对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紧迫得多的需要。美国使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原料,并且美国工人同不发达国家的穷人相比是“富裕的”这种事实有助于加强上述的看法。

但是这些投资的性质,以及它们被许可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本身并不真正有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伦纳德·伍德科克指出,“不受对国家忠诚的限制,国际公司(当然也有例外)在国际舞台上玩弄它们在国内用来对付那些争夺公司好感的各州立法机关的‘投资气候’的把戏,来增进自己公司的利益。在企业税最轻(因此公共服务水平也最差)、劳工法律限制最小、工会最弱、工资最低、对环境污染最为宽容,以及一般地说其立法机关最容易受到胁迫去按照公司吩咐办事的各州,被认为是‘气候’最好的。

“同样在国际舞台上,由不进行投资或重新安排投资地点这种威胁来支持的‘投资气候’,被用来讹诈那些国家,使它们互相进行两败俱伤的竞争,好让国际公司榨取到让步、补贴和特权,以致基本上抵消了在其他方面可能从他们的投资得到的任何公共利益。一种格雷沙姆定律在起作用,就是说,坏的社会标准赶走好的社会标准。”<sup>18</sup>

《外交》季刊上的一篇论“全球失业危机”的文章说,美国的投资倾向于资本集中(即使用大量的技术和很少的工人),而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是劳力集中的生产,这种生产雇用较多工人,其产品有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sup>19</sup>例如,一个穷国所需要的,不是仅雇用极少数工人并把它的产品输出到美国去的汽车引擎工厂,而是能雇用更多工人、其产品有助于国家发展的技术水平低的自行车厂这类的工厂。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外国投资已经倾向于造成一种叫做“出口的飞地”的变态经济结构。这是一种环状的经济流转,它只围绕着很少的一部分人口,而对关在外面的大多数人口没有什么价值。<sup>20</sup>

千名工人的五个案例,但是一个也没得到批准,事实上只是到了1969年才有工人得到帮助。即使到目前,也只有约两万名工人得到很普通的帮助。不到百分之十的一小群合格工人受到新工作的训练。上述《幸福》月刊那篇文章的作者欧文·罗斯把这计划说成是在六十年中“完全不起作用的”并且简直是个“笑话”。<sup>21</sup>

所有这一切很清楚地说明,职业外流和多国公司的问题是和失业与职业保障问题的其他方面分不开的。自动化以及工业迁徙到郊区、南部和其他国家去,都是整个复杂现实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方面,问题是关闭工厂,以及千千万万工人在收入和职业保障上都遭受损失,而对于自动化和职业外流的重新调整计划总的说来是可悲的失败。无法估计受到这些变化的这项或那项影响的工人究竟有多少,但是他们大概为数以百万计。

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黑人的贫穷和失业史使这个问题更加清楚。对他们来说,自动化和工业迁徙使过去四十年成为一种怪诞的经济上的骷髅舞。这是从那把他们逐离土地的农业机械化开始的。他们被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招工人员约定给以工作和象样的工资而带到北部城市以后,很快就发现工业和工作正越过他们朝相反的方向、即往郊区或往他们最近刚刚由那边来的南部发展。而现在,那些工厂又开始离开南部到墨西哥和台湾去,很可能以后还要重新开始工业迁徙的过程。(现在日本电子工厂正开始离开日本到朝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去,因为日本的工资高于别的地方的工资率。)<sup>22</sup>

现在很清楚,为什么不管总失业人数的统计数字如何,失业和职业保障问题依然是个大问题,并且可能是将来最重要的问题。自动化和工业迁移在造成六十年代国内最大危机,即黑人贫穷和失业的问题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它的受害者清单上继续加上越来越多的白人工人,它就可能变成七十年代主要的社会危机。

但是,对于一些企业方面的聪明的作者来说,这些对蓝领工人职业的威胁令人吃惊地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他们估计,长远的趋势是朝着“服务经济”或“后期工业国家”发展的。制造业中工作的减少是同大家都上升为中产阶级的趋势相一致的。

一个作者写道:即将到来的“后期工业社会是以各种服务为基础的……重要的不是天生的肌肉力量或精力,而是知识。中心人物是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具备智力……能提供各种越来越需要的技艺。后期工业社会的含义……取决于现在认为每个人中意的和可能得到的服务、乐事、健康、教育、文娱活动和艺术。”<sup>23</sup>

但是劳联-产联的主要经济学家纳特·戈德芬格指出了这种种估计的中心缺点。他说,“服务工作大都是低工资的卑贱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全是外科医师和搞科研的化学家。”<sup>24</sup>劳联-产联大体上已经把服务经济说成是“牛肉饼摊和冷饮柜台服务员的国家”,这个描绘明明是夸大其词,但比认为工人会找到“白领”专业人员或经理人员那种工作的任何想法都更接近于实际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白领工作的增长是在办事员和销售人员职业方面,这些职业工资很低,只有

次等女工才愿意充当。

即使有很多工人能设法进入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的行列,工厂工作的消减也会砍掉美国社会的中层,并造成巨大的阶级分化,使成百万工人面临收入大大降低的局面,更不必说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制造业依然是美国唯一就业的最大部门,所有工厂中的工作在最近的将来都不会消失。但是自动化的发展、工厂的关闭和职业外流则正在排除蓝领工人的职业。这些变化已经成为大家担心的主要原因。如果职业的丧失再加速出现,这些变化会成为美国工人的主要问题,在未来的年月里将形成他们的政治态度。

### 三

和对工人职业的现有的威胁不同,人们对“工作改进”问题给予新的注意,企图通过减轻许多工业工作所造成的厌烦和反感,来对蓝领工人进行帮助。

虽然这问题只是最近才为大家所注意,它并不真是个新问题。甚至在四十年代,有些工业设计者和顾问就提出组织生产的不同方式,认为这些方式会给工人以更多的自主和满足。在汽车业普通工人方面,这问题是十分尖锐的,甚至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使工作条件符合人道”的口号就在他们中间很流行了。

但是,只有新的一代工人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通过旷工、故意破坏、吸毒等等开始表示不满时,这问题才开始得到美国工业的认真考虑。<sup>25</sup>其后,洛兹城的罢工,然后又



1972年1月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关于工作不满的报告，引起销路广泛的报刊上连续出现大批的文章。工作改进和“蓝领工人的烦闷”一起作为一个公众问题出现了。

但是，尽管工作改进经常被认为好象是代替现在生产制度的一种具体的办法，这个概念大概同“幸福”或“满足”之类的字眼一样清楚明瞭。这个短语包括各式各样的做法，从权力结构和工作本身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到肤浅得可笑的革新。

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最近建立的小型盖恩斯狗食品工厂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改进”的试验而设计的。它每班雇用二十四人。工人分成若干小组，这些小组自行决定工作方法以及在某一天由谁做哪项工作。没有工头，只有“小组长”，每一个人都是多面手。象装卸这种最次的工作在某个时候大家都干。雇工自己也可以雇人和解雇，他们规定时间，帮着作出关于购买新设备和作出其他选择的决定，而这些从前是经理部门的特权。据说生产率和满意的气氛都有显著的增长。

俄亥俄州莱马市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的一家工厂已经采用了许多同样的革新办法。每一个工人有几种技能，日常工作由大家一起做。雇工自己决定工资等级，决定雇人和解雇，也同样没有监督人。实际上这种工作的人力被认为是“共同体”。虽然工厂本身每班只雇用四十人左右，其他新的设备也是按照同样的方针建立起来了。

克莱斯勒公司在它的三十一个工厂中采用了一系列比较普通的改革。在若干场合，装配线上添装了脚蹬开关，这样，如果一个工人要停下来喝口水或上厕所，就可以把装配线停住(但每天的定额不比以往低)。有些责任已经下放到较低的



一级，尽管难得下放到工头以下的工人自己身上。向工人解释和讨论改革问题的会议也在工作时间内举行。但是，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在工人刮、擦、抬和装配汽车的方法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在最近的将来预料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若干电子和其他小规模的生产工厂，试行了工作轮班制，即让工人去完成某项整个局部装配工作，而不是仅仅做一两项十分简单的工作。在一个这样的工厂，即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规模摩托罗拉工厂，有一条装配线上所需要的工人比原来的多，但是据说质量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高抵消了增加的成本。

离开主要的改革再看尺度的另一端，例如在托皮卡工厂，也已经提出了一些很琐碎的改革，称为“工作改进”，其中包括在工厂的墙壁涂上荧光颜料，免费供应咖啡和廉价饮料，或仅仅由工头对优良工作进行“赞扬和嘉奖”，这后者有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名称，叫作“积极的支援”。<sup>26</sup>

即使把比较不重要的实例除外，这些不同计划的唯一共同点显然是集中注意于工作本身，而不是工资、福利等等。头两个事例涉及权力结构和决策方面的真正改变，而其他几个事例则限于工作程序上的技术性调整。比较重要的改革往往限于小型的和新设计的工厂。据《纽约时报》估计，全国仅有三千名工人由于“改进”而在他们的职业上看到真正的改变。<sup>27</sup>

但是，在工作改进上有几个消极方面已经十分明显。首先，由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极大的注意，评论家和报刊杂志常

常把产业工人不满的范围缩小到单单是厌倦的问题，把它同工人在工作中所面临的其他一切问题隔离开来。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弗兰克·沃利克写过一本关于职业保健和安全问题的书，他沮丧地说，“即使工作场所的嘈杂声、灰尘和生癌物质每年使那么许多工人死亡，不知为什么从未见到一本比较重要的杂志发表一篇涉及这种事情的用作封面图片题材的报道。”下面这一事实加强了这类疑问的正确性，即：无论如何，在一些重要的文章中几乎从未把对工作的厌倦和工作改进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以讨论，而是把它们说成是早已明显地有了解决办法的一个孤立的问题。

并且，有一种非常真实的反工会运动的潜流；而在关于工作改进的文章里偶尔也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一位就这个问题写过文章的劳工历史学家托马斯·布鲁克斯说，“……我发现，除创造新的神话和拾人牙慧之外，还有一种对劳动人民的潜在的蔑视和一种对工会的嘲笑。”<sup>28</sup> 他引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的弗雷德·K·福尔斯的观点说：制定工作改进计划的许多公司是沒有工会组织的，并把这些手法看成“是停留在无工会组织状况下的一种手段”。

必须强调这些事实，因为工作改进在表面上对知识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正如报刊所说，它看来是很“富于想象力的”或“激进的”，而对一些进步人士来说，它似乎提出了一个解决美国工人阶级当前各种问题的迅速而简易的答案。在它改进美国工人工作状况的实际应用中，它当然是完全有效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那就无论如何必须谨慎地加以观察，直到它被系统地提出来，足以克服它目前完全不涉及工

人阶级所有其他不满的状况,并肃清它的反工会的势态。

但是,关于工作改进的最后一点是:即使在一个简单的经济水平上,对于这种想法的任何广泛应用都会遇到一种主要的障碍。在某些象电子工业这样的领域里,有时可以不要装配线技术而生产率不受什么损失。可是在其他许多方面,如果处理材料成为问题,情况就恰恰相反。装配线上的常规和压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发生“对工作感到疏远”和“旷工”或偶然的破坏行为,装配线仍然保证比任何更“完善的”工作组织方法能每小时生产更多的东西。

就汽车工业来说,这是很清楚的。在洛兹城的雪佛莱·维加牌汽车装配厂每小时生产一百零九辆汽车,而全国平均每小时只生产五十九辆,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雪佛莱·维加牌汽车必须同从日本这样一些工资较低的国家进口的汽车竞争。这意味着:从一个企业家的观点来看,一个美国工厂在同一段时间内必须生产更多的汽车,如果要使价格和利润都是一样的话。因此,洛兹城的汽车装配线的速度恰恰为平均速度的两倍,以便和工资几乎正为俄亥俄州的一半的日本工厂相竞争,这只是部分地由于偶然的巧合。

因此,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工作改进将碰到竞争和生产率最高限度的限制。例如在欧洲,萨布和沃尔沃已经设计了一些使用生产小组而不使用装配线的汽车工厂。但是用这些方法生产的汽车本来就沒打算和较低价格的进口货竞争;并且,虽然它们样式很新,可是比起使用装配线来,它们的生产率显然是要低一些。<sup>29</sup>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工人及其

工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忙于同管理部门提高生产率的要求作斗争——这种更高的生产率会排除就业的机会和增加工人已经面临的压力,而不能发动一场争取“改进”工作的认真攻势。钢铁工人工会已经同经理部门一起参加“生产率联合委员会”,而其他工人则已经被说服放弃增加工资的要求,唯恐失去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工作改进在走出它已经扎根的公司和职业的有限范围以后将面对的一些问题。<sup>30</sup>

#### 四

对于将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工资-物价冻结”及其对一般美国经济的意义。

虽然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细节通过报刊和宣传工具多次地反复讨论过,可是最基本的结果之一却很少提到。

简单地说,正是这种冻结把美国工人阶级的主要经济问题,即他们的工资与价格及利润的关系变成政治问题。

过去,这样的题目留给“市场”这个不具人格的力量去解决。如果工人工资的增益为通货膨胀所抵消,其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等到下次续订合同时要求增加更多的钱。在战后的整个时期,劳工基本上是同通货膨胀搞“你追我赶”的游戏,所以,虽然常常获得工资的增加,价格的上涨却使实际收入处于更低水平。

具体地说,工会认识到工人是坐在旋转木马上打转转,但除了再三要求提高工资以弥补生活费用外,却找不到什么实际的补救办法。正如迈克尔·哈林顿在第二阶段开始时写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但是,冻结所起的作用“是把经济政治化



了……〔尼克松〕承认工资、价格甚至利润都是便于政府采取行动的一个适当的题目”。<sup>31</sup>

忽然之间，即使是关于工资增加多少的问题，也必须在华盛顿的工资委员会面前作一番政治斗争，而不仅是和公司进行谈判。尼克松所采取的显然对企业有利的“一点点来”的办法同工会支持提高工人购买力和满足社会需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使经济的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工资、价格和利润——成为对美国每个工会工作人员都具有明显的实际意义的问题。<sup>32</sup>

这个变化向工会提出了未来两条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正如哈林顿所说的，“对这些新情况的一个反应将是提出全国性的收入分配问题〔即反对在新经济计划中偏袒企业〕。另一个将是使工会的斗争地方化……最强大的工会将能够保护它们自己。……但它们不会关心这样做是否会把负担转嫁到没有参加工会的和生活贫困的人的身上。”<sup>33</sup> 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工会会得到奖赏，并且为了报答工业和政府的支持，就会同它们一道越来越变成企业结构的一部分。目前在劳工内部存在着两种趋势的迹象，不过大体上比较进步的一种办法占了优势。

最初，尽管劳工批评这个计划，他们确实参加了工资委员会，并且正如伦纳德·伍德科克所承认的，强大的工会获得了“它们可以接受的决定，而没有工会组织的或很小的工会就遭到严格的‘冻结’”。<sup>34</sup> 有几个重要的工会，如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海员工会和建筑业各部门工会，在种种具体的劝诱下被尼克松的稳定计划和他的竞选运动争取了过去。但是在另一



方面，劳联-产联各工会领导人(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伦纳德·伍德科克一道)确曾退出工资委员会，尽管这一步骤招来了短期的惩罚。其后，劳联-产联坚持这样的态度：赞成遏制过高的利润，取消这项计划给予企业的税收上的有利条件，并一般地坚决主张唯一可以接受的稳定是一个公平处理的稳定。<sup>35</sup> 目前看来，尼克松已经放弃了引诱整个工会运动来支持他的政策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正试图加强既支持尼克松又支持稳定计划的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和建筑业工会，借以战胜和削弱米尼和劳联-产联的力量。任命纽约建筑业工会领袖彼得·布伦南为劳工部部长，而不是对一般的劳工运动提出别的建议，这是战略中的一个步骤。正如《民族》周刊劳工问题编辑B·J·威迪克所说的，“遴选布伦南一事避开了劳联-产联全国总部……〔布伦南〕不是米尼最喜欢的人。布伦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而乔治·米尼则没有。”后来他又说，“如今在华盛顿有三个大劳工领袖，即菲茨西蒙斯、布伦南和米尼，这给尼克松以运用政治手腕的活动余地，他过去就是用这种手腕来控制工会的……建筑工会和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都不希望在1973年退却。它们认为自己是‘当权的’。预料感到尼克松战胜乔治·麦戈文的直接打击的，是劳工运动的其余部分。”<sup>36</sup> 任何关于布伦南和劳联-产联领导之间关系的闹不清的地方，都被后者对布伦南最早一次的关于立法的正式证词的愤怒反应所澄清了。在作证时，关于青少年工人最低工资的问题，他支持政府反对劳联-产联。米尼立刻指责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他毕生拥护的工会原则”，正在代表“商会的声名狼藉的路线”。<sup>37</sup>

无论如何,基本的经济问题已经政治化了。因此,视经济情况而定,新的压力可能迫使其他工会仿效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和建筑业工会的榜样。

如果工会在全国舞台上找不到其他政治同盟,这种压力将变得特别强大。甚至那些真诚地主张对一切人实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公正原则的工会,最后也必须“屈从于”他们自己的成员。如果对自己工会会员有利的唯一联盟是一个伙同尼克松反对穷人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的联盟,“保守的工会”这一想法可能很容易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上面阐述的三个问题,即自动化和工厂迁徙对工人越来越大的威胁、工作改进和生产率,以及工资—价格冻结及其后果所引起的政治发展,都既有危险也有取得进步的机会。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对它们怎样处理,特别是自由主义者、黑人和劳工的联盟是否会得到发展。而这种联盟是能够提出积极的解决办法的。

## 五

当然,关于工人和自由主义者结成争取进步的政治联盟这一想法,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它一直是把大多数美国人民争取到进步这方面来的希望的基础。

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尽管有许多巨大的阻力,黑人与白人蓝领工人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联盟是可以办到的,决不是一种幻梦。

蓝领工人并未消失,也并未被吸收到中产阶级的行列中去。阶级区分依然是很真实的。大多数工人的收入不够过象

样的生活，只有少数的工人能认真地说是富裕的。他们面临着一系列实际问题，从工作上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恶劣条件，到居住区、政治和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公平现象。

工人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也遭到严重的歪曲。我们看出，他们和他们的工会都不是“必然保守的”，而且在许多决定性的方面，他们实际上是以比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较优越者”更加进步的形象出现的。除报刊上十分注意的所有不可否认的保守主义和种族偏见的例子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趋势：从对他们自己的具体问题发挥的越来越强的斗争精神，到以前完全被忽视的进步情绪的实例。

最后，甚至由于投票选举华莱士和尼克松而被认为是“右倾”的情绪，也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基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有人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力量一再忽视甚或攻击工人的利益。值得考虑的是，如果没有六十年代民主党人创议的一长串引起工人反感的社会计划，而代之以若干页充满了一例又一例的自由主义者的建议，这些建议既支持工人们尚未得到满足的实际需要，又表明真正关心他们的利益，那末，今天的形势就会多么不同啊。

简单地说，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想法：目前自由主义者和劳工之间的僵局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不能扭转的。

共同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无庸赘述，由于大多数黑人受雇于最次的蓝领工人的职业，蓝领工人的每一桩苦情都特别在大多数黑人方面可以找到。象充分就业、较高的工资、比较硬性的保健和安全规定、养老金改革、职业保障、税收改革，

以及公平的政府经济政策等等，只不过是首先想到的一些例子。甚至象较好的学校和住房，以及减少犯罪行为这些现在很容易引起对抗的方面，基本上都是所有蓝领工人的，实际上也是所有美国人的共同问题。

但是很遗憾，仅仅就共同的问题和利益的一些方面开出一大张详细的清单来，是无济于事的。真正的联合并不会由于有一系列的问题或想法而突然出现。只有在各个集团已分别采取行动，人们已经被唤起而进行活动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联合。

一些合作的例子上面已经讨论过，如在南部的几次罢工中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北部的一些地方团体中，黑白工人的团结一致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但是，除此以外，在最近几个月内，自由主义者的人类生态学的力量和若干部分的劳工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已经联合起来了。

最引人注意的是，石油、化学与原子工业工人工会于1973年春季发动罢工抵制壳牌石油公司时所得到的支持。<sup>38</sup> 主要的生活环境团体，其中包括荒野协会和大地之友会，支持了这一抵制。这一抵制的目标是为工人争取较好的保健与安全规定。有一个团体把这一行动叫做“劳工和生活环境组织的历史性的第一次联合”。<sup>39</sup> 大地之友会说：

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工人是在工作场所受到污染危险打击最厉害的一部分人。而且，我们认为美国工人象任何其他美国人一样有参加改进生活环境质量决定的权利。不仅如此，工人有权要求最安全和最合于健康的工作条件。<sup>40</sup>



一个由参议员菲利普·哈特组织的、以华盛顿为基地的团体，即城市生活环境会议，也把一些黑人和劳工团体同研究环境污染问题的专家结合起来，讨论职业保健与安全之类的问题（如果严格实施控制污染的规定，就可以制止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的威胁），以及城市中心贫民区儿童的铅中毒问题。<sup>41</sup>

还出现其他一些小规模的努力。在波士顿，经济机会局的一个方案——城市计划援助处——把年轻的科学家和保健专家同工人结合起来，发展有关危害健康问题的情报工作，并为工会和工人提出训练计划。纳德支持的一个单位，即健康研究小组也包括进去了。<sup>42</sup>

最后，在罢工和组织工作情况方面也有过自由主义者和劳工合作的孤立例子。当然，最重要的是农业工人工会的葡萄和莴苣抵制运动，但是也有其他地方性的实例。然而，从现实观点看，这些事情固然暗示着长期看来有合作的可能性，现在却显得太小太孤立，只能提供关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想象。在今后两三年内，只是在一个主要方面会发生联合的真正努力，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在引起目前大部分两极分化的方面，即进行选举的政治活动的领域。不管从长期看来有多大的希望或潜力，只有争取地方上的公职以及国会和总统的职位的运动才会给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提供具体机会，认真地努力把现在分隔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裂缝弥合起来。

与某一次示威游行甚或一次大罢工不同，好几万黑人、学生和工会会员实际上都卷入到政治运动中去了。例如，在



1972年的选举中，积极参加的学生比参加和平进军的学生多，积极参加的工会会员比参加任何一次大罢工的都多，积极参加的黑人比参加民权运动任何时候的大规模行动的多。此外，对蓝领工人、黑人以及现在对学生来说，政治提出了决定性的问题。现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不仅决定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将怎样处理，而且决定以往不属于政治的工资将增加多少、物价将上升多高的问题。也和实际上不太需要局外人过问的如罢工之类的其他方面劳工行动不同，政治活动几乎必然地要求联合。除了一个自由主义候选人只求助于一个集团来获得当选这种少有的情况外，政治运动迫使各不相同的集团进行合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联合是容易的。特别是就全国范围来说，报复性的政治活动在民主党内部似乎占着上风。正如1972年年轻的代表们怀着可以理解的喜悦心情撵走了戴利市长那样，乔治·麦戈文灾难性的表现也加强了劳联-产联最高一层领导人肃清麦戈文分子的决心。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劳联-产联既感到愤慨又希望重新获得党内中心地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即使是基本上同情“同性恋爱解放”运动的人也必须承认，明尼苏达州会议通过决议赞成同性恋爱的婚姻合法化的举动（在全州电视观众面前），无论在民权方面或在政治现实主义方面都不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事例。<sup>43</sup>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有公平代表制的基本思想，都要求劳工在民主党内占据一个中心的地位。

但是，至少在口头上，劳联-产联的一些领导人赞成把他

们叫做“新政治”的人物或“讨厌的家伙”那几类人完全驱逐出党。一个记者把他们的态度说成是“凡是那些对党的主流不满的人也大可以去掉”，以及“左派必须滚蛋”。<sup>44</sup>

我们可能希望，这是一种口头上的诛戮过多的说法，类似在谈判签订合同时第一次提出的特别强硬的要求，目的在于保证达到一个比较适度的目标。但是，如果劳工所用的“讨厌的家伙”这个词指的是民主党中整个自由主义的麦戈文派，并且劳工真正想把他们撵出去，这种态度就接近自杀的边缘了。这种行动会取消党内许多最亲劳工的力量，并加强南部各州民主党中极端保守的一派。纵然这会削弱“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花的代价也就只会是代之以纯粹老式的工会破裂罢了。不管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有多少罪过，他们总比民主党中的保守主义分子好一些。

幸而劳联-产联在这一点上始终是现实主义的。上面已经指出，尽管工会支持战争，它们还是拥护许多自由主义的“鸽派”，包括乔治·麦戈文在内，因为在一些关键性的国内问题上，他投票时确实同劳工站在一起。由于1976年即将来临，为了使共和党不能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几年里执政，仅仅是劳工本身的利益也将要求减少党内的分歧。

但是，不管这种态度变化的精确程度怎样，未来的政治斗争将必然为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合作提供从劳联-产联合并以来最好的机会。其理由是：许多在政治上最活跃的工会（因为它们支持麦戈文，而联合会则不予支持）扣留了捐赠给劳联-产联政治教育委员会（劳联-产联的政治支柱）的约五十万美元。甚至在若干月以后，象电讯工人工会、国际机器工人协

会、混合切肉工人工会、美国州县市政雇员联合会这样比较大的工会，以及象拥有十万会员的石油、化学与原子工业工人工会这样比较小的工会，正继续倾向于维持独立的政治活动，而不是把政治活动交给联合会去搞。<sup>45</sup>

例如，1973年初，独立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同巨大的国际机器工人协会联合起来，在华盛顿成立一个联合立法的“人民会议”，代表这两个组织的约二百五十万美国工人。这是一个其本身在规模上几乎可以同建筑业工会相匹敌的联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休伯特·汉弗莱和沃尔特·蒙代尔在他们的华盛顿会议上发表演说，特别集中谈到了产业工人的一些问题。<sup>46</sup>同样，有五十万会员的美国州县市政雇员联合会，以及其他象全国教育协会和国际救火员协会这样的公职人员的工会，协力于1973年3月成立了一个“美国公职雇员联盟”，这是一个分别有经费来源的有关法律和立法的机构，代表约三百万从事公用事业的工人。<sup>47</sup>

最后，在1972年竞选运动期间成立的工人运动内部的黑人组织、即“黑人工会会员联盟”，在选举以后的几个月还继续进行独立的活动。它的领袖包括全国地位最高的黑人工会会员。<sup>48</sup>

但是，一个容易产生的错误观念必须从速加以澄清。把劳联-产联的政治支柱，即政治教育委员会看成是代表工会运动的保守派，那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政治教育委员会一贯是进步的，它代表劳联-产联自由主义的一派而不是保守主义的一派。六十年代主要的民权法案和大多数好的社会立法，都是得到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赞同和支持的。并且，在自由主

义者愿意支持接近民主党中间派的候选人的情况下，据说他们有大得多的决心来支持比他们更左的候选人。劳联-产联的真正保守派，即共和党的一派，从未支持过政治教育委员会，并且往往捐款给政治教育委员会所反对的候选人。<sup>49</sup>

这些新的劳工政治团体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组织方面，而不在于现有的政治差别上。为了要成为一股有效的力量，政治教育委员会已经组织得很严密和“专业性”很强了。这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局外人或业余活动者所能起的作用。一般地说，它没有给那些对工会确有兴趣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提供很多作出贡献的机会（可是，公道地说，通过尽力把选民登记扩展到工厂大门之外的办法，这方面的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些改变）。

但是新的团体，以及在另一方面许多工会的独立政治活动，都提供了实际接触和联合行动的广泛机会。在经费不多、人力较少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它们对外界来的帮助就容易接受得多，并且会给工人运动之外的进步分子提供更多的机会来使用他们所具有的一切技能，而他们不仅对工会工作人员而且对工人本身都很关心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会看得出来的。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工会，它们和乔治·麦戈文合作，而并不同样具有对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憎恨，因此它们或许不仅会接受而且会鼓励这种帮助，尤其是如果这些自由主义者除了谈论之外也愿意倾听的话。

这种合作的影响可能确实是很深远的。不管这种影响如何，工会和蓝领工人都无疑地是关心实际效果的，他们看行动而不看言论。看到自由主义者和劳工在政治活动上实行有效



和真诚的合作，比任何表示支持和关切的华丽虚饰的语言更能消除素来的不信任。至少它也会在1976年的选举中给合适的候选人一个合理的机会来凑成一个多数。

这样的变化，将要求自由主义者把他们六十年代那种本质上“自上而下的”对待社会的态度（“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实质），改变为对黑人和白人“普通”人民的智慧和基本体面的尊重。我们无需接受劳动人民每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偏见，来摆脱往往对他们抱有的同样令人难以容忍的偏见。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出版的《华盛顿消息》的编辑和写得极好的关于蓝领工人健康与安全问题的作者弗兰克·沃利克，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论述学生怎样才能同工会和工人相处得很好的问题。可是，他的结论实际上扩展到所有自由主义者和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集团。在特别谈到学生在职业保健与安全运动方面同工人合作的可能性时，他说：“工会领袖们，甚至最进步的民主党工会的领袖们，都异常愤恨那些前来拯救他们摆脱愚昧无知的年轻人。在学生这方面，他们要看透工会对于在其办事处周围绕来绕去‘访问贫民窟’的局外人往往表示怀疑的那种关门主义，是不那么容易的。……仅仅有为工会服务的能力和愿望[是]不够的。工会最憎恨的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是这样一种态度：‘瞧，我们是在大学里造就的聪明进步的学生，有我们到这里来帮助你们，你们该是多么幸运啊！’要搞好联合，学生和工会就得采取非常小心谨慎的外交步骤，但这是会起作用的。那将不是召开群众大会和通过激烈决议的大众的联合，虽然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而无宁是诚挚的年轻人悄悄地、孜孜不倦地从事的工作。”



这些年轻人不愿招摇，但决心实现他们的诺言。如果任何工会拒绝这种帮助，那将是极端愚蠢的。”<sup>50</sup>

因此，至少在这样适度的水平上的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联合，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是有非常现实的可能性。麦戈文力图把杂七杂八根本不同的集团和问题捏成一个选举的多数，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却与此不同，他们已经由于同样的问题而联合起来了，并且需要同样的解决办法。他们是美国人民的多数。单单这些事实就使得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联合成为未来岁月中争取进步的最光明的希望。

## 六

除当前的实际政治可能性之外，还有一些与蓝领工人的问题和不满长期有关的事情。这些关系为美国指向一个更通情达理的和更民主的未来。很明显，进步分子所抱有的争取根本改进的一切希望，必须设法同美国公民的多数、即蓝领工人联系起来。

但是，关于社会变化的流行的“理论”至今把注意力集中在除工人之外的其他人身上，把他们看作是进步的未来的主要因素。黑人、学生、妇女、甚至嬉皮士的抗议和不满统统被看作是对不公平现状提出的激烈挑战。这些集团往往被说成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他们的斗争将改变社会的根本性质。象查尔斯·赖克的《美国的绿化》或弗朗苏瓦·雷维尔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耶稣》或罗斯扎克的《荒地终止的地方》这种流行的宣言书，是同学生-嬉皮士文化革命有关的这样一种趋势的三个生动实例。

另一方面，到工人在社会的基本变化中起作用的时候，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找到了辩护士而不是找到了拥护者。在讨论工人将来潜在的作用时，常常最后会提出这样一个警告：自由主义者切不可期望过高。有时人们提到工人的潜力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力量，但总是坚持认为工人不是“革命的”力量，肯定不准备在无产阶级热情的鼓舞下去设置街垒。但是，如果工人不打算去推翻政府，那么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人也不会这样作。例如，当前的一批学生就似乎同他们五十年代的前辈一样保持沉默。

不去考虑工人阶级的不平和不满，认为它们不如其他集团的不平和不满那么经过认真考虑或深切，这事实上就有点看不起人的味道。它带有某种含意，认为工人同学生、黑人、嬉皮士或其他集团不一样，他们有些愚蠢，缺乏想要对社会作根本改进和真正改革的情感。

但是，也很难认为，工人是如此的不同，以致在所有社会集团中只有他们对进步的变革必然是短视的。

实际上，所有这些讨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基本的进步变革并不来自宣读晦涩的和抽象的宣言书。倒不如说它来自普通老百姓的真实而迫切的需要。大多数参加美国革命的人从未听说过约翰·洛克。1789年攻打法国巴士底监狱的群众也不知道存在过一个叫做伏尔泰的作家。“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是他们的问题，并且也知道治标的办法是不解决问题的。

这样看来，蓝领工人不满的意义带有一种十分不同的性质。如果我们注意工人所遇到的实际的和迫切的问题，解决

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必然是“激进的”——这不是就抽象的理论而言，而是就具体的现实来说的。

最迫切但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之一，就是创造真正的充分就业。对于所有的工人来说，这是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但是它涉及经济公平和社会上应当优先考虑的事项的基本问题。充分就业和对那些不能工作的人给予援助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实际上消灭美国的贫困。

目前，这个问题被关闭在言语字句和统计数字的种种矛盾的迷宫之中，这只能使人想起乔治·奥威尔著的《1984年》。正如我们看到的，“失业率”严重地歪曲了问题的真实重要程度。但是，另外从企业的观点来看，充分就业甚至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了。它只意味着保证稳定的某种折衷的失业水平。这一水平曾被判断为百分之二点五。现在这一水平实际上高了一倍。有些经济学家争辩说，如果百分之五的劳动力没有职业，这就是美国所能达到的最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了。<sup>51</sup>

另一方面，工人运动对这问题却采取了唯一的通情达理的看法。正如劳联-产联的主要经济学家纳特·戈德芬格所说的，“照加入工会的工人看，充分就业意味着所有能够工作并想寻找职业的人都能有挣到象样的工资的工作机会。”<sup>52</sup>

这一定义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坚决主张把职业和象样的工资合在一起来谈。这提出了在整个辩论中往往被忘记的中心问题，即就业的重要之点是保证过一种象样的生活。事实上，在美国任何人都可能被短期“雇佣”，例如，只要他愿意为了得到五分钱而擦洗汽车，或为了一天挣一块钱而去当家庭

佣工。问题不单单是工作而已，而是所担任的工作的工资要使工人能够生活下去。

特别是中心城市的黑人失业状况，使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地显露出来。在任何大城市里，人们可以发现许多报纸的征求栏里刊登的招请擦洗汽车工人和洗盘工人等等的广告，然而许多失业的人是不会去应征的。根据这一情况，“文化”因素和“缺乏工作道德”就成为议论纷纷的话题。

然而，只有几哩路远，例如在通用汽车公司一个工厂的招工办事处里，就有数以百计的黑人从一清早四点半钟等候依次接见。任何时候“高工资”的工厂一开设，申请工作的人就蜂涌而来，有时达空缺的四五倍之多。有些工厂有许多胀得鼓鼓的档案柜，里面装满了它们从来不会退回也不予以考虑的申请书。愿意工作的工人是大大供过于求了。<sup>53</sup>

问题很清楚。一个认真的充分就业计划，不能涉及把照看婴孩的短工、卖报童、摆牛肉饼摊子的伙计同工业的或其他种类的稳定职业混在一起的全国性统计数字。第一类只能为十几岁的人提供真正的工作。其他如零售业或洗衣业的工作在经济上只能维持单身汉或没结婚的妇女。这些工作中没有任何一种能维持一个家庭。有一百万这样的工作可能向黑人区开放，但是年轻的黑人仍旧会在工厂和其他工地的招工处排成长队，找工资较高的工作。

根据这方面来看，人口调查局所解释的“失业”的问题就变成只是冰山的顶尖了。只能找到零星工作的工人，以及受雇于低工资工业部门而挣取低于贫困线的收入并不能找到更好工作的工人，必须一并包括在内。我们曾经指出，正是这一



类人而不是失业者,构成贫困黑人的大多数(实际上也构成贫困白人的大多数)。<sup>\*</sup>

有种种建议,可是没有一个本身是完整的或不包括其他建议在内的。也许最流行的建议是在公共事业部门中创设许多工作。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的领袖杰里·伍尔夫提到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在公共事业或非营利机构中可以创设大约四百三十万个非专业的工作,来完成有用而需要的服务。”他接着说,“这些工作不是‘因人而设的闲职’,而是实际需要做的工作。”<sup>55</sup>

实际上,有过多次开始创设工作职位的立法尝试。有些直接与福利金领取者有关,有些是为一般失业者设立的,但其结果都只抓到问题的表面。1971年的公共事业就业计划仅仅创设了十五万个工作职位,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临时的,并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由长期失业需要救济的工人填充的。福利改革法案的“工作福利”条款到目前为止创设了六千九百个工作职位,约合一个工厂雇用工人的人数。<sup>56</sup>

但是,如果作出认真的尝试,真正的潜力是十分清楚地存在着的。瑞典,即使它的失业问题比美国小得多,却花了三倍于美国的那么多的钱,并且使三倍于美国的那么多的失业人数得到好处。他们的公共工程规划除公共工程计划外还包括“受保护的车间”和政府支持的工厂。事实上,他们可算是

---

<sup>\*</sup>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这些其他类别叫作部分就业,把失业与部分就业这二者之和叫作总“次就业”。根据这个标准,有一项研究发现:1970年在六十个城市地区内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中心城市的黑人和白人居民处于次就业状态。<sup>54</sup>但是,这一概念的缺点是,它把实际上的一个连续统一体人为地分裂开来,并且倾向于把所有工人的共同问题和利益掩盖起来。



真正达到了充分就业。<sup>57</sup> 甚至在三十年代,纵然国民生产总值只合现在的五分之一,美国政府还能让大约四百万美国人在联邦资助的公共工程中工作,很难令人相信以同样真诚的努力今天倒做不到。

但是仅有公用事业工作还不行。失业和现在存在的福利制度“起了资助低工资企业的作用。一个有保证的公用事业就业计划会提高工资,而且对企业的代价也很高,特别在南部各州是如此”。<sup>58</sup> 因此,私营部分的必要的改变就不可忽视。

有一个方法是对企业采取税收刺激和对低工资收入的人给与政府津贴。<sup>59</sup>

但是,就业计划中“让企业去干”的方法(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的实际经验,并未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联合经济委员会对这个有四年历史的计划进行了研究,发现“这计划可能津贴了那些即使没有政府帮助也总会雇用不熟练工人的雇主”。并且它“已经证明在失业率很高的时期实际上是无用的”。<sup>60</sup> 事实上,乔治·米尼 1968 年在国会作证时就准确地预言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如劳联-产联所说的,“这恰好证明,在这一点上依靠税收刺激是一厢情愿的想法。”<sup>61</sup>

另一种办法是承认工业位置问题象从它们大烟囱里放出的废气一样,是一桩对公众和政府都有关系的事情。这个问题对于有关职业外流及其所造成的失业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性的,但是它必须扩大到把职业流动使各地区遭到破坏的一切方式包括在内,并且必须制定一些规章。

有一个可能性是通过立法,要求一定比例的新工厂设置在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其他更属于推测性的可能性包括由

政府直接拨付津贴来支持新的企业，或者建立合作机构，给以生产美国需要而市场不予鼓励的货物的稳定可靠的政府定货合同。特别是，如果这类企业立意要使用大量劳工，能提供最大数量的令人满意的职业，它们就会发生实际的影响。

但是，尽管所有这些计划的细节十分复杂，需要同工会、管理部门和失业者本身一起具体进行制定，第一步总该是一个以做到充分就业（按工会所理解的这一名词的完全正确的意义来说）为主要目标的基本计划。

大概这是可以认真地改变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两极分化状况的唯一计划。它把体力强壮的人的工作问题同对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帮助明确地区别开来，就能一举而解决福利问题。它将比其他任何政府计划对黑人地区投入更多的钱，取得住房、医疗等等方面的明显效果。最后，它对于目前笼罩美国各大城市的爆炸性犯罪问题将有深远的影响。固然强盗和其他罪犯占失业者的一小部分，并且有些罪犯也不会被那种答应给予适当工作的诺言所吸引，特别是那些贩毒赚大钱的人，但是充分就业就会把失业和由于没有希望过象样生活而造成的大量新手吸收殆尽。

为争取充分就业而进行的严肃斗争的前景实际上是大有希望的，尽管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企业方面的反对。正如迈克尔·哈林顿所指出的，“有组织的劳工势必会成为任何争取有保证的工作权的政治运动的先锋。工会在将近三十年前就为了这项要求而进行斗争。自从那个时候以来，它们一直为了实现一系列能刺激经济的人力计划而奋斗，这种刺激的方法

不是给予公司以意外的收入，而是给男男女女安排工作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当然，单靠劳工是不能奏效的。但是它在无产阶级中有着天然的同盟军。这个问题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即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利益必定会由此很明显地汇合在一起。围绕着要求得到有保证的工作权而形成的这种联合，会给整个社会造成许多后果。”<sup>62</sup>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上面最后所提出的主张也只是没有充分说明事实罢了。充分就业会对美国面临的整个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最巨大的影响。

但是，尽管充分就业是可能争取的最迫切和最直接的政治目标，其他许多目标也应当提到。工人所注意的一个进步的问题是城市生活的质量。工人在减少犯罪和污染，改进住房、医疗护理和大众运输系统等实际问题上的利害关系是很明显的。但是，开辟“合乎人性的居住区”的迫切需要并不限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各新村的居民。不同种族的工人阶级的地段事实上往往是城市里最真实的居住区，而工人重视这种居住区的意义的心情，同最热诚地拥护新村的人一样的殷切。

这问题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因为城市地区面临的许多问题可以溯源于各大城市有计划地破坏有机的居住区的方式。城市规划者的理想是就业、住房和各种服务事业都经过规划和协调而成为一体化的居住区，同这一理想相反，大多数城市地区是特殊利益和计较得失心理的混乱产物，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性的需要服从于经济法则。专业化和赚钱这一企业逻辑使装配线上的工作基本上不合人性，这种企业逻辑也使许

多城市同样产生这种情况。正如效率的逻辑把工作变成呆板重复的动作,阻止了社会上的交换和满足一样,专业化把城市分为企业区、闹市和单调的住宅区而不是真正成为一体的居住区,会引起同样紧要的问题。划分地区的法律和建筑的式样是以最明显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这几乎保证一个人的舒适、健康甚至身体安全都直接与其收入成正比。逐渐衰败的中心城市、活动房屋搭盖场,以及有钱人用墙围起来的堡垒,都是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

从充分就业的实际问题,跃进到认真处理恢复居住区生活的解决办法,其间的距离并不象看起来那么大。在特殊利益集团面前,居住区变得无能为力这一现实已广泛地为蓝领工人所了解。有些同马里兰州哥伦比亚市一样的完整“新城市”的试验已经出现。<sup>63</sup> 种族问题在这个地区显然很突出,并构成严重的障碍,但黑人和白人对工人阶级的象样住房的需要给改革提供了真正的机会。种族隔离的明显愿望不会突然消失,但是当新建的(或更可能是重新发展的)没有种族隔离的居住区提供安全的街道和较好的住房以及改进的运输和社会服务,而不是现在的城市为其居民提供的那种前景的时候,很可能这种愿望就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了。

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还有其他对长远的将来更带有推测性的方面。

一个是干脆废除完全死板的体力工作。我们已经指出,有些工作改进计划使工人在工厂的日常活动中起着更加广泛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还在于更为广泛地参加整个企业管理工作的可能性。工人“自治”的一些零散实例已经在西欧出



现,并且从理论上说南斯拉夫就是个典型。\*

但是,两种基本思想是引人注意的。一种是在一个企业里工作的人——扩大地说,即全体人民——对生产什么东西、新投资的种类和数额,以及工业部门属于社会问题而不属于技术或专门问题的所有其他方面,都应该有发言权。

另外一种是没有任何人应当“仅仅”是个工人,一个毕生只做一种简单工作的按时计算的雇工。目前存在着的那种往上移动,只是极少数人能够从一个静止等级逃避到另一个静止等级的有限的出路。长期的要求是打破体力和智力、只用铁锤的人和从来不用铁锤的人的范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改变权力结构,不再象以前那样让一切权力和决策权都集中在一个集团身上,而其他集团不得过问。

虽然多年来否认美国有阶级存在的说法是很流行的,阶级仍然是个铁的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不仅在工厂,而且在社会上以及在全国,蓝领工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始终是次等公民。美国现有的政治民主,即在对立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同民主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有很大的距离。一向作为进步理想的根据的最后问题是真正的民主——人民管理社会上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不把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或一个人所得的收入作为权力或功绩的标准。这是民主理想的最完整的形式。

要建立这样一种民主,那就无可否认地需要采取真正的革命的手段。但是它是这样一种革命,即:虽然它一向作为一

---

\* 实际的现实象历来一样,远远落在理想的后面。由于政府和高级经理人员这二者的影响,工人实际上管理南斯拉夫工业的程度如何是很成问题的。64



种理想而存在着，它同现有的任何国家的实际情况相距太远，以致它是一种还没有名称的革命。本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可是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之外，只在不发达国家出现，而且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工业发达的地区是一种发展的而不是变革的策略。这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往往是学生或知识分子不能正确对待工人们当前的真正问题的原因。对极端贫困的、有时是挨饿的农民具有吸引力的问题和政策，就是不适合美国工人的需要。不管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缺点如何，它们根本不能成为在美国争取真正进步所效法的榜样。

相反，只有把民主扩大到美国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的中心方面，创造一个并不歧视蓝领工人的社会，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就是实现那种一直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民主的理想，实现那些在我们整个历史上都暗中存在的平等和真正大众统治的思想。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情。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许多人可能认为讨论这类问题是极其渺茫而不切实际的。但不把蓝领工人看作是争取进步的真正力量，也同样是错误的。蓝领工人的真正需要会成为进步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一种障碍，如果把所有的神话和优越感都排除掉的话。

马丁·路德·金在逝世以前不久，提到黑人造反时说，“这已经发展成不止是一个单单要求平等的问题。这是为了创建公平，对创造了生产奇迹的制度的一种挑战。”<sup>65</sup>

那些话是他在1968年年中写的，还在白人工人的反抗最初在政治上表现得很混乱以前。但是在那时以来的这些年里

已经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这同一说法也适用于一切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就实际意义来说，不仅创造生产奇迹而且还要创建公平的这种要求，才是本世纪每一次反抗和每一次进步斗争的主要要求。这也是在美国工人日益不满的情况下构成一切复杂问题和复杂事件的基础的中心问题。因此，近些年的纷扰和混乱或许未必是一个“共和世纪”（即在寻求进步中的一个永久性的僵局）的开始，而毋宁是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斗争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 注释和资料来源

## 第一章

1. 坎贝尔·麦康内尔,《经济学》(Campbell R. McConnell, *Economics*, McGraw-Hill Book Co. New York, 1966),第 377 页。
2.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New York, 1967),第 276 页。
3. 赫伯特·马库塞,《线性的人》(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Beacon Press, Boston, 1968),第 27 页。
4. 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震动》(Alvin Toffler, *Future Shock*,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0),第 16 页。
5. 美国劳工部,《职业名称辞典》,1965 年第 1 卷和 1966 年增编。
6. 根据伊丽莎白·沃尔德曼和安妮·扬,《工人的婚姻和家庭特征,1970 年 3 月》,表 Q,第 A21 页(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特别劳动力报告,130)。
7. 根据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72 年,第 222 页,表\*347。

关于认为工人的妻子是“工人阶级”,还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

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同中产阶级的人在一间办公室里长久相处的工人阶级的妻子,将会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把它们带给她的工人阶级社会和她的丈夫。

这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有某些微弱的迹象表明,工人阶级妇女更“适应”于中产阶级的倾向和生活方式。

但是,首先,这类妇女人数很少,因为接触中产阶级的工作往往雇用中产阶级的妇女——例如,招待员通常都是选用能够和中产阶级人们打交道的人;高级行业和金融界很少雇用焊接工的三十五岁的妻子。工人阶级妇女往往在她们家庭附近和在工人阶级地区工作。总经理的秘书通常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而电话接线员和出纳员则常常是工人阶级的妻子和女儿。理查德·汉密尔顿在一份关于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的研究报告中表明,其中百分之五十是工人阶级。

而且,如果我们认为,同中产阶级的接触会使工人阶级的妻子发生根本变化,那么,工业心理学家、独立承包人、人事负责人,以及同蓝领工人一起工作的任何中产阶级的人,都可以被认为会把工人阶级的价值标准带进中产阶级。所以,使用男性职业数字,仍然是实际估计美国社会阶级的最好的方法。

另外,在说明妇女倾向于遵循她们丈夫的政治见解和生活方式的时候,作者并没有表示赞成的意思,这只是一个现有的事实。

8. 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劳工统计手册》,1970年,第57页,表#19。

1969年就业男性白人主要职业分类

专业和技术人员	15.4%	} 31.0% 中产阶级
经理和业主	15.6	
办事员	7.4	} 13.6% 下层中产阶级
销售人员	6.2	
技工和工头	22.0	} 55.3% 工人阶级
机械操作工	20.5	
服务人员	6.3	
杂工	6.5	

黑人对于总数的影响很小,这看来有些奇怪。可是,男性黑人在男性职业结构中占百分之十,即五千万中的五百万。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别对总数影响很小,这正是统计数字的特性。我们会不断看到这点。对黑人状况十分重要的东西,在包括全国的统计数字中并不显得很大。

一般说来,当我们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较时,我们要把黑人工人包括在内,这仅仅是因为,虽然黑人工人总是最穷困的人,他们是工人阶级,并且在今后十年的实际政治生活中,这将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当然,在每种事例中,我们也将单独说明白人工人的情况,这样,比如说黑人的穷困就不致掩盖一个典型的“硬帽工人”的真实状况。

还有一点也需要加以说明。虽然根据我们的定义(大多数工人肯定也有这种见解),领班是“工头助手”,是低级管理人员而不是工人,可是不幸的是,必得把他们留在“工人阶级”范畴之内。其原因是,实际上所有的统计——人口调查局统计和其他统计——都把熟练工人和领班总括在一起,简直没有办法把领班从有关收入等等的统计中排除出去。然而,由于领班是工人阶级中工资最高的部分,因此在大多数指标上更象“中产阶级”,这样,把他们留在工人阶级之内就会使统计数字与这里所表明的想法相冲突,并且肯定不利于这些想法。所以,把领班留在蓝领工人范畴之内,虽然不够精确,可是并没有使这里所表明的观点得到任何不正当的好处。

9. 西摩·沃尔夫宾,《美国社会中的工作》(Seymour Wolfbein, *Work in American Society*, Scott, Foresman and Co., London, 1971),第一章,以及前引《统计摘要》。

10. 前引《统计摘要》。

11. 根据《1980年美国经济》,载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报#1673,第57页,表A24。

12. 前引《统计摘要》。
13. 赫特曼·P. 米勒,《蓝领美国的轮廓——通过人口调查资料得出的看法》,载莱维坦编,《蓝领工人,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论文集》(*Blue Collar Workers, a Symposium on Middle America*, Levitan ed., McGraw-Hill Book Co., New York, 1971),第 51 页。
14. 《1970 年生活费用手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特刊。
15. 根据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 辑, #79。
16. 《工资衡平以满足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及其家属的需要》,1970 年 7 月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致通用汽车公司的声明,第 2—3 页。
17. 根据前引现时人口报告。
18. 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 辑, #78,第 6 页,表 7。
19.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就业和收入》,第 18 卷, #1,1971 年 7 月,第 87 页,表 C-5。
20. 默里·S. 韦茨曼,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技术论文 22,《美国白人和黑人家庭收入分配的交迭的计量》,第 6 页,表 D。
21. 白领家庭收入的全部分配情况如下:

#### 1970 年白领家庭收入

收入(千)	白领总计		办事员和销售人员		专业人员和经理	
	%	累计%	%	累计%	%	累计%
0—7	17.7	17.7	26.1	26.1	12.5	12.5
7—8	5.6	23.3	8.2	34.3	4.2	16.7
8—9	6.4	29.7	7.3	41.6	5.4	22.1
9—10	6.2	35.9	6.7	48.3	6.0	28.1
10—12	12.5	48.4	13.6	61.9	12.0	40.1
12—15	16.2	64.6	12.6	74.5	17.4	57.5
15以上	37.2	100.0	30.1	100.0	42.2	100.0

本表的计算根据是,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 辑, #79,第 13 页,表 3。关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收入各个方面的详尽资料,见现时人口报告,P-60 辑,第 70、72、73、75、78、79、80、83、84 号。

22. 《美国统计摘要》,第 128 页,表 #201。
23.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职业展望手册》,第 376 页。
24. 理查德·F. 汉密尔顿,《美国的阶级和政治》(Richard F. Hamilton, *Clas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New York, 1972),第 163 页。
25. 同上书,第 160 页。



26. 同上书,第 383 页。
27. 同上书,第 165 页。
28. 根据《统计摘要》,第 856、876 页。
29. 根据同上书,第 210 页。
30. 威廉·斯普林、B. 哈里森和 T. 维托里兹,《失业者的危机——在大部分内城,百分之六十的人的收入不足以维持象样的生活水平》,载《纽约时报杂志》,1972 年 11 月 5 日,第 44 页。
31. 根据前引《劳工统计手册》,第 57 页,表 19,以及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 辑,\*80,第 120 页,表 56。
32. 根据《统计摘要》,1972 年,第 222 页,表 347,以及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 辑,\*78,第 6 页,表 7 和\*80,第 110 页,表 50。
33. 雷克斯·哈德斯蒂,《变化着的美国劳工队伍》,载《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2 年 11 月,第 16 页。

## 第 二 章

1. 罗伯特·布劳纳《美国工业中的对工作疏远感和自由散漫》(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in American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一书是差不多十年前的旧书了,可是在有系统地对不同的工人阶级工作情况进行比较方面,它仍是最好的著作之一。它的唯一欠缺是没有包括机器操作这类工作。他的比较只限于印刷工人、纺织工人、汽车工人和化学工厂工人。
2. 彼得·宾曾,《美国的白人城》(Peter Binzen, *Whitetown, U. S. A.*, Vintage, 1970, New York),第 299 页。
3. 约翰·海恩斯,《新工人》,载《新世代》,1970 年秋季号,第 4 页。
4. 根据雷金纳德·卡特《非劳动活动相对于劳动活动来说不断增加的神话》一文中的资料,载《社会问题》,1970 年夏季号,第 60 页。
5. 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地区工资调查》,公报 1660-91,第 52 页,表 B-1。
6. 贾德森·古丁,《装配线上蓝领工人的苦闷》,载《幸福》月刊,1970 年 7 月,第 71 页。
7. 海恩斯,前引文,第 6 页。值得指出的是,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的社会行动负责人所写的这篇论文即使在今天也是关于青年工人的最好短文。尽管它是在两年以前写出的,它是以在几处城市中实际直接访问资料为根据的少数论文之一。参阅约翰·麦古金,《仲裁人的好机会》,载《劳工法评论》,1971 年 10 月。
8. 这两处分析都来自威廉·H. 利维,《工会车间代表的仲裁和反抗》,载《仲裁杂志》,1972 年 3 月,第 22—23 页。

9. 巴巴拉·加森,《洛兹城的机器破坏者》,载《哈泼斯》月刊,1972年6月,第68页。
10. 海恩斯,前引文,第4—5页。
11. 乔治·斯特劳斯,《工厂中变动着的力量均势》,载《劳资关系》,第1卷,第3号,1962年5月,第86—87页。
12. 这四个事件的材料来源分别为:
  - 弗兰克·沃利克,《美国工人:一个受危害的种类》(Frank Wallick, *The American Worker: an Endangered Species*,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72),第157页。
  - 霍默·比加特,《肺病问题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州黑兹尔顿铍精炼厂的灾害》,载《纽约时报》,星期日版,1972年10月29日,第58页。
  - 罗伯特·维尔,《受攻击的石棉》,载《新共和》杂志,1972年7月8日,第13—14页。
  - 劳伦斯和奥尔特曼,《关于难于确诊的疾病,医生有大量工作要做》,载《纽约时报》,1972年3月20日,第43页。
13. 拉尔夫·纳德,《疏忽的暴行》,载《民族》周刊,1969年2月10日,第44页。  
小费利克斯·贝莱尔,《美国劳工机构在安全问题上获胜》,载《纽约时报》,1972年4月16日。布伦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顿,《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Brendan and Patricia Sexton, *Blue Collars and Hard Hat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1),第103页。
14. 弗兰克·沃立克,前引书,第2、4、7、42页。
15. 同上书,第53页。
16. 同上。
17. 《工人的赔偿金——救助受伤者》,载《新共和》杂志,1972年9月16日,第12—13页。
18. 例如参阅约翰·莱格特和克劳德特·塞尔文卡,《再谈劳工统计》,载《社会》杂志,1972年11/12月,第99页,以及A. H. 拉斯金,《失业——百分之六只是冰山的尖顶》,载《纽约时报》,1972年6月25日,第4组,第4页。关于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参阅詹姆斯·丹尼尔,《五百万失业者——多么大的危机》,载《读者文摘》,1972年6月。
19. 安·M. 扬和科普·米切洛蒂,《1970年度人口工作经验资料》,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年12月,第42页。
20. 同上书,表4,第42页。
21. 同上。
22. 收入资料引自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辑,\*80,第118页,表55。失业数字引自上述扬和米切洛蒂的论文。
23. 肯尼思·拉森,《工人》(Kenneth Lasson, *The Workers*, Grossman, New

- York, 1971), 第 157、161 页。
24. 沃思·贝特曼和乔迪·艾伦,《收入维护,获得者和支付者》,载莱维坦编,《蓝领工人》,第 307—14 页。
  25. 引自《蓝领工人世界》,载《异议》杂志,1973 年冬季号,第 29 页。
  26. 引自弗雷德·哈里斯,《蓝领工人的愤怒》,载莱维坦,前引书,第 354 页。
  27. 迈克尔·詹森,《美国的养老金制度——一千三百五十亿美元的问题》,载《星期六评论》,1972 年 4 月 8 日,第 42 页。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见于例如罗伯特·D. 保罗,《养老金是一个不会退休的问题》,载《纽约时报》,第 3 组,第 14 页,星期日版,1972 年 10 月 22 日。
  28. 彼得·亨利,《有关收入的退休福利金的最近趋势》,载《劳工每月评论》,1972 年 6 月,第 14 页。
  29. 《纳德把私人养老金制度叫作骗局》,载《纽约时报》,1972 年 5 月 25 日,第 65 页,以及《保护养老金的新压力》,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1 年 10 月 11 日,第 40 页。
  30. 这些事情见:
    - 詹森,前引书,第 43—45 页。
    - 拉尔夫·纳德,《养老金大骗局》,载《进步》杂志,1971 年 10 月,第 18—19 页。
    - 《私人养老金计划:国会考虑采取行动》,载《国会季刊》,1972 年 4 月 15 日,第 848 页。
    - 《保护养老金的新压力》,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 年 10 月 11 日,第 41 页。
  31. 亨利,前引文,第 17 页,表 6。
  32. 彼得·L. 彼得曼,《城市工人的小额优惠》,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 年 11 月,第 42—43 页。
  33. 同上。

### 第 三 章

1. 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 辑,\*79,表 3,第 13 页。
2. 社会研究所调查研究中心,《消费者财力调查》(Survey Research Center, ISR,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Michigan, 1970),流动资产资料第 99 页,表 6-2,假期资料第 93 页,表 5-18,分期付款债务资料第 23 页,表 2-3。
3. 同上。
4. 伊莱·金斯伯格,《往远看》,载莱维坦编,《蓝领工人》,第 29 页。
5. 《消费者财力调查》,第 23 页,表 2-3。
6. 《商业周刊》,1972 年 8 月 12 日,第 85 页。

7. 布伦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顿,《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第 155 页。
8. 这些统计数字的来源是:  
     联邦所得税资料:阿诺德·坎托,《靠不住的公平征税途径》,载《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3 年 4 月,第 1 页。  
     州和地方资料:迪克·内泽尔,《可见的税制》,载前引《蓝领工人》,第 259 页。  
     社会保险税资料:《养老补助金和上升的费用》,载《纽约时报》,1972 年 12 月 24 日第 28 页,以及路易斯·霍兰德,《社会保险改革》,载《纽约时报》,1973 年 1 月 3 日,第 37 页注。  
     财产税资料:《即将到来的财产税的改变》,载《商业周刊》,1972 年 2 月 12 日,第 50 页,以及内泽尔,前引文。
9. 纳特·戈德芬格,《对工人的经济压榨》,载《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2 年 12 月,第 7 页。
10. 爱德华·科恩,《怀疑论者一年之后发现经济控制工作成绩出乎意料》,载《纽约时报》,1972 年 8 月 11 日,第 57 页。
11. 迈克尔·哈林顿,《劳工的基本要求》,载《新领袖》,1971 年 2 月 22 日,第 13 页。
12. 阿瑟·B. 肖斯塔克,《蓝领生活》(Arthur B. Shostak, *Blue Collar Life*,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9),第 113 页。
13. 彼得·宾曾,《美国的白人城》,第 81 页。
14. 同上书,第 228 页。
15. 同上。
16. 理查德·J. 克里克斯,《组织街坊:加里和纽瓦克》,载《异议》杂志,1972 年冬季号,第 108 页。
17. 宾曾,前引书,第 28 页。
18. 威廉·B. 弗朗,《一个感情疏远的选民侧影》,载《星期六评论》,1972 年 7 月 29 日,第 49 页。
19. 巴巴拉·布兰特和戈登·费尔曼,《工人阶级提出抗议,反对一条城市公路》,载《环境和行为》,1971 年 3 月,第 63—79 页。
20. 塞缪尔·鲍尔斯,《徒劳无益:计划中的阶级停滞》,载《社会》,1972 年 6 月,第 47 页,表 2。
21. 宾曾,前引书,第 56—57 页。
22. 埃文·詹金斯,《为学校筹集经费的混乱和不公正办法》,载《纽约时报》,1973 年 3 月 11 日,第 1、52 页。
23. 鲍尔斯,前引文。
24. 罗伯特·施兰克和苏珊·斯坦,《渴望、学习和地位》,载前引《蓝领工人》,第 324—25 页。



25. 美国劳工部人力管理署,《个人前程的开始》,人力研究专论,第16号,第1卷,第37页。
26. 维拉·C. 佩雷拉,《新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载《劳工每月评论》,1973年2月。
27. 职业变动统计数字根据彼得·M. 布劳和奥蒂斯·D. 邓肯,《美国职业结构》(Peter M. Blau and Otis D. Duncan,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1967),第496页,表J-2-1。
28. 《全国谘询委员会关于国内骚动的报告》(*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Bantam, New York, 1968),第267页。
29. 比尔·科瓦奇,《调查表明,犯罪率远远高于报告的数字》,载《纽约时报》,1973年4月27日,第1页。
30. 乔治·盖洛普,《关于美国国内犯罪问题的特别报告》,载《盖洛普民意测验索引》,1973年1月,第3—14页。
31. 《犯罪调查表明,逮捕率很高》,载《纽约时报》,1972年10月19日,第12页。
32. 唐纳德·马修斯,《美国参议员的社会阶级背景》,载保罗·布卢姆伯格编,《社会阶级的影响》(Paul Blumberg, ed.,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2),第314页。
33. 海恩斯·约翰逊和尼克·科茨,《工会》(Haynes Johnson and Nick Kotz, *The Unions*, Pocket Books, New York),第92页。
34. 欧文·罗斯,《劳工竭力争取保护主义》,载《幸福》月刊,1973年3月,第94页。
35. 《美国电讯工人工会新闻》,1972年11月,第6—7页。
36. 此项大事记的资料来自:
  - 弗兰克·沃利克,《美国工人:一个受危害的种类》。
  - 费利克斯·贝莱尔,《美国劳工机构在安全问题上获胜》,载《纽约时报》,1972年4月16日,第44页。
  - 费利克斯·贝莱尔,《劳工批评工作安全法》,载《纽约时报》,1972年4月29日,第63页。
  - 《工业的墓地》,《纽约时报》(社论),1972年9月30日,第30页。
  - 费利克斯·贝莱尔,《工作安全诉讼激怒美国助手》,载《纽约时报》,1973年1月7日,第48页。

## 第 四 章

1. 罗伯特·科尔斯,《了解白人种族主义者》,载《纽约图书评论》,1971年12月30日,第13—14页。
2. 汤姆·卡恩,评论阿诺德·贝奇曼的《关于美国的九种谎言》,载《美国劳工联



- 合》月刊,1973年2月,第23页。
3. 西摩·M. 利普塞特,《工人阶级权力主义》,载保罗·布卢姆伯格编《社会阶级的影响》,第336页。
  4. 钱德勒·戴维森,《关于两个种族的政治学》(Chandler Davidson, *Biracial Politic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Baton Rouge, 1972),第147页。戴维森对利普塞特作了详尽而精采的批评;西德尼·M. 佩克,《思想意识和政治社会学:利普塞特的“政治人”的保守主义偏见》(载《美国天主教社会学评论》,1962年夏季号)也论证了研究的偏见。前引理查德·汉密尔顿《美国的阶级和政治》也提出了不利于利普塞特的证据。其他来源包括路易斯·利普西茨,《工人阶级权力主义:重新评价》,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65年2月。
  5. 理查德·汉密尔顿,《美国的阶级和政治》,第456—57页。
  6. 参阅“可允许的选择差误”表,这些是《每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索引》的附录。
  7. 汉密尔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白人的强烈反应》,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以及汉密尔顿,《黑人的要求,白人的反应和自由主义者的惊恐》,载莱维坦编,《蓝领工人》。
  8. 汉密尔顿文,载前引《蓝领工人》,第135页。
  9. 来自汉密尔顿文,载前引《异议》杂志,第225—27页。
  10. 汉密尔顿文,载前引《蓝领工人》,第141页。
  11. 安格斯·坎贝尔,《白人对黑人的态度》(Angus Campbell, *White Attitudes Toward Black Peopl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n Arbor, Michigan, 1971),第52页。
  12. 霍华德·D. 汉密尔顿,《黑人白人混合居住问题公民投票的投票情况》,载《社会科学季刊》,1970年12月,第721页。
  13. 同上,第728页。
  14. 詹姆斯·W. 范德·赞登,《种族隔离问题公民投票的结果》,载《舆论季刊》,XXV(1961年),第105页。
  15. 戴维森,前引书,第7章。
  16. H. 爱德华·兰克福德,《蓝领工人的愤怒:对学生和黑人抗议的反应》,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72年6月,第339页。
  17. 理查德·汉密尔顿文,前引《蓝领工人》,第149页。又参阅安德鲁·格里利和保罗·希茨利,《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态度》,载《美国科学》月刊,1971年12月。
  18. 科尔斯,前引书,第12页。
  19. 斯塔兹·特克尔,《一个钢铁工人的意见》,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第12号。
  20. 不幸的鼓吹者是马丁·帕钦,《社会阶级和对外交政策的态度的各方面》,载

- 《社会科学季刊》，1970年12月。另外的支持来自：詹姆斯·D. 赖特，《生命、时间和战争的命运》，载《学报》杂志，1972年1月；R. 汉密尔顿，《美国的阶级和政治》，第453页；菲利普·康弗斯和霍华德·舒曼，《缄默的多数和越南战争》，载《美国科学》，1970年6月。
21. 根据安德鲁·格里利，《美国白人各种族的政治态度》，载《舆论季刊》，1972年夏季号，第215页，表L。
  22. 罗伯特·艾布尔森和菲利普·津巴多，《为和平奔走：志愿人员手册》(Robert P. Ableson and Philip Zimbardo, *Canvassing for Peace: A Manual for Volunteers*, Ann Arbor, Michigan, 1970), 第29页。
  23. 哈伦·哈恩，《关于战争的公众情绪的相互关系：关于越南问题的地方公民投票》，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64卷，第1190页。
  24. 本表的资料来源分别为：兰斯福德，前引书，第399页，以及理查德·莱蒙，《不安的美国人》(Richard Lemon, *The Troubled American*,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71), 第163页。最后三个问题来自布卢门撒尔、卡恩、安德鲁斯和黑德，《为暴行辩护——美国人的态度》(Blumenthal, Kahn, Andrews, and Head, *Justifying Violence—Attitudes of American Me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n Arbor, Michigan, 1972), 第76页。
  25. 布伦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顿，《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第52—53页。
  26. 《新共和》杂志，1972年11月18日，第33页。
  27. 引自理查德·M. 斯卡蒙和本·J. 沃顿伯格，《真正的多数》(Richard M. Scammon and Ben J. Wattenberg, *The Real Majority*,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Inc., New York, 1970), 第62页。托马斯·佩蒂格鲁、罗伯特·赖利和里夫·范纳曼也注意到华莱士选票的阶级性质，见《乔治·华莱士的选民》，载《今日心理学》，1972年2月，第47页。
  28. R. 汉密尔顿文，载前引《蓝领工人》，第144页。
  29. 斯卡蒙和沃顿伯格，前引书，第191页。
  30. 同上书，第192页；《候选人华莱士谈税收和就业》，载《商业周刊》，1972年4月29日，第60—64页。
  31. 《纽约时报》发表了三篇关于伯顿的文章。头一篇在1972年5月14日，第58页；第二篇在1972年11月7日，第23页；第三篇在1972年11月8日，第34页。上面引文选自这三篇文章。
  32. 《盖洛普民意测验索引》，1972年11月。关于这些民意测验，我在现在使用它们时，如果看来好象是和我以前所说的话不一致，那么，答案在于两种事实：第一，只有百分之十三的黑人选举尼克松，因此尼克松的总数差不多只相当于对白人的调查。第二，当谈到国家政策和人们的看法相反时，男子和妇女、南部和北部的再分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33. 《盖洛普民意测验索引》，1972年10月。
34. 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揭穿了尼克松何以获胜的理论》，载《亚特兰大宪法报》，1972年12月14日，第24-A页。
35. 弗雷德·哈里斯，《蓝领工人的愤怒》，载前引《蓝领工人》，第351页。
36. 戴维森，前引书，第219页。

## 第五章

1. 海恩斯·约翰逊和尼克·科茨，《工会》，第17页。
2. 杰克·纽菲尔德和杰夫·格林菲尔德，《人民党宣言》(Jack Newfield and Jeff Greenfield, *The Populist Manifesto*, Praeger, New York), 第164页。
3. 《新的研究表明，有一个工会是有好处的》，载《机工报》，1972年12月7日，第1页。
4. 引自《劳联-产联新闻》，1973年3月31日，第3页。
5. B. 罗森堡和S. 瓦因曼访问迈拉·沃尔夫冈，《有工作的青年妇女》，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第30页。
6. 《全国工会和雇员联合会名录》，1971年，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报1750，第74页。
7. 同上书，第75页。
8. 安·M. 扬和科普·米切洛蒂，《1970年度人口工作经验资料》，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年12月，第42页。
9. 见《木工》和《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杂志》最近几期。
10. 《建筑业抑制暴行的新步骤》，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3年5月28日，第101页。
11. 约翰逊和科茨，前引书，第8章。
12. 亲自采访。
13. 亲自采访。
14. H. 哈默曼，《建筑业在职工人工会中的少数民族》，载《劳工每月评论》，1973年5月，第44页。
15. 约翰逊和科茨，前引书，第187页。
16. 哈默曼，前引文，第44页。
17. 布伦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顿，《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第269页。
18. 《反对工龄问题上的偏见》，载《商业周刊》，1973年2月10日，第56页。
19. 塞克斯顿，前引书，第269页。
20. 亲自采访。
21. 见例如伯顿·H. 霍尔，《工会中的专制和造反》(Burton H. Hall, *Autocracy and Insurgency in Organized Labor*, Transaction Books, New Brun-

wick, N. J. 1972)。

22. 亲自采访。
23. J. 哈钦森,《乔治·米尼和刚愎自用者》,载《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1971年冬季号,第56—57页。
24. 戴维·希普勒,《研究表明,市建筑业每年支付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贿赂》,载《纽约时报》,1972年6月26日,第26页。
25. 查尔斯·史蒂文森,《建筑业中恐怖主义肆虐》,载《读者文摘》,1973年6月,第89页。
26. 引自约翰逊和科茨,前引书,第171页。
27. 杰克·巴巴什,《美国工会》(Jack Barbash, *American Union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7),第40页。
28. 迈克尔·哈林顿,《另一个美国》(Michael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Penguin, New York, 1964),第28页。
29. 见B. 霍尔,《餐馆工人工会:克扣工人》,载《民族》周刊,1968年1月22日,以及M. 卡普兰,《工会欺骗退休法官》,载《纽约时报》,1973年2月16日,第26页。
30. 德里克·博克和约翰·邓洛普,《劳工和美国社会》(Derek Bok and John Dunlop, *Labor and the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70),第90页。
31. 亲自采访。
32. 霍尔,前引文。
33. H. W. 本森,《漠不关心和其他通则:把工会反对者逐出历史》,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第220页。又参阅B. J. 威迪克,《底特律:种族和阶级暴行的城市》(B. J. Widick, *Detroit: City of Race and Class Violence*, Quadrangle Books, Chicago, 1972),第43页。
34. G. 斯特劳斯,《工厂中变动着的力量均势》,载《劳资关系》,第1卷,第3号,1962年5月,第86—87页。
35. 亲自采访。
36. 《劳工赞成和平》,1968年1月,第3页。
37. 《劳工新左翼发动一次进攻》,载《商业周刊》,1972年7月1日,第15页。
38. 《劳工注视第九十二届国会》,劳联-产联立法报告,1972年12月。
39. 约翰逊和科茨,前引书,第77页。
40. 同上书,第96页。
41. 《全体国会议员的压力集团比额》,载《国会季刊每周报告》,1972年4月29日,第934—41页。
42. 这些引文选自以下资料来源:
  - (1) 《劳联-产联新闻》,1973年1月20日,第4—5页。



- (2) 《这些是我们的根基》，载《钢业劳工》，1972年12月，第10页。
- (3) 同上，1973年3月，第16页。
- (4) 《电讯工人工会新闻》，1972年5月，第3页。
- (5) 《机工报》，1972年9月14日，第8页。
- (6) 《电讯工人工会新闻》，1972年9月，第3页。

## 第 六 章

1. (a) 《装配线上由无聊带来的麻烦》，载《生活》周刊，1972年8月。  
 (b) 巴巴拉·加森，《洛兹城的机器破坏者》，载《哈泼斯》月刊，1972年6月。  
 (c) 《弄钱的人》，载《新闻周刊》，1972年2月7日。  
 (d) 杰弗里·诺曼，《蓝领怠工者》，载《花花公子》杂志，1972年8月。
2. 贾德森·古丁，《装配线上蓝领工人的苦闷》，载《幸福》月刊，1970年7月，第71页。
3. 贝内特·克雷门斯，《这种骚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第24页。
4. 同上。
5. 阿吉斯·萨尔普基斯，《青年工人破坏通用汽车公司的主要工厂》，载《纽约时报》，1972年1月23日，第41页。
6. 拉塞尔·吉本斯，《洛兹城的摊牌》，载《公共福利》周刊，1972年3月3日，第523页。
7. 根据1972年《统计摘要》，第105页。
8. B. J. 威迪克，《黑人城市，黑人工会》，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以及《工厂中暴行》，载《新闻周刊》，1970年6月29日，第142页。
9. 同上两文。参阅《工厂中的地狱》，载《时代》周刊，1971年6月7日，以及《行刺米德的工人被判处十四年徒刑》，载《亚特兰大宪法报》，1971年12月18日。小约翰·H. 麦古金，《仲裁人的好机会：通用汽车公司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争论什么》，载《劳工法评论》，1971年10月，第647页。
10. 威迪克，前引文，第142页。
11. 克雷门斯，前引文，第25页。
12. H. 谢泼德和 N. 赫里克，《机器人都到哪里去了？》(H. Sheppard and N. Herrick, *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72), 第134—44页。
13. 托马斯·布鲁克斯，《工会中黑人高潮》，载《异议》杂志，1971年夏季号，第125页。
14. B. J. 威迪克，《各工会中的少数民族力量》，载《民族》周刊，1969年9月8日；参阅威廉·B. 古尔德，《白人工会中的黑人工人》，载《民族》周刊，1969年9月8日，以及布伦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顿，《劳工的十年——或许是》，



- 载《异议》杂志,1971年7月。
15. 威廉·艾博特,《公共工程工人改造劳工》,载《民族》周刊,1971年5月24日,以及塞克斯顿,前引书,第649页。
  16. 布伦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顿,《劳工的十年——或许是》,载《异议》杂志,1971年夏季号,第365页。
  17.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手册》,第340—41页,表153。
  18. 德里克·博克和约翰·邓洛普,《劳工和美国社会》,第244页。
  19. 上节资料来自斯坦利·韦尔,《美国——劳工造反》,载莫里斯·蔡特林编,《美国社会大公司》(Maurice Zeitlin, ed., *American Society Inc.*, Markham Publishing Co., Chicago, 1971),第480页。
  20. 本节资料来源:韦尔,前引文;《上吊桥》,载《新闻周刊》,1971年6月24日;伯顿·霍尔(编),《工会中的专制和造反》。
  21. 这一清单的资料来源如下:
    - (a) 《各族人来了》,载《新闻周刊》,1972年4月3日,第86页;弗雷德·巴巴什,《联合反对街区破裂》,载《民族》周刊,1972年4月17日,第496—97页;约翰·赫伯斯,《种族集团中的一千六百人组织抗议他们认为在破坏城市的机构》,载《纽约时报》,1972年3月20日,第29-c页。
    - (b) 理查德·克里克斯,《组织街坊:加里和纽瓦克》,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第25页。克里克斯,《白人各种族》,载《城市》杂志,1971年5—6月。
    - (c) 弗赖伊·盖拉德,《底特律的波兰人同黑人联合》,载《种族关系记者》杂志,无日期。
  22. 这些事实来自:
    - (a) 帕特·沃特斯,《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第70页;威廉·T. 伦德伯格,《黑人和白人林业工人在南部组成新工会》,载《新领袖》周刊,1972年3月6日,第10—12页;史蒂夫·马丁,《南部松林中的怒火》,墨西哥湾沿岸纸浆原料业联合会的小册子,无日期;《密西西比:奇异的联盟》,载《新闻周刊》,1971年11月9日;比尔·格雷,《伐木工人的呼吁》,载《大斑鸟》杂志,1972年2月21日,第15页;凯西·卡恩,《纸浆原料业罢工:密西西比州黑人和白人同心协力》,载《今日南部》,无日期;彼得·巴恩斯,《纸浆原料业的雇用日工》,载《民族》周刊,1972年3月18日,第15页。
    - (b) 卡尔·E. 法里斯,《南卡罗来纳州钢铁工人罢工》,载《自由之路》,1971年第二季度,第178页。
    - (c) 钱德勒·戴维森,《两个种族的政治学》;小吉恩·格雷罗,《纺织业罢工:代表工人新精神的不同种族的共同努力》,载《今日南部》,无日期;(南

- 部研究所)《佛罗里达州农业综合企业和工会斗争》，载《大斑鸟》杂志，1972年2月14日，第14页。
23. (a) 伦德伯格，前引文，第12页。  
(b) 法里斯，前引文，第187页。  
(c) 沃特斯，前引文，第71页。
  24. 《盖洛普民意测验索引》，1972年11月。
  25. 《黑人劳工和白人》，载《新共和》杂志，1973年1月27日，第12页。
  26. 休·内申斯，《小地区最公共的住房》，载《亚特兰大宪法报》，1971年4月4日，第11页。
  27. 见例如《机工报》，1972年8月。

## 第七章

1.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就业和收入》，第19卷，第9号，1973年3月，图7，第11页。
2. 伊娃·米勒，《扩展经济中的技术进步》(Eva Mueller, *Technological Advanc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 1969), 第10页。
3. 《技术改革的控制办法》第IV-B节中可看到一些例子，见马克斯·沃特曼编《劳工的紧要问题》(Max Wortman, ed., *Critical Issues in Labor*,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Limited, 1969), 第175—224页。
4. 唐纳德·N. 迈克尔，《电子计算机控制：无声的征服》，见安德鲁·哈克编，《公司接管》(Andrew Hacker, ed., *The Corporation Takeover*, Anchor Books, New York, 1964), 第193页。
5. 本·塞利格曼，《自动化和工会》，见欧文·豪编，《激进派的文件》(Irving Howe, ed., *The Radical Papers*, Anchor Books, New York, 1965), 第223页。
6. 保罗·N. 齐默勒，《向众议院银行通货特别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提出的陈述》，见《工业位置政策》(*Industrial Location Policy*,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第316页。
7. 肯尼思·佩顿的陈述，见齐默勒，前引书；琳达·格林豪斯，《工作职位的增加在郊区提出了问题》，载《纽约时报》，1971年8月18日，第47页，第1栏。
8. 佩顿，同上。
9. 比尔·科林斯，《南部工厂的增长速度超过全国》，载《亚特兰大日报》，1972年8月21日，第10—11页；詹姆斯·L. 斯特恩，《工会和自动化》，载《进步》杂志，1967年2月，第25页。并参阅《工业不停地向南部转移》，载《商业周刊》，1973年7月19日，第62—64页。

10. 约翰·格林和阿伦·格萨克,《劳工:寻求偏狭性》,载《公司财务》,1971年3—4月,第60页。
11. 《工作都到哪里去了?》,载《福布斯》,1972年8月1日,第17页;利奥·芬斯特,《底特律成为多国的》,载《民族》周刊,1973年3月12日,第326页;欧文·罗斯,《劳工竭力争取保护主义》,载《幸福》月刊,1973年3月,第95页。
12. 《反对美国保护主义的公约》,载《商业周刊》,1973年3月31日,第78页。
13. 《墨西哥边境的商业小繁荣》,载《商业周刊》,1972年1月22日,第36、38页;罗伯特·D. A. 肖,《国外投资和全球的劳工》,载《哥伦比亚世界商业杂志》,1971年7—8月,第329页。
14. 引自赫伯特·梅尔的陈述,《美国国会两院经济委员会关于对外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一项对外经济政策》,1970年,第823页。关于朝鲜和台湾的资料,来自本·沙曼,《自由贸易》,载《机工报》,1973年5月24日,第8页。
15. 格斯·泰勒,《多国公司:全球性的威胁》,载《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2年7月,第4页。
16.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2年3月27日,第57—59页。
17. 泰勒,前引文,以及芬斯特,前引文。在有关职业外流数目的不断争论中,主要文件是美国商务部关于“多国公司”的报告。
18. 伦纳德·伍德科克,《迫使国际公司负起社会责任》,载《纽约时报》,1973年1月7日,第3组,第34页。
19. 詹姆斯·P. 格兰特,《全球失业危机》,载《外交》季刊,1971年10月,第116页。
20. 见例如安·塞德曼,《亚洲经济学教科书》(Ann Seidman, *An Economics Textbook for Africa*, London, Methuen & Co., 1969),第4部分,“对外贸易”。
21. 欧文·罗斯,前引文;美国国务院,《问题》(*Issues*, publication #8546,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第20页。
22. 《日本:进一步寻求廉价的亚洲劳工》,载《商业周刊》,1973年3月31日,第40页。
23. 丹尼尔·贝尔,《后期工业社会的劳工》,载《异议》杂志,1972年冬季号,第166页。
24. 《福布斯》前引文《工作都到哪里去了?》,第17页。
25. 见例如贾德森·古丁,《唤醒蓝领工人是合算的》,载《幸福》月刊,1970年9月;《装配线上蓝领工人的苦闷》,载《幸福》月刊,1970年7月。
26. 本节资料包括在下列论文之内(虽然有些重叠之处,但大体上是按照资料出现的先后次第排列的)。戴维·詹金斯,《工厂里的民主》,载《大西洋》月刊,

- 1973年4月;《工作无聊:谁想工作?》,载《新闻周刊》,1973年3月26日;《同对工作厌烦的情绪进行斗争的最近行动》,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2年12月25日;阿吉斯·萨尔普基斯,《汽车工人有了对装配线的发言权》,载《纽约时报》,1972年6月19日,第1页;《摩托罗拉公司创造了一种要求更高的工作》,载《商业周刊》,1971年9月4日;《工厂:碰壁的技艺》,载《新闻周刊》,1971年8月2日;安德鲁·H.马尔科姆,《更多的美国公司减低了工人的厌倦情绪》,载《纽约时报》,1972年5月15日,第53页;《新工具:对提高工作质量的支援》,载《商业周刊》,1971年12月18日。
27. 菲利普·沙别科夫,《重新设计无聊的工作:领袖们谨慎小心》,载《纽约时报》,1973年1月7日,第F-17页。
  28. 托马斯·R.布鲁克斯,《工作满意:难以捉摸的目标》,载《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2年10月,第3页。参阅威廉·冈伯格,《工作满意,拣出废话》,载《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3年6月,第14—19页;莱维坦和约翰逊,《工作重新设计》,载《劳工每月评论》,1973年7月,第35—41页。
  29. 《生产:装配组》,载《新闻周刊》,1972年8月21日,第69页。
  30. 见例如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提高生产率:劳资双方的办法》,公报1715,1971年9月。
  31. 迈克尔·哈林顿,《尼克松先生的反动的革命》,载《公共福利》周刊,1971年11月26日,第200页。
  32. 见例如劳联-产联立法报告,《劳工注视第九十二届国会》,1972年12月和前一年。
  33. 哈林顿,前引文,第200页。
  34. 戴维·戴奇,《第二阶段:它能工作吗?为谁工作?》,载《民族》周刊,1971年12月27日,第680页。
  35. 见例如《劳工观察经济,1973年》,载《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3年3月,第10页。
  36. B. J. 威迪克,《尼克松的硬帽工人战略》,载《民族》周刊,1972年12月18日,第615页。
  37. 乔治·米尼,《布伦南的退却》,载《劳联-产联新闻》,1973年4月14日,第4页。
  38. 《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新盟友》,载《商业周刊》,1973年2月2日,第86页。
  39. 同上。
  40. 《商业周刊》,1973年2月24日,第19—20页。
  41. 丹尼尔·兹维德林,《贫穷和环境污染》,载《进步》杂志,1973年1月。
  42. 亲自访问弗兰克·沃利克,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华盛顿消息》的主编。
  43. 保罗·威克,《劳工的巴坎》,载《新共和》杂志,1973年3月24日,第15页。
  44. 同上。



45. 同上。参阅《劳工和民主党人》，载《新共和》杂志，1973年6月30日，第10页。
46. 见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华盛顿消息》，1973年3月12日；《机工报》，1973年3月15日。
47. 《公务员》，第38卷，第3号，1973年3月。
48. 《黑人工会会员联盟安排第二次年会》，载《公务员》，第38卷，第4号，1973年4月。参阅《黑人工会会员召开首次大会》，载《公务员》，1973年6月，第7页。
49. 纽约建筑业是一个例子。
50. 弗兰克·沃利克，《美国工人：一个受危害的种类》，第142—44页。
51. 《人人都有工作：快了吗？》，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1年8月2日；《关于为失业者找公职工作的争论》，载《商业周刊》，1972年12月9日。
52. 纳特·戈德芬格，《充分就业：被忽视的政策》，载《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2年11月，第7页。
53. 亲自采访：三家大汽车公司之一的一个雇工负责人这样说的。
54. 《商业周刊》，1972年12月9日，第102—4页。
55. 杰里·伍尔夫，《职业危机——发掘公用事业的潜力》，载《美国劳工联合》月刊，1971年8月，第24页。
56. 保罗·德莱尼，《根据工作福利计划有82,075人找到了工作》，载《纽约时报》，1973年4月20日，第34-C页；迈克尔·哈林顿，《政府应该是头一个雇主》，载《纽约时报杂志》，1972年3月26日，第44页。
57. 从瑞典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是也有许多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不同之处，这里篇幅有限，不能详细论述。下列论文对瑞典的人力政策作了一些说明：《天堂里的麻烦》，载《福布斯》，1972年4月1日；查尔斯·D. 斯图尔特，《瑞典的劳工市场和人力政策》，载《成长和改革》，1970年1月；美国劳工部人力管理署，《西欧为难于就业的人创设特别工作》，载《人力研究专论第10号》，1970年；伊莱·金斯伯格，《瑞典的人力政策》，载《人力》，1970年11月。
58. 弗兰克·赖斯曼和艾伦·加特纳，《头一个雇主》，载《民族》周刊，1971年4月5日，第434页。
59. 见例如迪安·A. 武斯特，《超出福利和充分就业之外：没有通货膨胀的最理想的就业经济学》(Dean A. Worcester, *Beyond Welfare and Full Employment: the Economics of Optimal Employment Without Inflation*,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72)。
60. 《关于为失业者找公职工作的争论》，载《商业周刊》，1972年12月9日，第106页。
61. 见乔治·米尼在美国国会两院经济委员会的证词，1968年5月28—29日和



6月4—6日。

62. 哈林顿,前引文,第62页。
63. 见例如小托马斯·C. 沃尔夫在银行通货委员会关于工业位置政策特别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1970年,第67页。
64. 同瑞典相比更是如此,南斯拉夫往往象是一份罗尔沙克测验材料,在其中,任何东西都看得出来。关于工人自行管理的一般情况,见以下各文:  
    J. 奥布拉多维茨、J. R. 芬奇和 W. L. 罗杰斯,《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载《人的关系》,第23卷,第5号; W. F. 格卢克和 O. 卡夫兰,《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载《实业视野》,1972年2月; 约翰·凯斯,《关于一种新社会秩序的想象》,载《民族》周刊,1972年2月14日。
65. 马丁·路德·金,《良心的召唤》,1967年冬季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所作的广播讲演。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